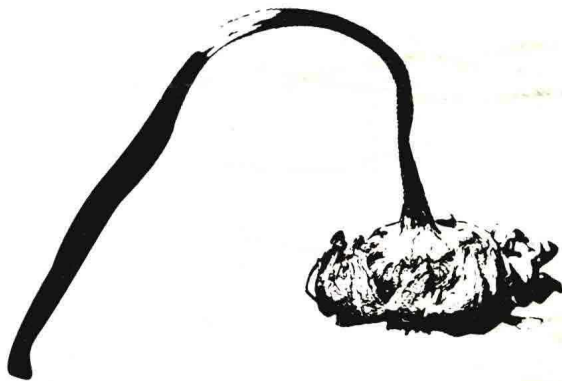

BENDING SPINES

弯曲的脊梁

THE PROPAGANDAS OF NAZI
GERMANY AND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

兰德尔·彼特沃克 (Randall L. Bytwerk) 著 张洪译 上海三联书店



“元首永远正确” 纳粹一年中的神圣节日 纳粹的信仰 “党总是正确的” 崇拜的方式 社会主义信仰 纳粹没有宣传指南 作为马列主义科学的宣传 和谐与争吵 社会主义宣传的结构 作为纳粹宣传员的生涯 东德特色的宣传 现实的地图 元首的媒体 东德的媒体 战败中的胜利 反法西斯主义保护墙 文艺与娱乐 希特勒的文艺政策 社会主义文艺政策 尴尬的文艺表现：幽默与讽刺 来看卡巴莱表演吧 笨蛋都笑了：讽刺性出版物 公共与私人生活 党内高度一致 99% 的选举胜利 临界点 看不见的教会 锋利之剑 一致性的代价 失败的宣传 成功





三
辉
图
书

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都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弯曲，有时是折断人们的脊椎——它们都发现宣传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过程。

为什么极权主义的宣传，比如在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开始时显得卓有成效，最后却导致失败？有效的宣传取决于一系列有说服力的方法——从温和的建议到公开的暴力，二十世纪的独裁者对此都深有体会。从许多方面来看，现代极权主义运动在本质上是宗教性质的世界观，它们提供了对文化、道德、科学、历史和娱乐的方方面面的解释，也提供了人们接受现状的理由。本书考察了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使用的所有说服技巧，并试图指出这两个系统最终失败的原因。

ISBN 978-7-5426-3790-1



定价：38.00元

B E N D I N G S P I N E S

**THE PROPAGANDAS OF NAZI
GERMANY AND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弯曲的脊梁

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

兰德尔·彼特沃克 著

张洪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献给罗伯特·彼特沃克，

给了我一个好的开始

并且一路上给予我不间断的帮助

致 谢

本研究获得了加尔文学院 (Calvin College) 的支持,它提供了一次休假机会,让我可以有时间旅行与研究,同时还有一个有益于写作的环境,而这皆是因为我欲一吐为快而非不得已才去写作的缘故。

位于柏林的德国联邦档案馆内拥有“东德政党与群众组织”基金档案 (SAPMO),那里的档案保管员和图书馆员管理着一个令人舒畅的工作环境,他们熟悉自己的馆藏 (holdings)。

我的同事们花时间阅读了手稿的草稿,并给予回应,这些使我的思考更清晰并将我从错误中解救出来。罗伯特·布鲁克斯 (Robert D. Brooks) 在 30 年前首次激发了我对这一主题的兴趣 (它确实需要一些激励),现在他给了我最有利的建议。John Rodden 也是这样。我的加尔文学院同事 David Diephouse, Barbara Carvill 和 Wally Bratt 都提供了很好的建议。我的部门同事 Quentin J. Schultze 通读了倒数第二稿,这让我想起,在同事中他是多么慷慨大方的一个人。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社的三位同仁审核了手稿,提出了大量建议,对此我深表感谢。

我的那些曾经是民主德国公民的朋友们在诸多方面激发了我的思考。我尤其要感谢的是 Pastor Wolfgang 和 Cornelia Gröger, Kalinkat 一家, Günter Gießler 以及 Christa Fischer。无论在 1989 年

之前还是之后,他们一如既往地提供友谊与殷勤招待。

Sharon 和 David Bytwerk 驱散了我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种种烦恼,使我能在愉悦心情下从事写作。

我要感谢以下文章的出版商允许我将文中的部分内容并入此书。

- 《你们最终还是胜利了:纳粹节日的诸修辞面向》(“Und Ihr Habt doch Gesiegt: Rhetorical Aspects of a Nazi Holiday”),最初发表于 *ETC: A Review of General Semantics* 36 (1979): 134 - 146, 由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General Semantics, Concord, California 出版发行。
- 《笨蛋都笑了:希特勒和昂纳克统治下的讽刺性出版物》(“The Dolt Laughs: Satirical Publications under Hitler and Honecker”),最初发表于 *Journalism Quarterly* 69 (1992): 1029 - 1038.
- 《民主德国宣传的失败》(“The Failure of the Propaganda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最初发表于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5 (1999): 400 - 416.
- 《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The Propagandas of Nazi Germany and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最初发表于 *Communication Studies* 49 (1998): 158 - 171.
- 《民主德国一致性的欢愉》(“The Pleasures of Unanimity in the GDR”),最初发表于 *After the GD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Old GDR and the Young Länder*. (Amsterdam; Rodopi, 2001) 109 - 124.

专有名词及缩写

ADN	德意志通讯社
<i>Bezirk</i>	14个东德专区之一
DAF	德国劳工阵线
DEFA	东德电影制片厂
DSF	德苏友好协会
FDGB	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
FDJ	自由德国青年
<i>Gau</i>	纳粹党的大区
GDR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
GPA	德国宣传档案
<i>Kreis</i>	大致相当于美国的一个郡/县,纳粹党的分区
NSDAP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
OKW	帝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RKK	帝国文化协会
RMVP	帝国公众启蒙与宣传部
RPL	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
SA	“褐衫队”,或纳粹冲锋队
SAMPO	德国联邦档案馆的一部分,东德政党与群众组织记录档案馆
SD	纳粹党卫军情报机构
SED	德国统一社会党
SS	“黑衫队”,纳粹准军事的精英组织,纳粹党卫军
ZK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目 录

致谢	1
专有名词及缩写	1
导论	1
第一章 世俗信仰	
“元首永远正确”	7
纳粹一年中的神圣节日	15
纳粹的信仰	21
“党总是正确的”	26
崇拜的方式	33
社会主义信仰	38
总结	41
第二章 教义	
纳粹没有宣传指南	47
作为马列主义科学的宣传	58
总结	65
第三章 等级结构	
和谐与争吵	68
社会主义宣传的结构	81
总结	85
第四章 福音传播者	
作为纳粹宣传员的生涯	87

东德特色的宣传	98
总结	110
第五章 现实的地图	
元首的媒体	115
东德的媒体	121
战败中的胜利	126
反法西斯主义保护墙	133
总结	139
第六章 文艺与娱乐	
希特勒的文艺政策	143
社会主义文艺政策	151
尴尬的文艺表现:幽默与讽刺	155
来看卡巴莱表演吧	156
笨蛋都笑了:讽刺性出版物	159
总结	173
第七章 公共与私人生活	
党内高度一致	177
99%的选举胜利	181
临界点	183
看不见的教会	196
锋利之剑	203
一致性的代价	207
总结	209
第八章 失败的宣传	
成功	211
失败	218
精选参考文献	232
索引	252

第一章 世俗信仰

1987年,东德作家协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一位长期受到当局容忍的“闹事者”尤根·库钦斯基(Jürgen Kuczinski)提到,他期待着出现一种祈祷的社会主义等价物:“我一直在徒劳地找寻着一种祈祷的替代形式,它能时刻提醒我们,不管在每天或至少每周会面临怎样的困境,遭遇怎样的障碍,社会主义是多么的伟大……我们如何才能一天中有一两次可以提醒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以及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1〕1940年,戈培尔在其日记中也提出了一个相关问题:“当一个人尚没有新的宗教信仰时,他能教给孩子们什么呢?眼前的替代品仅仅是一个替代品而已。”〔2〕他们都在找寻着世俗崇拜的方式。

在本书中,我将把极权主义的宣传行为视作一种准宗教现象。不过,这一思想马上会遭遇两种反对意见:首先,极权主义的定义,甚至其存在本身都是充满争议的。第二,虽然把极权主义看作一

〔1〕 Schriftsteller Verband der DDR, X. *Schriftstellerkongreß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Arbeitsgruppen*. (Cologne: Pahl-Rugenstein, 1988), 24.

〔2〕 Fröhlich,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7:293.

种宗教现象的根源可追溯到埃里克·沃格林,并且近来它在汉斯·迈耶尔(Hans Maier)、迈克尔·巴勒赫(Michael Burleigh)、克洛斯-伊克哈德·巴斯克(Claus-Ekkehard Barsch)以及其他人的作品中又得以复兴,但它仍是理解这些问题的一种非正统方式〔3〕。

- 12 批评“极权主义”概念的论证林林总总,从指控它本身不过是冷战宣传中的一个术语(或措辞),到主张既然事实上没有哪个社会是完全极权主义的,那么这一术语的价值就微乎其微〔4〕。我同意“绝对的极权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既然它反映了20世纪许多独裁国家的目标,纵然其实践未完全实现此目的,“极权主义的”这一术语本身仍然是有用的。历史就是热烈追求许多不可能实现之目标的记录,而极权主义确属此类。

我将在其经典意义上使用“极权主义”这一术语。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致力于对历史的一种完美构想(an ideal vision),并以实

〔3〕 参见 Hans Maier, ed., “Total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Religion”: *Konzepte des Diktaturvergleichs*, 2 vols.,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1996); Michael Burleigh, *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0); Claus-Ekkehard Barsch, *Die politische Relig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Religiöse Dimension der NS-Ideologie in den Schriften von Dietrich Eckardt, Joseph Goebbels, Alfred Rosenberg und Adolf Hitler* (Munich: Wilhelm Fink, 1998)。有关纳粹政治宗教的更早研究包括 Hans Jochen Gamm, *Der Braune Kult: 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Ersatzreligion: Ein Beitrag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Hamburg: Rütten & Loening, 1962) and Klaus Vondung, *Magie und Manipulation: Ideologischer Kult und politische Relig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1)。

〔4〕 有关此术语的可靠的通史,参见 Abbott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The Inner Life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有关此术语对东德之适用性的一个好的评论,参见 Corey Ross, *The East German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DR* (London: Arnold, 2002), 19-43。他发现此术语本质上没有我认为的那样有用。

现这一构想的世界作为自身使命。它拥有一个愿做一切必要之事以达成目标的政党,一个源于天命或历史法则而选择的领袖,一种将其主张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种对大众宣传充满自信的依赖,以及对至少大多数制度的中央控制〔5〕。这一界定并不要求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成功地达到彻底的极权,或者各个极权主义国家应受到同等的谴责。

作为宗教表达的一种形式,极权主义的观念是有疑问的。虽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的“宗教大法官”(Grand Inquisitor)一章中,对下一世纪的预言奠定了这一观念的基础;虽然有信仰的人们承认,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都在像争夺身体一样争夺灵魂,但是宗教至今未在极权主义的大部分分析中占据中心地位。虽然它与宗教相比存在着许多相似点,但它们通常都被一笔带过了。我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详尽阐述这一类比。

各种宗教提出的主张是一般政党不会做出的,而且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些主张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基督教和其他主要宗教都是世界观。基督教主张元初是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中没有哪一部分是处于它的创造者能力范围之外的。大多数基督徒希望他们的信仰能对其个人行为、社会政策、艺术、过去与未来说些什么。一个人不会在走出教堂之后忘记十诫。虽然基督教的传统也以不同方式来解释信仰,但是总体而言,基督徒至少在原则上同意基督教义适用于生活的所有方面,而不只在某些外围领域。

〔5〕 这遵循了极权主义的标准经典定义,它是由 Norbert Kapferer 提出之定义的一个稍作改动的版本。参见 Norbert Kapferer, *Der Totalitarismusbegriff auf dem Prüfstand* (Dresden: Hannah - Arendt - Institut für Totalitarismusforschung, 1995)。

西方政党一般都有着更为温和的目标。人们不会期望由一个美国政党的政纲来决定日常的活动。一个共和党人不必被迫将一个民主党人看成是误入歧途的,因而该受监禁、折磨乃至死刑。成为一个民主党人也不必强求他对艺术抱持某些特定观点,或者采纳民主党式的婚姻仪式。此外,人们也不必期望政党成员对语言的性质持相同的教条观点,或者在女童子军(Girl Scouts)应如何规范她们的活动上达成一致意见。总之,标准的政党是由许多人组成的团体,他们拥有重合的但并非完全相同的态度与兴趣,但他们不指望所属政党为其解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

与之相反,很明确,极权主义政党的主张是全面彻底的。纳粹主义和马列主义都声称拥有真理。不过,由于缺乏上帝作后盾,若要实现真理,他们只能依靠其追随者的不懈奋斗。基督徒可以假定,只要遵照信仰的命令行动,他们就已经尽了其义务,而要是这是上帝欢喜的上帝亦会有所行动。纳粹党人或马列主义者则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或者党内全体成员的努力来实现真理。正如我在导论部分所言,纳粹主义和马列主义都类似于国家宗教,一种世俗与神圣的混合物。它们不只对党内成员,还对所有人提出要求。没有任何的文化或社会角落能在理论上得以幸免。在基督教义中,一切都服从上帝的意志。就极权主义而言,一切都服从于人类意志(也就是说,一切都是政治的)。极权主义的政党懂得,允许任何非政治的“孤岛”就等于提供了滋生异端或政治冷漠的土壤。

因此,极权主义者将其主张贯彻到人类生活的每个领域就是非常清楚的。在1938年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的一个领导人集会上,一个演讲者直截了当地作了一个极权主义的断言:“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已经征服了全民族,从现在开始,它会将其踪迹播撒在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其目标是)我们生活中的

每一层面都会得到改造,直至最微小的细节,概莫能外。”〔6〕纳粹领导人也做了大量类似的声明。

他们说到做到。1939年,纳粹党内供政治领导人阅读的机密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家庭装饰的文章。它声称,“与所有国家社会主义者一样,政治领导人未言明的义务乃是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安排个人生活……主要的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需要自己来创造它:我们的家庭组成,我们的家庭住所,我们的各种仪式”。这篇文章进一步解释了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一个人应该怎样装饰他的家〔7〕。如果内部装饰都被列入了党的管理权限,那还有什么不能呢?在公共意识形态中,极权主义的世界观渗透于私人生活,其结果是,几乎没有为政治上的反叛留下多少可利用的空间。

民主德国在其主张中同样体现了这种全面性。它所赞成的世界观定义很有启发性:“对自然、社会、人类在世界中的角色,以及人类社会行为规则的形成等问题的系统而全面的解释……世界观的作用就是为一个人所有的思想、行为与实践活动提供一个全面的方向性指引。〔8〕”正如在1970年代中期,一本为参加“青年奉献”仪式(Jugendweihe,基督教坚信礼 confirmation 的社会主义等价物)的14岁少年而编写的书中所言,“为了不让你们在世界上误入歧途,以便你们梦想的幸福能在很大程度上变成现实,你们需要一个生活的指南,一种懂得该走哪条路的时刻存在的有效方法,一个智识的框架。在我们这个时代,斗争遍及全世界,新事物与旧事物,即将到来的东西与正在消逝的东西,日新月异的世界与固守过

14

〔6〕 Otto Zander, ed., *Weimar: Bekenntnis und Tat; Kulturpolitisches Arbeitslager der Reichsjugendführung*, 1938 (Berlin: Wilhelm Limpert, 1938), 63.

〔7〕 Wolfgang Schultz, “Auch an seinem Heim erkennt man den Nationalsozialisten!” *Der Höhesträger* 3, no. 8 (1939): 17.

〔8〕 *Kleines politisches Wörterbuch* (1988), 1077–1079.

去的世界,和平与侵略,真相与谎言,二者尖锐对立,水火不容——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只存在唯一正确的智识框架:那就是马列主义的世界观”。〔9〕由此,民主德国的世界观就从一个许可的政治立场提供了各种看待教育、家庭、休闲与运动的方式。在儿童周刊《鼓》(*Trommel*)1980年发行的某一期中,针对有人抱怨它包含太多的政治内容,该期头版社论对此做了如下回应:“我们不仅不反对令人愉快的琐碎之事,而且一个人还有权去享受它们,只要他也同样关注生活中的那些主要问题。那自然包括政治。那是很重要的。政治再多些也不过分。它指导着我们所有人的生活。”〔10〕一切皆政治,莫不如此。

正如基督徒认为个体的拯救有赖于人的灵魂改造,马列主义则强调一种智识的拯救,有时名之为“澄清”(clarity)。一份来自柏林的1958年报告提到一种看法,即只有在生产与分配中的困境得到解决之后,好些公民才会在政治上变得活跃起来。然而,这一报告却如是评论,“只有在人们头脑清醒的情况下,错误和过失才会得到纠正”。〔11〕在当局的定义中,澄清意味着,在人们能正确地看待现实并最终解决其问题之前,不得不接受马列主义。

总之,国家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都将自身界定为一种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的世界观。那么谁能决定那一信条本身?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对此,我将首先研究两种体系中的“神灵”(deities)与“经典”(scriptures),然后考察它们“崇拜”(worship)的方式,最后,我将简要阐述它们各自的“神学体系”(theologies)以结束讨论。

〔9〕 Heinrich Gemkow, ed., *Der Sozialismus—Deine Welt* (Berlin: Neues Leben, 1975), 477.

〔10〕 A. Hempel, “Zuviel Politik,” *Trommel*, 18/1980, 1.

〔11〕 Landesarchiv Berlin, BPA/SED IV—2/9. 01/894, Wochenbericht (5.2.1958), 2.

“元首永远正确”

国家社会主义酷似宗教的崇拜,它的创立者仍在忠诚的框架中前行。纳粹党人就以环绕着超人光环的方式表现希特勒。赫曼·戈林(Hermann Goring)在1941年用的就是教皇绝对正确的语言:“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十足的自信宣称,对我们来说,在攸关人民的国家与社会利益之所有政治和其他事务上,元首绝对正确。”〔12〕德国人“深深地,毫不动摇地相信”相信希特勒神圣的天赋使命,他也这样做了。德国战士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宣誓对希特勒的个人效忠,保证绝对服从,就像在他们的上帝和教友面前宣称与确定其信仰一般。在纳粹的岁月里,希特勒高大的形象出现在普通的海报中,并配以如下一段说明:“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13〕1941年由纳粹党出版社公开出版的一本小书只能以崇拜文学(devotional literature)名之。人们也被询问元首对他们有何意义。按照一个战士的说法:“我们的元首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人物。我毫无保留地相信他和他的运动。他就是我的宗教。”〔14〕这样的例子无可计数。

一个最有趣的表现对希特勒崇拜的例子就是数千首对元首的赞美诗。一卷名为《忠诚颂》(*The Song of the Faithful*)的小册子出现在1938年。它包含19首短诗,全部由1938年德奥合并(*Anschluß*)前,奥地利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匿名写成。其中一首很有代表性的诗就是“我们的元首”(Our Führer):

〔12〕 Herman Göring, untitled editorial, *Sommerlager-und Heimabendmaterial für die Schulungs-und Kulturarbeit*, summer 1941, 2.

〔13〕 参见 GPA/posters/hitler.jpg。

〔14〕 Gunter d'Alquen, *Das ist der Sieg! Briefe des Glaubens in Aufbruch und Kreis* (Berlin: Franz Eher, 1941), 42. 参见 GPA/sieg.htm。

众人赞美您，
纵然其赞美是无声的——
众人并未亲见您，
您仍是他们的救世主。

当您向您的德国人民喊话，
其言词已穿越整个国家
深入无数人的心灵，
您的形象已长驻心中。

有时您的洞察让那些
处于苦役和重负下的人们重获新生……
因而那么多人愿为您献身
并在您的精神中寻找光明。〔15〕

这无疑宗教的语言，就像赞美、救世主、生命、献身、精神和光明这些词一样。只有在一个人把希特勒看成是一个基督式的人物，一种神圣的与人类的结合体时，这一意义才说得通。《忠诚颂》因此获得了德国国家图书奖（戈培尔曾用它鼓励出版那些有正确主旨的书）。在该书的护封上，戈培尔这样写道：“当我们正为奖项的归属而僵持不下，或者说只得通过抽签来表决时，一本小而薄的

〔15〕 Baldur von Schirach, ed., *Das Lied der Getreuen: Verse ungenannter Österreichischer Hitler - Jugend aus den Jahren der Verfolgung, 1933—1937* (Leipzig: Philipp Reclam jun., 1938), 12. 更多的例子，可参看 GPA/hitpoet.htm. 包含更广泛作者群的一本类似著作是 Karl Hans Buhner 编辑的，参见 Karl Hans Buhner, ed., *Dem Führer: Gedichte für Adolf Hitler* (Stuttgart: Georg Truckenmüller, 1939)。

诗集适时地出现在市场上。它让所有进一步的考量都毫无意义。与其他书相比,此书更好地满足了我们这一奖项的目标。”

要是这些诗描写的是罗斯福或丘吉尔(Roosevelt or Churchill),那一定会滑天下之大稽,但是纳粹党人不会只把希特勒看成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凡人。虽然他们不得不承认希特勒终会死去,结果他确实如此(在死之前,他有时也提到自己的独特性以及实现目标的重要性),希特勒还是被德国人看成是可以绝对信任的一个人。

每年在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聚会上,戈培尔都会做年度演说。它绝对是引人注目的阅读材料。即使在1945年,戈培尔用的仍是宗教式的口吻:“我们觉得他(希特勒)就活在我们心中,与我们永远在一起。”〔16〕更早的那些系列演说同样如此宣称。〔17〕希特勒的灵魂/幽灵如影随形,无处不在。

希特勒典型的形象,我们可以在《意志的胜利》中一探虚实,这是由莱妮·瑞芬施塔尔拍摄的1934年纽伦堡帝国代表大会(Nuremburg rally)的纪录片。此片采用多种手法强调了希特勒的非凡特质。他的飞机伴随着圣洁的音乐在云层中悄无声息地掠过。飞机投下的阴影,仿佛一个十字架,投射在他那忠实信徒的游行队列中。他在凯旋的队伍簇拥下进入纽伦堡。摄像机时而给他一个特写镜头,时而从下往上拍,以凸显其伟岸的身躯。他的光辉向四处发散,比如,在开进纽伦堡的车队中,当他那握成杯状(cupped)的手正好捕捉到光亮时。希特勒,手握血旗(Blood Banner即Blutfahne,1923年暴动时携带的旗帜),用它来作神圣化新的党旗。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当场宣布,希特勒就是德国,

〔16〕 Helmut Heiber, *Goebbels Reden, 1932—1945*, 2 vols. (Münich: Wilhelm Heyne, 1971), 2: 455.

〔17〕 它们中的许多文本可在德国宣传档案中获取。

德国就是希特勒。这些都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形象。

希特勒引人注目的地位明显源于其各种肖像描绘艺术。照片、绘画与雕塑都精心控制,需要希特勒个人的认可。〔18〕为表达对希特勒的敬意,纳粹领导人于1936年出版了一本以《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生活照片集》(*Adolf Hitler: Pictures of the life of the Fuhrer*)为名的纪念册,印数至少达245万册。〔19〕人们购买纪念册,并把买香烟收到的附赠照片贴起来。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出版了超过12本希特勒的影像集,并且销量不菲。比如,一本“私人的”影集,《不为人知的希特勒》(*The Hitler No One Knows*)就售出了至少40万册。〔20〕鲁道夫·赫茨(Rudolf Herz)评论道,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照片的无处不在”是“表现领导人克里斯玛形象不可或缺的手段”。〔21〕

17 纳粹党人还没有时间来发展电视系统,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希特勒的形象同样会遍布荧屏。正如纳粹广播节目主管欧根·哈达莫夫斯基(Eugen Hadamovsky)所说,当实验性的广播开始在1935年对外播送时,“现在,此时此刻,广播将会响应号召以实现它最伟大和神圣的使命:将元首形象永不磨灭地根植于所有德国人的心中”。〔22〕

作为纳粹宗教中的一个超人形象,希特勒深知界定纳粹世界观的重要性。按照1937年的一份党内指示,甚至希特勒自己的演

〔18〕 有关例子,可参看 GPA/ah-art.htm。

〔19〕 *Adolf Hitler: Builder aus dem Leben des Führers* (Hamburg: Cigaretten/Bilderdienst Hamburg - Bahrenfeld, 1936). 此书部分内容可从 GPA/ah.htm 获取。

〔20〕 有关此书的材料,可参看 GPA/hitler2.htm。

〔21〕 Rudolf Herz, *Hoffmann & Hitler: Fotografie als Medium des Führer-Mythos* (München: Klinkhardt & Biermann, 1994), 329.

〔22〕 William Uricchio, “Rituals of Reception, Patterns of Neglect: Nazi Television and Its Postwar Representation,” *Wide Angle* 11 (1989): 51.

说只有在获得其本人认可之后才能出版。〔23〕1939年，希特勒指示，涉及纳粹世界观的演说文本应该事先得到鲁道夫·赫斯的认可。〔24〕在赫斯飞往英格兰之后，则由希特勒自己许可。

各种世界观都有依其重要性程度不同的文本。《我的奋斗》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圣经。〔25〕乔治·摩斯(George L. Mosse)猜想，既然“《我的奋斗》中的观念已经被翻译成了礼拜的(liturgical)形式，并且离开打印文本变成了全国性的雅利安(Aryan)崇拜的大众仪式”〔26〕，那么与马克思和列宁的作品是某些共产主义者的圣经一样，希特勒的书在同样的意义上也是纳粹党人的圣经。毫无疑问，《我的奋斗》中的观念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实现，但是此书对纳粹主义者来说仍然具有中心意义。它以庞大的发行量出版(到1945年，已超过1000万册)。市长们将精装本赠送给新婚夫妇。其目标就是实现每个家庭和图书馆都有该书。像家庭里的圣经一样，人们通常不去读它，但是仅仅其存在就证实了它的重要性。

希特勒的演说拥有同等的教义式权威。它们本身就是标志着巨大重要性的事件。正如战争开始之后，位于林茨(Linz)的党内宣传办公室发表了关于学习和运用希特勒演说的公告。这是一份值得注意的公文：

〔23〕 Partei Kanzlei, *Verfügungen/Anordnungen Bekanntgaben* (Munich: Franz Eher, 1943), 1; 2.

〔24〕 Bundesarchiv Berlin, NS 22/904: Anordnung Nr. 93/39 (1939).

〔25〕 Hugo Ringler, “Die Arbeit des Propagandiste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 *Unser Wille und Weg* 4 (1934): 297.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出版社把它看成是这一运动的典范之作。

〔26〕 George L. Mosse,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75), 10. •

元首的话就是人们心中的种子。党员必须看管好这一种子,并看到它开花结果。因此,他应该逐字逐句,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元首的讲话,直至他能够掌握这些需要在面对面宣传时讲出来的观点。如果他能在所有谈话中依靠元首的话,那么他将能利用元首的强大权威来影响甚至最顽固的抱怨者使他们沉默……

因此,每一个宣传员的任务就是,捍卫元首每次讲话在全民族的存在,培育热情的火花,甚至激励它。如果他以全部的忠诚和认真来学习每一个词,让它们每天都重新影响他,那么他将能做到这些。他和其他公民的谈话将会充满振奋的和统一的力量,而这在元首所有的讲话中无处不在。〔27〕

- 18 这是对一份神圣文本,而非政治演说的描述。希特勒话语的神圣性在一幅广为流传的名为“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的图景中,而不是约翰福音(Gospel of John)之开场白的一种随意引用中得到强调。希特勒被看成是对着一群狂热的早期追随者布道。〔28〕

正如圣经会被某些人作为证据性文本煞费苦心地进行开发,希特勒语录也渗透了第三帝国。这样的例子数量巨大,随手可举。1942年的生物课本在说明“生命的法则”时,引用了《我的奋斗》七次。〔29〕《我们的意志与方法》(*Unser Wille und Weg*, 宣传员月

〔27〕 Gaupropagandaamt Oberdonau, “Parteigenossen!” *Front der Heimat* (1939). 全文参见 GPA/heimat.htm。

〔28〕 参见 GPA/images/hitler/hoyer.jpg。

〔29〕 Marie Harm and Hermann Wieble, *Lebenskunde für Mittelschulen: Fünfter Teil, Klasse 5 für Mädchen* (Halle: Hermann Schroedel, 1942), 168 = 173. 参见 GPA/textbk01.htm。

刊)则频繁引用它。党内宣传办公室每周发行 30 万份用于公共展示的语录海报,许多采用的是希特勒语录。〔30〕比如,1941 年 5 月 4—10 日的海报引用了他的这一说法:“无人会在德国战士占据之地攻城略地。”纳粹党的艺术杂志,《德意志帝国的艺术》(*Die Kunst im Deutschen Reich*)包含精心印刷的希特勒语录,它们迎合了战争早期岁月的计划。

一些人家中还有一个“希特勒神龛”(Hitler shrine)。正如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的《先锋报》(*Der Stürmer*)在 1936 年写道:“通过将元首画像悬挂在家中,德国公民们得以表达他们对第三帝国的态度。”〔31〕同年,一份德意志儿童杂志告诉它的读者如何庆祝希特勒的生日:“所有德意志的儿童都要在 4 月 20 日元首生日那天思考做些什么。元首的画像应该挂在每一个家庭里,而我们要用亲手做的绿色花环来装饰它。这就是展示我们爱戴领袖的方式,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永不改变。”〔32〕在纳粹之前,德国人也会在墙上悬挂圣徒和政治领导人的画像。不同之处在于,现在任何表现出对悬挂希特勒画像的不情愿则变成了背叛的证据。

到 1933 年为止,城市和乡镇中的主要街道与公共广场都已经以希特勒的名字重新命名,不久之后纳粹其他领导人也忝列其中。凯撒街(Kaiser - Straße)变成了阿道夫 - 希特勒大街(1945 年后东德时期则是,卡尔 - 马克思大街)。

不管转向哪里,德国人不仅要遭遇希特勒的画像或话语,而且还被期望在这大合唱中加进他们自己的声音。最明显的方式就是

〔30〕 这基于“Die Arbeit der Partei - Propaganda im Kriege,” *Unser Wille und Weg* 11(1941)中的一个数字,它声称,自战争开始以来,每周语录海报已经发行了 3250 万份。相关例子,参见 GPA/ws. htm。

〔31〕 “Wie reimt sich das zusammen?” *Der Stürmer*, 24, 1936, 10.

〔32〕 “Zum Geburtstag des Führers,” *Deutsche Kinderwelt*, 9/1936, 10.

行纳粹礼“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一种“德国式的问候”(German Greeting),纳粹党人如此称呼它。这很快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惯例。公开张贴的标语宣称:“我们的问候就是‘希特勒万岁’。”电视广播节目也以广播员的“希特勒万岁”结束。

19 这一问候就是展现纳粹忠诚的测量计。一位美国访问者在1935年这样写道:“‘希特勒万岁’现在是这个国家的问候方式,所有阶级的人,无论何处。”〔33〕另一方面,1943年,一位党员在巴门镇(Barmen)对着他遇到的51个人如此问候,只有2个人回应了他。〔34〕不断恶化的战争局势使公民们对元首宣誓效忠的热情开始消退。报纸上战士阵亡的讣告被期望来表达他们是“为元首、人民和祖国”而死的。到1944年底,当这些通告的百分比在一些报纸中下降到4%时,这一措辞则像是义务性质的了。〔35〕

希特勒的个人受欢迎度是高的。尽管如此,这要取决于他的成功。作为一个可见的神,希特勒的权力依赖于他的“奇迹”,纳粹党人通常用它来描述他的伟大成就。无论何种失败都不能得到承认。希特勒习惯于出现在胜利的那些时刻,比如,法国陷落后在柏林举行的壮观接管仪式上。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些时刻不断减少,他现身的次数也同样减少了。戈培尔的日记定期记录了战争晚期他努力劝服希特勒现身公共场合,而希特勒很不情愿在没有胜利的情况下这样做。丘吉尔在1940年6月4日做了一场演说,承认法国发生的战事是“一场巨大军事灾难”,但是希特勒没有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做同样的声明。战场失利的神只会有有限的可信

〔33〕 Henry Albert Phillips, *Germany Today and Tomorrow* (New York: Dodd Mead, 1935), 59.

〔34〕 Cornelia Schmitz-Berning, *Vokabula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8), 143.

〔35〕 Ian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89.

性,希特勒非常清楚。即使在和他亲信的私人谈话中,他也是将失败归罪于他人,而不是自己。

纳粹的教规超出了《我的奋斗》的范围。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Alfred Rosenberg),鲁道夫·赫斯,约瑟夫·戈培尔,奥托·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赫曼·戈林,罗伯特·雷(Robert Ley)的作品也有近似教规的权威。虽然戈培尔和戈林都是出现在“每周语录”(“Quotation of the Week”)海报上的“常客”,但它们缺乏希特勒话语的力量,不会被反复引用。

纳粹一年中的神圣节日

一种宗教需要崇拜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使不可见之事物可见的各种方式。要如此做,节日和庆典都是重要的方式。纳粹党人倾注了巨大努力来建立和推进那些能合理地成为宗教节日与仪式的事情。跟往常一样,几个纳粹党人,主要是戈培尔和罗森博格,要求控制这一进程,虽然这也是希特勒感兴趣的一个领域。

到1934年,纳粹党人已建立了他们的礼拜历。它开始于1月30日,希特勒就职周年纪念日。2月24日则是1920年政党纲领公布的纪念日。希特勒政权的第一年,节日着重强调希特勒与其早期追随者的关系,虽然战争期间,它开始强调早期政党成员的信念,即如果德国人要赢得胜利,它对每个人都是必须的。悼念阵亡者的英雄纪念日则在3月中旬。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是青年义务日,即在一段仪式中,包括从青年到成年的群体有宣誓服从祖国的义务。希特勒4月20日的生日则是宏大庆典的理由(这一高峰在他1939年50岁生日时到来,那年一部伟大的电影应运而生)。纳粹党人把5月1日劳动节变成了德国人民的国庆日(National Holiday),虽然它也是工人们的节日。母亲节在5月上旬。有4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将会获得奖章。夏至日则主要由希特勒青年

团和纳粹党卫军(SS)来庆祝。9月上旬将会看到最重要的纳粹盛况,纽伦堡集会,这样一个事件,即使那些不能参加的人也会通过大规模的报纸和广播(甚至电视)覆盖网,以及瑞芬施塔尔的纳粹集会纪录片《信仰的胜利》(*Victory of Faith*)与《意志的胜利》参与其中。直至1938年,这些集会在规模和豪华程度上一直在扩大。〔36〕1939年集会,即名声不佳的“有关和平的党代会”(Party Rally of Peace)恰在战争开始前取消了,但是为了当年的集会,各项计划进行到了1940年夏季。〔37〕在党员集会地建立不朽建筑的工作直至战争晚期一直在进行。丰收节在10月初来临。几十万农民聚集在德国南部一座大山脚下的比克堡(Bückeberg),聆听希特勒赞美农业优点的演说。纳粹日历上最神圣的日子是11月9日,即1923年“啤酒馆政变”(Beer Hall Putsch)纪念日。甚至圣诞节,一年中最后的节日,采取的都是纳粹的而非基督教的解释。在战争的年月,纳粹党出版了一些评论圣诞节的书,但它们都不会只提到基督。既然圣诞节不包括与耶稣基督的任何直接联系,那么圣诞节一词的德语词汇(Weihnacht)就使这一任务更简单了。〔38〕

纳粹节日的性质在11月9日的例子中显露无疑,这是一个庆祝最高秩序(first order)的伪宗教盛典。一开始,它的根本重要性并不明显。1923年11月,希特勒决定要发动一场起义。11月9

〔36〕 有关1936年集会的材料,参见GPA/pt36.htm。纳粹对阵亡者崇拜的最佳通俗性论述是Jay W. Baird, *To Die for Germany: Heroes in the Nazi Panthe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37〕 Bundesarchiv Berlin, NS 22/227: Teilnehmerzahlen für den Reichsparteitag (1940)。迟至1940年7月,党一直在为有19万9500人出席的大会而筹备着。

〔38〕 Hauptkulturamt der NSDAP, *Deutsche Kreisweihnacht* (München: Franz Eher, 1944)。有关1937年对克里斯玛的讨论,参看Hannes Kremer“Neuwertung ‘überlieferter’ Brauchformen?” *Die neue Gemeinschaft* 3 (1937): 3005a-c, 可在GPA/feier37.jpg获取。

日那天,当声称夺取国家权力的队伍靠近慕尼黑一座有名的公共纪念建筑统帅堂(Feldherrnhalle)时,警察开火了。希特勒的16个追随者被击毙。他则受了轻伤,试图逃跑,但随后被捕,在狱中度过了一个舒服的刑期。1925年希特勒重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同年在魏玛的党员集会上,两年多以前携带的血浸的旗帜(blood-soaked flag)变成了血旗,这是纳粹圣物箱中最神圣的宝物。虽然没有其他人会留意,但这一天对魏玛共和国的后继者来说,则被看成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哀悼日”。

21

1933年,11月9日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节日(a national holiday)。从这年开始到1943年,希特勒都会在11月8日晚间,在慕尼黑向他的早期追随者们发表演说。虽然只有长期党员(老战士,alte Kämpfer)参加,但是第二天的报纸上满是希特勒的演说文本。11月9日那天,仪式在慕尼黑举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重演1923年的那场游行。沿路上都是写有纳粹阵亡者名字的高塔(pylons),建筑物上则覆盖着旗帜和黑布。当希特勒经过每一座高塔时,高音喇叭则宣读在为他效忠中死去的纳粹党员的名字。快到统帅堂时,全场瞬间寂静无声。

随后几年,这样的仪式甚至更让人印象深刻。每年慕尼黑都会以旗帜和横幅装扮一番。1935年,16名阵亡者被从他们彼此分开的墓中转移到了慕尼黑的一组“荣耀殿”(Honor Temples)内,在那里他们将得到“永久的看护”。这就像是他们又重获新生一样。那些之前下半旗志哀的旗帜现在则全部降了下来。《纽约时报》记者评论说,慕尼黑举行的“不是葬礼而是庆祝凯旋”。〔39〕在荣耀殿前,当16个亡灵的名字作最终宣告时,成千上万的大会聚集者每听到一个名字就以“在这里”来回应,当然,这不只是一种新

〔39〕 New York Times, 10 November 1935, 42.

的技术手段,还是一种感染人的方式。

慕尼黑的仪式通过报纸和广播波及到了整个国家,尽管如此,大多数小镇和学校则宁愿组织他们自己的仪式。和慕尼黑的仪式比起来,它们在规模上更小,但是,即便如此,旗帜覆盖的建筑,墓边的仪式与庄严的集会在整个德国盛行不衰。

典型的地方仪式通常会在一个精心装饰过的房间里进行。开场是在伴随着振奋人心的音乐声中,身穿制服的党小组成员进入现场。很快,大家齐唱11月9日赞美诗,“今天,十万人在游行。”在一份祈祷文中,希特勒向大家许诺,这一天将在德国历史上永远铭记,紧接着是更多的音乐。随后,地方高官发表一份演说,试图建立11月9日的神话,同时鼓励听众们跟随希特勒早期追随者奉献的足迹。希特勒青年团地方乐团吹响号角,随后主席说道:“我们永记这场运动中第一批流血牺牲的殉道者。”旗手们随后开始降旗。“11月9日下午12点30分,怀着对他们民族复兴的真正信仰,下面这些人倒在了统帅堂前,倒在了慕尼黑前作战部的院子里(court)。”16人的名字被宣读,紧接着是一首诗:

你们牺牲了
为了我们的帝国。
你们视死如归
这样我们
才能生活在胜利中。

你们这些死去的人儿
意味着运动的胜利
并且你们的遗产
对我们是永恒的责任。

党和军队里的其他牺牲者也值得我们铭记。旗帜升起来了,象征着死去者的胜利。在更多的诗篇、歌曲和对希特勒的赞颂之后,这场集会以一首纳粹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Song*)作结。〔40〕

纳粹党大量运用基督教的意象。希特勒在1934年说道:“他们流的血已经变成了洗礼帝国之水。”〔41〕比如以身殉道者、牺牲、圣物、复活、耶稣受难地以及朝圣这些术语都在不断地使用。不管何处,纳粹党人采取的策略是把新的意义灌注到旧的象征中,为了新的信仰而吸收它们。一个党内作家在1939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即通过注入异教的仪式,基督教已经得到了发展。早期宗教的信徒“并没有哪怕一点这种观念,即在他旧习惯的伪装下,一种新的和异质的宗教正逐渐渗透到他心中。”纳粹主义也需要用新的意识形态意义来填充到传统的象征中,他继续说:“只有当国家社会主义已经铭刻到每一公民的灵魂之中时,它才可以说自己是固若金汤的。”〔42〕

纳粹圣徒的万神殿之建立要归功于这些节日。所有那些在希特勒事业中牺牲的人,运动的“殉道者们”都能享此殊荣,但是1923年的亡者则处于崇拜的顶点。我们来考虑一下1935年时他们的活动是如何被描述的:“为了摆脱困窘、痛苦、卑贱、绝望的深渊、毁灭的无序境地与毫无抵抗力的屈从,这些不为人知的

〔40〕 取自为了1942年11月9日的仪式而获得推荐的方案,见 *Die neue Gemeinschaft* 8 (1942): 493-498. 关于其他材料,可参看 [GPA/99feier.htm](#)。

〔41〕 Max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trans. Mary Fran Gilbert (Wauconda, Ill.: Bolchazy-Carducci Publishers, 1990-2002), 1:542.

〔42〕 Ewin Hilbig, “Sind Feierstunden notwendig?” *Unser Wille und Weg* 9 (1939): 164-165.

战士们,他们的名字就像一声惊雷,穿透了人们之间悲惨的孤立的茫茫黑夜。为背叛而复仇是他们心中燃烧的火苗,在痛苦中锻造,不幸中形塑,受伤者的荣耀中坚固成形的复仇,几乎取消了死亡,这就是伟大的,不可遏制的复仇。”〔43〕这不是有关凡人的语言。这些人就是德国人美德的楷模。16人的传记把他们当作为德国的事业而遭受苦难的圣徒。1935年的传记丛书是以如下评论开头的:“从有关他们生活的描绘中,我们将会收获为德意志民族的未来而奋斗的新勇气。”其中一个如此被提及:“他在统帅堂前英雄般地死去,不是别的,完全是为德国而牺牲的一生之至高顶点。”〔44〕

这些死去的人甚至赢得了不朽,它伴随1933年纳粹党获胜而至。掌权后的一天,希特勒来到慕尼黑向这些死者表达敬意,说道“你们最终还是胜利了”(Und Ihr habt doch gesiegt)。虔信的人在会议厅的旗帜上、报纸上、广播里,甚至邮票上,信徒们无以计数地重复着他的话语。这一节日也是纳粹艺术中的一个流行题材。〔45〕

纳粹的修辞中同样表达了更多种不朽形式。殉道者的灵魂以某种方式长存。一本关于学校仪式之规范导引的书这样写道:“现在他们再次安详而平和地在他们的墓冢中睡去了。因为有了元首赞扬和感激的话语:‘你们最终还是胜利了’,伟大的极乐和永恒的快乐已经降临在他们身上。”〔46〕《民族观察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在1936年写道:“一年前,统帅堂的英雄们占据了永恒

〔43〕 “9 November ,” *Völkischer Beobachter*, 8 November 1935.

〔44〕 *Fränkische Tageszeitung* (Nuremberg), 24, 29, and 31 October 1935. 《民族观察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也对此做了连载。

〔45〕 参看 GPA/stamps. htm 和 GPA/9nov. htm。

〔46〕 Carl Schütte, *Schulfeiern im Geist der neuen Zeit* (Langensalza: Verlag von Julius Beltz, 1937), 137.

的关注。哀悼他们的旗帜现在已经发黄,破烂不堪,显得有些多余。(但是)死者已经复活。他们不止一次行进在我们之前,与我们同行。”〔47〕纳粹出版机构的许多类似评论都宣称了死者的不朽。

每年的慕尼黑仪式上都会展示血旗,但是它也出现在纽伦堡集会上。瑞芬施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展现了希特勒通过抚摸血旗来神圣化新的党旗。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权力通过希特勒之手从旧旗转移到了新旗上。正如罗伯特·布鲁克斯所评论的,通过将过去的事迹与信念赋予当下的事件,这一仪式将过去和现在天衣无缝地联系起来。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仪式,它通过给予所有在场之人一种参与某种比自身和此刻更伟大之事的感受,将他们统一了起来。〔48〕

纳粹的信仰

纳粹主义的全部修饰以扭曲的方式反映了宗教信仰的习惯和仪式。正如任何信仰一样,它运用它们来赋予党的日常活动以神秘的重要性,并且在其他方面为那些将会看起来可耻的活动提供正当性。除此之外,这些意识形态的礼拜仪式将会用世俗的含义取代传统的宗教意涵,从而压制与之竞争的启示所挥之不去的影响。

24

了解了纳粹主义的影响和后果之后,我们很自然地会假定它的追随者都是些遭遇不幸的不快乐的人。但是很少德国人变成纳粹是因为他们渴望屠杀犹太人或者毁灭欧洲。当追求不光彩的目标时,纳粹主义诉诸深深根植于德意志传统中的,许多德国人认为是高贵目标的东西。毕竟,纳粹主义宣称自己是德国历史和文化

〔47〕 *Volksicher Beobachte*, 10 November 1936.

〔48〕 Personal communication, 11 February 2002.

的顶峰而不是弃绝,因而我们就能非常确信纳粹主义与德国过去的许多因素有其一致性。正如罗伯特·盖拉特莱(Robert Gallately)所评论的,对于“人们真诚希望是真实的东西”,纳粹所宣传的内容就是一个指示器。〔49〕

我们先来考察赫尔穆特·施特莱彻(Helmut Stellrecht)的《信仰与行动》(*Faith and Action*),一本关于纳粹美德的书。尽管有战争的压力,到1944年为止,它的精装版仍有至少17.5万本付印。它包含论信仰、忠诚、勇敢、服从、血气、生命和死亡等的简短章节。论信仰的语言用的这种口吻:“因为信仰是强大的,它能推动那些看似不可能之事。它是任何功绩的基础……一个人最高尚和重要的不是他的学识和判断力,而是他的信仰。只有在一个人拥有足够强大的信仰时,他才是有价值的。”〔50〕此书的宗教意图从一份党内宣传员杂志的评论中可见一斑:“一个人如果希望给他正在长大的孩子比旧约的犹太故事或那些今天对我们来说已失去意义的箴言和赞美诗更好的东西,他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它用的是高贵的形式和清晰有力的语言,因而是那些任何寻求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生活观的入门指南。”〔51〕关于旧约故事“已经失去其意义”的附带段落是令人震惊的。施特莱彻的书被看成是一种解释生活意义的新方式,一个道德行为的向导。要是它忽略了深植于读者中的传统信念和价值,它是不会成功的。

耶稣说,信仰足以排山倒海。施特莱彻和纳粹党认为它能赢得战争。书中没有提到奥斯维辛(Auschwitz)。战争确实被美化

〔49〕 Robert Gallately, *Backing Hitler: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59.

〔50〕 Helmut Stellrecht, *Glauben und Handeln: Ein Bekenntnis der jungen Nation* (Berlin: Franz Eher, 1943). 参看 GPA/glaeben.htm.

〔51〕 对 Helmut Stellrecht 的作品 *Glauben und Handeln* 之评论,见 *Unser Wille und Weg* 8 (1938): 349.

了,但是这种方式却巩固了大多数德国人乐意接受的美德。大量相似的资料出现了。一个德国人,他无须努力思考或者看起来这样,就会很愿意相信,纳粹主义坚定地站在他们所熟悉的美德的一边。

宗教提出了生活的伟大问题,包括起源、终极和目标。纳粹主义提供了答案,虽然或许不像宗教答案那样令人满意,但是仍然为公民提供了手段,使其周围的世界有意义。自然奖赏强大而惩罚虚弱。德国人有天生好运,生来就是自然宠爱的民族,它的先辈可追溯到时间的混沌之初,而向前延伸到辉煌的未来。

25

关于这一主题的资料数量是巨大的。比如,在1939年一份纳粹妇女双周刊《女性立场》(*Frauen Warte*)中,一首名为“我的孩子”(My Boy)的诗这样写道:

现在我靠你而活。
你应该并且将会活在
我无法再见到你的日子。
那是多么地美妙!
这就像古老的英雄传奇一样精彩,
那时每个部落都奋斗
以保证它的血统不会消失。

然而,你还小。
你又怎么能知道
你只是一棵大树上的一节枝丫!
但是那天终会到来
到时我必定告诉你
不只是你,
还包括你的父辈们也将由你的英勇事迹来评判。

不,你还无法理解。
你整天只知梦想和玩耍。
但是当你明白时,
我将确信
你和我的每一次心跳
让我们活着,
也在永恒中泛起一轮涟漪。〔52〕

这首诗将每个德国人看成是永恒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将过去连接到了未来。

一个种族纯净的德意志“天堂”就是目标。它就是一个世俗的伊甸园,要求人性的改造,而它可能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正如希特勒 1934 年所言,纳粹党人正在逐步塑造“一个新的德意志个体[Mensch]。”〔53〕

虽然在字面意义上,党的信徒不再能活到体验那个天堂,但他们也不会真正死去,正如 11 月 9 日的修辞所试图证明的。1938 年一本精心策划的书试着列出了一份在效忠希特勒时死亡的所有人的全面清单。正如此书中名为“他们活着!”(They Live!)的导言诗所宣告的:

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漫游着,他们没有死去。
他们对我们来说是告诫和警告,
因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伟大英雄的后裔。

〔52〕 Werner von Hofe, “Mein Junge,” *NS Frauen Warte* 7, no. 4 (1938): 97.

〔53〕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1: 452.

在他们的人格像火一样照耀之地，
我们会继承遗志穿越黑夜和痛苦抵达光明。
他们是德意志人。德意志民族永垂不朽！

纳粹党的党歌宣称“被红色阵线与反动 (Red Front and Reaction) 击毙的同志在精神上与我们的队伍并肩同行”。此书坚称这首歌是“德意志人的祈祷书。”〔54〕

在某种意义上,当已死去的人在后继者心中继续活着时,他们体验到的将会是一个新世界。1945年2月,戈培尔写到在纳粹胜利之后的2000年,德国孩子们的幸福未来:“我们的希望将会在他们的世界实现,我们的理想将会成为现实。既然我们见证过反映在孩子们眼中,这个野蛮年代的诸多风暴,我们必定不会忘怀上述前景。让我们行动吧,那赢得的将是他们永恒的祝福,而不是他们的诅咒。”〔55〕再次,诸如此类的资料会有一大堆。它向德国人许诺了他们的忠诚和服从的“永恒”回报。

宗教需要它们的魔鬼,或者罪恶的来源。同雅利安种族,一个最发达的和代表人性未来的种族相比,犹太人 (the Jew) 则占据另一极端。纳粹党通常使用“the Jew”而不是“the Jews”,在字面意义上它是一个撒旦式的人物。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报纸《先锋报》经常做对比。比如,1943年的一期,在封面上采用了一幅名为“撒旦”的犹太人照片。〔56〕正如许多其他纳粹党人一样,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做了相同的对比。犹太人并非仅仅是卑下的(比如,正像黑人在纳粹意识形态中一样);他们就是罪恶的化

〔54〕 Hans Weberstedt and Kurt Langner, *Gedenkhalle für die Gefallenen des Dritten Reiches* (Münich: Franz Eher, 1938), 9.

〔55〕 Joseph Goebbels, “Das Jahr 2000,” *Das Reich*, 25 February 1945, 2. 全文可在 GPA/goeb49.htm。

〔56〕 *Der Stürmer*, 9/1943. 参看 GPA/images/sturmer/ds-43.jpg。

身,雅利安德国人的死对头。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说:“通过抵挡犹太人,我做的就是上帝的工作。”在与罪恶斗争中,任何事情都允许。

反犹主义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纳粹主义的中心,纵使它对许多德国人来说不是这样。所有主要的纳粹宣传至少依赖于以下不言明的主张,即希特勒和他的党正在同世界范围内的犹太同谋者做斗争。犹太人在1933年前控制了德国,他们驱使英国和法国加入了反对德国的战争,他们的背后是马克思主义和它的体现者苏联,他们组织了全世界的反德力量。

27 总而言之,国家社会主义贡献给德国人的是一种发展了的、多少有些不明朗的世界观,向他们解释他们来自哪里,正在向何处去,为到达目的地应该做些什么,谁又在路上阻挡他们。它就是一种世界观,依靠的是熟悉的词汇、名字与价值。它为日常的行动提供理由,为未来提供希望。对于接受了纳粹主义明确主张的德国人来说,世界变得有意义了。他们被要求接受的意识形态包含了德国历史、思想和文化中那些熟悉的方面。

“党总是正确的”

如果纳粹主义是一个异教,他的创教者仍然身处信徒之中,那么东德的马列主义则是一个在结构上更像天主教而不是新教的、拥有确定的神学体系从而合理地建立起来的宗教。虽然东正教的高级教士被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取代了,但教皇身处“第三罗马”(Third Rome)莫斯科。德国统一社会党(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 SED)的党魁是一个红衣主教,他在其国土内至高无上然而最终还是要服从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权威已经渗透全党,并且它的语言现在就是神圣的。

尽管如此,在东德的早期岁月,斯大林崇拜是强大的。苏联占

领军 1945 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的某部分就是斯大林的简短传记,由俄语翻译过来,它准备的如此仓促以至于没有提到他在二战中的作用。它把斯大林塑造成一个毫无缺点的、几乎超人式的人物:“斯大林是党的卓越领导人与导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战略家。在面对社会主义的敌人时,他毫不宽容,绝对忠诚于原则;在所有活动中,他表现出清晰的革命眼光与明晰的目标的结合,在达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还显现出非同寻常的坚定与毅力。”〔57〕两页之后,该书声称:“斯大林的名字就是苏联社会的道德与政治统一的象征。”与赫斯 1934 年的话语的比较是明显的(“希特勒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数千首赞颂斯大林的诗通常由俄语翻译过来,充斥于东德的早期岁月。〔58〕在那些年,教室里有被红彩旗围绕的斯大林画像的神龛,孩子们则背诵如下感人的诗:

十指交叉你的小手,
鞠躬低下你的头,
默念五分钟
斯大林。〔59〕

此诗的更早版本如下:

十指交叉你的双手,

〔57〕 Marx-Engels-Lenin-Institut, *J. Stalin: Kurze Lebensbeschreibung* (Berlin: Verlag der Sowjetischen Militärverwaltung in Deutschland, 1945), 81.

〔58〕 Alan L. Nothnagle, *Building the East German Myth: Historical Mythology and Youth Propaganda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1945—1989*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159.

〔59〕 这一故事源于巴伐利亚州威登堡的赫尔穆特·哈塞(Pfarrer Helmut Hasse in Wittenberg)。

鞠躬低下你的头，
默念五分钟
希特勒，
是你赐予我们每日的面包
还满足我们每一需要。

直到 1953 年斯大林逝世，斯大林崇拜与希特勒崇拜不相上下。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接受奉承，虽然从没达到希特勒那样的程度。自由德国青年（Free German Youth，FDJ）最年轻的成员是台尔曼先锋队（Thälmann Pioneers）队员。被杀害的德国共产党（German Communist Party）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是他们的榜样。没有歌颂党的领导人的诗集，然而会出现偶然的诗歌大爆发。考虑一下这首 1950 年歌颂台尔曼的诗：

恩斯特·台尔曼似乎已死去了很久。
台尔曼确实死了，然而并未真正死去。
在世时，为了他所教导大家的事情，
不知疲倦，而他为之鼓与呼的东西，
将会作为一种告诫深入千百万人心中，
也如知识一般铭刻在千百万人头脑中。〔60〕

即便在这里，重点也是放在台尔曼所教导的事情而不是他本人上。到东德晚期岁月，如此的夸词大部分消失了。

虽然东德从未打算与斯大林划清界限〔1989 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禁止了苏联的杂志《伴侣》（*Sputnik*），而不是《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原因之一是它直率地讨论了斯大林统治的罪

〔60〕 Nothnagle, *Building the East German Myth*, 121.

恶],但此后的苏联和东德领导人都未享受到同样的尊敬。没人会考虑用这些术语来描写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主义措辞,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奉承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连贯的。这也很难避免唤起希特勒所受之待遇的那些记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的领导人都受尊敬。他们的形象充斥在报纸、杂志、新闻片和电视中,但是那些形象表达的都是普通人。沃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和埃里希·昂纳克更多是以慈祥的老先生/祖父而不是伟大的独裁者出现。

与1968年在乌布利希75岁生日之际,作为礼物献给他而出版的书和《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生活影像》相比是令人震惊的。前者题名为《沃尔特·乌布利希:为德国而奋斗的一生》(*Walter Ulbricht: A Life for Germany*),将传主描绘成一个聪明而做事干练的人,但不是超人,很清楚,这个人要服从他的党。〔61〕后者的护封上是一张从下方拍摄的照片,希特勒巍然挺立于看不清的观众之上。〔62〕前者的封面展示的则是一位老者正在读书。〔63〕导论部分是这样说的:“沃尔特·乌布利希深受马恩政党以及李卜克内西(Liebkecht)和台尔曼的教诲。他的老师都是像列宁和季米特洛夫(Dimitroff)这样的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他们首先教导他,只有一个人与群众保持最紧密的联系才能领导他们。我们都见证了,乌布利希如何与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科学家和艺术家,妇女和青年讨论所有的重要问题,他如何能够利用所获取的知识,进行理论化的概括,以此改善我们的生活。”〔64〕乌布利希被看成是党

29

〔61〕 副题是常见的。比如为了纪念兴登堡,一卷包含同样标题的有插图作品在1934年出版了。

〔62〕 参看 [GPA/images/hitler/ah.jpg](#)。

〔63〕 参看 [GPA/images/ulbr/ulbrcov.jpg](#)。

〔64〕 *Walter Ulbricht - Ein Leben für Deutschland* (Leipzig: VEB E. A. Seemann, 1968), 10. 有关此书的更多材料,参见 [GPA/ulbricht.htm](#)。

培养的一个作品,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则是希特勒的杰作,事实上它和希特勒一样是同一性质的。共产主义运动早于乌布利希本人。它塑造了他,而不是相反。二战期间,最普通的纳粹海报宣称“阿道夫·希特勒战无不胜。”〔65〕二十年后,自由德国青年(FDJ)的口号是“沃尔特·乌布利希——他就是我们的榜样!团结在沃尔特·乌布利希周围,我们必胜!”〔66〕在第一个口号中,希特勒是焦点,这与第二个口号中更广泛的关注形成鲜明对照。

昂纳克受到的奉承更少。有关他形象的标准海报确实大量发行〔67〕。当他视察莱比锡商品交易会时,则通过确保在《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上刊发数十张照片来捍卫其形象。甚至当他政治局(Politburo)的一位同僚担心在一期中刊发50张照片是否足够时,昂纳克回复道,他要么已经出现在所有与他交谈的伙伴的照片中,要么压根儿就没有。〔68〕但是再一次,这些照片展示的都是一个普通人。没有口号将他与胜利相提并论,没有照片夸大其身材。不像希特勒,他在照片里看起来也小,或许最值得一提的就是1987年他访问西德*时,与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站在一起,顿显矮小不堪。尽管如此,从东德的角度看,他的访问就是一场外交胜利,足以掩盖掉他的体形问题。在阅兵式照片中,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一起站在看台上。他们就像普通人一样身着灰

〔65〕 参看 GPA/posters/ahsieg.jpg。

〔66〕 Stiftung Archiv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DDR im Bundesarchiv, DY 30/IV 2/9.03/22: Beschluß des Sekretariats des Zentralrats der Freien Deutschen Jugend über die propagandistische Arbeit im Verband unter der Jugend, 1961. 将提供备查资料。SAPMO。

〔67〕 参看 GPA/images/hinecker.jpg。

〔68〕 Manfred Uschner, *Die zweite Etage: Funktionsweise eines Machtapparates* (Berlin: Dietz, 1993), 88。

* West German,即联邦德国,为简便起见,后文多用西德。——译注

色套装,而不像高大魁梧之人一样让普通人相形见绌。

“出于故意的忽略”(“by omission”),东德的领导人是绝对正确的。在后斯大林时代的东德,没有人敢像戈林宣称希特勒永远正确一样做出类似声明。不过,他们简直不会提及他们的错误。由于有党的领导,东德领导人似乎总能做出正确决定。

东德领导人是重要的,但党才是绝对知识的真正来源。依据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简明政治词典》(*Concise Political Dictionary*),党的集体领导能够科学地做出“准确无误的决定。”〔69〕党的智慧就像教皇的一样至高无上,甚至还更高,因为教皇极少以宗教权威(ex cathedra)之名发言,而党却经常这样做。比如,1959年,东德军队的一本培训小册子声称,社会主义军队在听从党的意志时,既然它正服从的是自然界不可更改的法则,那么我们不可能命令它的战士不按照这一职业标准来行事。〔70〕既然德国统一社会党了解社会主义的含义,那么相信社会主义军队行动之绝对正确就如同纳粹战士宣誓绝对服从希特勒。在每个例子中,宣誓的对象绝对正确。

30

党的角色体现在1958年出版的一本宣传小册子中,该册子用来指导党小组(partygroups)庆祝德国共产党创立40周年。其中一部分引用了布莱希特(Brecht)对党的赞美诗:

党啊——

就是我们使命的不朽动力。

党啊——

就是唯一的保证。

〔69〕 *Kleines politisches Wörterbuch* (1988), 880.

〔70〕 Götz Scharf, *Über den moralischen Faktor im modernen Krieg* (Berlin: Verlag des ministeriums für nationale Verteidigung, 1959), 110.

阶级的头脑，
 阶级的意义，
 阶级的力量，
 阶级的荣耀——
 那就是党。〔71〕

在这里，语言也是宗教性质的，比如说不朽和荣耀。正如基督教的宿命论教义所声称的，上帝不仅知道未来，还引导其实现他的目的，因此同样，按照马列主义理论，党也是由某种历史的规律所指引。人类的行为能加速或减缓历史运动脚步，但是长远来看却决不可能颠覆它。共产主义的终极天堂是毫无疑问的。

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有神圣的力量，但是它们也需要党来解释。为了东德的目标，学者们就像圣经诠释者们一样勤奋，从事马恩全集的编辑工作。东德的官方经典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还包括党代会的决议与党的领导人的纲领性讲话。这些讲话更多地是用来阅读和研究而不是聆听——虽然可怜的党员们确实要在讲话被阅读时（它们几乎总是要被阅读）听数小时之久。

正如希特勒的话语是第三帝国时期各种书籍和文章的必要补充一样，经常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也是必须的。论文作者们懂得，
 31 一篇文章中引用合适数量的马列主义经典是多么地重要。普通的东德婚姻手册也会引用马克思论家庭重要性的观点。〔72〕横幅上合适的引用几乎和西方的广告一样普遍。

〔71〕 *Feierstunde zum 40. Jahrestag der Gründun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Berlin: Zentralvorstand der Gewerkschaft Unterricht und Erziehung, 1958). 全文可在 GPA/kpd40.htm 获取。

〔72〕 引自 Nothnagle, *Building the East German Myth*, 16.

崇拜的方式

社会主义信仰明显体现在它连续不断的节日中。正如基博斯和格瑞斯(Monika Gibas and Rainer Gries)所评论的:“东德有一系列极其密集的国家官方政治节日。”〔73〕一年中第一个节日降临在1月15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919年罹难周年纪念日。它是11月9日的东德等价物。正如《新德国》在1986年所主张的:“卡尔和罗莎为信仰而死。但是他们活在我们的行动中。他们与我们同在!我们都在他们的红色旗帜下!”〔74〕国际妇女节在3月8日。5月1日那天是广大工人的节日。二战结束纪念在5月8日。一年中的高潮在10月7日,1949年东德建立周年纪念日。主要节日都是群众游行的场面,被鼓励采用各种方式的公民们手持旗帜、横幅与标语牌游行,接受领导人的检阅。

这些周年循环的纪念活动,不只有节日盛典,还包括重要的新闻报导:马克思、恩格斯、台尔曼、皮克(Wilhelm Pieck)和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的诞辰日和逝世日。东德的日历中也预留了特定的一些日子来向特定职业致敬,比如冶金工人、农民、建筑工人、化工工人,但是这些都不会获得主要的新闻报导。

东德日历中最重要时段是党代会。不像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每年的纽伦堡大会,1950年以后党代会都是每4—5年举

〔73〕 Monika Gibas and Rainer Gries, “Die Inszenierung des 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Geschichte und Dramaturgie der Dezennienfeiern in der DDR,” in *Wiedergeburten: Zur Geschichte der runden Jahrestage der DDR*, ed. Monika Gibas et al. (Leipzig: Leipzig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99), 12–17.

〔74〕 Günter Schabowski, “Inr Vermächtnis ist unser Kampf für Arbeit, Brot und Völkerfriden,” *Neues Deutschland*, 13, January 1986, 2.

行一次。十一次会议如下：1946, 1947, 1950, 1954, 1958, 1963, 1967, 1971, 1976, 1981 和 1986 年。计划中的 1990 年大会因东德解体, 已失其实际意义, 尽管各项准备工作进展良好。每一次大会, 据它声称, 都代表了东德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不像纳粹党的大会, 它并不是一个决策的组织而只是欢庆纳粹主义, 东德共产党大会据称是协商的机构, 未来数年的方针将会通过党的集体智慧来讨论决定。“党代会的决议将会得到贯彻”, 正如一幅通常的标语所宣称的。纳粹党每年会出版两卷重要的关于党员大会的内容, 其中充斥着充满激情的照片。既然东德党代会的主要活动包括坐在大厅里的代表们聆听没完没了的讲话, 那么只有这样两卷就是不可能的。相反, 满是讲话和决议文本的厚厚大书出版了。两次党代会期间将是中央委员会 (Central Committee) 的大量会议, 它们的决议也会出版。

重要的年度庆典是 10 月 7 日, 东德的“生日”。那些能被 5 整除的“整数”周年纪念都是特别壮观之盛典的主体。每 10 年都会发行纪念书籍。〔75〕40 周年纪念日则会集全国之资源来大肆庆祝。国家通常以增加稀缺商品供应的形式为群众提供“礼物”, 而人民也被期望以增加生产的形式向国家献礼。新闻媒体报道为了庆祝这一节日, 各个工厂和生产小组纷纷承诺超额完成任务。

1984 年的 35 周年纪念日就很典型。正如往常一样, 在前一次纪念活动不久, 筹备工作就开始了。《新德国》提前几个月就开始提及它了。一份对临近 10 月 7 日数周内的文章所做之调查暗示了它的中心性:

- 9 月 1-2 日: 东德田径运动员获佳绩喜迎 35 周年纪念。

〔75〕 有关 10 月 7 日庆典的详细讨论, 参见 Gibas et al., *Wiedergeburt*。

- 9月4日:35周年纪念标志首现头版。
- 9月11日:生产目标完成迎接35周年纪念。
- 9月15-16日:地方(*Bezirk*)党部在东德35周年纪念名义下开始年度培训课程。工人们誓言最好最快完成任务向国家献礼。
- 9月21日:埃里希·昂纳克会见东德艺术家代表并高度评价他们35年来的成就。
- 9月27日:为庆祝35周年纪念,奖章颁发仪式举行。
- 10月2日:为迎接35周年纪念,柏林剧院重新开放。
- 10月4日:为庆祝35周年纪念,奖章授予军队官员、有贡献的公民和有战斗力的集体。
- 10月5日:昂纳克向反法西斯主义的抵抗成员讲话:“在庆祝东德成立35周年之际,工人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 10月6-7日:16版中14版聚焦于周年纪念。
- 10月8日:16版中大多数评论了各种庆祝活动,并且刊登讲话文本。

33

8月30日后只有3期没有给接下来的纪念活动以哪怕一个冗长故事的篇幅,这几期关注的是埃里希·昂纳克访问埃塞俄比亚(Ethiopia)纪念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成功十周年。

这些庆祝活动提醒公民们他们国家已取得的成就,以此在他们心中建立一种“报效”国家的责任感。但是它的中心价值已经超越了正常的节日活动。为期数周的准备,大量的新闻报导以及壮观的游行活动试图赋予国家纪念活动以引人注目的重要性,以此建立一种“我们”的感觉,从而让公民们相信他们是这一伟大尝试的一部分。既然每一年都标志着社会主义前进的另一个阶段,那么它就是民主德国的马列主义的伟大“拯救故事”中

一个重要的事件。

另一个准宗教的体现是或许可被称作由许多朝圣地构成的网络。这些包括与列宁、党的历史和位于柏林 - 特雷普托 (Berlin - Treptow) 的巨大的苏维埃战争纪念碑 (Soviet War Memorial, 部分使用希特勒帝国总理府 Reich Chancellery 的石头建造而成) 有关联的地方。阿兰·罗斯兰格 (Alan Northnagle) 如此描绘特雷普托纪念碑的重要性:

就像所有这种类型的共产主义纪念碑一样 (并且就像任何大教堂一样), 特雷普托公园纪念碑不只是为了吸引旅游者, 它还是忠诚地支持苏维埃与反对法西斯之仪式的一个中心。数千庆祝仪式在这里举行,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年一度 5 月 9 日苏维埃胜利日和 11 月 7 日革命胜利日的庆典。但是在这之间, 它也被用作如下事件的背景: 青年奉献仪式、少先队与自由德国青年组织入会仪式、战士和官员宣誓仪式、授旗仪式、反法西斯集会、反帝国主义示威、无数的火炬仪式、自由德国青年 - 共青团 (Komsomol) 集会、新婚夫妇献花, 以及许多其他别的事件。〔76〕

罗斯兰格进一步提到, 少先队 (Young Pioneers) 照看着全东德约三千座苏维埃纪念碑。拜访者经常在纪念碑前留下花环或其他献祭。1974 年的一本书列出了大约五千座纪念碑, 其中纪念的是工人运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的历史。〔77〕在东德, 如果没有多次拜访这些神圣之地的经历, 没人能完成学校教育。

〔76〕 Northnagle, *Building the East German Myth*, 66.

〔77〕 *Gedenkstätten: Arbeiterbewegung, Antifaschistischer Widerstand, Aufbau des Sozialismus* (Jena: Urania, 1974).

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尤其像一个神话般的所在,其有趣之处在于它涉及对历史的双重操纵。它过于强调它是左派的牺牲之地,从而掩盖了以下事实:苏联自己在1945年之后很快就将其用作集中营运作了一段时间。在布痕瓦尔德散发的40页小册子有4页附带涉及犹太人。集中营被描述成共产主义英勇抵抗纳粹主义的一个例证:“第一批被关押者就是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毫不屈服,坚定地相信其事业的正义性和它的最终胜利,因而始终未放弃斗争。他们体现了更好的德国人,他们拯救了德意志民族的尊严。”〔78〕布痕瓦尔德的重要性因台尔曼在此被杀害而增强了。政治犯事实上是布痕瓦尔德的主要受害者,但是即使在讨论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中营时,小册子也没有对犹太受害者的重要性提供任何暗示。

34

像纳粹党人一样,德国统一社会党试图发展出生、婚姻与死亡的各种合适仪式,但是没有像纳粹党人那样花费同样精力在它们之上。由适合这些场合的文本集结而成的应景书籍出版了。正如1961年出版的其中一本所评论的:“在节日和庆典中,工人及其家庭首先应该意识到我们社会主义生活的意义与内容,从而理解它并被鼓励如此行动。”〔79〕东德缺少的是像《新共同体》(*Die neue Gemeinschaft*)这样的等价物,而产生的关于仪式的资料总体来说也少得多。到东德末期,各种完善社会主义婚礼和洗礼仪式的努力大体上终止了。“青年奉献”仪式是一个例外。直到最后那些日子,东德仍把大量实质精力放在印象深刻的青年仪式上。

〔78〕 Annadora Miethe, ed., *Buchenwald* (N. p., 1983), 4.

〔79〕 Rudolf Fischer, Ursula Langspach, and Johannes Schellenberger, eds., *Sieh, das ist unser Tag! Lyrik und Prosa für sozialistische Gedenk- und Feierstunden* (Berlin: Tributeüne, 1961), 6. 类似的作品,可参看 Heinz Czechowski, ed., *Unser der Tag unser das Wort: Lyrik und Prosa für Gedenk- und Feiertage* (Halle: Mitteldeutsche, 1966)。

社会主义信仰

马列主义呈现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它遵循已被发现的规律,而只要遵循它,就会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马列主义理论解释了人类社会来自何处,去往何方。它的追随者“站在历史一边”,坚信这一事业不会失败。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就是成为一个现代的科学人,他的行动服务于伟大的目标。

东德仍然精力充沛地支持德国的传统美德。最生动的例子或许就是在1958年第五次党代会上由沃尔特·乌布利希揭示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十项戒律”(Ten Commandments for the New Socialist Person):

1. 你应该一如既往地工人阶级和所有工人的国际团结而工作,就像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间牢不可破的联合而工作一样。

2. 你应该热爱你的祖国,并且随时准备为了捍卫工人和农民的权力而贡献你的所有力量与能力。

3. 你应该帮助消除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剥削。

35

4. 你应该为社会主义努力工作,因为社会主义会引导工人们实现更美好的生活。

5. 你应该如此行动:通过相互帮助和同志般的合作来发展社会主义,尊重集体,虚心接受它的批评。

6. 你应该保卫和增加人民的财产。

7. 你应该为提高你的成就而不断奋斗,勤俭节约,并且巩固社会主义工人的纪律。

8. 你应该本着和平与社会主义的精神教导孩子们,以广泛的知识、坚毅的品格和强健体魄提升人们的素质。

9. 你应该爱清洁,生活体面,并且尊重家人。

10. 你应该向那些为其民族自由或者国家独立而斗争的各个民族表达你休戚与共的感情。〔80〕

经过适当的修改,乌布利希的大多数戒律就将与纳粹的“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原则保持某种连续性。

纵观东德的历史,相似宣传的广泛变体推动了很少有人反对的德国传统美德之传播。这些美德据认为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光辉事业。正如1983年一本探讨如何培养行为正派孩子的书所提到的:“对我们而言,好行为要通过社会主义道德起作用,它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一部分。”〔81〕道德行为根植于社会主义的世界观。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的天堂,它从未被清晰地描述,因而总是在未来。1976年的一幅海报提供了一个迷人的憧憬:“共产主义是人性的光辉未来。在那里,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将会消除,而人们将免于战争的灾祸。共产主义是和平、劳动、平等与友谊的世界。在共产主义之下,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将能够全面发展他们的能力与天赋。”〔82〕不管共产主义的天堂可能看起来如何,它的成就即能证明眼前的艰苦与挑战是值得的。这一目标展现了如此令人激动的前景,以至于使我们接受过渡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缺陷成为可能。正如1978年的一本书所声称,这也

〔80〕 Dieter Vorsteher, ed., *Parteiauftrag: Ein neues Deutschland: Bilder, Rituale und Symbole der früheren DDR* (München: Koehler & Amelang, 1997), 37. 此书提供了对东德早期仪式与象征的一系列出色解释。

〔81〕 Ernst Z. Ichenhäuser, *Erziehung zum guten Benehmen*, 3rd ed. (Berlin: Volk und Wissen, 1983), 11–12.

〔82〕 笔者收藏有此海报。

就要求在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中塑造“一种新人”。〔83〕按照马列主义的理论,人性是可塑的,比起天生的人类特质,人性更多是它周遭客观环境的产物。改变环境就能改变人。

36 资本主义在马列主义中扮演着魔鬼的角色。既然马列主义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人类进程中的一个必要步骤,那么它就与纳粹主义中犹太人扮演绝对罪恶制造者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尽管如此,一旦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然过去,它就变成了罪恶的力量。因此,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取决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满是对资本主义的攻击,它把两个体系间的斗争看成是善与恶两种势力间的对抗。1973年的一本出于军事教育的小册子中有这样典型的一段话:“(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对抗是一场世界范围内激烈的阶级冲突。没有何处不被它所肆虐。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在人类理智与情感的斗争中,它发生着激烈的冲突。”〔84〕正如东德政治词典最终版所言,资本主义已然威胁到人性的存续。〔85〕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世界才能达到它最终的和幸福的状态。在其他方面,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恰好为东德政策中那些难以理解的方面提供了正当理由。在世界范围内针对反动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柏林墙、国内监视体系、经济困境以及其他都具有暂时的不可避免性。

因此,像纳粹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将其观念根植于据称永恒的科学规律中,它鼓励公民们为那些将会导向快乐未来的貌似美好的目标而工作和奉献,它还创立了各种伪宗教仪式与庆典,并且认为世界就是善对抗恶。

〔83〕 Gerhart Neuner, *Politisch-Ideologische Arbeit und Erziehung*. (Berlin: Akademic, 1978), 9/G: 4.

〔84〕 Ernst Hampf, *Weil die Partei führt, ist unser Sieg gewiß* (Berlin: Militärverlag der DDR, 1973), 35.

〔85〕 *Kleines politisches Wörterbuch* (1988), 474.

总结

极权主义是一种试图影响社会各个领域的无所不包的现象。正如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所评论的,它“掌控着一套无可匹敌的精确,逻辑结构严谨,总体上易于理解,并且根本而言又极其灵活的意识形态。从其精巧性和完备性上看,它几乎就是一种世俗宗教。无论什么问题它都能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它几乎不可能只被部分接受,对人类生活而言,接受它有着深刻的寓意。”〔86〕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的马列主义都通过把宣传作为努力的一部分,以图将生活所有方面都纳入党的影响之下。它们都发展了一种宗教的各种外部特征:永恒力量、绝对真理、神圣文本以及世俗崇拜的各种方式。

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允许它提出特定的宗教主张。正如我们将会在本章中看到的,那会强加给它许多标准的宗教在面对其他宗教时同样的冲突:容忍一种与之竞争的宗教世界观就是削弱自身。尽管它的党内纲领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赞成“积极的基督教”(positive Christianity),但是基督徒和纳粹党人对真理的宣称内在地不相容。这一事实双方的领导人都心知肚明。纳粹主义应付基督教的唯一方式是拒绝承认它的主张是一种世界观。因此,纳粹主义试图将教会的活动限制到各种礼拜仪式,而把教堂门外之事和个体灵魂托付给党。

东德面对的冲突相对没那么激烈。它的马列主义无神论基础迫使它要去对抗基督教对真理的更广泛声称。不像纳粹主义,它

37

〔86〕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Europe*, ed. John Keane (Armonk, N. Y. : M. E. Sharpe, 1985), 25.

明确主张,宗教是过去的残余,它与马列主义的“科学”原则是矛盾的。鉴于基督教在德国强大的文化支撑,以在苏联有时运用的同样力量与它对抗将是很不明智的。有时教会和党的目标恰好一致(比如在和平问题和 1983 年的路德纪念活动上),即允许把基督徒看成是过时体系的后继者,而这一体系仍会将其支持者引向正确的方向。非常清楚,马列主义与基督教的和解就像那样。它不需要假定它们的核心世界观是相容的。既然历史站在它一边,在历史之河将其宗教对手冲垮之前,它等待就够了。

纳粹主义是偏执的。正如纳粹党人所声称的,它不是“出口产品”(an export item),而是只适合于德国人的一种统治形式。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马列主义的宣称拥有比国家社会主义宣传更广泛的听众。马列主义声称自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有当社会主义取代了世界上所有其他统治形式之后共产主义才会到来。对亚洲和非洲人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要接受纳粹主义,但是马列主义则向所有人许诺了一个世俗的千年王国。当向世界上的听众发话时,马列主义的普遍吸引力赋予了它相当可观的宣传优势。

两种体系都对下一代的信仰问题忧心忡忡。纳粹党人将加入其宣传组织的资格限制为 1933 年前即是其成员的那批人,同时对 1933 年后怀着实用主义目的蜂拥入党的成员充满忧虑。随着建国一代的老去,以及他们不相信更年轻一代能将必要的精力投入到斗争中,东德在 1980 年代也面临自己的问题。几次主要的清洗运动都没能完全净化党员队伍。

两个体系都面临一种形势,它与 17 世纪中期新英格兰新教徒面临的困境非常相像。随着虔诚之人的老去,他们发现教会里满是对信仰表示赞同的人,但是却没有经历过赋予他们教会成员身份的皈依经验。解决办法是“中途立约”(Half Way Covenant),它允许在怀着对最终皈依经验的期待中让这些人的孩子受洗。纳粹主义和民主德国的马列主义担心,幸福地生活在老一辈赢得的有

利条件中的年轻一代将无法胜任他们的使命。1942年一位纳粹作家注意到,很多德国人缺乏铸就了老一辈人的那种火的洗礼:“这些公民(包括一些党员)在观念上接受了我们,但是在他们内心仍然与党相距遥远。或许这是因为他们缺少在我们掌权之前的伟大斗争经验。他们就像一群后继者,不用动一根指头,不用克服巨大的挑战,和平、满足、繁荣与幸福就如约而至。”〔87〕1933年前那些为纳粹党或1945年后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人,他们的革命经历如何传达给未经历此事的人们?他们并未亲见,如何能相信?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的马列主义创立庞大的教育体系来培养下一代,它们都充满自信,认为新一代将会推进老一代人担心不会得到贯彻的工作。

两个体系都承诺世俗的乌托邦。虽然纳粹主义用了更明显接近宗教的语言,它也讨论上帝,但纳粹的天堂将会在人间实现。人类的问题通过意志就能解决。人性或许从不能实现绝对的完美,但是一旦犹太人和基因的缺陷被消除,低等民族安居其合适之位,千年帝国(Thousand Year Reich)将会如此接近于一个可能中的完美国家。对所有人来说,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未来的憧憬比纳粹主义的雅利安世界更加全面和无所不包,但它也是一种奇怪的混合,即拒绝了上帝,然而仍期待一种人性的转变。

为了达至这些新世界,有必要操纵人性。长期的教育过程和社会条件的变迁将会产生一种新人。对这种新人的想象各有不同,但是在两种情形下,它都是一种他们需要的人的类型,献身于统治的意识形态,忠诚于个人之上的共同体,摆脱了对过去的幻觉。它们都明白,这是数代人的任务,非几年之功,并且要使公民们无愧于他们所生活的国家,坚定的、毫不松懈的宣传必须被看成

〔87〕 Scholle, “Vom Ortsgruppenleiter,” *Der Hoheitsträger* 6, no. 9 (1942): 29.

是一个关键的手段。问题只在于这些新人将会由他们年老的、顽固不化的父母来教导。结果证明,改变人性的任务比这一体系所期望的难度更大。

39

点燃了国家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之间冲突的激情揭示出它们在世界观上的冲突。希特勒看不起英国和法国,乃在于它们的堕落和对犹太人的屈从,但仍将其看成是具有某种美德的两个国家。它们仍是西方的一部分。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完全是一个他者(other),一种竞争性宗教。戈培尔在1943年5月8日的日记开头谈论了这一问题:“建立在一种世界观之上的国家拥有资产阶级国家没有的一种优势。它们建立在一个清晰的精神基础之上。一直到这一运动在东方露头前,这都给我们带来巨大优势。现在我们遭遇到一个对手,它也代表一种世界观,即便它是错误的。”〔88〕在卢森堡占领区,纳粹党卫军情报服务(SS intelligence service)报导说,对于同苏联的战争,人们正在接受一种多少有点不同的观点,不过它仍将其看成是一场世界观的较量:“反基督教者(anti-Christian)对抗反基督者(Antichrist)。”〔89〕

东德似乎经常在同西德的斗争中重燃二战。它建基的神话是反法西斯主义,从而把德国在二战的失败看成是德国传统中更好成分的一场胜利。柏林墙是“反法西斯主义保护墙”(Anti-Fascist Protective Wall)。东德习惯于将西德看成是希特勒国家的直接继承人。〔90〕为何提出这种关联是关键的呢?如果纳粹的威胁

〔88〕 Joseph Goebbels, *Joseph Goebbels Tagebücher, 1924—1945*, ed. Ralf Georg Reuth (Münich: Piper, 1999), 5: 1927.

〔89〕 Heinz Boberach, ed.,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Die geheimen Lageberichte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SS, 1938—1945* (Herrsching: Pawlak, 1984), 7:2522.

〔90〕 比如,参见一幅1953年的典型漫画:GPA/images/wind/windd.jpg。

不在,很难论证东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抵抗西德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东德抵抗的是一个理论上注定要崩溃的体系,但是在生产的质和量上,后一体系毫无疑问绝对超过了前者。在宣称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崇高立场时,东德的宣传工具选择了一种方式来重申其论点,即声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前景是解决德国困境的方式。

无一体系是一种宗教,但是它们都通过在宣传中运用一种宗教教会采取的许多相同方式来呈现自身。任何宗教的大多数信徒都不是哲学家。他们对神学的厚厚大书不感兴趣,而是对理解世界的意义,赋予生命以价值,回答那个最伟大的问题“为什么”,宗教所能提供的实际好处感兴趣。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写道:“极权主义不仅是人间地狱,还是天堂之梦。”〔91〕没有那个梦,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就不能在人类灵魂中建立起它们已然拥有的控制。对它们的追随者来说,这一梦想使他们能选择忽略罪恶,看见善的幻象。

它们的公民确实通过许多方式选择了转移自身注意力,但是比起那些天生好运生在各种诱惑的吸引力更少之地的人们来说,并不能就把他们看成某种程度上道德上更不敏感,更少人性之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正确地评论道,大众对极权主义的支持既非无知也非洗脑之结果。〔92〕极权主义的幻觉是吸引人的。两个体系都主张崇高的目标。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的马列主义以各自的方式激发了人们对公共善、勇敢、奉献、友爱、勤勉、乐观、忠诚,以及所有能带来许多美好之物的美德之兴趣。

不像弥尔顿(Milton)的撒旦大胆宣称:“恶呀,你来做我的善”

〔91〕 引自 John Rodden, *Repainting the Little Red Schoolhouse: A History of East German Education, 1945—199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60。

〔92〕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1), XXIII.

(Evil be thou my Good),极权主义把自身看成是一股被所有正确与真实之物所驱动的力量。对公民们来说,要让他们相信他们的政府正在追求高贵的目标相当容易,特别是考虑到永无止境的宣传如此宣称之时。正如神学家普兰廷格(Cornelius Plantinga, Jr)所评论的:“为了做得最糟,罪恶需要看起来最好。罪恶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在乔装打扮上。”〔93〕大量花费则用在了宣传上。

〔93〕 Cornelius Plantinga Jr. , *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A Breviary of Sin* (Grand Rapids, Mich. : William B. Eerdmants, 1995) , 98.

第二章 教 义

虽然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的马列主义同属主张拥有绝对真理的准宗教世界观,但它们发展了非常不同的看待宣传的理论视角。纳粹主义根本不喜欢理论。第三帝国期间,费解的理论著作讨论了纳粹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但是纳粹领导人对此毫无兴趣。虽然纳粹主义宣称它建立在永恒的自然法则之上,但是其领导人反而把自信更多地放在信仰与坚定的意志,而非学术的细致论证上,然而马列主义在每一个主题上都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并期望其中一些对职业的宣传员有其重要性和好处。

41

这一不同要追溯到他们各自的创建者。希特勒《我的奋斗》更多地理解了宣传的意义而不是它所包含的多数主题,但是他对提出有关宣传的复杂理论不感兴趣,党内也没有任何其他感兴趣。另一方面,民主德国的马列主义则坚决主张其科学的基础,虽然已证明这些基础对开展有效的宣传来说帮助有限。首先,我将考察两个体系各自提出的宣传方式是怎样的,然后在其他章节转向它们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

纳粹没有宣传指南

纳粹党否认一种科学的宣传理论之可能性。戈培尔在一本关

42

于其柏林早期活动的书中坦率地谈及这一点。学院派的宣传员是无用的。“当他坐在书桌前,正好想出了一个聪明的方法,随后他会惊愕和吃惊于那时真正的宣传员并不用他的方法,或者他们实际上企图这样做,但却没有达到其目标。”〔1〕他时不时会重复这一观点。宣传攸关实际的行动,而不是学术讨论。他最合适追随希特勒的领导。《我的奋斗》谈及了大量有关宣传的内容,但是希特勒并未在那里或随后其他地方详细地解释过宣传怎么和为何会产生效果。他的目的就是设计宣传该如何运作,而不是发明理论来解释什么促使它运作。

在1934年的纳粹宣传员杂志上,一个作者比其他大多数人更接近于理解了科学研究的作用,然而很清楚地认为它是次要的:“由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支撑的……现代心理学试图通过系统的实验和统计分析(比如,逻辑思维)发现心理过程的规律。这些现代方法已经产生大量有价值的结论,但是它们本身不是自足的。单个个体和群体的心理中存在的无法衡量的因素很难被解释。心理实验和统计技术都不能产生宣传员能以数学的确定性加以运用的规律。”〔2〕最好的宣传员是那些能从其灵魂深处和经验中本能地懂得如何争取大众的人。研究和培训是必要的,但是并不够。

就像基督徒有时利用《圣经》的方式一样,《我的奋斗》被用作“证据文本”(proof texts)的来源,此方式意图表明某人正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3〕纳粹对这一主题的论述,无一不服从于《我的奋斗》。既然纳粹的宣传理论从未超出过这一范围,它仍是纳粹思

〔1〕 Joseph Goebbels, *Kampf um Berlin: Der Anfang* (Munich: Franz Eher, 1934), 18. 也可参看1928年戈培尔就宣传向党员们做的讲话, *Signale der neuen Zeit*, 41. 此次讲话全文的翻译在 GPA/goeb54.htm.

〔2〕 Schulze - Wechsungen, “Politische Propaganda,” *Unser Wille und Weg* 4 (1934): 323 - 332. 参看 GPA/polprop/htm.

〔3〕 Ringler, “Die Arbeit des Propagandisten,” 297.

考此问题的最好指南。

希特勒没有声称对这一主题的伟大原创性。他坦率地承认从天主教徒、马克思主义者、共济会员(Freemasons)以及相当广泛的其他资源中获取了灵感。〔4〕他的视角在整体性和综合性,而非特定细节上是原创的。既然他把方法本身看成是中立的,他乐意从任何一处借用好的方法。

关于宣传,希特勒思考了些什么?他把两章奉献给了这一主题,一章名为“战时宣传”(“War Propaganda”),另一章则为“宣传与组织”(“Propaganda and Organization”),但是此主题贯穿《我的奋斗》全书。他将其看成是“公共教育”,一种劝服大众接受一个政党或国家之观点的方式。宣传将整合进一个民族的文化中,而不只限于特定的媒体或形势。他的思想的中心原则是感情呼吁、简明易懂、重复、力量(或武力)、领导力和信念(emotional appeal, simplicity, repetition, force, leadership and faith)。

43

希特勒的原则来源于他对人类总体尤其是德国人毫不妥协的观点。大众是“愚蠢和健忘的。”〔5〕他赞同维也纳市长卡尔·鲁伊格(Karl Lueger),后者“很好地提醒自己不要把人们想象得比他们实际更好。”〔6〕大众面对的是一个超出了他们理性和逻辑理解能力的复杂世界。任何通过复杂的论辩来征服他们的企图必定会失败。无知和健忘的人们需要所有的帮助,这样才能踏上通往真理之路。

大众会被情绪感染,而希特勒没有轻蔑地看待它。感觉是比

〔4〕 参看 Haig A. Bosmajian, “The Sources of Nature of Adolf Hitler’s Techniques of Persuasion,”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25 (1974): 240–248。

〔5〕 Hitler, *Mein Kampf*, 115. 参看 Jeane J. Kirkpatrick, *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 Rationalism and Reason in Politic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106–109, 此处讨论了希特勒对德国大众的看法。

〔6〕 Hitler, *Mein Kampf*, 99.

理智更确定的指南。大众能被理性误导,但是长远看他们的直觉有可能拯救他们:“在政治事务中,感觉通常比理性更能正确地做出决定。”〔7〕戈培尔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大众的思考是简单和原始的。他们喜欢从复杂的事实中进行概括,然后根据这些概括,得出清晰和不可妥协的结论。一般来说,那些概括确实是简单的,但是通常一针见血。”〔8〕通过告诉大众,他们无需颇费周章理解它们周遭世界的复杂性,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将会做出他们本能上意识到的正确选择。由此,希特勒和戈培尔能取悦于他们。

希特勒认为理解大众的心理学的关键是。他们并非完全顺从的,但宣传员能够在他所希望的任何方向上操纵他们:“一场具有伟大目标的运动因此必须警惕自己,确保不失去与广泛大众的联系。”〔9〕为了感动他们,一个人必须依靠他们现有的态度与感觉。希特勒论证道,德国的一战宣传没能理解大众。比如,它嘲笑外国来士兵,因而在随后遭遇致命的敌人时扰乱了德国军队。他们被来自国内外的宣传误导了。甚至在二战期间,希特勒也比同盟国更慢地实施总体战计划,就是担心它们可能激起民众的反对。

44 一种宣传方式与大众越贴近,它争取他们就越直接,其作用就越大。因此希特勒更喜欢演说而不是写作:“在历史的车轮中,从古至今开启最重大的宗教与政治巨变的权力总是口头语(spoken word)的魔力,并且这就足够了。”〔10〕他强调,激情更容易通过演说者的直接在场而不是一页文字激发出来。书页只能一个个地赢得支持者,并且只有在读者有能力聚焦于论点本身时(希特勒认为大众无此能力)。口头语使听众成为演说者的同盟。演说者的

〔7〕 Hitler, *Mein Kampf*, 173.

〔8〕 Goebbels, *Kampf um Berlin*, 191.

〔9〕 Hitler, *Mein Kampf*, 107.

〔10〕 同上, 106 - 107。

激情变成了听众的激情。

希特勒认为,比起小谎来,“大谎”更易被人相信,不过他的“大谎”观念经常被误解了。他的观点是小谎(比如,“市长是一个有罪的盗用公款犯”)不如大谎有说服力(比如,“犹太人卷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同谋计划”)。小谎即刻就能被驳斥,而大谎则很少如此。矛盾的是,谎言越大,越难被驳倒。市长通过到法院走一遭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犹太人如何能证明他们没有参与这场巨大的阴谋?证据越少,在颠倒它时,阴谋势力的证据反而越多。他的论证出自一个讨论维也纳犹太新闻界的中间部分:“如此一来,他们将按照以下原则行动,既然大多数人在其内心深处倾向于腐化,而非有意识和有目的地作恶,那么一个谎言的巨大能量中总是包含某种可信性的因素。并且,因此,鉴于他们原始简单的头脑,既然他们自己在小事情上撒谎,但对太大的谎言则会感到羞愧,那么他们更容易变成大谎而不是小谎的受害者。他们从未在头脑中构思过如此一个大谎,也无法相信如此骇人听闻的厚颜无耻行为和邪恶的歪曲会在其他人中存在。”〔11〕虽然希特勒有时将撒谎看成是一个必要的手段,但并不提倡将撒谎当作一般的原则。他赞成精心选择而不是捏造的谎言,但是如果选择被证明于他的目的来说还不够,他并不对捏造感到不安。他很清楚,宣传是一个手段,总是服从于更大的目标。人道主义或审美的考量都是不恰当的。〔12〕目的证明了手段正当。

即使大体而言,戈培尔因发明“大谎”而比希特勒受到更多指责,但在公开场合,他更少明确表达欺骗的需要。在1934年纽伦堡集会上,他称赞了纳粹宣传的诚实:“好的宣传不需要撒谎,事实上它可以不撒谎。它没有理由恐惧真理。相信人民不能掌握真

〔11〕 Hitler, *Mein Kampf*, 231.

〔12〕 同上, 177。

45 理,这是一个错误。他们能。唯一的问题是以一种人民能理解的方式将真理赋予他们。”〔13〕当然,他是在为宣传做宣传。当他认为形势允许时,他会严肃看待被当作真实的东西。在可选取的大量事实中,通常存在一些前后一致的或能被如此解释的事实。

既然大众很容易陷入困惑之中,宣传就必须清楚明白。不应该用各种选择或复杂的观点来搞乱其思想。希特勒声称一战期间宣传犯的错误是允许公开讨论战争的理由,“一旦我们的宣传承认另一作战方哪怕少许的正义性,怀疑我们正义性的基础就已经铺就了。这样一来,大众就无法站稳立场,来区分国外的非正义终结于何处,我们的非正义开始于何处。”〔14〕

就像一个肥皂制造商声称他的产品是最好的,同样,一个政治宣传员因此必须承认反对方毫无美德可言。大众理解黑和白,而不是灰的阴影部分。戈培尔认为宣传更不应该试图去证明它最具争议的观点。在讨论他1927年开办的一份柏林报纸《攻击》(*Der Angriff*)时,他写道:“它特意呈现它试图劝说读者相信的内容,然后从中推导出毫不妥协的结论。”〔15〕这种宣传是一场独白,而不是一场对话。它压制了对立的观点与视角。按照当前的行话(*jargon*)就是,它意图获取霸权,而不是只在观念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大众的有限能力使得重复变得极为关键。甚至最有天赋的宣传员在确保大众的注意力时,更不要说信念了,都面临巨大挑战。既然大众的智力有限,健忘严重,“所有有效的宣传必须限定为很少几个观点,并且以口号的形式反复向其灌输,直到公众中最后

〔13〕 *Der Kongress zu Nürnberg vom 5. bis 10. September 1934: Offizieller Bericht über den Verlauf des Reichsparteitages mit sämtlichen Reden* (Munich: Franz Eher, 1934), 134. 关于演讲全文,参看 GPA/goeb59.htm。

〔14〕 Hitler, *Mein Kampf*, 183.

〔15〕 Goebbels, *Kampf um Berlin*, 200.

一个人都能理解你通过口号想让他们理解的内容为止。”〔16〕希特勒并未指出宣传必须以相同的方式重复其观点,因为那很快就会让人厌烦。相反,一个观点必须转换成多种而非唯一的形式直至它被掌握。希特勒意识到,政治就像广告一样,持续的努力是必要的,这样才能维持甚至一种既成产品:“所有的广告,无论在商业还是政治领域,要获得成功,需要它专注于连续性和持久的一致性。”〔17〕

对希特勒来说,力量是有效宣传的一部分。大众不会尊重这样一场运动,它容忍其宣传所表达的内容是罪恶的。征服大众的秘密是“意志和力量”。〔18〕希特勒根据情形的不同赞成一系列恰当力量的运用。他赞成任何宣示力量的事情,只要它不会疏远大众。大众集会和游行总是影响巨大的。希特勒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会对他的影响:“战争结束后,我经历了一场马克思主义者在皇宫(Royal Palace)和大花园(Lustgarten)前的群众游行。这场游行就是红旗帜、红头巾与红花的海洋,估计有12万人参与了,从纯粹外人的眼光来看,这已经非常庞大了。我自己能够感受和了解人群中的男人们是多么容易就屈服于事实上如此壮观场面所暗示的魔力之中。”〔19〕希特勒写到了纳粹冲锋队(SA,褐衫队)的重要性和他的追随者甘愿为运动而死的意志。力量的展示让那些不是其成员的人们印象深刻。

46

国家拥有随它自由控制的甚至更强大的武器,希特勒直接描述了力量的中心性。领导力需要运用武力:“为了在地球上实现革命新秩序,坚定相信有权运用甚至最残暴的武器总是与一个狂

〔16〕 Hitler, *Mein Kampf*, 180-181. 原文皆为斜体。

〔17〕 同上, 185。

〔18〕 同上, 338。

〔19〕 同上, 492。

热信念的存在密切相关。”〔20〕大众会对以下教义印象深刻，它不容忍竞争对手，并且主张它绝对相信自己有能力和权利命令他人服从。

但是力量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基础，它只能在短期内控制大众，除非它与一些他们所相信的事情相结合：“任何暴力，只要它不是源于一个牢固的精神基础，就将是摇摆不定和靠不住的。”希特勒绝对明白需要信念的支撑：“一个人不会为生意而死，只会为观念而亡。”虽然他把宗教看成是需要最终被根除掉的对象，但是他一次次注意到宗教，将其看成是产生强大公众影响之典范：“我认为一种宗教的基础或毁灭比一个国家的基础或毁灭更强大，更不要说一个党了。”他经常引用天主教会信仰的中心控制作为例证：“它相当正确地意识到，它抵抗的力量并不取决于更少或更多地采纳了某一重要时刻的科学发现，事实上这总是处在变动中，而在于严格遵循曾经建立起来的教义，因为只有这些教义才会赋予这一整体以一种信仰的特征。”〔21〕

希特勒认为个人对宗教主张的献身是一场有效的大众运动必不可少的。一般的政党会为其支持者提供建议。宗教提出绝对的主张。他写道：“政党倾向于妥协；哲学(philosophies)从不如此。政党甚至要对付反对者；哲学则宣称它们永不犯错。”〔22〕希特勒的运动需要的正是那种绝对正确性。

47 希特勒的宣传手法中最后的特征就是他强调领导力。宗教信仰一般包含一个上帝。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希特勒事实上就是被作为一个神而口口相传，虽然他不能在《我的奋斗》中以那样的外观来呈现自己。他确实强调了领导力的重要性。在

〔20〕 Hitler, *Mein Kampf*, 593. 原文皆为楷体。

〔21〕 同上, 171, 152, 114, 459。

〔22〕 同上, 455。

1927年的演讲中,希特勒说道:“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民族期望被社会的大多数人统治,那就是在自我欺骗。不,你没有理解这个民族。它完全不想被拖进‘大多数人’这个群体。它对这些计划没有兴趣。它需要的是它能信赖的一个领导人,这就足矣。”〔23〕他正在对数千名充满激情的追随者讲话,他们的欢呼印证了他的观点。

希特勒把领导力看成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就像一个名画家不能被取代,而由另一个人来接替他完成遗留下来的后半部分绘画工作一样,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伟大的政治家和战士也不能被取代。因为他们的能力通常也牵涉到艺术的领域。它不是机械的训练,而是上帝恩赐的天生才能。”这种与生俱来的领导力同宣传有直接的关联:“因为领导意味着:有能力鼓动大众。”〔24〕伟大的宣传,本质上就像伟大的领导力,是个性和天赋的问题,不是普通人能够掌握的原则问题。按照纳粹党人的想法,大众不能长时间容忍无能的领导——但是只要领导人履行了他的职责,大众自然会支持他。

从纳粹的角度来看,有效的宣传要求一种单一的意志。正如广播主管阿道夫·罗斯金(Adolf Raskin)所言,宣传部长不能按照大多数人的规则行事:“自由民主国家的宣传部长要么就是一场闹剧,要么他变成所有党派的独裁者——这样一来他也就不再是民主主义者,也不是民主国家的部长。”〔25〕

〔23〕 Alfred Rosenberg and Wilhelm Weiß, *Der Reichsparteita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Nürnberg: 19./21. August 1927* (Munich: Franz Eher, 1927), 42.

〔24〕 Hitler, *Mein Kampf*, 352, 580.

〔25〕 Adolf Raskin, “Dramaturgie der Propaganda,” in *Handbuch des deutschen Rundfunks, 1939/40*, ed., Hans-Joachim Weinbrenner (Heidelberg: Kurt Vowinkel, 1939), 84.

希特勒认为有效的组织需要形成一个发号施令者的等级机构（a hierarchy of dictators）。他主张赋予党内官员以“对下绝对的权威和行动的自由，但是……对上无限制的义务。”〔26〕这极大地简化了事情；一个人服从长官号令下属。它也有一种可靠的内部逻辑。领导力由能力来宣示，因此如果一个人要变成领导者，按照定义他要有能力。希特勒自己就是重要的例子。14年中，他从无名之辈爬升到了绝对权力的地位。

一个强大的领导者对宣传的控制并不意味着任何事都是可能的。领导者们必须认识到追随者有不同层次的义务。希特勒区分了宣传和组织，基本上就是一场运动中消极和积极追随者的区分。

48

宣传的功能是吸引支持者，组织的功能是赢得成员。

一个运动的支持者宣称他同意某一运动的目标，一个成员则是为它们而斗争……

由于成为支持者只要求消极地承认一种观念，而成员身份则要求积极的拥护和辩护，十个支持者中最多一两个会成为其成员。〔27〕

希特勒提出，一个党的成员必定承担深深的义务，但它也欣然接受那些相对冷漠的人的支持和选票。

总之，希特勒把宣传看成是有助于实现某一目标的一套实用方法。正如他在讨论自己从其他打动人心的运动中学到什么时，他清楚地表明了，这些方法也能用于迥然不同的事业中。最好的宣传员不是远离他们听众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本能地懂

〔26〕 Hitler, *Mein Kampf*, 595.

〔27〕 同上, p. 581.

得,即使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却知道该做什么的人。

纳粹党人没有兴趣去超越希特勒早期对宣传的思考,他本人也如此。他在后来的演说和谈话中提及宣传的各个方面,但是从未像《我的奋斗》那样集中探讨。他的追随者出版了一本有关宣传的通识读本。欧根·哈达莫夫斯基(Eugen Hadamovsky)1933年的《宣传与国家权力》(*Propaganda and National Power*)是唯一一本广泛论述宣传的书,它列在了1939年的宣传员参考书目中。〔28〕它包含论权力、大众集会、广播、新闻出版和文化等章节。虽然同希特勒比起来,哈达莫夫斯基更详细地阐述了一些观点,但此书仍是一种派生产品,没有在希特勒《我的奋斗》所写基础上增添任何重要内容。〔29〕戈培尔经常谈到宣传,并在其演说和短论集中讨论它,但他也很少说出在某些重要方面扩展了希特勒思考的内容。还有大量书籍,论证针对德国的所谓国际宣传的力量,但其中一些书讨论的则是宣传的普遍原则〔30〕。新闻写作教科书也考虑宣传,但并非以一种很可能有助于一名职业宣传员的方式。〔31〕因此,现在一个人如希望了解纳粹党如何考虑宣传,则把目光转向《我的奋斗》。

〔28〕“Schrifttum über Propaganda,” *Zeitschriften - Dienst*, 28 October 1939. 参看 GPA/biblio. htm。

〔29〕Eugen Hadamovsky, *Propaganda and nationale Macht: Die Organisation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für die nationale Politik* (Oldenburg: Gerhard Stalling, 1933)。

〔30〕比如,参看 Gerhard Baumann, *Grundlagen und Praxis der internationalen Propaganda* (Essen: Essener Verlagsanstalt, 1941), 18-48。

〔31〕比如,参看 Josef H. Krumbach, *Grundfragen der Publizistik: Die Wesenselemente des publizistischen Prozesses: Seine Mittel und Ergebniss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35)。这本新闻写作教科书以有关宣传的毫无启发作用的一章作为开头。

作为马列主义科学的宣传

49 要发现东德宣传方式的本质则更加困难。原则上,它的宣传是一种科学而不是艺术。马列主义区分了宣传和鼓动 (agitation)。宣传是从深度上处理观念;鼓动则以相对少的深度向大众呈现这些观念,但是要在两种劝说形式中划出一个清晰的分界线则是困难的。它们的领域有重叠,这导致马克思主义劝说大师威利·明岑伯格 (Willi Munzenberg) 把鼓动称作“应用中的宣传”。〔32〕一般而言,我会用“宣传”来指代两者。

对纳粹宣传方式感兴趣的人会转向《我的奋斗》。马列主义则没有类似的圣经。虽然马克思和列宁都是有造诣的宣传家,但是他们都未能以希特勒那种高度的清晰性来讨论这一主题。宣传方式不得不从他们广泛的著作中提炼出来。1974年,东德根据列宁的《论鼓动与宣传》(*On Agitation and Propaganda*) 节选相关章节出版了一本书。该书护封上这样说道:“本文集对以下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士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指南:党的官员、鼓动员、宣传员、新闻工作者和其他相关人士。”许多人很可能无法从这本异常丰富多样的文集中找到许多实际的帮助。其中一些内容只不过是列宁要求把鼓动员们送往特定地区去的简短笔记。〔33〕

东德的宣传员有一个长长的阅读清单。首先就是马列主义的一般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全集达到了43卷。列宁

〔32〕 Willi Münzenberg, *Propaganda als Waffe* (Paris: éditions du Carrefour, 1937), 11.

〔33〕 W. I. Lenin, *Über Agitation und Propaganda* (Berlin: Dietz, 1974). 此书由1969年俄罗斯版翻译而来。

的作品也有40卷可用。在人们开始反对斯大林之前,计划中的16卷斯大林著作已经出版了13卷。此外书架上还会有东德领导人的著作(1988年埃里希·昂纳克的演说和写论文集达到了12卷,超过5000页)和党代会与一般会议的决议,更不用说像柏林的马列主义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Marxism - Leninism)这样的学术机构的作品了。在这里,官僚机构而非某一重要人物说了算。

第二,各种专业文献。按照1972年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的一项决议:“只有当社会科学研究充实了鼓动和宣传,社会科学家自己积极参与鼓动和宣传,它们才能发挥全面有效的作用。”〔34〕不像纳粹党人,他们很少期望学者们可以提供任何有用的内容给职业宣传员,东德则积极寻求他们的帮助。

多数理论作品都是从俄语翻译而来,这与东德的标准口号遥相呼应:“学习苏联意味着学会胜利。”正如1972年政治局关于宣传的一份决议规定的:“主要目标就是把苏联(有关宣传)的科学研究成果传播开去。”〔35〕宣传是一个太重要的课题了,以至于很难独立完成。一个国家必须追随智慧的发源地苏联。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出版机构,迪茨出版社(Dietz Verlag)发行了三个版本的《政治教育方法》(*Methods of Political Education*),由苏联的一本标志性宣传教科书翻译而来。它是1972年政治局决议的直接产物,直到东德结束都是标准的宣传教科书。此书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探讨宣传,这意味着它是党内教育,但也对大众宣传和鼓动感兴趣。一开始它就主张宣传有着它的科学基础:“党的宣传的方法论是社会科学和党的活动的一个独立

50

〔34〕 *Die Aufgaben der Agitation und Propaganda bei der weiteren Verwirklichung der Beschlüsse des VIII. Parteitages der SED* (Berlin: Dietz, 1972), 87.

〔35〕 同上。

分支。它以马列主义的科学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依据并由此获得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宣传是完全冷酷的理性，“如果没有选择采用正确的方法，以使人们意识到宣传的内容，那么它将完全达不到目标……宣传的艺术非常接近于精通(mastery)的观念，包括可靠的专业知识、造诣和才能。”〔36〕尽管如此，相对于科学，艺术是第二位的。

此书用了100多页的篇幅来讨论宣传的理论基础。它首先提醒大家马列主义理论的优先性，必须不断地去研究它。理论是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宣传必定要鼓吹的真理。名为“社会心理因素可增强宣传的有效性”这章用14页的篇幅评论了个性、情感需求、态度与陈规。还有探讨教育的方法和逻辑的一些章节。

尽管关于宣传的科学性质存在多种说法，但是此书和其他苏联作品倾向于解释宣传的原则而不是从经验上论证它们。苏联学者甚至抱怨说资本主义世界在研究宣传的心理学时做得更好。〔37〕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学采用它自己的方式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但通常不被承认。比如，196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威廉·麦奎尔(William McGuire)提出了预防接种理论(Inoculation Theory, 又称防疫论)以发展出对劝服的抵抗。〔38〕不过它很快在苏联的理论中露头。〔39〕就像希特勒一样，苏联也乐意从对立的传统中吸取并“净化”(baptize)这些有用的方法。

〔36〕 A. S. Weschnjakov et al., *Methodik der politischen Bildung*, trans. Intertext (Berlin: Dietz, 1974), 20, 45.

〔37〕 David Wedgwood Benn, *Persuasion and Soviet Politic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9), 41.

〔38〕 William McGuire, “Resistance to Persuasion Conferred by Active and Passive Prior Refutation of the Same and Alternative Counterargument,”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 (1961): 326–332.

〔39〕 Benn, *Persuasion and Soviet Politics*, 166.

东德在对宣传进行科学研究时,产生的成果很少,而且已产生的成果又没有任何用处。在对控制论(cybernetics)的兴趣形成风潮之际,东德的一位著名哲学家,乔治·克劳斯(Georg Klaus)出版了几本东德历史上最详细研究宣传的书。〔40〕他费解的研究只有有限的影响,尤其是在控制论遭到反对之后。1967年党的政治词典提出:“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体系。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合理地控制社会过程,全面利用控制论就显得格外重要。”〔41〕1988年的版本完全丢弃了这句话。正如东德的一位知名媒体人士随后评论的:“乔治·克劳斯将他的书建立在逻辑和语义学之上。那使此书几乎不忍卒读。或许这也是它为什么会翻印出来的原因?”〔42〕可以确定的是,它的读者很少会是职业宣传员。

51

虽然东德从未在重要方面违背苏联树立的典型,但是国内从不缺有关宣传的资料。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主题上频繁发表有约束力的声明。党的领导人经常谈到宣传的问题。〔43〕各级党组织都为宣传员和鼓动员出版资料。

各种方法时而时髦无比,时而乏人问津,这就造成了一些困难。1972年,一份莱比锡青年研究所(Institute for Youth Research)的报告发现了宣传的缺陷,这部分是因为宣传员无法依靠一种连

〔40〕 George Klaus, *Die Macht des Wortes: Ein erkenntnistheoretisch-pragmatisches Traktat*, 4th ed. (Berlin: 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68), and Georg Klaus, *Sprache der Politik* (Berlin: 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71).

〔41〕 *Kleines politisches Wörterbuch* (Berlin: Dietz, 1967), 369.

〔42〕 Günter Herlt, *Sendeschluß: Ein Insider des DDR-Fernsehens berichtet* (Berlin: edition ost, 1995), 73.

〔43〕 其中一个例子,可参看 Fred Oelßner 向 1954 年第四次党代会所作的讲话, *über die allseitige Verbesserung unserer politischideologischen Massenarbeit: Diskussionsrede auf dem IV. Parteitag der Sozialistischen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Berlin: Dietz, 1954)。此次讲话的翻译在 GPA/oelsner1.htm。

贯的方法：“怀着那些最好的意图——我们作着不断的跳跃，从一种观念到另一种观念，一种方法到另一种方法，一种极端到另一种极端。已证明的原则都被忽视了。缺乏方法上必要的连贯性必然影响我们意识形态努力的结果。”〔44〕

因此，要勾勒出东德宣传之基本原则的轮廓则要求通过一系列广泛的渠道细细探究，但是它的根本原则是清楚的。如果纳粹的原则是感情呼吁、简明易懂、重复、力量、领导力和信念的话，那么东德则把宣传看成是一种科学方法，意图劝说大众遵照他们自己最好的利益而行动。其结果是，它建立于逻辑之上，更多地强调马列主义理论而不是领导力，但是它仍然青睐简明易懂和重复，有时按照宗教的语言来看，构建的则是一个无神论的信仰。

东德强调宣传的科学或理性基础，按照它的精神，这就将其与纳粹的操纵性情感呼吁和资本主义的宣传区分了开来。党把宣传界定为“对政治的、哲学的、经济的、历史的、科学的、技术的或其他的知识与观念进行系统散播与周密解释。”〔45〕鼓动未能达到如此深度，但是它也有赖于科学的基础：“鼓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马列主义世界观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信念与行为，它们将激发工人们在同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敌人斗争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坚定的阶级立场。”〔46〕

52

马列主义的宣传有一个困难的任务。正如我已经写到的，纳粹的宣传并不受真实性所约束。虽然它并不建议将撒谎作为一个普遍的政策，但是仍然承认其有用性。既然国家社会主义的松散意识形态更多依赖于希特勒彼时所想而不是理论原则，那么宣传

〔44〕 SAPMO, DY. 30/IV 2/2. 033/37; Zu Problemen der ideologischen Arbeit unter Jugendlichen (1972), 26.

〔45〕 *Kleines politisches Wörterbuch* (1988), 795. 全文参看 GPA/kpwb.htm。

〔46〕 同上，17。

也是可以变化的。另一方面,东德的宣传则声称遵循的是可证明的规律,并且在理论上拒绝谎言,据称它是敌人使用的方法。这并没有阻止东德的宣传员们撒谎——不过这确实会使它难堪。

希特勒并不认为大众没有价值判断,而是认为在什么对他们而言是好的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概念。马列主义的措辞中认为大众更有能力行动。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是当前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中的推动力量。”〔47〕克劳斯声称:“与帝国主义的操纵比起来,我们不想制造出会引导人们‘推导出他们自己的结论’(事实上,这些都是计划好的)和做出‘自由的决定’(事实上它们都是知识奴役的表现)的某些虚幻感觉,而相反,是创造有利的条件鼓励自由思考,从而不被操纵的力量所影响。”〔48〕大众会被娴熟的资本主义宣传所误导,它掩盖了他们的真正利益,并且欺骗他们以使其支持客观上对他们形成伤害的政策,但是如果给予其合适的指导,他们是能够理解复杂的问题和做出正确决定的。

因此,同纳粹党人比起来,民主德国的马列主义的宣传更少基于情感驱动。正如一本苏联教科书所言:“宣传的目标是培养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有坚定信仰的和积极的战士,他们不会盲目相信,而是将其信仰建立在科学知识之上。这些人认为理论是关键的,同时在实践中验证它,他们还能分析其经验,能令人信服地为他们的理想辩护。”〔49〕在把宣传员蒙上眼罩(blinders),只将其目光引向许可的方向时,这一体系拒绝了无条件的信仰——但是至少这些许可的方向看起来是理性的。

〔47〕 *Kleines politisches Wörterbuch* (1988), 795. 全文参看 GPA/kpwb.htm. 62。

〔48〕 Klaus, *Sprache der Politik*, 49.

〔49〕 Wischnjakov, *Methodik der politischen Bildung*, 313.

这一结果就是支持书面语 (written word) 的倾向, 它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平台来细细地发挥论证。在 1953 和 1954 年, 政治局委员弗雷德·欧司勒 (Fred Oelßner) 引用列宁和斯大林的话: “众所周知, 新闻媒体是党最强大和锐利的武器。”〔50〕1958 年欧司勒被清除出政治局, 其他的东德领导人没有像他那样坚定主张新闻媒体的优先性,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东德实际上比纳粹党人更多地依赖于印刷语 (printed word)。正如我们随后会看到的, 在运用口头语时, 东德更偏爱个体对个体或小群体的口头鼓动而不是公共集会, 既然前者为量身定做的观点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尽管对大众存在上述强大的信任, 东德仍然认为领导力是重要的。埃里希·昂纳克的讲话经常被引用: “领导的艺术就是劝说的艺术。”〔51〕他的话接近于更早引用的希特勒的声明 (“领导意味着: 能够感动大众”), 但是希特勒多聚焦于通过激情来领导, 而昂纳克则从明显理性的论证中受益良多。

德国统一社会党也赞成简明易懂和重复。正如一本早期的宣传员小册子中 (由俄语翻译而来) 所言: “清晰 (clarity)、简单易懂 (simplicity) 和易于明白 (ease of comprehension) 是布尔什维克主义鼓动的主要特点。”〔52〕苏联的教科书确实提到了简单易懂不会

〔50〕 Fred Oelßner, *über die Verbesserung der Arbeit der Presse und des Rundfunks* (Berlin: Dietz, 1953), 3. 文本最初是作为一次讲话递送给中央委员会的, 但是已印行了 3 万 5 千份。他在 6 个月后的第四次党代会上做了相同的评论。参见 Oelßner, *über die allseitige Verbesserung*, 10。

〔51〕 SAPMO, vorl. SED/11527; Stenographisches Niederschrift der Konferenz der Zentralkomitees der SED über die Aufgaben der Agitation und Propaganda bei der weiteren Verwirklichung der Beschlüsse des VIII. Parteitag der SED am 16. und 17. November 1972, 201.

〔52〕 K. Kalaschnikow, *Die Grundsätze der bolschewistischen Agitation* (Berlin: Dietz, 1951), 37.

羞辱听众的智力。〔53〕鼓动的基本目的是把重大的问题转换成大众便于理解的形式。克劳斯讨论了重复,只要它不使听众感到厌烦,他认为就是重要的。〔54〕可以肯定,任何东德报纸的读者都会对它不厌其烦的重复与黑白分明的报道印象深刻。

马列主义是一种世界观,而不仅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理论。作为世界观,它宣称拥有绝对真理。东德经常引用列宁所做的众所周知的评论:“马克思的学说全是万能的(allmächtig)因为它们是真理。”1960年出版的有关马列主义的标准作品说得很清楚:“卓有成效地学习马列主义将会带给人一个统一的世界观——我们时代最进步的世界观。”〔55〕要接受这种世界观需要某种信仰的飞跃。虽然德国统一社会党并未像纳粹党人那样使用“信仰”一词,但是它要求其追随者们接受比理性所能证明的更多内容。

总结

在发展宣传理论上,纳粹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从不同的地方开始,但都根植于德国的文化中。纳粹党人是虔信派的,马列主义者则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纳粹主义利用的传统贬低理性,代之以赞成直觉和本性。这一方式很少有利于发展精致的宣传理论。它更多攸关正确的直觉而不是学习研究。好的宣传员明白必须做些什么。马列主义者利用的则是与之并行的德国理性传统,自信地宣称,宣传就如任何其他责任领域一样从属于理论。尽管他们的起点不同,但是实际上他们切入宣传的方式相似之处远甚于

54

〔53〕 Wischnjakov, *Methodik der politischen Bildung*, 285.

〔54〕 Klaus, *Sprache der Politik*, 15 - 21.

〔55〕 引自 Enquete - Kommission, *Materialien der Enquete - Kommission*, vol. 3, bk3, p. 2038。

差异。

纳粹党人认为大众特别没有理性,很容易动摇,而德国统一社会党则坚称他们是历史的推动力量,但是他们都得出结论说,大众需要大量的帮助,才能完成任何重要的事情。他们都坚持认为有效宣传的能力取决于天才的领导人,或者引导问题的马列主义政党。

在纳粹的例子中,没有简易的方式可以解决宣传政策中的争论。正如戈培尔和希特勒反复提到的,有效宣传的措施就是成功的。如果它产生了作用,它就是好的;如若没有,则是糟糕的。这一原则只有有限的预言价值,因为它只在事实之后才适用。如果戈培尔和奥托·迪特里希在新闻出版战略上有分歧,他们唯一求援的对象就是希特勒。

东德的宣传建基于马列主义理论而不是有个性的人物。问题是理论过于宽泛,因而模糊不清。因此,控制论在一个阶段是试金石但在下一阶段则完全被遗忘了。既然理论假定自身是绝对正确的,纵然不能被完美地理解,那么任何失败都可以通过批判技术而非理论本身获得解释。既然理论永不犯错,它也很难改变。当改变发生时,它是领导人行动而非学术讨论的结果。

马列主义的理性基础在东德产生了一个费解得多的宣传方式。正如我们随后将看到的,纳粹的宣传员无须经过特别的良好培训。他们被告知,激情比复杂的知识更重要。与之相反,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宣传员被期望在学习马列主义时达到一定的实质深度。他们的宣传就像达至内心(heart)一样达至头脑(mind)之中。

两个体系各自的党代会显示了它们对理性和情感的不同看法。纳粹党从1933到1938年举行了6次纽伦堡集会。德国统一社会党举行了11次党代会。纽伦堡集会是壮观的情感经历(虽然它要求在单调的队列中站立数小时),它给世界留下的纳粹主义形象持续至今。它们指向的是能量的爆发而不是一些需要决策

55

的事件。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大会则让代表们经受各种丝毫不间断的讲话。据称,他们做出的决议将会指导这个国家直至下次大会召开,但是结果是预先计划好的。甚至“讨论发言”按照惯例也是事先准备好的。社会主义的瑞芬斯塔尔没有办法把一场德国统一社会党大会变成一部有《意志的胜利》之影响力的电影。这或许是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了比纳粹社会更多讽刺作家的原因之一。无论纳粹主义是什么,它并不好笑。不变的、官僚主义的和严密的社会主义体系只能乞灵于像瓦茨拉夫·哈维尔这样的作家的讽刺作品。

两个体系把宣传放置在一个修辞性的/华丽的紧身衣中(straitjacket)。元首和党永不犯错的原则迫使两个体系谈论一些不真实的事情,而这与那些接受宣传之人的直接经验相矛盾。当事情进展顺利而不是糟糕之时,这些限制很少被感受到,但是即使在顺利得多的时期,在宣传更多是由事情应该如何而不是实际上如何所决定的问题上,公民们要洞悉这一点并无多大困难。这一认识削弱了以下理论主张,即每一体系能同时解释世界已走到哪里,又将去往何方。

第三章 等级结构

57

1945年3月30日,约瑟夫·戈培尔正向希特勒抱怨由奥托·迪特里希与罗伯特·雷策划的无效宣传。〔1〕戈培尔从未在劝说希特勒授予他所渴望的完整权威上获得相当的成功。不像东德的宣传有清晰的权威序列,纳粹的宣传显示的是组织上的混乱。党和国家以令人困惑的方式纠缠在一起,它有6个以上的重要党员在为自己的影响力而互相争斗。我首先考察他们各自的和重叠的管辖范围(jurisdictions),然后转向讨论东德宣传中更清晰的结构。

和谐与争吵

对第三帝国宣传的控制 in 党和国家之间分开了。一些事务是党的责任范围,一些属于国家,还有一些则共同管理。这不意味着存在两种宣传的方式。纳粹党人利用国家结构但是也使人明白谁拥有权力。事实上“领导的原则”意味着,只要希特勒不去干涉,

〔1〕 Joseph Goebbels, *Final Entries, 1945: The Diaries of Joseph Goebbels*, trans. Richard Barr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8), 277 - 278.

那些能得到权力的人就有权力。为了理解纳粹的体系,一个人必须知道谁什么时候实际上拥有什么权力,而不仅仅是理论上。

希特勒宣传体系中的主要参与者是约瑟夫·戈培尔、奥托·迪特里希、罗伯特·雷、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阿希姆·里宾特洛甫(Joachim Ribbentrop)、菲利普·波尔(Philip Bouhler)和麦克斯·阿曼(Max Amann)。除开里宾特洛甫,所有人都是党的全国性领导人(Reichsleiter),1933年此职位有16人。理论上每个人都有机会直接向希特勒报告。〔2〕与希特勒在实际操作中指定几个人负责一个共同领域相一致,他们各自的权威领域发生了改变而彼此有重叠。党和国家的界限同样地不清晰。其结果从表1中有所揭示。

希特勒能够也确实干预了任何领域,其他主要的纳粹领导人有时也宣称他们的权威。在最重要的宣传领域,至少两个领导人有发言权。有时这种发言权来源于同时凭借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

组织不确定的结果有时几乎是很滑稽的。戈培尔和迪特里希各自向德国新闻媒体发出每日指示。他们的指示并非总是一致的。1940年的一天,他们各自起草了一份讲话,指示新闻媒体将其作为头版报道刊发,这使编辑们陷入了一个令人不快的尴尬处境。〔3〕希特勒有一次把他们锁在了一节火车车厢中,指示他们不得离开,除非彼此已达成和解。离开时他们达成了一份彼此都不会认真看待的协议。〔4〕宣传部和外交部在柏林为外国的记者各

〔2〕 Dietrich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1933—1945*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3), 74.

〔3〕 Jay W. Baird, *The Mythical of the Nazi War Propaganda, 1939—1945*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4), 9.

〔4〕 Michael Balfour, *Propaganda in War, 1939—1945: Organisations,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104.

59

表 1 纳粹的宣传家

领域	国家控制	政党控制
报纸	戈培尔 迪特里希 里宾特洛甫	戈培尔 迪特里希 阿曼
杂志	戈培尔 雷	戈培尔 阿曼
电影	戈培尔	戈培尔
书籍	戈培尔	波尔 罗森博格 阿曼
公共集会和庆典	戈培尔	戈培尔 罗森博格 雷
外交宣传	戈培尔 里宾特洛甫 罗森博格	戈培尔
戏剧	戈培尔	戈培尔 罗森博格
艺术	戈培尔	戈培尔 罗森博格
国内广播	戈培尔	戈培尔
政党教育		戈培尔 雷 罗森博格

自开办了俱乐部。一个瑞典记者写道,外交部俱乐部的食物和服务更好。他也注意到,一个部门的糟糕招待经常会把一个人推向另一个有好的招待的部门,这对一个正从事其工作的记者来说尤

为管用。〔5〕当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正为控制国际宣传而彼此争斗时,德国入侵苏联了,这样一来罗森博格获得了掌管东方宣传的权力。〔6〕

有关纳粹宣传体系纷繁复杂之处的通论作品,最好的当属杰·拜尔德(Jay Baird)和罗伯特·赫兹斯坦(Robert Herzstein)的。〔7〕此处我感兴趣的是这一体系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内斗的全部细节与此间的重整过程。迈克尔·巴尔弗(Michael Balfour)所写的戈培尔与迪特里希之间的争执,就其作为整体的体系而言是真实的,下面这句也一样:“戈培尔与迪特里希的相对地位一直是在变化的,因此没有哪句有关他们的陈述在整个阶段是有效的。”〔8〕纳粹主义通过达尔文主义的术语来看待这个世界,但是它的内部政治却只是半达尔文主义的。铲除(extinction)是困难的(希特勒对他那些至交通常是“忠心的”),但是退化成相对的无能(impotence)则是一个持续的威胁。尽管如此,正如我们会看到的,这一内斗不会对实际上运行的宣传之性质产生巨大影响。

60 我将首先从戈培尔开始,一个几乎从1924年入党那天开始就从事宣传的中心人物。希特勒在1926年11月把他派到柏林,在那里他发展了一套有效的宣传体系,极大地增加了党的曝光率(visibility)和成员数。下一年,他创建了一份报纸《攻击》,很快就

〔5〕 Arvid Fredborg, *Behind the Steel Wall: A Swedish Journalist in Berlin*, 1941-43 (New York: Viking, 1944), 17-18.

〔6〕 Horst J. P. Bergmeier and Rainer E. Lotz, *Hitler's Airwaves: The Inside Story of Nazi Radio Broadcasting and Propaganda Swing*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70.

〔7〕 参看 Baird, *The Mythical World*, and Robert Edwin Herzstein, *The War That Hitler Won: The Most Infamou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Histor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8)。

〔8〕 Balfour, *Propaganda in War*, 468.

为贩卖诽谤 (scandal - mongering) 建立了鲜明的名声。到 1931 年,他已经成为帝国宣传的领导人 (Reichspropagandaleiter), 即党的宣传机构的头目,直到 1945 年都担任此职。纳粹接管之后,戈培尔成为公众启蒙与宣传部 (RMVP) 的头目。他还掌管德意志帝国文化协会 (Reich Chamber of Culture), 一个文化领域的所有工作者必须隶属于它的组织。戈培尔是唯一最有影响的宣传者,而他在某些领域中拥有比其他人更具实质意义的权力。

戈培尔的部门是最重要的宣传团体。它是一个空前的组织,戈培尔把它看成是公共舆论一致性的指导者,吹嘘它是“最现代的部门”。〔9〕1933 年一开始它有 350 个雇员。虽然戈培尔承认的目标是保持在 1000 人以下,但是到 1942 年人数已经超过 1900 人。战争期间的 42 个地方宣传办公室又雇佣了 1400 人。〔10〕从组织上看,这些人都服从于公众启蒙与宣传部,但是由于纳粹党和国家间特有的纠结困境使得那些人经常更多地拥护纳粹省党部头目 (Gauleiter) 而不是柏林。他更近,柏林则遥不可及,而且在纳粹主义中邻近性是重要的。在其他职责中,地方办公室会把宣传的相关事务的详细报告提供给柏林总部。

戈培尔很可能在柏林拥有最精干的部门[至少直到阿尔伯特·施佩尔 (Albert Speer) 作为生产部部长出现之前如此]。虽然 92% 的人员是党员,但他决不容忍傻瓜。〔11〕他要的是真正有能力的人,如果他们情愿贡献给他更大潜力的话。正如他的日记显示的,他密切关注着他的下属,毫不犹豫地解雇那些他认为不能胜任工作的人。赫兹斯坦评论道:“在戈培尔的部门,一个成功职业生

〔9〕 Paul Oestreich, *Walther Funk: Ein leben für die Wirtschaft* (Munich: Franz Eher, 1940), 92.

〔10〕 Herzstein, *The War That Hitler Won*, 134.

〔11〕 Heriber, *Goebbels Reden*, 1: 250.

涯的最好背景是,一个人文或社会科学的博士头衔,外加一段作为纳粹老党员的过往历史。如果一个人有这些资格,而且在40岁以下,那他就是最好的人选。”〔12〕1933年部门初建时分为5个分支:宣传、广播、新闻、电影和戏剧。到1941年则增至7个分支,包括了艺术、音乐、杂志和文学。〔13〕宣传部(The Propaganda Ministry)的资金支持主要来源于广播执照费,这一费用的增长速度快于戈培尔的部门,故而它几乎是自我维持的。〔14〕这是以下政策的一个令人高兴的附带后果,即纳粹党决定制造便宜的收音机[“人民的收音机”(People's Receiver)]以使那些低收入的人也可以拥有。

从一开始戈培尔的目标就是全面的。该部正式建立两天之后,他就对新闻媒体说:“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公众启蒙与宣传部……公众启蒙根本上是有些消极的,但另一方面,宣传则是积极主动的……只让人们或多或少与我们的政权保持一致,把他们推向一个对我们持中立态度的立场,这些都还不够,我们需要给他们做工作,直到他们对我们崇拜之至,直到他们同时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意识到德国正在发生的不仅一定是被允许的,而且确实能被允许。”〔15〕虽然改变了术语,但是戈培尔正在做的是希特勒已在宣传与组织之间所做的区分。对他来说,启蒙就是赢得普遍的支持,宣传是产生激情。

戈培尔也掌管帝国文化协会(Reichskulturkammer, RKK)。它

〔12〕 Herzstein, *The War That Hitler Won*, 120. 戈培尔自己就符合这一形象。

〔13〕 同上, 123。

〔14〕 戈培尔在1933年宣称,广播的收益一般来说应该反哺广播,或者为国家更广泛的文化需求服务。参见 Goebbels, *Signale der neuen Zeit*, 205。

〔15〕 David Welch, *The Third Reich: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London: Routledge, 1993), 138。

是“专业性的”组织,包括的人员中几乎每个人都在文化领域扮演某一角色,不管是在表演、制作还是管理上。始建于1933年,帝国文化协会最初有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美术、新闻和广播这些独立处室。广播办公室证明是多余的,因而战争一爆发就撤消了。宣传部和帝国文化协会的联系因戈培尔而得到了加强,他作为主管有权指定帝国文化协会的高级官员。

帝国文化协会有重要的法定权力。既然没人能在未成为成员前就在艺术领域工作,既然成员们会因违反了帝国文化协会认定为合理的规定而被开除,那么无须公然的审查,它就能激发大家对纳粹党之原则的忠诚。它也准许国家推动艺术,支持它喜欢的艺术家。既然存在地区办公室,帝国文化协会的活动也能在全国范围内经由地方层面来协调。〔16〕

接下来,我将转向党的宣传机构。最重要的机构是设在慕尼黑的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Reichspropagandaleitung, RPL)。戈培尔是其头目,但是自他身居柏林以来,则由其下属处理日常工作。1939年,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有5个主要分支:积极宣传、电影、广播、文化和协调处。当中最忙的是积极宣传处。它的任务包括“贯彻各个层面的宣传行动,从群众活动的组织结构安排到当地组织或部门层面的成员会议。这要求它组织好党的整个演说体系(entire speaker system),它的下属机构和附属组织。除开处理日常政治问题,它也向整个演说体系提供情报,还把《我们的意志与方法》(*Unser Wille und Weg*)月刊寄送给乡村的宣传员。就像要严格审查演说家与各宣传办公室的会议报告一样,这一演

〔16〕 David Welch, *The Third Reich: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London: Routledge, 1993), 28-29. 关于纳粹的解释,参看 Karl-Friedrich Schrieber, *Die Reichskulturkammer* (Berlin: Junker und Dühaupt, 1934)。

说体系还要求制作与分发合适的海报与小册子。”〔17〕电影处组织电影展映,尤其是在没有影院的地区。广播处鼓励大家收听,推动与纳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计划,还组织兴趣团体。文化处则监管那些以某种方式污蔑党的艺术作品。比如,它控制了各种纳粹标志的使用,还负责批准党的集会音乐和党的建筑物的结构。协调处负责与国家和其他组织的关系。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比宣传部的权力小得多。

隶属于纳粹党中央办公室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宣传与人民启蒙帝国团体 (*Reichsring fü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ropaganda und Volksaufklärung*)。这一拥有国家、地区和基层办公室的机构于1935年建立,目的是为了规范进行宣传的大量组织。它由党的各级宣传部门领导人管理。作为它的主管,沃尔特·提司勒(Walter Tießler)在1939年写道:“夺取权力之后,我们知道党所有领域的活动,包括宣传都被拆散了。党的许多下属机构和附属组织,同宣传办公室有关的其他组织一样,很大程度上没有明白跟随党的宣传指示走的必要性,相反它们想走自己的路,不管这条路是否可行。其结果是它们不仅要同时处理不同的问题,而且还运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确定性和对一部分人的不信任。”〔18〕当然,处于较低层级的宣传员只会模仿他们领导人的例子,而这一事实几乎不被承认。

帝国团体(Reich Circle)确实帮助协调大量组织的活动,一开始是党的相关组织,比如德国劳工阵线(the German Labor Front)、学生联合会、纳粹冲锋队、纳粹党卫军(SS)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

〔17〕 “Die Reichspropagandaleitung der NSDAP,” *Unser Wille und Weg* 6 (1936): 6–11. 译文可在 GPA/rpl.htm 获取。

〔18〕 “1. Lehrgang der Gau-und Kreispropagandaleiter der NSDAP,” *Unser Wille und Weg* 9 (1939): 126.

工人党殖民地事务部 (NSDAP Colonial Office)。它也很快包括众多有代表性的非党的 (nonparty) 组织。它所声称的任务是庞杂的：

- 确保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对整个宣传机构的领导；
- 确立普遍的路线；
- 分发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的情报资料给所有的宣传员；
- 组织统一的庆典和特定的大型活动；
- 使各级宣传员领会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的普遍规则和路线；
- 澄清和消除各个宣传部门之间的误解与冲突；
- 拥护各种宣传运动；
- 支持党代会和大众集会；
- 筹备党代会上有关宣传的讨论；
- 安排各种会议和通信沟通,以促进宣传体系的平稳运行；
- 举行每月帝国团体管辖范围内全体宣传员会议；
- 起草季度活动报告；
- 考虑到出勤率,需提前三周告知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要召开讨论宣传形势的会议。〔19〕

63

理论上它运转良好,但是帝国团体有时会因纳粹体系内在的混乱而难逃崩溃。正如赫兹斯坦所评论的,尽管有来自上面的命令,但党的领导人经常坚持他们自己的方式。〔20〕他们喜欢领导原则,只要是他们发号施令而不是被动接受命令。

〔19〕 Walter Tießler, “Der Reichsring für nat.-soz. Propaganda und Volksaufklärung,” *Unser Wille und Weg* 5 (1935): 412–416.

〔20〕 Herzstein, *The War That Hitler Won*, 148.

戈培尔把宣传看成是一个整体,应该把各种职责指派给最适合处理它们的组织。1935年在谈及宣传的领导人时,他概述了这一体系:“控制新闻媒体:我们通过国家来达到。因为党不能那样做,由于它缺少手段和法定的权威。新闻媒体服从作为一个部长的我。如果我是作为(纳粹党)的帝国宣传领导人(Reich Propaganda Leader)走到它面前,它会说:你没有法定的权威。尽管如此,比如说,我们想要人们聚集在滕珀尔霍夫运动场(Tempelhof Field)。那是党的工作。当我们想通过集会这样的一场宣传运动来争取大众时,党有责任这样做。当我们想通过新闻媒体来达到此目的时,宣传部则会来处理。在这任何一种情形下,对公共舆论的全部影响仍然掌握在我们手中。”〔21〕从戈培尔的角度来看,问题将是“我们的手”并非总是他的手。其他纳粹党人也在竭尽全力以获取影响力。

奥托·迪特里希是另一个早期纳粹党员,他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在身。希特勒在1933年指定他为党的帝国新闻主管(Reichspressechef)。1937年末他成为政府的第一新闻官和希特勒的新闻秘书。迪特里希作为公众启蒙与宣传部的一名副部长在组织上仍隶属于戈培尔,虽然他很少出现在其办公室。作为党的全国性领导人,他们是平等的。战争期间,迪特里希远比戈培尔更迅速地出现在希特勒面前。既然希特勒本质上比戈培尔更像一个乐观主义者,那么宣传部门经常会被迪特里希乐观的放松所困扰,而这种放松更多来源于元首的乐观主义而不是真实的形势。

迪特里希的影响力主要限制在新闻媒体,但是他也固执地为其管辖权辩护,正如戈培尔频繁的抱怨所显示的。比如在1939年11月,戈培尔写道:“迪特里希先生正在挑起麻烦。他想成为新闻

64

〔21〕 Heriber, *Goebbels Reden*, 1: 252.

部长。真是一个没有想象力或判断力的笨蛋。”〔22〕然而，一旦战事爆发，迪特里希每天都有直接见到希特勒的机会，而且他也是1939年后独一无二的国家新闻机构德国通讯社（*Deutsches Nachrichtenbüro*, DNB）的主席。为了与戈培尔在柏林的每日新闻会议（daily press conference）相竞争，迪特里希开始在1940年发表每日新闻通讯（daily press releases），有时用来刺激戈培尔。比如，1941年2月戈培尔指示新闻媒体把主要的篇幅都用来刊发他的讲话。迪特里希迅速发了一个通讯稿回应道：“有理由注意到，政治会议的报道应该受到足够的限制，这样才能为由元首致辞的大众集会留下更多的报道篇幅。”〔23〕既然迪特里希的指示宣称有希特勒的直接授意，那么它们是有影响力的，但是它们从迪特里希落到戈培尔手里，并在他的柏林每日新闻会议上发表了。这将迪特里希置于不利的境地。戈培尔身居柏林，而他不是。

罗伯特·雷是党的帝国组织部长（*Reichsorganisationsleiter*）。这使他对党的教育体系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他也领导德国劳工阵线（DAF）。德国劳工阵线，最终达到2500万会员，提供各种类别的服务，其中一些在性质上属于宣传性质。作为帝国的组织部长，雷有他控制下的党员培训。他也建立大量的培训课程和学校。他和戈培尔运作得相当好。雷很清楚他与戈培尔经常存在着分歧。

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是纳粹党的“理论家”（*theoretician*），虽然他的书是不忍卒读的，对希特勒也是如此。他主管党的外交事务，但是尽管如此，他并不希望成为外交部长。然而，1934年希特勒授予了他一个夸张的头衔：全德知识与哲学教育以及国家社

〔22〕 Fröhlich,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7: 182.

〔23〕 Peter Longerich, *Propagandisten im Krieg: Die Presseabteilung des Auswärtigen Amtes unter Ribbentrop* (Munich: R. Oldenburg, 1987), 117.

会主义党指示的元首助手(Führer' Deputy for the Entire Intellectual and Philosophical Education and I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他暧昧不明的职责不得不处理党内的意识形态教育。他的办公室同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合作,为那些开展党和国家节日与庆典的人,出版了一本单月刊《新共同体》(*Die Neue Gemeinschaft*)。他也在1941年7月17日成为东方占领区的部长,正值向苏联发起袭击之后。这也使他能控制对东方的宣传。自从希特勒授予他对意识形态事务的权威,而他认为它正好包含对一切事务的权力以来,他频繁地寻求扩张其权限。他也有一些宏大的计划,希望建立一所党校。〔24〕戈培尔认为他能力不足。他对日复一日的宣传影响甚微。

65

阿希姆·里宾特洛甫是1938到1945年的外交部长,这赋予了他在外交宣传上相当大的权威。〔25〕他缺少其他人的党内基础(他不是一位党的全国性领导人),但是乐意做它所需要的以巩固他在国际宣传上的权力。比如,他主要控制了短波广播。在入侵苏联的7天前,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里宾特洛甫正在卷入各种与他无甚关联的事务之中。我现在应该采取攻势反对他。像他那样的人只会厚颜无耻夺取眼球。”〔26〕戈培尔有能力这么说。

在其他分派的工作中,菲利普·波尔领导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文学保护审查委员会(Nazi Censorship Committee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t Literature),它要保证各种书籍不包含任何反

〔24〕 比如,参看 Alfred Rosenberg, *Lehrstoffsammlung und Grundplan für die weltanschauliche Schu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Munich: Beauftragten des Führers für die gesamte geistige und weltanschauliche Schulung und Erziehung der NSDAP, 1939)。

〔25〕 有关细节,可参看 Longerich, *Propagandisten im Krieg*。

〔26〕 Fröhlich,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9: 387-388。

对党的主张。他声称对第三帝国出版的所有书都有审查之权。〔27〕戈培尔不满意这种说法。在他 1941 年 6 月的日记开头写道：“古特雷尔(Gutterer)已经和拉默斯(Lammers)谈过了：他同意我们有关波尔和他古怪的审查委员会的观点。不应允许任何单独查禁书籍的权力。”〔28〕

马克斯·阿曼是党的弗朗兹·艾尔出版社(Franz Eher Verlag)主管。他也掌管帝国文化协会新闻处。虽然他主要对出版的商业方面比较感兴趣(到 1945 年他设法确保控制 80% 的德国新闻媒体),然而当他可以选择时,他确实毫不犹豫地卷入了编辑事务之中。阿曼没有正式权威可以指定编辑,但是当他希望如此做时,他实际上有能力这样做。〔29〕他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很容易被触怒。

总之,纳粹的宣传由一批能力不一的人主导着,他们的组合看起来非常混乱,有时他们还互相嫌恶。〔30〕那么为何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byzantine)体系还运转着?有关这一体系的关键事实是,它向着大致同样的方向发展,竭尽全力以决定(或影响)希特勒的愿望。不管何时,争斗多么激烈地进行,希特勒都会插手干预,维

〔27〕 Glenn R. Cuomo, ed.,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1995), 171.

〔28〕 Fröhlich,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9: 388.

〔29〕 Ernst K. Bramsted, *Goebbels and National Socialist Propaganda, 1925—1945*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5), 111 - 113.

〔30〕 威悉河-伊姆斯(Weser-Ems)地区的领导人卡尔·茹福尔(Carl Röver)在 1942 年的备忘录中,深入讨论了纳粹在组织上的混乱。他极力主张宣传完全应该是党的管辖领域。他把宣传部看成是一个错误。参看 Michael Rademacher, *Carl Röver: Der Bericht des Reichsstatthalters von Oldenburg und Bremen und Gauleiter des Gau's Weser-Ems über die Lage der NSDAP: Eine Denkschrift aus dem Jahr 1942* (Vechta: Selbstverlag des Verfassers, 2000), 104.

持某种和平,不过一般来说,这不会持续太久。

伊恩·科索(Ian Kershaw)在1934年提出了一个观点,解释了是什么让这个体系保持完整:“每一个有机会留意它的人会明白,元首几乎不会高高在上指示每一样他打算或早或迟要实现的事情……每个人有义务向着元首所希望的路线而努力工作。任何犯错的人不久之后便会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任何真正沿着元首的路线和目标工作的人,必定会在现在和未来的某天,获得最好的奖赏,那就是对他工作的意外而合法的肯定。〔31〕

66

虽然纳粹的主要领导人在所有事务上有分歧,而且各自尽其所能以竞争对手为代价来增加其权力,但是对希特勒的忠诚与第三帝国内部任何事情一样是绝对的。在“领导原则”下,他们的权力最终还要仰仗他。他们或许在特定决议上有分歧,而且可以确定,他们也不会管辖权问题上总是遵循元首的指示,然而所有人会同意希特勒关于宣传的根本主张,正如在其他事务中一样。希特勒明白,他何时需要将事情变得清楚些,并让纳粹主义的普遍指示对牵涉其中的几乎每个人来说都清晰可辨。

社会主义宣传的结构

与纳粹宣传中的纷乱之处相比,东德的宣传则组织严格,秩序井然。权威的谱系尽人皆知,虽然完美的友善关系并不普遍,但是总体来说,谁对哪方面拥有权力是清楚的。要梳理出组织的细节会花费些时间,但是,到1989年仍存在的基本结构在1970年代早

〔31〕 Ian Kershaw, “‘Working toward the Führer’: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the Hitler Dictatorship,” in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ed. Ian Kershaw and Mosh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4.

期就已然成形。〔32〕纵观这一时期,变化更多源于努力找寻更有效的方法来组织这一体系,而不是源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之间的斗争。

德国统一社会党控制了宣传,只为国家留下了一个次要的角色。理论上,党的权威来自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成员们。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每一层的决策制定都需要成员们的民主表决,在这之后,所有人有义务遵守它们——但是这一体系更倾向于集中而不是民主。真正的决策权威在党的领袖身上(1950—1973年沃尔特·乌布利希,1973—1989年埃里希·昂纳克),也来自于政治局委员们的重要意见。

67 中央委员会全会(The Full Central Committee, ZK)更像是一个橡皮图章,而不是比这更有用。它的各个部门,每个都在一名政治局委员的监督之下,它们才是真正权力的所在地。中央委员会的部门领导和政府的部长享有同等地位,然则,虽然没有首先同中央委员会某部联系,没有哪个部长能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但是对话也不总是实情。虽然处理外交情报、外交关系、政党联盟和群众组织、妇女、青年、教会事务、文化和教育、农业以及体育的部门也有影响力,但两个直接影响宣传的重要部门则是宣传部和鼓动部。

虽然鼓动部和宣传部在1957—1961年合并了,但它们通常是独立的。〔33〕在地区(Bezirk, district)和县级(Kreis, county)层面有相应的部门。与马克思主义在宣传和鼓动之间所做的区分相一致,鼓动部监管媒体、广播和视觉资料。宣传部则控制党训

〔32〕 Gunter Holzweißig, *Zensur ohne Zensor: Die SED-Informationsdiktatur* (Bonn: Bouvier, 1997), 13.

〔33〕 有关中央委员会全会内部各种重新调整的全部细节,可参看 Andreas Herbt, Gerd - Rüdiger Stephan, and Jürgen Winkler, *Die SED: Geschichte, Organisation, Politik: Ein Handbuch* (Berlin: Dietz, 1997), 878 - 884。

课程与学校,这一领域在第三帝国期间主要是罗伯特·雷负责的范围。与纳粹党的官僚体系相比,它们在人员配备上经济得多了。宣传部在1983年只有33名成员。〔34〕而鼓动部在1987年则有69人。〔35〕

鼓动部是二者之中最重要的。到1989年它已划分成8个分支。它们各自的领域是鼓动、视觉鼓动、《为什么与怎么样》(WAS und WIE,鼓动员月刊)、图书馆和档案、外国记者、“B部门”(B-Sector,与军事动员计划有关)、新闻和广播/电视。〔36〕它的主要知名人物是它的书记:霍斯特·辛德曼(Horst Sindermann,1954—1963)、鲁道夫·辛格(Rudolf Singer,1963—1966)、维尔纳·兰博尔茨(Werner Lamberz,1966—1971)、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1971—1973)和海因茨·吉格(Heinz Geggel,1973—1989)。

这一部门在1955—1967年由阿尔伯特·诺登(Albert Norden)所管理,随后是维尔纳·兰博尔茨,直至他在1978年利比亚空难中身亡,最后由约阿希姆·赫尔曼(Joachim Herrmann)掌管,直至1989年。一位东德知名媒体人士描述了政治局委员通过以下方式的这种三重唱:“诺登想要媒体寓教育于娱乐中,反之亦是。兰博尔茨想把内容聚焦于我们自己的、敌人的和世界的形象上。赫尔曼只想把成功的宣传记在脑中,并且在与其他政治局委员比较时,将昂纳克的照片大小精确到了以厘米计。”〔37〕东德的宣传家中,大家普遍同意兰博尔茨是三人中最有能力的,许多人希望他成为昂纳克的继任者。一些人怀疑,昂纳克有意安排能力差

〔34〕 SAPMO, DY 30/IV 2/2. 037/24: Bericht über die Prüfung in der Abteilung Propaganda des ZK. der SED (1983).

〔35〕 SAPMO, DY 30/IV 2/2. 037/24: Bericht über die Prüfung in der Abteilung Agitation des ZK. der SED (1987).

〔36〕 Holzweißig, *Zensur ohne Zensor*, 9.

〔37〕 Hert, *Sendeschluß*, 74.

很多的赫尔曼在兰博尔茨死后接替这一角色,这一方式在于确保无人有足够吸引力会威胁到他的地位。〔38〕

68 最后一个组织是建立于 1950 年代的鼓动委员会 (Agitation Commission)。它由负责任的政治局委员领导,包括了鼓动部、东德电视,以及政府新闻办公室 (government Press Office) 的主管,还有来自工业和农业部门的代表。鼓动委员会的任务是起草长期战略,而中央委员会的宣传和鼓动部则对更紧迫的事务负责。这在现实中并非总能行得通。在诺登掌权期间,鼓动委员会和鼓动部都向新闻媒体发出各种指示。〔39〕

政府的宣传作用很有限。1958—1989 年期间,柯特·布勒查 (Kurt Blecha) 领导了一个政府新闻办公室,但是它的 50 名职员的权利很小。它甚至缺乏批准各种常规事务报告的权力,比如没有获得相关党务办公室的首先许可 (first clearing),就不能采用夏令时。〔40〕

新闻办公室确实对宗教杂志有权威,包括 5 份新教徒周报。《波茨坦礼拜》(Potsdamer Kirche) 的编辑描述了这一过程。教会没有它自己的出版工厂。周二,校样经过阅读,然后收到来自出版社的付印许可。但是它要在周三才能付印。在此期间,一份底稿会送到新闻办公室:“需要双重许可。它不会正式对外宣告。尽管如此,我们明白怎么回事。星期三上午 9 点到 10 点之间,一个电话从新闻办公室打过来。‘波哥曼 (Borgmann) 先生,请来新闻办公室。’我不得不过去。根据过错的严重程度,我可能被呵斥一

〔38〕 Wilfried Poßner, *Immer bereit! Parteiauftrag: kämpfen, spielen, fröhlich sein* (Berlin: edition ost, 1995), 128.

〔39〕 Holzweißig, *Zensur ohne Zensor*, 29.

〔40〕 同上, 75。

顿,也可能受到多少算是礼貌的对待。”〔41〕教会有时能赢得争论,偶尔也能在空白处(blank spaces)发表论文,但是那些规则相当清楚,而教会通常会遵守它们。〔42〕

东德唯一的官方新闻机构德意志通讯社[The Allgemeiner Deutscher Nachrichtendienst (ADN)]是一个国有性质的组织,就像广播和电视系统一样,但它们实际上由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官员控制着。这有其缺陷。约阿希姆·赫尔曼在1988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向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经济主管冈特·米塔格(Günter Mittag)抱怨,虽然电子媒体和德意志通讯社直接隶属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治领导,但是同诸如《新德国》这样的党报比起来,它们在政府机构中的位置导致它们在经费支持上处于弱势。〔43〕

总结

纳粹德国存在了12年,而东德则是40年,这意味着有更多时间来发展它的体系。然而,两个体系被证明是相似大于差异。

它们都发展了从地方到全国层次的复杂的官僚政治部门。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迫使各级下属无条件地服从其上司的命令,即便从理论上说,纳粹的权威自上而下而马列主义是自下而上的。任何一个体系都极其符合德国的权威主义传统。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体系是两个体系中较松散的一个。

〔41〕 Renate Schubert, *Ohne größeren Schaden? Gespräche mit Journalistinnen und Journalisten der DDR* (Munich: ölschläger, 1992), 51-52.

〔42〕 按照德党的观点,新教教会是在数量上更庞大,同时更加麻烦的组织。有关天主教会的讨论,可参看 Bernd Schäfer, *Statt und katholische Kirche in der DDR* (Cologne: Böhlau, 1998)。

〔43〕 Holzweißig, *Zensur ohne Zensor*, 82.

纳粹的领导人为增强他们各自在宣传领域的权力而斗争,就如在其他领域一样。宣传包含一系列准独立实体性质的机构,虽然并非一贯如此,但一般来说它们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发展。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党的上层的决策提供了一个合法外观。据称如果一个人参与了各项决策制定过程,那么他就有义务遵循这些决策。一位东德的新闻工作者以如下方式表达了上述结果:“这是一个设计出来只会制造焦虑的体系。”〔44〕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体系产生的是焦虑的共享,但是比起希特勒的德国来,一位东德的宣传员更容易陷入麻烦之中。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实质上把更多的控制权力交到了政府机构的手中。宣传部和其他机构对媒体的内容有明确的发言权。东德没有像戈培尔的宣传部那样的等价物。党的部门牢牢抓住了控制之权。

纳粹体系比东德体系看起来更令人困惑。一般来说,在东德一个人知道去哪里寻求答案,而由互相斗争的纳粹党领导人与组织所构成的令人费解的体系则使得获取答案更有挑战性。尽管如此,在两个体系中,公众都清楚,所有参与公共舆论形成过程的人也清楚,对于什么能说能做着有着严密的控制。每个稍加留心的公民早早就懂得了什么能说和不能说。负责什么能说和不能说的权威部门是非常清楚的,相关部门的分布也是足够广的,这就让逃脱和忽略它们变得异常困难。

〔44〕 Schubert, *Ohne größeren Schaden*, 38.

第四章 福音传播者

纳粹党和东德都发展了实质性的中央宣传官僚部门,以决定宣传的一般内容。这些部门从来不能单独运作严密的控制体系。为此,两个体系要依靠较低层级的大量宣传员来落实它们的行动。参与(Participating in)这一体系意味着需要增强大量公民对体系的忠诚(或者至少在让他们表达批评性态度时更不适宜),同时也要求提供大量的人来做宣传。

71

宣传员既是新社会的又是为了新社会的福音传播者。作为真正的信仰者,他们会通过言语与行动把党的信息带到每个公民身边。这些宣传体系如何指望他们呢?一个纳粹宣传员或者地方宣传组织领导人都读些什么做些什么呢?一个东德鼓动员的工作是什么呢?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地方层面上,就像一个教区的牧师会将教会的信仰个性化(personalized)一样,这些福音传播者也将国家和政党的宣传个性化了。

作为纳粹宣传员的生涯

纳粹党是按照等级原则组织的。1939年总共分成40个大区(Gaue)。每一个大区再由分区(Kreise)构成。分区则由分部

72 (Ortsgruppen)构成。1939年有28 376个分部(local groups)。^[1]大的分部再进一步分成由4至8个小组(blocks)构成的支部(cells)。这些小组大概有40到60户家庭。大区 and 分区的党务官员由国家付薪,而分部的人则不是(虽然他们有时也有不错薪水的政府工作)。大区、分区和分部都有宣传领导人。他们让下属负责积极的宣传活动(演说和公共集会)、电影、文化、广播以及有时其他领域。1934年2月,各级宣传办公室有1.4万名党务人员(functionaries),但这些还只是正式的部分。^[2]党员中的重要成员都送去从事宣传工作,即便他们没有任何头衔。比如,仅1936年就有2万5千人协助党的电影宣传。^[3]

其他几十万人则作为家庭密探(block wardens)为党和它的附属组织服务,从而在公民个体与组织之间提供了个人层面的联系。^[4]他们被期望去倾听邻居们的心声,同时在必要之时,作为调解人,为有问题的公民提供快速和非官僚式的帮助,但是也要去发挥宣传的作用。

家庭密探在像星期天炖煮食物募集(Eintopfsonntag collection)这样的活动中是重要的,它是纳粹冬季慈善救济(Nazi Winter

[1] Fritz Mehnert, "Die Statistik der NSDAP," *Der Hoheitsträger* 3, no. 7 (1939): 10-12. 据推测,分部下辖不超过1500户家庭。

[2]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92.

[3] Curt Belling, *Der Film in Stadt und Partei* (Berlin: "Der Film," 1936), 72.

[4] 有关这些党务人员的细节,参看 Detlef Schmiechen-Ackermann, "De' Blockwart': Die unteren Parteifunktionäre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Terror- und Überwachungsapparat," *Vierteljahrshä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8 (2000): 575-602. 仅1935年就有20万4359名家庭密探。参看 Reichsorganisationsleiter, *Partei - Statistik: Stand: 1935* (Munich: Reichsorganisationsleiter, 1935), 2: 7。

Relief Charity)的一部分。〔5〕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每个人(包括希特勒)只吃一顿简单的晚饭,即只准备一锅简单的炖煮食物,以将省下来的钱捐给慈善。家庭密探或其他人会在当天拜访每户家庭接受捐献的钱物。1933年柏林的方针提醒,每一家庭都被期待参与其中,这些党务人员则负责监督那些没这样做的家庭。当然,至少这些方针表明,募集者不会去检查炉上锅内有些什么,以确信这一家庭确实只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6〕

各项工作异常繁重。1939年,来自爱森纳赫(Eisenach),一位负责约600个公民的支部领导人的一份报告概括了他4月和5月的各项活动。除开许多非宣传性质的工作外,与宣传相关的工作包括:

- 参加与教育有关;政治领导人;晚会;
- 发展各种纳粹附属组织中的成员人数;
- 参加周末分区培训课程;
- 销售希特勒演说集;
- 销售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这一大区的领袖)演说集;
- 邀请每一党员参加分部会议;
- 寄送通告小组会议的书面邀请给每户家庭,还有张贴布

73

〔5〕参看 Herwart Vorländer, *Die NSV: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ation ein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Organisation* (Boppard am Rhein: Harald Boldt, 1988)。虽然这是一项涉及党和国家的有些混乱的事业,但是戈培尔仍领导每年每次的运动,这证明了它作为宣传的重要性。有关分部运作的更多细节可参看 Carl-Wilhelm Reibel, *Das Fundament der Diktatur: Die NSDAP - Ortsgruppen 1932—1945*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2002)。

〔6〕*Sozialisten der Tat: Das Buch der unbekanntenen Kämpfer der N. S. V. Gau Groß-Berlin* (Berlin: N. S. D. A. P Amt für Volkswohlfahrt, Gau Groß-Berlin, 1934), 66。

告,寻找场地以及筹备演说与音乐(在他之下应有大约6个小组);

- 管理小组会议。〔7〕

1939年明斯特(Münster)的党务官员抱怨道,尽管有明确的党的政策,但是家庭密探仍然是一场运动中负有宣传使命的忠实仆人。在这一年的头4个月,他们被指示去卖掉三本希特勒演说的小册子,一本《我的奋斗》,一期在希特勒50岁生日之际出版的《观察家画报》(*Illustrierter Beobachter*,党的每周画报)特别版,以及五本有关间谍到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话题的小册子。有时在党的会议前一天,它们连同大量入场券(tickets)卖给了他们的邻居。他们被期望定期拜访其区域内的每一个人,同时保存与更新每个人的卡片档案。〔8〕他们也被分配一些任务,这必定使他们不受欢迎。比如,1941年末,德国人被指示在他们的收音机调频旋钮旁贴一个小标志,以提醒他们收听国外电台是违法的。家庭密探被期望去检查这些标志是否存在,而这种事自然不会增加他们的受欢迎度。〔9〕

这样庞大数量的低级党务人员对党的有效运作来说是重要的。党对其他公民来说是一个榜样,它是帮助、建议和激励的源泉。这些基层干事使党对广泛地区的要求看得见摸得着了。远在柏林的

〔7〕 Myers Collection, Kreisleitung Eisenach/11a: Bericht über die Tätigkeit eines Blockleiters (1939).

〔8〕 Joachim Kuroпка, ed., *Meldungen aus Münster, 1924—1944* (Münster: Regensburg, 1992), 668. 小组头目用以掌握他们邻居的详细形式,一个例子可参看 *Deutschland - Berichte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opade)*, 1934—1940 (Salzhausen: Petra Nettelbeck, 1980), 3: 1644—1645。

〔9〕 Boberach,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8: 3020.

戈培尔不可能亲自让一个公民去从事平息抱怨的任务,但是一个当地的家庭密探能办到(并且也被期待如此去做)。通过这种怪异的方式,它甚至提升了国家领导人的威信。公民们抱怨那些“小希特勒们”,因为这些低级党务人员对其监管甚多,而他们却从对权力的满足中获益。虽然这些党务人员事实上做着这一体系希望他们去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却像避雷针那样,将批评从其上司身上转移开了。“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德国人经常这样说。同时,融入这一体系巩固了这些奴仆们的忠诚(或者至少是他们的公开支持)。一个家庭密探或当地党务人员不可能公开表达不赞同的态度。随着时间的变化,他们的行为,正如会影响他们的那些邻居们,也会强化他们自己的态度。

党的演说家是另一个重要的宣传群体。〔10〕一些精英是全国性的演说家(Reichsredner),他们有权在国家的任何一地讲话。按照1936年的重要人物来算,他们包括党的最重要官员、大区领袖、政府部长、省长以及大约60名其他人士。〔11〕到1940年这一人数上升至约500人。〔12〕正在培训中的演说家(Stoßtruppredner)能够在全国性的密集活动中获得重用。他们属于全国性演说家之下的一个级别,如果其表现证明了他的能力,则能被提拔到更高的层级中。〔13〕大区的演说家(Gauredner)限制在其大区,而分区的演说家(Kreisrender)则限制在分区。还存在有关特殊主题的(比如,农

74

〔10〕 参看 Ross Scanlan 的两篇文章,它们详细讨论了这一体系:“The Nazi Party Speaker System,” *Speech Monographs* 16 (1949): 82-97, and “The Nazi Party Speaker System, II,” *Speech Monographs* 17 (1950): 134-148。

〔11〕 “Reichsredner der NSDAP,” *Unser Wille und Weg* 6 (1936): 222-223.

〔12〕 Fröhlich,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7: 309.

〔13〕 Hugo Ringler, “Der Rednerstoßtrupp der Reichspropagandaleitung,” *Unser Wille und Weg* 5 (1935): 154. 1936年,40人在此考虑之中。

业或军事事务)专业演说家(Fachredner)。他们被党的附属机构雇佣,比如德国劳工阵线或纳粹农业组织。总计起来,当战争开始时,在某种程度上,约有9800名演说家获此资格。〔14〕

纳粹党人把大量精力倾注在了演说家的能力上。要从事第三帝国事务,只有那些1933年前就是积极党员的人才资格成为演说家。党的宣传员月刊中有一篇文章解释了为何那些1933年后成为党员的人不被允许加入演说家群体:“即使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已经变成了德国人的世界观,它仍是建立在斗争的基础上。只有那些本身经历过斗争也为斗争做过贡献的党员才能以正确的精神对外发言。”〔15〕他们的信仰已经证明这句话的真实性。甚至党的附属机构的专业演说家也是入党已久的党员,而且总是被期望在其演说中产生政治效果。他们被期望将其演说与纳粹的世界观联系起来。

1933后党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宣传。这一体系善于开展引人注目的活动。战争的第一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宣称,尽管许多富有经验的宣传员都在军队服务,但是仍然举办了3万次幻灯片展示(*slide shows*),约20万场公共集会,另外还分发了大量的传单、小册子和海报。〔16〕这些数据包含的还只是纳粹党自身的各种努力。德国劳工阵线、党的妇女附属机构以及其他组织开展了它们自己的活动。更低级别的机构则把精力集中在短时间内密集的宣传活动中。比如,仅1939年3月的单独一天,就有62场大

〔14〕 Herzstein, *The War That Hitler Won*, 144.

〔15〕 Hugo Ringler, “Neuordnung des politischen Rednerstabes,” *Unser Wille und Weg* 5 (1935), 30.

〔16〕 “Die Arbeit der Partei – Propaganda im Kriege,” 1. 文本可在 GPA/warprop.htm 获取。

众集会在布雷斯劳 (Breslau) 举行 (此城市的人口约为 63 万)。^[17] 如何夸张的能量爆发是普遍的, 像极了美国宗教复兴期间信徒们的野营集会。随着战争的进行, 集会的数量有某种程度的减少。尽管如此, 按照党的统计, 即使在 1943 年 10 月 1 日到 1944 年 4 月 30 日期间, 有 3500 名演说家在军队服务, 但仍举行了约 8 万场集会, 吸引了 19% 的人口。^[18]

一个精细的、并且与往常一样有些重叠的体系为低层级的宣传员提供情报。最广泛分发的机关报是《我们的意志与方法》, 由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出版。到 1940 年, 它的月发行量约为 12 万份。《我们的意志与方法》刊发范围广泛的文章。虽然在任何意义上它很少是理论性质的, 但有一些文章确实在更大的框架中看待宣传。^[19] 1938 年总共 12 期, 包括 380 页内容。一些文章为像奥地利纳粹党的历史这样的主题提供背景资料, 或者解释为何德国人需要多吃鱼肉。其他文章则为宣传的各个方面提供建议。比如, 一篇有关组织会议 (organizing meetings) 的文章提醒道, 确保房间不要过热和过冷是很重要的。此外还有与宣传相关的资料的简短书评。

中央宣传办公室联合德国劳工阵线出版了《教育与演说家情报资料汇编》(*Aufklärungs - und Redner - Informationsmaterial*), 它被涵盖在《我们的意志与方法》中随之发行。它以活页的形式出现, 因而能够按照主题装订成册。1936 年各期共包含 560 页的资

[17] Kurt Sperber, "Die Versammlungswelle," *Der Hoheitsträger* 3, no. 1 (1939): 27 - 28. 文本可在 GPA/breslau.htm 获取。

[18] "Die Versammlungen der NSDAP: Eine Uebersicht über das Winterhalbjahr 1943/44," *Die Lage*, Folge 116B (1944), 5.

[19] 比如, 参见 Schulze - Wechsungen, "Politische Propaganda," 可在 GPA/polprop.htm 获取。也可参看 GPA/dietz.htm。

料,主题涉及住房、劳工政策、农业、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凡尔赛和约。〔20〕虽然只有演说家才可订阅,但是这一资料也不是绝密的。

资料提供了演说家会在讲话中体现的详细信息。比如,1936年7月版有3页讨论了世界范围的义务兵役制。希特勒已经在1935年3月宣布了义务兵役制。这一信息的要点意图表明德国只是遵循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先例。文章这样说道,法国首先在1793年引入征兵制。奥地利在1936年3月再次引入,意大利则在1934年。俄罗斯在1874年引入征兵制:“苏联继续奉行此政策,并打算利用义务兵役制最大限度地发展人民军队。”许多其他主要国家也这样做,这一政策又因一战的经历而毫不含糊地获得证明。英国和美国“还没有”这样做。文章以如下评论结尾:“几乎所有国家都引入了普遍兵役制,虽然它们在现役和预备役的时间长短上不同。”既然希特勒已经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众运动来重建德国的军事力量,那么这一资料无疑十分符合这场广泛的宣传运动。演说家情报提供了演说家运用的一般资料,而这对以下频繁的纳粹运动来说格外有用,诸如从1934年针对发牢骚与抱怨之人到1933与1938年之间,希特勒称作的4次全国公民投票这样的一系列运动。

76

作为帝国的组织部长,罗伯特·雷出版了两份有关宣传的杂志。《教育通信》(*Der Schulungsbrief*)的对象是所有公民,它刊登有关纳粹意识形态各方面的文章。由于有低层级宣传员参与其中,一场兴致勃勃的订阅运动的结果是,它的月发行量从1937年初的150万跃升到1939年的450万。1937年各期包含的主题包括诸如中世纪妇女的角色、1914年前的奥地利军队和19世纪的反自由主义运动。它的目标就是用一种有理性的能读写的公民可理解的形式,为德国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一种纳粹式的解释。

〔20〕 这方面例子,可参看 [GPA/rim1.htm](#) and [GPA/rim2.htm](#)。

《主权担当者》(*Der Hoheitsträger*) 发行于 1937 到 1943 年, 它的读者对象是分部及以上级别的党务官员。1941 年它的发行量是 3.8 万份。〔21〕每一期都做了编号, 每一页也标注“绝密的”。读者们被命令不许它进入未被授权之公民的视线。尽管如此, 内中无一秘密的; 虽然不准直接引用它, 但是党的领导者们确实受到激励与他们的下属分享其中的内容。代表性的文章包括为以下问题提供建议: 如何鼓励家庭多生育孩子, 在分部与住在国外的德国公民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 激励小组头目更有效发挥作用的途径等。还有党的领导人的讣告, 对不合适行为的批评(比如, 当身穿党的制服时, 拎着一个印有商业广告的手提箱), 以及书评。某些情况下, 一篇文章会在《主权担当者》和《我们的意志与方法》同时发表。

除去这些杂志, 宣传员还会收到其他大量资料。雷的办公室出版了大量培训材料。〔22〕大区宣传办公室出版每月简报。〔23〕戈培尔在 1943 年为党的领导人引入了一个出版物《形势》(*Die Lage*)。它的目标是“为领导人提供他们急需的政治、军队和经济方面的情报, 用以评估形势并贯彻其领导责任。”〔24〕党的附属机构为宣传员提供它们自己的资料。比如, 德国劳工阵线在 1939 年为宣传员创办了一份杂志, 名为《我们的口号》(*Unsere Parole*)。频繁的宣传会议也在举行。〔25〕总之, 宣传员收到各种各样用以支

〔21〕 Bundesarchiv Berlin, NS 22/894: “Der Hoheitsträger” Verteilerliste Folge 1/1942.

〔22〕 关于细节, 可参看 Herzstein, *The War That Hitler Won*, 156 - 157. 两个例子可在 GPA/hsa01.htm 和 GPA/hsa02.htm 获取。

〔23〕 比如, 图灵根州(Thuringia)的各期宣传简报可参看 the Myers Collection, Kreis Eisenach 56.

〔24〕 *Die Lage*, 31 May 1944.

〔25〕 比如, 戈培尔经常在纽伦堡集会上向宣传员讲话。两个译本可在 GPA/goeb41.htm 和 GPA/goeb.59.htm 获取。

撑他们努力的资料,与典型的纳粹风格相对应,这些资料来源不同,而它们并非总是处于毫不冲突的最佳状态。

77 组织和支助地方宣传员的最后一种方式是通过国家社会主义宣传与人民启蒙帝国团体,这在前一章已讨论过。在规范这几十个有着各不相同议程的迥然相异的组织时,它显示出了一定的效率。〔26〕大区的帝国团体出版通常标记着“绝密”的每月简报,虽然其中根本没有什么透露内幕的东西。

党员是追随他们的公民的榜样。雷在 1938 年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手册》(*Organizational Handbook*)中列出了党员的义务,或可看做纳粹主义的 12 条戒律,用的是典型的命令口吻;

- 元首永远正确!
- 永远遵守纪律!
- 不要将你的时间浪费在无益的唠叨或批评上,而应脚踏实地地努力工作!
- 要自豪不要自负!
- 纲领是你的信条,它要求你完全献身于这场运动!
- 你是党的代表。注意你的举止并照此行动!
- 忠诚和无私是最高的义务!
- 成为一个好同志显示出你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 对待你的公民同胞就像你希望他们如何对待你一样!
- 在战争中要不屈不挠,冷静沉着!

〔26〕 按照“Merkblatt für den Propagandisten im Gau Weser - Ems,” *Monatsblätter der Gaupropagandaleitung Weser - Ems der NSDAP* 7, no. 3 (1942), 1942 年在威悉河 - 伊姆斯大区 (Gau Weser - Ems), 40 个不同的组织是体系宣传 (Propaganda Circle) 的一部分。它们包含所有党的组织,也有像园丁协会和歌唱俱乐部这样的组织。参看 GPA/wesere.ms.htm。

- 勇气不是通过粗野来表现的！
- 任何有利于运动的必有益于德国，这意味着它有助于你的民族！〔27〕

党员们接到努力工作的确定不变的训谕。1943年的一份宣传员简报写道：“自愿加入我们的党员必须通过为人民的无私奉献来证明自己，正如他在斗争期间所做的那样。”〔28〕党员被强烈要求去树立榜样，拒绝容忍任何对党和政府的批评。首先，他们需要绝对相信纳粹的启示。正如哈达莫夫斯基在1938年写道的：“我们宣传员习惯于坚定地相信明天将会怎样，就像它已经这样发生了一样。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教授信仰。”〔29〕

尽管有大量的地方福音传播者和过剩的福音传播文献，事情并未如党所期望的那般成功。即便党务人员确实服从了雷的训谕，公民们并未给予党它本可能会赢得的尊重。《主权担当者》和《我们的意志与方法》刊发文章为宣传员们在其他德国人那里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而悲叹。〔30〕公民们很快厌倦了参加集会。在避免各种浪费时间的活动之时，他们接受了不那么重要的忠诚展现（比如，购买《教育通信》）。党的宣传员经常成为讨厌的人，有时也成为其公民同胞的一个威胁。

78

〔27〕 *Organisationsbuch der NSDAP*, 5th ed. (Munich: Franz Eher, 1938), 8.

〔28〕 Hans Hackl, “Die Partei hat in allem Vorbild zu sein!” *Die Lage*, September 1943, 4.

〔29〕 Eugen Hadamovsky, *Hilfsarbeiter Nr. 50 000* (Munich: Franz Eher, 1938), 21.

〔30〕 比如，可参看 Ross Scanlan, “The Nazi Speakers’ Complai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40 (1954): 1-14.

东德特色的宣传

纳粹党人以大量有经验的宣传员为后盾开始他们的统治。整个党都在执行宣传,希特勒认为这是一个组织的首要任务。1933年1月30日,因为从反对走向统治地位,纳粹的宣传发生了转变,但它是一个灵活的体系,能够很快调整以适应新状况。现有的大众媒体与传播体系是纳粹的优势,大体来说许多方面与它的目标相一致。

东德一开始的形势就与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12年的统治很少留下有经验的社会主义宣传员。没有广泛的党组织。没有宣传资料。大众媒体系统也已被破坏。

第一步是建立党组织。正如在纳粹统治下,它包括渗透这个国家每一部分的基层组织(units)的严密网络,德国统一社会党也按照等级原则来构建。一开始它建立了约6万个基层党组织(lscal groups),它们要么按照工作场所要么按照邻里关系。^[31]向县级(Kreis)党委报告(1989年达到264个),后者又服从于15个专区(Bezirk)党委。每一层级都有负责宣传与鼓动的人员。发掘与培训他们则是第一项挑战。

1950年以《论改进党的宣传》(“*On Improving Party Propaganda*”)为题,供党内领导层阅读的出版物注意到,党的教育体系存在的弱点:

- 党员和预备党员仍缺乏足够的马列主义培训;
- 负责宣传与理论的领导人员仍培训不足;

[31] “Qualitative Stärkung der Reihen der SED fortgesetzt,” *Neues Deutschland*, 11 January 1989, 3.

- 党校内过于形式主义的培训,与党的日常工作经验脱节;
- 草率、随意的学生选拔。〔32〕

1950年后完善的体系包括全国、专区和县级的党校,以及由其他组织所管理的类似机构。到东德晚期,管理“党员年训课程”(Parteilehrjahr)的宣传员中,有一半已在党校完成了一年的课程,80%的则获得了高等教育学位。余下的大多数则参加短期党校培训。〔33〕1980年代,宣传部的所有职业工作者都取得了大学学位。〔34〕这些正式的教育成为以正确的信念与方法武装党员的主要手段之一。

79

征募合格的鼓动员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既然德国统一社会党试图在每一工作场所、街坊区或公寓大楼都安置一名鼓动员,那么它就需要比纳粹党更多的鼓动员。因为这一职位既费时又无报酬,而且经常不能赢得马列主义理论认为本应获得的来自工友们的尊敬,许多人并不乐意承担这一任务。找到卖力的街区鼓动员尤其是一个问题。1955年,《新路》(*Neuer Weg*)中一篇文章报道说,3月份35万个街区小组(neighborhood groups)中只有13%举办了期望中的每月鼓动工作大会。〔35〕1963年,柏林的普伦茨劳堡区(Pre-

〔32〕 *Über die Verbesserung der Parteipropaganda: Entschließung des Parteivorstandes der SED vom 2. Und 3. Juni 1950* (Berlin: Parteivorstand der SED, Abteilung Propaganda, 1950), 6.

〔33〕 Heinz Puder, “Zu den Aufgaben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Bildung und Erziehung sowie zu den Anforderungen an die Propagandisten des Parteilehrjahres,” in *Beiträge zur Methodik im Parteilehrjahr* (Berlin: ZK der SED, 1988), 7-8.

〔34〕 SAPMO, Bericht über die Prüfung in der Abteilung Propaganda.

〔35〕 引自 Ernst Richert, *Agitation und Propaganda: Das System der publizistischen Massenführung in der Sowjetzone* (Berlin: Franz Vahlen, 1958), 218-219.

nzlauer Berg) 只有 45% 的公寓大楼指派了鼓动员。〔36〕

不过在工作场所寻找鼓动员要轻松得多。1986 年,普伦茨劳堡区报告,它在所有 1600 个工作集体 (work collectives) 中配备了鼓动员,就整个国家来说,这似乎也是普遍真实的。〔37〕它的目标就是找到获得工友们信任的鼓动员。在 1976 年的一次专区会议上,一位负责鼓动的领导人对征募鼓动员的重要性做了评论:“我们的目标是挑选出这样的同志来做鼓动员,他们在政治和专业上过硬,尊重集体,并且总体而言拥有最好的能力……一旦我们清楚某一同志由于他的观点和知识,事实上已经是集体的鼓动员,同事们有问题或需要建议时都向他请教,那么我们就已经获得了我们需要用来解决问题的鼓动员。”〔38〕

但是仅仅指派鼓动员还不够。他们需要脚踏实地做事。比如,一份有关莱比锡百货公司的报告发现,“既然选定的鼓动员无法获得来自党的领导层的任何指导,进而无法在集体中发挥作用,那么他们或多或少只存在于纸面上。”〔39〕

鼓动员并不总是希望参加会议或者购买专为他们编辑的资料。1961 年 8 月,正值柏林墙修建之前,勃兰登堡州 (Brandenburg) 的一次宣传会议受到批评:“这次会议最大的缺点是,尽管做

〔36〕 Landesarchiv Berlin, BPA/SED IV/A - 4/06/097: Agitationsarbeit in den Wohngebieten (1963).

〔37〕 Landesarchiv Berlin, BPA/SED 005725: Information über Ergebnisse und Erfahrungen in der Arbeit der Agitation der Partei (1986).

〔38〕 Bezirksleitung Cottbus, *Erfahrungen Formen Methoden der Parteiarbeit*: 3. Agitatorenkonferenz der Bezirksleitung Cottbus der SED, 13. 12. 1976 (Cottbus: Bezirksleitung Cottbus der SED, Abteilung Agitation/Propaganda, 1977), 14.

〔39〕 SAPMO, DY 30/vorl. SED 33899: Zur politischen Massenarbeit im Centrum-Warenhaus Leipzig (1980).

了相对充分的准备,受邀的 192 名宣传员最后只有 52 人与会。”〔40〕积极的宣传员要求拥有自己的时间,不想把另外一场漫长的会议强加到他们的每周日程中。〔41〕他们并不经常买适宜的书籍。一份 1961 年的报告注意到,并无多少宣传员购买了推荐的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著作。〔42〕许多确实买了这些书的人都不读它们。那些出于可以理解的实用主义理由而入党的人不愿意花除必要之外更多的时间在党员义务上。离开东德的赫尔曼·冯·博格(Hermann Von Berg)总结了这一形势:“我认识不少的教授和党务官员,他们微笑着承认,从未读过任何马克思著作中哪怕一行文字,但是仍然通过了各种考试。‘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只是摆放在每个党务人员的书架上和图书馆中。就像政治局委员的讲话(由党的机器中的官僚撰写)或纳粹政权中希特勒《我的奋斗》一样,它们是必读资料。不过在私下场合,它们都被抵制——虽然在公开场合受到更多的赞许。”〔43〕

鉴于这一体系对信息的严密控制,保持宣传员的消息灵通是一项挑战。1957 年来自德国统一社会党鼓动部的一份提案说道:“作为大众真正的知己,他们(党系官员)必须比一般的报纸读者知道更多有关政治各领域的情报。但事实仍然是,党的书记大多

〔40〕 SAPMO, DY 30/IV 2/9. 03/15; Bericht über die Auswertung der Propagandistenkonferenz des ZK im Bezirk Neubrandenburg (1961), 134.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文件中也有大量类似的抱怨。

〔41〕 比如,1954 年政治局委员弗雷德欧司勒注意到,在哈勒专区,全体宣传员会议从当天上午 10 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5 点或 6 点。“不会有许多好提议来自于这样的会议”,他敏锐地评论道。参看 Oelßner, *Über die allseitige Verbesserung*, 23。

〔42〕 SAPMO, DY 30/IV 2/9. 02/159; Darüber muß man offen reden! (1961)。

〔43〕 Hermann von Berg, *Marxismus-Leninismus: Das Elend der halb deutschen, halb russischen Ideologie* (Cologne: Bund, 1986), 19。

数情况下从报纸获取信息,这就跟共和国的其他公民一样。”〔44〕希望提供绝密信息给宣传员的提议始终没实现。纵观东德的历史,宣传员只比关注媒体的工友们知道的多一点点。专为鼓动员而出版的资料有如此大的发行量,以至于它们不可能容纳绝密信息。东德对可能泄漏到西德的坏消息保持着持续的关注,这使得对地方宣传资料的限制甚至更严格,如此一来,鼓动员也无法获知任何不可能让他们知道的内容。除此之外,允许宣传员了解到党的领导层事实上并非意见一致,将会产生异议。如果他们都不能确定什么能说,那么他们将不会得到前后一致的信息。

81

共同官僚机构发挥作用。大众宣传机器的众多分支机构相互竞争以显示各自的成功,衡量的方式则通过像举办集会与分发小册子的数量这样的方式。正如任何官僚机构一样,计数(counting)是宣示成功的最简单方式。比如,1961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各种组织更关心通过举行大量的集会而不是回应人民的实际需要来向上级组织显示它们的效果。〔45〕同样,1963年,一份基于同县级报纸编辑的谈话而写成的报告显示,人民通信运动(它试图鼓励普通人给新闻媒体写信)是萧条的,乏人问津。很少有人确实去写了,但是他们仍然出现在名单上,因为一个高数字在提供给上级的报告中看起来更好,哪怕很多人什么都没做。〔46〕

虽然东德从未成功赢得经济上的斗争,但是到1960年代,它

〔44〕 SAPMO, DY 30/IV 2/9.02/14; Vorlage für das Sekretariat des ZK zur Verbesserung einiger Seiten der Agitationsarbeit der Partei (1957).

〔45〕 SAPMO, DY 30/IV 2/9.03/15; Bericht über Einsatz im Kreis Prenzlau (April 1961).

〔46〕 SAPMO, DY 30/IV A2/9.02/39; Bericht über eine Aussprache mit Kreiszeitungsredakteuren der Gebietsgruppe Karl – Marx – Stadt des VDJ am 25. Juni 1963. 在 *Zensur Ohne Zensor* (102) 中, Holzweißig 坚称,人们不愿受到这种身份的对待的另一个原因是某种可以理解的担忧,即由于传递了工友们的评论他们会被当成告密者。

获得了鼓动组织的战斗胜利。到那时为止,已经有庞大数量经过培训的宣传员和鼓动员。1976年,德国统一社会党(那时正好超过200万)中估计有10% - 15%的党员被指派担任鼓动员。〔47〕1972年的报告声称德国统一社会党有超过10万的宣传员。〔48〕尽管如此,大多数不是全职的宣传员。还有大量人在为自由德国青年、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Free German Trade Union, FDGB)和其他群众组织做宣传。合理的估计是,1980年代约有50万东德公民被指派为宣传员或鼓动员。这一估计得到了以下数据的支持,即鼓动员月刊《为什么与怎么样》的发行量在1980年约为45万份,1989年约为53万份。〔49〕它的发行量与鼓动员人数之间相当直接的关系从1976年来自维森菲尔斯县(Kreis Weißenfels)的一份报告中得到揭示,它宣称有664名指派的鼓动员,701人订阅了该刊。〔50〕

急速膨胀的资料服务于宣传员和鼓动员。一开始,东德转向苏联,即翻译了名为“鼓动员丛书”(Agitation's Library)的11本系

〔47〕 SAPMO, DY 30/vorl. SED 18300: Information über den Erfahrungsaustausch zu Fragen der Agitation auf dem 1. Weiterbildungslehrgang mit den Sekretären für Agit/Prop an der Sonderschule des ZK in Kleinmachnow (1976), 1.

〔48〕 SAPMO, DY 30/vorl. SED 12885/2: Arbeitsgruppe: Welche Anforderungen müssen heute an die theoretischen und pädagogischen Fähigkeiten der Propagandisten gestellt werden? (1972), 1. 1988年,11万的宣传员参加了党员年训。参看 Puder, “Zu den Aufgaben,” 7。

〔49〕 SAPMO, DY 30/IV 2/2. 037/14: Information über die Aufag-entwicklung von “Was und Wie” nach Bezirken (1980). 这意味着约3%的人口是鼓动员。1965年的一项研究估计,苏联的类似数据是1%。可参看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145。

〔50〕 *Bilanz zwischen zwei Parteitagten; Fakten und Ergebnisse der Agitation und Propaganda der Kreisparteiorganisation Weißenfels* (Weißenfels: Kreisleitung Weißenfels der SED, Abteilung Agitation und Propaganda, 1976), 13, 15.

列小册子。在“布尔什维克主义鼓动的基本原理”(The Fundamental of Bolshevist Agitation)系列中,一本1951年的小册子包含58页的建议,比如,“清晰明了、简单明白和易于理解是布尔什维克主义鼓动的主要特点。”〔51〕

与此同时,鼓动部的《问题与答复》(*Questions and Answers*)系列为鼓动员提供了用于日常讨论的资料。其中一个版面讨论了处理划归东方的德国领土的各种方式。为了答复为什么这一地区的德国人要被迫迁往西部和北部,它给出的回答是:“德国人被从之前的东部领土驱除了出去,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希特勒的征服战争。作为居住在外国的小数群体,这些德国人的存在总是国家社会主义宣传的最佳借口,其目标指向‘解放同胞们,让他们去东部’。为了一劳永逸解决这一问题,一场激进的、艰苦的但又是连续的将东部地区所有德国“人迁移出来”的政策贯彻下去了。”〔52〕

82

党务官员月刊《新路》在1945年开始出版。它经常刊登的文章不得不处理宣传问题。最初几期有时对宣传员来说既生动也有帮助。1949年的一期告诫宣传员,不要过于消极地对待那些学习有些迟缓的人:

“我亲爱的同志!你的问题证明你学习还不够。”这是开姆尼茨(Chemnitz)的演说家对一个问题给予的答复,源于这一问题不可否认地没有用最好的方式加以表达。

在奥古斯特堡(*Augustusburg, Saxtony*),*Flöha*镇的党组领

〔51〕 Kalaschnikow, *Die Grundsätze der bolschewistischen Agitation*, 37.

〔52〕 “Warum ist die Oder – Neiße – Grenze die Friedensgrenze?” *Frage und Antwort: Argumente für die tägliche Diskussion*, no. 6 (1950), 3 – 4. 译文可参看 GPA/oder. htm.

领导人针对一个有点愚笨的老同志草率作答：“一个人不能尽做愚蠢之事！”

有特别的例子吗？根本没有！许多党务人员和演说家有着以这些方式来回答的习惯。当一个同志在一次党会上产生提问题的勇气时，上述答案像是给人一个冷水浴，只会不断产生一个个沉默的成员。那对党来说是有利的吗？[53]

这些文章同时显示出在努力争取大众上的真正兴趣，以及通过有能力的鼓动员，事实上他们能被争取到的巨大自信。

随着时间的流逝，《新路》变得更加单调乏味。1962年一份党的内部报告提到：“低层级的党组织很少能从《新路》中获得实际的建议和指导，不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和方法，还是鼓动的方法与手段。”[54]到1980年代，它充斥着“党八股式”（Party Chinese）的文章，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

党的政治 - 意识形态工作的决定性领域不仅是而且要保持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统一，它是我们社会战略的基石。由于社会战略不仅在理论上，而且还具体地同工业、工厂与工作集体每一分支部门的任务相联系，因而我们需要以一种每个工人都能明白的方式，去解释它的性质以使他们理解它如何因其工作场所相联系。每一个人必须清楚，在生

[53] Michael Heiss, “‘Gegen Dummheit gibt’s kein Mittel!’” *Neuer Weg*, December 1949, 31.

[54] SAPMO, DY 30/IV 2/9.03/5: *Wie erfüllt der “Neuen Weg” seine Aufgaben zur Vermittlung und Verallgemeinerung der besten Erfahrungen der Arbeit der Grundorganisationen und der Führungstätigkeit der Kreisleitungen (1962)*, 249.

产领域,而且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生产出社会和文化领域需要的东西。因此,比起通过运用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尽管它已经理性化了,通过彻底利用生产资料,以及通过有效的管理这样一种实质上更高水平的努力来没有其他替代性选择。〔55〕

一个人很能体谅这些被要求消化大量这种乏味文章的普通公民们。这几乎不可能激发真挚的承诺和勤奋的工作。

83 杂志也包含用于宣传的特定信息。比如,1986年的某期杂志在“对当前问题的答复”(“Answers to Current Questions”)系列中刊登了一篇名为“国家恐怖主义——美国为何与怎样越来越多地实行它?”〔56〕的文章。该文指出,美国打算支配世界,它正在压制争取国家解放的斗争,并且它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反对。除了新闻媒体或报纸提供的内容外,读者了解不到任何东西,不过这一材料至少非常简洁。

发展出告知鼓动员对当前事务之正确态度的方法需要花费些时间。鼓动部在1949年开始出版双月刊《鼓动员手册》(*Notizbuch des Agitators*)。〔57〕它通常约为70页,包含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文章。1953年7月很具代表性的一期包括中央委员会近期会议概览,有关苏联食品运输的辅助材料,东德工资与价格政策以及西德选举的详情,讨论提防敌人颠覆之重要性的警告,农业政策的讨论,鼓动员会议的报告,以及推荐读物。没有什么是绝密的。尽管如此,双月刊无法有效地为大量的鼓动员读者群服务,因此鼓动部

〔55〕 Heinz Geggel, “Jederzeit aktiv und überzeugend die Politik der Partei vertreten,” *Neuer Weg* 44 (1989), 197.

〔56〕 Ernst Becker, “Staatsterrorismus—warum und wie wird er verstärkt von den USA praktiziert?” *Neuer Weg* 41 (1986): 236–238.

〔57〕 比如,参看 [GPA/notiz1.htm](#) and [GPA/notiz2.htm](#)。

在 1955 年 5 月决定停止出版。专区党委准备出版它们自己的版本,事实上这存在了几年,但是到 1958 年大多数也消失了。

最终的解决办法是为鼓动员们出版了一份新的国家级杂志,《为什么与怎么样》,1975 年开始发行。该月刊每期都有 32 页可供鼓动员利用的详细信息。1989 年 4 月号包括以下主题的文章,即将开始的东德公共选举,教育的重要性,社会主义之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东德对苏赔款,种植更好蔬菜的成果,西德的社会苦难,增加东德出口的重要性,西德城市的金融问题,拉丁美洲社会冲突以及布什政府的政策。没有任何文章是绝密的——一个勤勉的报纸读者不会发现什么令人惊异的东西——但是它们确实提供了相当清晰的观点和有用的数据。直到东德崩溃,《为什么与怎么样》都在发行。不幸的是,这一体系的死板之处使它不能为许多合理的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1989 年 12 月的最后一期因过去的诸多不足向读者致歉,更不用提它无视那些重要的问题,还出版了一些简直是错误的资料。〔58〕

还有来自鼓动委员会、专区党委、群众组织以及其他机构的定期出版物、简报和小册子。军事部门也很积极,1988 年编制了一本 500 页的指南《军事组织与单位政治工作手册》(*Handbook for Political Work in Military Groups and Units*) 和为军队鼓动员创办的月刊《雷达》(*RADAR*)。〔59〕柏林的鼓动与宣传部制作了许多可为宣传员使用的幻灯片展示 (slide shows)、电影带 (film strips) 以及演讲录音。正如任何浏览完德国统一社会党档案的人会了解到的,这些资料的总量是庞大的。

虽然德国统一社会党试图劝说那些已经享受着同事们尊敬的

〔58〕 “In eigener Sache,” *WAS und WIE*, December 1989, 4 – 5.

〔59〕 此一资料诸多部分的译文可参看 [GPA/nva01.htm](#) and [GPA/radar1.htm](#)。

人担任鼓动员,但是这一职位会把人们置于一个艰难的境地。既然他们只比其工友们知道得多一点,并且不得不通过解释来消除许多问题而不是解决它们,那么他们的可信度并不总是很高。正如一个鼓动员在1961年说道,他与之交谈的农民们都在抱怨:“你说事情会变好,但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改善。”〔60〕1980年,一个沮丧的鼓动员写信给昂纳克,悲叹她自己在购买日常必需品上的困难,以及这带给她她在鼓动工友时遭遇的挑战:“我请问您,当我作为党的积极分子试图赢得工友们支持时,我如何能在自身绝望的情形下找到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我又如何来养活我那每日都被这些问题困扰的儿子?”〔61〕1962年,来自鼓动员的一封长达23页的信抱怨道:“几乎不可能列出我们在工作中面临的所有问题。”〔62〕他提供了一个好的尝试,其中涉及缺钱、懒惰的同事以及来自城市的障碍。一份1982年的报告注意到,通告经常晚到,即使对于一年一度的活动也是这样,而且,虽然录音材料提供了,但是播放它的设备短缺,并且声音质量经常难以忍受。〔63〕党的文件中也有许多类似的怨言。

尤其是在早期,鼓动员工作进展困难。比如,有人建议,让谈话在家庭中得以进行的方式是以讨论家庭问题开始。但是倾听问题是一回事,对此采取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一般的家庭都愿意提供诸多困难的一个长长清单。鼓动员该做什么呢?作为党的代

〔60〕 SAPMO, DY 30/IV 2/9.03/14; Jochen Eichstädt to Abt. Propaganda on 5 September 1961.

〔61〕 Monika Deutz-Schroeder and Jochen Staadt, *Teurer Genosse! Briefe an Erich Honecker* (Berlin: Transit Buchverlag, 1994), 49.

〔62〕 SAPMO, DY 30/IV A2/9.02/169; Horst Brederick to Kurt Seibert on 17 June 1962, 6.

〔63〕 SAPMO, DY 30/IV 2/2.037/24; Bericht über die Prüfung Die Herausgabe, den Betrieb und die Nutzung von Agitations-und Anschauungsmitteln (1982).

表,他/她要么说,这些问题会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最终消失,而这对于沮丧的谈话伙伴来说并不是一个满意的答案,要么试图做一些事情来解决它们。那意味着放弃本就很少的自由时间而在各个部门之间周旋,不过很少能指望它可以解决公民们的大量困难。在任何案例中,家庭动员不可能有说服力。正如恩斯特·理赫特(Ernst Richert)在1958年写道,党的新闻媒体提供了很少家庭鼓动员的示范性例子,这是一个信号,显示出类似例子本就稀少。〔64〕

信息只有单方向的流动。鼓动会议频繁地提到,反馈运行得不好,信息只有自上而下,没有自下而上的流动。〔65〕那些处于底层的人经常淹没在了上级的指示与命令的洪流之中。弗雷德·欧司勒在1954年一次党的会议上提到:“我们在同一时间开展太多运动了,或者说彼此之间间隔太短了,如此一来那些处于底层的经验不足的鼓动员经常不知道应该首先做什么。”〔66〕那些处于底层的人不仅被期望掌握厚重大卷的党的决议与党的领导人的纲领性讲话,还有做这做那的频繁的紧急指示。一个苦恼的官员在1961年做了一个计算:“1961年1月1日到3月30日之间,专区和县级党委办公室收到中央委员会31份决议。其中15份总共90页,送达各县,另16份(87页)则送到专区。1月和2月间,(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鼓动委员会运用15台电传打字机,总共发送了

85

〔64〕 理赫特(在 *Agitation und Propaganda*, 219 - 221 中讨论了这些挑战。

〔65〕 大量例子中的一个,可参看 SAPMO, DY 30/vorl. SED 18300: *Information über den Erfahrungsaustausch (zur Leitung der Agitationsarbeit der Partei) auf dem Lehrgang mit den Sekretären für Agitation und*.

〔66〕 Oelßner, *Über die allseitige Verbesserung*, 8. 参看 GPA/oelsner.htm。

长达47米的电报。”〔67〕如果东德存在足够长时间以至于通过Email来沟通的话,想象一下会发生些什么,就让人头疼不已了。

总结

国家社会主义和东德都依靠普通公民来实行宣传。每一体系都面临相似的问题。它们不得不征募和培训大量的宣传员,保持他们的斗志,并且提供给他们情报与观点,而在这过程中,则不用向他们透露任何绝密内容或给予他们真正的权力。

让数量庞大的普通公民参与鼓动,不仅完成了各项工作,为更大的组织赢得了尊严,而且它还把普通的公民整合进了这一体系。除非他们愿意承认自己虚伪,而这是大多数人都不会情愿做的事,那么参与这一体系的构建让他们成为了它的同谋者。参与巩固了他们的态度,迫使他们至少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向其公民同胞展示其热情外表的舞台上。

86 两个体系努力的方向不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聚焦于通过群体形式争取大众。该党利用其成员争取大众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公众集会,虽然党员们被期望着实行面对面的宣传,而且确实存在一个发展良好的家庭密探体系。电影、戏剧和媒体也加以利用。尽管如此,当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想争取大众时,它也派遣演说家,并依靠一大群宣传员来组织和推动公众集会。

东德则更少依赖于公众演说家。不过德国统一社会党没有忽略口头语鼓动。它举行了大量的集会,但没有哪场像经过精心准备的纳粹演说体系。相反,它更主要地是依赖于面对面的和小组

〔67〕 SAPMO, DY 30/IV 2/9.02/92; Bezirksleitung Cottbus to Walter Ulbricht on 8 March 1961.

形式的鼓动。其目标是在每个工作单位和街区都配备鼓动员,在一对一基础上,利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信息来争取大众。其结果更像一个劳动密集型(more labor intensive)的体系。《我们的意志与方法》的发行量每月约12万份,约8000万人可阅读。《为什么与怎么样》的发行量为前者的4倍多,人口还不到上述的1/4。因此,二者流通的密度相差20倍左右。

较低层级宣传员迥然不同的数量导致不同的宣传风格。纳粹的大众集会 是激发大众热情的激情舞台。纳粹主义没有逃避理性的论辩,但是公众集会不是一个进行周密理性思考的恰当场所。东德对个体鼓动 的热情产生的更多是讨论而非演说。鼓动员需要根据他们与之对话的特定个体或小组的反应来调整策略。当然,他们也会由于需要遵循精心制定的党的路线而备感困扰,这导致他们对许多问题提供有说服力的答案变得困难了。

德国统一社会党进一步要求宣传员承担更多的义务。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像德国统一社会党那样完善的党的教育体系。前者的学校倾向于为宣传员开设简短的课程,而后者的党员则要上更长时间的课,要么通过函授,要么在党校。差异之处部分与各自体系的性质相关。纳粹主义对宣传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信念和激情才是关键,“领导原则”(Führerprinzip)命令下属要无条件服从其上司。德国统一社会党实际上要求的是几乎同样的服从,但是在理论上它将其要求建立于科学原则之上,甚至领导人也要为其政策提供复杂的理论论证。

比较各自对地方宣传员的要求的一种方式是比较两个体系发展出来的宣传计划。威悉河-伊姆斯大区(Gau Weser-Ems)的1942年3月宣传简报包含下一周的宣传计划。它简短地概括了会用到也需注意的重要宣传观点:“这些人需要知道的有关政治

87

事件的详情,他们能轻易地从报纸、广播和由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提供的资料中获知……并且首先是来自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的文章。〔68〕他们是否知道某一形势或政治事件的每一细节,这个并不是关键的,相反,他们必须表现出完全的信念,对德国人来说除了胜利其他替代选择皆无意义,一切都是为了它而来,因而首先,每个人都要求竭尽全力。”〔69〕宣传员并不被期望知道得比他们的公民同胞更多。相反,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展现信念。

比起这种傲慢的无知来,德国统一社会党所期待的就相当多了。我们考察一下萨克森州(Saxony)洛奇利茨县(Kreis Rochlitz)的1982年宣传计划。对于宣传员的信念,它只字未提,相反,它提供了数页详细的安排,以确保大众能领会其要旨。其中一部分处理争取工人的问题:

在与工会同志的合作中,有关我们政策之基本问题的讨论和谈话必须更加始终如一地进行下去……

同志们将会接受分派的特殊任务,与年轻的工人,尤其是青年团(*brigades*)里的那些人一道,讨论工人阶级的责任和党的角色及其重要性。其目标是为党争取到最佳入党候选人。

工人阶级的群众政治工作必须聚焦于如下问题:

- 社会主义与和平的统一。确保和平与消除战争危险——人类最重要的问题。
- 东德与社会主义的普遍巩固——保持前进步伐的最重要前提条件。

〔68〕可参考戈培尔每周在*Das Reich*中的文章。

〔69〕“Alles nur für den Sieg, der Sieg allein entscheidet!” *Monatsblätter der Gaupropagandaleitung Weser - Ems der NSDAP*, 7 no. 3 (1942): 19. 参看GPA/weserems.htm。

- 提高国家的生产率要求将提升劳动生产率、效率和质量作为工人大众首创精神的主要目标。
- 社会主义优越性与科学技术革命成果的密切联系。
- 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革命的基础。
- 为进一步完善东德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不断增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作用。〔70〕

这是一系列相当不同的期望。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宣传员被期望展现信念,但是这一信念是以坚实的知识为后盾的。

对两个体系来说,几十万的地方宣传员不同程度的勤勉工作在普通公民与党或国家之间建立了联系。他们有许多任务,但还经常听到他们只能做很少一点事情的抱怨,他们的工作充满挑战也很艰苦。他们的公民同胞也有相当正当的理由将其看成是体系的奴仆而不是真实信息或帮助的来源。然而,他们还是赋予了这一体系一个人性的和可接近的面目,没有他们,体系就不可能运转。他们在体系中对信念的公开表白作用于公民同胞也作用于自身。

88

〔70〕 *Plan der massenpolitischen Arbeit der Kreisparteiorganisation Rochlitz für das Jahr 1982* (Rochlitz: SED Kreisleitung Rochlitz, 1982). 参看 [GPA/rochlitz.htm](#)。

第五章 现实的地图

89

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Empress Catherine the Great) 的情人和顾问, 格里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波特金 (Grigory Aleksandrovich Potemkin) 在 1787 年遇到了一个问题。女皇打算去巡视一下倾注了她大量财力却只有有限成果的那个地区。在精心准备之后, 虽然波特金没有建立像图例中那般如实的波特金村, 但他为凯瑟琳呈现了一个成功的外观, 女皇在对其能力的信服中离开了。他是一个早期的宣传家。他的后继者, 利用现代媒体的资源, 已经超越了他的成就, 让整个国家都相信那些实际上并非如此的各种事情。

极权社会的媒体起着教义问答式的 (catechetical) 功能。它们的目标是对人们不能直接了解的内容进行有说服力的说明——超越他们日常生活的现实。它呈现出来的内容必须与统治的世界观保持一致。如果犹太人是坏的, 那么世界上任何地方犹太人的新闻都是糟糕的新闻。如果资本主义已经处于垂死的阶段, 那么呈现其成功的一面将是不合适的。如果新闻是作为真理的喉舌而服务, 那么那些能决定新闻是什么的人必定是那些据称知道真理本身的人。

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新闻媒体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研

究。〔1〕我不会从细节上去重复其他人已经做过的。相反,在考察两个体系之后,我将转向对运行中的体系的案例研究。

元首的媒体

国家社会主义是伴随着对大众媒体的角色有着清晰的观点而上台执政的:它们为国家政权服务。正如哈达莫夫斯基 1933 年所写的:“积极参与形塑公共舆论的德国知识分子不应该讨论自由,而应该是自我约束与责任。他们在精神上应该效忠的最高价值不是新闻媒体,而是以其能力和力量为之服务的国家。”〔2〕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应该由国家直接控制。理论上,纳粹党人赞成媒体的私人所有权,但实际上却是反对这一主张。

对于新闻媒体,他们的手段是最清楚的。虽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出版社被很快取缔,但是其他报纸拥有者还掌握所有权。因此,即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自己的报纸和杂志占据支配地位,这也使那些人多少得到些宽慰。该党的全国性日报,《民族观察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变成了创记录的一份报纸。它的

〔1〕 有关纳粹新闻工作的文献是丰富的。入门读物是 Norbert Frei 和 Johannes Schmitz, *Journalism im dritten Reich*, 2nd, ed. (Munich: C. H. Beck, 1989)。有关纳粹媒体内容的最优秀分析是 Herzstein, *The War That Hitler Won*; Baird, *The Mythical World*; 以及 Bramsted, *Goebbels and National Socialist Propaganda*。有关东德媒体的文献少很多不过还在增长中。Holzweißig 有关东德媒体的两本书是最好的入门读物, *Die Schärfste Waffe der Partei: Eire Mediengeschichte der DDR* (Cologne: Böhlau, 2002); *Zensur ohne Zensor*。用英语写作的对东德媒体体系的概括可参看 Simoone Barck, Christoph Classen, and Thomas Heimann, “The Fetered Media: Controlling Public Debate,” in *Dictatorship as Experience: Towards a Socio -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GDR*, ed. Konrad H. Jarausch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1999), 213 - 240。

〔2〕 Hadamovsky, *Propaganda und nationale Macht*, 100。

发行量从 1933 年的 13 万份一跃而升到 1940 年约 100 万份。当战争的进行迫使许多报纸消失时,该报纸的发行量却在 1944 年达到 170 万。〔3〕党的组织出版了各种报纸。戈培尔的日报《攻击》由德国劳工阵线(DAF)承担发行。纳粹党卫军(SS)则出版了《黑色军团》或《黑衫队》(*Das Schwarze Korps*),一份纳粹党卫军之外的人也在阅读的特色鲜明而龌龊的周刊。许多非党的机关刊物要么耗费过多难以为继,要么被纳粹的新闻出版体系所吸收。作为纳粹党的新闻媒体领导人,马克斯·阿曼到 1939 年已经控制了 2/3 的日报。〔4〕此外还有为男孩儿、女孩儿、妇女、教师和医生等开办的党刊。

既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迅速地建立了对报纸内容的全面控制,那么新闻媒体的所有权很少会导致多少实际的差异。新闻机构实行的是中央控制。所有那些依照法律参与新闻工作的人必须是帝国新闻协会(Reich Chamber of the Press)的成员。犹太人则不行;少量的人为特别针对犹太读者群的报纸服务。按照 1933 年 10 月 4 日的编辑法规,纳粹党人避免官方正式的新闻审查,这使编辑们依照法律对各自报纸的内容负责。他们成为了事实上的审查员。新闻工作者明白,即使很次要的错误都可能导致立即被解雇。有效的自我审查体系产生了。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采取合作态度以避免麻烦几乎没有新闻工作者不被纳粹强迫服从(比如,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仍按照自己的意志这样做了。〔5〕

91

新闻媒体收到巨细无遗的指导。戈培尔在 1933 年 3 月 15 日面对新闻工作者讲话时,清晰地表述了其目标,而此时正值他

〔3〕 Frei and Schmitz, *Journalismus im Dritten Reich*, 99.

〔4〕 Welch, *The Third Reich*, 36.

〔5〕 Frei and Schmitz, *Journalismus im Dritten Reich*, 122.

作为宣传部长执掌该部门两天之后：“很明显，你们应该在这里获取信息，但是你们也应该遵照自己的指示。你们不仅应该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也应知道政府正在想什么，并且知道如何最有效地向人们解释这些内容。我们想要一个愿同政府共事的新闻界，正如政府也想同新闻媒体合作一样。”〔6〕这不会是一个平等的伙伴关系。

宣传部每天举行新闻会议向主要的新闻工作者下达指示。〔7〕这些指示从琐碎的到关键的事态不一而足。下面是几个例子：

- “星期天柏林将会举行一场国际狗宝宝秀。鲁道斯·赫斯（Rudolf Heß）的妹妹，赫斯小姐的狗，不应获得特别的关注。”【1935年10月26日】
- “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可以用一种友善的方式来报道。”【1937年11月20日】
- “有关昨晚震惊帝国的事件【水晶之夜，或碎玻璃之夜 Kristalnacht】，贝考（Baeckow）解释了，各报纸可以增加今晨德国通讯社（Deutsches Nachrichtenbüro, DNB）对个别事件报道的例子，它涉及各处的窗户被打碎，犹太教堂被烧毁。他要求这些情况不应该过分渲染，首先不要出现在报纸头版头条。他也强调目前暂时不要刊发图片。也不应该有覆盖全国的一般解释。报纸可以很自然地提及发生了可理解的暴行，以及帝国其他地方民众的相应行动。”【1938

〔6〕 Welch, *The Third Reich*, 144.

〔7〕 例子可从以下著作获取，Joseph Wulf, *Presse und Funk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ntersloh: Sigbert Mohn, 1964), 90-110. 全面的版本可参见 Hans Bohrmann, ed., *NS - Presseanweisungen der Vorkriegszeit: Edition und Dokumentation*, 7 vols. (Munich: K. G. Saur, 1984-2001).

年 11 月 10 日】

弗雷和史密茨 (Frei and Schmitz) 估计类似指示的总量约在 8 万到 10 万之间。〔8〕出版的战前指示达到了 7 卷。既然会议期间官方禁止做记录,那么它是以暗地里所作的记录为基础的。〔9〕

现存的记录有时解释了新闻工作者如何做出反应。比如, 1939 年 2 月,卡巴莱表演 (cabaret) 艺术家维尔纳·芬克 (Werner Finck) 因过于擅长他的艺术而被惩罚。新闻工作者被指令为这一步骤喝彩。作为回应,他们得出结论,任何形式的讽刺作品都是危险的。三周之内,一个忠诚的讽刺作家写信给戈培尔抱怨无人敢出版他的作品。这进一步导致了对新闻工作者的更多指示。随后一个著名的广播评论员,汉斯·弗里茨彻 (Hans Fritzsche) 告诉新闻工作者:“一个国家应该期望文化编辑能有更多的骨气。”〔10〕然而,当然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到那时为止,已经让他们的脊梁弯曲了 6 年,也就不再剩下多少骨气了。还有一份秘密简报《工作杂志》(Zeitschriften - dienst) 送达各位编辑,内有好与坏的新闻写作的例子。〔11〕它斥责那些刊载政府反对的材料杂志,称赞那些树立了良好榜样的杂志。

92

广播新闻也是一个第三帝国面临竞争的领域。德语短波广播从各个途径争取德国人。战前的广播杂志甚至刊登国际广播的节假日表。虽然在战争开始时收听国外电台会被马上禁止(到战争末

〔8〕 Frei and Schmitz, *Journalismus im Dritten Reich*, 34.

〔9〕 Gabriele Toepser-Ziegert, *NS-Presssanweisungen der Vorkriegszeit: Eine Einführung in ihre Edition* (Munich: K. G. Saur, 1984), 13.

〔10〕 Bohrmann, *NS-Presssanweisungen*, 7:382, 399, 556, 624 - 625.

〔11〕 Robert G. Young, “‘Not This Way Please!’ Regulating the Press in Nazi Germany,” *Journalism Quarterly* 64 (1988): 787 - 792.

期,人们会因这一犯法行为而被处死),但这很难控制。〔12〕英国广播公司(BBC)估计,到1944年秋为止,超过1000万的德国人都在收听它的德语广播。虽然新闻广播员不能经常过于明显地表达他们正在对BBC做出回应,但这确实迫使德国广播不断做出回应。〔13〕

电视播放在柏林开始于1935年,汉堡开始于1941年。它的设备昂贵,节目编排也有限。解决办法是设立公共观看室。1939年柏林有10处。播放持续至1943年末,但是战争的开始终止了纳粹本应发现非常有价值的这一手段之发展。〔14〕

到1933年,新闻片(newsreels)已成为一个固定的制度。战争期间,新闻片大致在20-30分钟,在正片开始前放映。纳粹党意识到视觉影像的重要性,从一开始它就把实质性的精力投入到新闻片中。优秀的摄影师确保了极为真实的而不是看起来令人吃惊的长镜头。自此以来报道战争的宣传公司(propaganda companies)中就有几乎1000人被杀害或受伤,〔15〕在同意发行之前,戈培尔至少会把每一新闻片看两遍,一次无声,一次有声。〔16〕直到

〔12〕 Karl-Heinz Reuband, “‘Schwarzhören’ im Dritten Reich: Verbreitung, Erscheinungsformen und Kommunikationsmuster beim Umgang mit verbotenen Sendern,” in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vol. 41 (Bonn: J. H. W. Dietz Nachf., 2001), 245-262.

〔13〕 Hans Fritzsche 在纽伦堡审判期间对这一问题做了评论。参看 Hildegard Springer, ed., *Es sprach Hans Fritzsche* (Stuttgart: Thiel, 1949), 225-226。

〔14〕 参看 Uricchio, “Rituals of Reception,” and Heiko Zeutschner, *Die braune Mattschreibe: Fernseh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Rotbuch, 1995)。

〔15〕 Hilmar Hoffman, *The Triumph of Propaganda: Fil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5*, trans. John A. Broadwin and V. R. Berghahn (Providence, R. I.: Berghahn Books, 1996), 211.

〔16〕 Herzstein, *The War That Hitler Won*, 225.

斯大林格勒战役，希特勒都会检查新闻片，有时命令做一些修改。他们二人并非总是意见一致。戈培尔在他 1941 年 7 月的日记中提到：“元首想要在脚本中添加更多有争论的材料。而我则宁愿让这些图片自己说话，只有在不这样做观众就不能理解的地方，才需要脚本来解释。我认为这样更有效，因为如此一来，观众就不会从中看到艺术了。”〔17〕跨过艺术，戈培尔意指的是宣传。他确信，经合理选择的图片会引导观者得出合适的结论。观众相信看到的，比起语言来，他们很少可能去质疑影像。

93 新闻片的重要性通过纳粹投入其中的资源可见一斑。在 1930 年代，较小的剧院（付费更少）会在新闻片发行后数月内获得一份拷贝。战争期间，1600 份拷贝制作出来，在一个月内送至那些最小型的剧院。〔18〕

二战的新闻片和照片有巨大的影响力。〔19〕国内的士气报道经常提到新闻长镜头能激发什么，不能激发什么。海因茨·鲍伯拉赫（Heinz Boberach）坚持认为，唯有希特勒的演说拥有更大的公共影响力。〔20〕新闻片有清楚的宣传目的。战争一开始，它们就把德国塑造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随后又看成一座无法征服的堡垒。1945 年，片子主旨即是来对抗最后的或脸上的恐惧。比如，1945 年 3 月的新闻片充斥着正在入侵的俄罗斯人谋杀平民的恐怖场景。

〔17〕 Fröhlich,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9: 426.

〔18〕 Fritz Hippler, *Die Verstrickung: Einstellungen und Rückblenden von Fritz Hippler ehem. Reichsfilmintendant unter Joseph Goebbels*, 2nd ed. (Düsseldorf: MEHR WISSEN, 1982), 143.

〔19〕 对二战新闻片的最好探讨，参见 Herzstein, *The War That Hitler Won*, 223 - 258.

〔20〕 Boberach,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1: 27.

东德的媒体

东德体系就简单多了。媒体的私人所有权是被禁止的。除去宗教出版物外,所有的报纸和重要的杂志都由德国统一社会党,四个联盟党,或者如自由德国青年(FDJ)或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FDGB)这样的组织出版。〔21〕德国统一社会党出版主要的日报《新德国》,发行量约为100万份。专区党委也出版各自的日报。广播由国家垄断。电影则由国家所有的东德电影制片厂(DEFA)摄制。

正如在纳粹统治下一样,新闻媒体也受到严密的监管。面对一开始缺乏经过培训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的情形,德国统一社会党迅速采取行动,建立了一个值得信赖的核心构架。没人能在未证明其政治可靠性之前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它先后在1950年、1951年和1959年为新闻工作者组织特别会议,以使后者明白它的期望。位于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开设的新闻写作课程成为新闻工作者培训的主要内容。到了1967年,它的目的已很清楚,此时埃米尔·杜西斯卡(Emil Dusiska)成为其主管。他不是一个人训练有素的新闻工作者,而是来自于中央委员会。一个人的政治背景比其专业背景更为重要。一个学生回忆起他提醒一个想调查媒体作用的组织时的情形:“你知道,党并不希望你那样做。”〔22〕新闻媒体为党的利益服务。

不像纳粹时期,党和政府同时对新闻工作有影响,东德的权威方针则来源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鼓动部每周四举行新

〔21〕 联盟党是受到官方许可的,基督徒、农民和中间阶级的政党,它们遵循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路线,但是允许公民表达少量稍稍有些不同的观点。

〔22〕 Holzweißig, *Zensur ohne Zensor*, 129.

94 闻工作会议说明接下来处理问题的方式。指令是口头的,不准做记录,但是材料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鼓励了人们违反这一规则。〔23〕新闻出版训谕的两个例子揭示了它们的性质。

- 有关抵制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我们要求你们……避免做出任何声明或评论。直到有进一步的通知,否则,没有我们事先的许可,不能出版任何东西。不得私自行动!”
【1984 年 5 月 10 日】
- 有关 1984 年东德 35 周年纪念报道:“人民必须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建设者。以它应得的方式来表现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此期间,没人可以对他不喜欢的情况喋喋不休,比如马灿(Marzahn)【柏林郊外一个庞大的住宅发展工程】。抱怨者们不得不在过去搬运 40 年的煤,而现在热水直接从他们的水龙头流出来了。他们是这样一些人,对集体和个人取得的伟大成就没有任何概念。”
【1984 年 8 月 30 日】

联盟党的代表没有受邀参加周四的会议,但是收到了国家新闻办公室类似的指示。〔24〕鼓动部也给新闻工作者发出了大量书面指示和电报。

新闻工作者不仅要经过精心的挑选和培训,而且他们也明白错误会终结他们的职业生涯。哈勒专区一份倒霉的报纸报道了党的 KZ 而不是 ZK(即是说,集中营而非中央委员会)。经过大量调

〔23〕 参看 Ulrich Bürger, *Das sagen wir natürlich so nicht! Donnerstag - Argus bei Herrn Geggel* (Berlin: Dietz, 1990). 按照 Holzweißig 的观点,这是 Ulrich Ginolas 的一个笔名。其他例子存在于 Günter Schabowski 的文件中。参看 SAPMO, DY 30/IV 2/2.040/16。

〔24〕 相关例子,可参看 Holzweißig, *Die schärfste Waffe*, 243 - 246。

查之后,这些工作人员逃脱了在未来以种种指示对之详加解释的命运。〔25〕此外,还有大量类似的意外事件。

不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东德没有官方正式的审查。它不需要。埃里希·昂纳克宣称,“一种责任感”会指导东德的新闻工作者。〔26〕这些都是胡话。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在1984年的一次周四新闻工作会议上阐述得很清楚了。鼓动委员会的第二号人物克劳斯·拉德达茨(Klaus Raddatz)告诉与会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新闻工作者是根据自身自由意志加入的党的前线战士。没人是被迫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27〕这已经足够清楚了。考虑到在为报社撰稿和在工厂工作之间做出选择,新闻工作者会进行自我审查以维持其地位并避免不愉快的经历。

东德的广播电视播放由国家垄断。广播服务在第三帝国崩溃后迅速得以重建。东德有4个国家级电台和大量的地方电台。电视播放正式开始于1952年12月21日斯大林生日当天。直到1956年1月它都在试播,那时每天播放2小时12分。最初观众很少,但是到1960年,第100万台电视机获得了许可牌照,1968年则跃升至400万台了。〔28〕到1969年,只有一个频道,不久则增至两个。〔29〕

95

东德的广播和电视面临的挑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极为独特的。外国印刷媒体的泛滥被控制住了,但是整个国家都能收听西

〔25〕 Holzweißig, *Zensur ohne Zensor*, 99.

〔26〕 Reinhold Andert and Wolfgang Herzberg, *Der Sturz: Erich Honecker im Kreuzverhör*, 3rd ed. (Berlin: Aufbau, 1991), 325.

〔27〕 SAPMO, DY 30/IV 2/2.040/16.

〔28〕 Michael Meyen, “Ein Stück Privatleben: Die Anfänge des Fernsehens in der DDR,” *Deutschland Archiv* 33 (2000): 209.

〔29〕 由牵涉其中的人们写作的,对东德电视的某种有偏见的解释,可参看 Erich Selbmann, *DFF Aldershof: Wageübers Fernsehland: Zur Geschichte des DDR - Fernsehens* (Berlin: edition ost, 1998), and Helt, *Sendeschluß*.

德的广播,而且 80% 的人口在西方电视频率的发送范围内。国家雄心勃勃地尝试,意图阻止数年收听西德广播的习惯,尤其在 1961 年柏林墙建立之后。普遍采用的方式是让父母和孩子们一起发誓,不再接触西方的媒体。〔30〕在校的孩子们有时也被鼓励讨论他们在家所看到的节目内容,以此收集信息,用做反对父母的手段。自由德国青年群体的成员拆毁了指向西方的天线,但是既然许多人能通过室内和屋顶天线收看西方的电视,那么这只会产生有限的作用。〔31〕最后东德也放弃了类似努力。埃里希·昂纳克在 1973 年 5 月宣称,人民可以自由收看他们想看的内容,虽然公开谈论它们仍然会导致一些麻烦。这也产生了一种有意思的形势,东德的媒体有时会对西方的媒体做一些回应,它假定它们共同的受众已经看过或听过相关内容,尽管他们不清楚自己这样做的后果。

电视新闻受到了最严格的监管。既然人们不愿花时间看晚间新闻,国家就很少有动力来使它变得生动,这样一来,随着拥有优势的新传播媒介获得发展,新闻片消失了。不过,每晚新闻播报的计划需送到鼓动部,然后会收到带有直接指示的回复。指示有时在节目开始播放后才送达。直到 1989 年 10 月 6 日,昂纳克才做出最后的改变。〔32〕结果通常来说就是充斥着名字与头衔的长长清单的乏味播报。1989 年 2 月 1 日的“当代摄影”(Aktuelle Kamera)节目播送,其开篇故事就是一个典型:

〔30〕 一个例子,可参看“Lügensender am Pranger,” *Frau con Heute*, 29 September 1961, 7。

〔31〕 与西德遵照的 PAL 标准相比,东德则选择了 SECAM 电视系统。虽然很容易把一个变频器连接到一个 SECAM 接收器上,但是如此做的必要性也使收看西方电视变得困难了一些。

〔32〕 Selbmann, *DFP Aldershof*, 457。

- 为了迎接即将在 5 月举行的公共选举,7800 个民选机构 (elected bodies) 将回顾它们在 1984—1989 年间取得的成就。
- 德里奇县 (*Kreis Delitzsch*) 发展数据统计。
- 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州 (*Schleswig - Holstein*) 州长 (*minister president*) 访问东德。
- 东德教师齐聚一堂讨论本学年事务。
- 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Czechoslovakian Communist Party*) 领导人会议。
- 西柏林一所法庭判决禁止一名共产党员担任邮递员工作, 这违反了人权。
- 新纳粹团体在西德很活跃。

进一步的结果就是大多数的东德观众在观看西方的新闻。平均而言,国内报道发现只有 7% - 18% 的东德观众观看国内的新闻。〔33〕这些比例是绝密的,即便对那些参与制作东德节目的大多数人也是如此。表面的原因是防止他们迎合大众口味,但尴尬是更有可能的理由。〔34〕

96

新闻媒体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发挥作用? 回答此问题的一种方式考察纳粹党和东德的媒体如何回应一种危急形势——现实的官方图像与现实本身之间的一种悖逆。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例子中,案例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即战争形势发生转折的那一阶段。对东德来说,案例将是 1961 年 8 月柏林墙的修建。两个事件将前所

〔33〕 SAPMO, DY 30/IV 2/2.037. 16; E. Fensch to Joachim Hermann on 6 January 1982. 存在一些偶然的例外。当赫尔穆特·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总理在 1982 年访问东德时,由于东德的新闻工作者处于提供报道的更好位置上,观众达到了史无前例的 50%。

〔34〕 Selbmann, *DFP Aldershof*, 309.

未有的挑战呈现给了媒体。

战败中的胜利

正如戈培尔注意到的,当一个国家取胜时,开展宣传是容易的。战争的头两年是顺利的,在闪电行动中,它先后在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地国家和法国获得了胜利。德国最初对战争的无把握让位给了全国性的欢呼。甚至1941年6月的反苏运动一开始就进展不错,以至于8月份的公共舆论报告发现公民们正期望苏联人崩溃。德国的宣传犯过错误,但是它也为成功中的失误留有余地。

1941—1942年的冬天是一次打击,因为准备仓促的德国士兵本期望住在温暖的莫斯科住宅中,结果却遭遇霜冻灾害。1942年的春夏攻势恢复了乐观主义,但是德国的进展仍不充分。到1942年8月,德国人已经占领斯大林格勒地区的80%,而这个城市至少在宣传价值上与战略位置一样同等重要,但是该年11月中旬苏联的一场反击包围了约有33万人的22个师。希特勒拒绝同意撤退。自那时起,余下9万1千挨饿受冻的德国人在1943年1月31日投降,另有14万7千人不幸身亡。〔35〕这场灾难清楚表明德国可能要战败了。

斯大林格勒是一个挑战,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被预料到。战争总体而言进展不错。新闻报道也是乐观的。1942年10月和11月的每周新闻片播放了斯大林格勒的画面,显示这一城市几乎完全在德国人控制之下。帝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Supreme Command of Wehrmacht, OKW)出版的每日军事公报报道,直到11月,

97

〔35〕 有关斯大林格勒战役宣传的概述,可参看 Baird, *The Mythical World*, 175-190。

扫荡作战行动还在进行当中。〔36〕10月中旬,主要的周报《帝国》(*Das Reich*)中有一篇关于斯大林格勒的文章,得出结论说:“在斯大林格勒,苏军战线正摇摇欲坠。无边的废墟中,一个标志在燃烧着。强大的力量已遭到决定性的打击。”〔37〕希特勒差一点就声称斯大林格勒在德国控制之下,但是在11月8日向慕尼黑的老护卫队(*Old Guard*)讲话时,他宣称:“我想拿下它【斯大林格勒】——你们知道——我们是谦虚的,我们确实占领了它!只剩下几个非常小的地方等着夺下来。”〔38〕11月18日的新闻片也宣称,在这一城市,只剩下几个小的苏军阵地有待占领。随后一周的新闻片没有对迫近的胜利做任何声明,但是行进的德国军队的画面给碰巧的观者一个印象,德国军队仍在不断取得胜利。一般的德国公民有各种理由相信胜利正在临近,而且这也是志气报道找寻的东西。事实上,斯大林格勒的重要性对德国公众来说完全是不清楚的。到11月中旬,公众的注意力聚焦在没那么重要的北非前线,在那里同盟国已于11月8日实现登陆。人们认为俄罗斯时值冬季,事态已然平静下来了。〔39〕

戈培尔更加谨慎。在试图为总体战努力寻求支持时(也包括在此过程中增加他自己的权力),戈培尔想提醒德国人,战争可能会失败,而非仅仅以轻易宣称的胜利来宽慰他们,这就要求更加直率的报道。尽管如此,他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力是有限的。按照他一般的自我赞颂风格,他在1942年12月12日的日记开

〔36〕 有关斯大林格勒战役宣传的概述,可参看 Baird, *The Mythical World*, 177。

〔37〕 Willy Beer, “Das Schlacht um Stalingrad,” *Das Reich*, 18 October 1942, 4.

〔38〕 引自 Baird, *The Mythical World*, 177。

〔39〕 参看纳粹党卫军为1942年12月19日所作的报告,Boberach,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12: 4484。

头这样写道：“纳粹党卫军情报机构(SD)和帝国宣传办公室最近的报告呈递给了我。正如大区领袖的报告一样,它们对我们有关前线形势的新闻政策有非常尖锐的批评。我绝不认为这种明显的批评(fizzle)有何过错。我总是鼓励新闻应更坦率。”〔40〕即便戈培尔有他自己的方法,但斯大林格勒的情势处理起来已变得棘手了,而现在德国媒体被委派的困难任务是解释突然的、戏剧般的、未意料到的失败,这恰好是它们所一直预测的反面。这一任务无法逃脱。几十万的德国士兵不能毫无提及就消失了,报社也不能简单地阻止出版相关地图,它们展示的是贯穿斯大林格勒的德军作战路线。

98

首要的和最简单的战略是保持沉默。斯大林格勒几乎从媒体中消失了。报纸只是顺带提到它。1942年12月和1943年1月的新闻片把它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北非、德国潜艇战(U-boats)、法国南部的占领和纳粹盛会。也有来自俄罗斯前线的材料——但都避免提及斯大林格勒。观众们在12月2日的新闻片中看到的是一辆火车运送给养到列宁格勒前线(Leningrad 现为彼得堡)。1月27日的新闻片显示的是俄军被击退回几个地点。批准帝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每日公报最后草案的希特勒,一贯地去掉了任何提及斯大林格勒的内容。〔41〕新闻媒体接收到这一暗示,因而很少涉及此事。

沉默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信号,表明事态正往坏的方面发展。纳粹党不会掩盖胜利。12月7日的纳粹党卫军报告提及,一些人注意到了斯大林格勒在帝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公报中的缺席,从

〔40〕 Joseph Goebbels, *The Goebbels Diaries, 1942—1943*, trans. Louis P. Lochner (Garden City, N. J.: Doubleday, 1948), 239.

〔41〕 Baird, *The Mythical World*, 179.

而得出结论,形势是严重的,甚至德国军队很可能被包围了。〔42〕来自斯大林格勒的士兵的信件印证了这一信息,并迅速传播开来。但是在1月初,纳粹党卫军的报告发现,既然人们已经得出结论说,在临近的未来,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能发生,他们也只是瞥了一下标题而已。〔43〕甚至戈培尔也没有被完全告知。他在1943年1月5日的日记开头注意到,形势已经变得“有些令人苦恼了”,而事实上那时失败已经注定。直到1月22日他走访希特勒的司令部以后,他写道:“很显然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痛苦的事实,在斯大林格勒的22个师已全军覆没。”〔44〕

既然希特勒禁止撤退,德国人也缺乏打破包围的力量,宣传员们不得不解释这场军事灾难。沉默不可能作为长期战略。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它必然会被转化成一种胜利。1月16日的帝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公报首次承认,在斯大林格勒的军队正遭到全方位的攻击。1月22日,戈培尔劝说希特勒对这一形势提供一个更准确的解释。1月25日,帝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提到,拥有不朽荣誉的德国军队为他们英勇和充满牺牲精神的战斗赢得了尊敬。〔45〕这似乎澄清了形势。在一周内,纳粹党卫军报道,人们正开始疑惑的不是它要花多长时间赢得战争,而是德国能坚持多久而仍能赢得一个值得赞赏的和平。〔46〕纳粹夺取政权的10周年纪念日在1月30日来临。戈培尔和戈林做了主要的演讲,戈培尔还宣读了希特勒的声明,但是无一给予斯大林格勒以主要的关注。第2天,斯大林格勒残余的德国军队投降了。

〔42〕 Boberach,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12:4537.

〔43〕 同上, 12: 4630.

〔44〕 Joseph Goebbels, *Joseph Goebbels Tagebücher*, 5:1879. 戈培尔缺乏定期接触希特勒的机会是其不断抱怨的一个来源。

〔45〕 Baird, *The Mythical World*, 182.

〔46〕 Boberach,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12:4761.

在他2月4日的日记开头,戈培尔记录下了给公众的通告:“我们不得不告知德国人民斯大林格勒丢掉了。这是痛苦的,但也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在4日下午以特殊通告的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而且是以一种合适的英雄般的形式。我和元首个人确定了所有的细节,他完全同意我的建议。”〔47〕戈培尔还命令剧院和其他娱乐场所必须关闭到下周六。

每日新闻指示概括了新闻媒体在向公众通告这一失利时应采取的方针:

英雄般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结束了。在为之哀悼的几天中,德国人民将会把荣誉给予他们勇敢的儿子,这些人尽职尽责直到最后一口气最后一颗子弹,结果是他们攻破了布尔什维克对我们的东方前线发动攻击的后方(back)。斯大林格勒的英勇战争将成为德国历史上所有英雄史诗中最伟大的一次壮举。眼下,德国新闻媒体也会履行它最伟大任务中的一项。按照今天随后要发布的帝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特别公报的精神,新闻媒体必须报道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它会让过往历史中每一项英雄主义的功绩都黯然失色,它的这一重要性表明,这种英雄主义的崇高范例,这种为了德国最终胜利的彻底的、自我献身的精神将如神圣的火焰般照亮前行之路。德意志民族,受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士兵不朽的英雄主义所激励,将会比以往更高贵地宣称,那些保证民族胜利的精神的、身体的品质,在此刻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热烈地注定了胜利的前景。〔48〕

〔47〕 Joseph Goebbels, *Joseph Goebbels Tagebücher*, 5:1890.

〔48〕 引自 Baird, *The Mythical World*, 184.

既然纳粹的世界观很难允许被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力量所击败，那么媒体则要把这场真实的失败转化成一場神话般的胜利。

新闻报道突然充斥着遵照这些指示的叙述。斯大林格勒战役被看成是一次压制苏军的不可避免的牺牲，而其他战区则因此得到了巩固。故意忽略幸存的德国士兵以及大量将军已经投降的事实，媒体首先表明德国军队已经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考虑到俄罗斯人正在用德语广播幸存者的名字（收听它是违法的），这证明它是令人尴尬的。关于那些下落不明的人的一篇最有力的文章发表在2月中旬的《帝国》上。戈培尔亲密的助手之一，汉斯·施瓦茨·凡·博克（Hans Schwarz van Berk）谴责苏联用战俘来为宣传目的服务，同时告诉德国人，正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步骤来确定一个准确的伤亡者清单，并向他们保证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牺牲是值得的。〔49〕

有关斯大林格勒的宣传中最难忘的部分是戈培尔在1943年2月18日作的“总体战”演说。他主张，为了服务于战争的努力，德国全部的经济和人力资源都应该置于控制之下，而希特勒基于士气的原因为并不情愿这样做。他组织了一次引人瞩目的媒体事件，目标是说服希特勒和德国公众，需要采取果断的行动。

场地选在柏林体育场（Berlin Sport Palace），许多纳粹集会举办之地。戈培尔召集了约1.4万精心挑选的听众，他宣称他们是帝国的代表。这包括党、军队、政府、艺术、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领袖，也有受伤的退役军人、工人和妇女。惯常的旗帜和横幅悬挂在听众上方（比如，“总体战是最短的战斗”）。广播两次播发这一演说，报纸全文印行。摄影师也在那儿。2月24日的新闻片以5分

100

〔49〕 Hans Schwarz van Berk, “Die offenen Verlustlisten,” *Das Reich*, 14 February 1943, 3. 文本在 GPA/dr03.htm. 纳粹党卫军的报告发现这篇文章是受人欢迎的。

半钟的演说开场。

演说开头,戈培尔宣称他打算坦率地讲话:“我想发自内心向你们所有人讲话,希望能唤起你们内心深处的共鸣。我相信所有德国人必定对我今晚讨论的内容有强烈的兴趣。因而,我将严肃而又坦率地讲话,正如下一小时会表明的。在国家社会主义中成长、受教育和受约束的德国人能接受这一真理。他们知道形势的严峻性,因而他们的领导人要求采取必要的严厉措施,甚至是最严厉的措施。”〔50〕他正在寻求重建公众的信任,为把经济转化成战争的基础而激发热忱。

演说在戈培尔有关总体战的10个著名问题中达到顶点。虔诚的群众如戈培尔所希望的以激情来回应,而由此产生的新闻片长镜头是非常壮观的,但是或许它也过于明显了。正如纳粹党卫军报告提到的:“演说的最后一部分产生了复杂的反应。10个问题的力量普遍得到了承认,但是所有组织的公民与党员同志注意到,这些问题的宣传意图,以及听者与读者的答案都太显而易见了。”〔51〕

回想起这些失利很难令人愉快,一旦德国公众有时间调整自己以适应斯大林格勒战役,这场战斗几乎就从媒体中消失了。希特勒没有在3月21日英雄纪念日那天的演说中直接涉及此事,此时有人应该会认为,提及“这个德国历史上所有的英雄史诗中最伟大的一次壮举”本应是妥当的。戈培尔在1943年6月5日做了一场重要的演说,开头却是这句“冬季危机已经结束”。这场演说没有提及斯大林格勒。相反,它聚焦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犹太人

〔50〕 印刷文本,没有完全遵照口述版本,收于 Joseph Goebbels, *Der steile Aufstieg: Red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42/43* (Munich: Franz Eher, 1944), 167-204. 有关印刷文本的译文参看 GPA/goeb36.htm。

〔51〕 Boberach,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12: 4831.

的罪恶,总体战的需要和潜艇战的前景。〔52〕随着战争的进行,以及德国军队后撤的里程越来越大,斯大林格勒争取时间巩固德国防线的观点失去了它的有效性。斯大林格勒的记忆变得令人尴尬,而令人尴尬之事自然无需回忆起来。

反法西斯主义保护墙

柏林墙不可避免地建立起来了。在 1945 到 1961 年间,约有 270 万东德人离开。1960 年有 199 180 人离开,紧接着是到 1961 年 8 月 13 日柏林墙开始修建当天,则有 155 042 人离开。离开的人半数在 25 岁以下。无论从经济的还是宣传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场灾难。当一个国家无法确定劳动力意味着什么时,它很难运行一个计划经济,但是要去解释为何“更好的德国”(Better Germany)正在使公民流失,包括那些它几乎不能承担失去代价的年轻而又受过训练的公民,无论如何令人为难。

101

这一体系不是生产性的,公民们则很困苦。商店甚至缺少基本必需品,而且很少看到改善的前景。正如 1961 年 5 月底来自德雷斯頓市(Dresden)的一份有代表性的党内报告所言:“一个人根本不能谈及乐观的情绪。情绪是沮丧的、悲观的。主要的问题是,人们不能理解为何大多数生活基本品都无法获得。各种意见从怀疑、不理解和不满意到嘲讽,敌意的声明,甚至还有几个罢工威胁的例子。真正正确的观点也不再有人相信……我们的党员陷入了困惑。同志们找不到有说服力的方法来解释重要的短缺问题。”〔53〕党内士

〔52〕 这一讲话的文本可在 Goebbels, *Der Stile Aufstieg*, 287 - 306 中获取,译文参看 GPA/goeb40. htm。

〔53〕 SAPMO, DY 30/IV 2/9. 02/95: Informationsbericht über Lage und Stimmung in Bezirk Dresden (1961), 90 - 93.

气低沉。7月底的一份报告发现,24%的基层党组在6月份无法举行每月必须的党员会议。”〔54〕党员们不知道做或说什么。他们的日常经验同他们的世界观所承诺的存在太重大的冲突。

在为柏林墙建设作铺垫的数周内,媒体则聚焦于一场同等重要的运动,意图劝诫东德公民,西德正试图通过恶毒的手段引诱他们去西方。《新德国》上的典型标题揭示了宣传路线:

- 工人追击东德敌人:非法越界的法西斯主义分子【8月5日】
- 非法越境者生产军用物资(一位在西方国家工作的东德公民因其活动受审)【8月5日】
- 对(来自西方的)婴儿绑票者实施逮捕(warrant)【8月11日】
- 工人向东德人民议院(Volkskammer)呼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人民【8月11日】

余下的新闻媒体也反映了这一路线。

102 德国统一社会党哈勒专区鼓动部在7月底概括了鼓动员运用的论证。它声称许多人被西德的资本家所引诱,这些人在二战期间同样利用犹太人和纳粹党卫军监禁的犯人在其工厂做苦役。这些可怜的受害者面对可怕的命运:

那些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变者过去疯狂地相信呆在波恩

〔54〕 SAPMO, DY 30/IV 2/9. 02/18: Bericht über die bisherige Durchführung des Politbürobeschlusses vom 13. 6. 61 und die Vorbereitung der Wahlen zu den Gemeindevertretungen und Kreistagen entsprechend den Beschluß des Politbüros von 20. 6. 1961, 148.

(*Bonn*) 军事国家,生活将会是充满安乐 (*a bed of roses*),而现在则沦为外籍军团 (*Foreign Legion*) 征兵员和皮条客的受害者。这已经被以下事实所证明,大量离开东德背叛祖国的年轻人,已经发现他们在外籍军团服役,实际上是在为阿尔及利亚 (*Algeria*) 的法国人与西德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流血。其他年轻人则被迫加入波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军队,在那里,他们训练的目的是把枪口对准他们在东德的父母,兄弟与姐妹。

在东德,为了她们的未来着想而进行过可靠工作培训的许多年轻女孩,在她们背叛祖国之后,沦为可怕的奴隶贸易的受害者。

现在她们住在西德的妓院,把她们的生命浪费在取悦和满足美国占领军上,或者她们必须将其身体暴露在肥胖的资本家和花花公子们贪婪的目光注视之下。这就是称赞有加的“自由世界”,它采用流氓的方法来误导人们,或强使他们以违法的方式背叛他们的祖国然后陷入悲惨的境地。许多人已经对他们愚蠢的行为表示后悔,并从西方世界回来了,虽然伤病已痊愈但仍感觉不光彩。其他一些人还犹豫不决,因而在西方世界的泥淖中越陷越深。〔55〕

大量类似的资料得以出版、播发或由鼓动员传播开去。

东德领导人意识到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但是柏林令人头疼的法律地位使它采取独立的行动变得不可能。即使东德早在1952年就提议建立一座墙(苏联否决了这一提议),但沃尔特·乌布利希在1961年6月15日的一次国际新闻会议上回答问题时仍

〔55〕 SAPMO, DY 30/IV 2/9.02/159: Argumentation 46: Menschenhandel und Kopfrömien in Westberlin! (1961).

声称没人有在柏林建立一座隔离墙的意图。〔56〕考虑到他在 1961 年 3 月一次华沙条约组织 (Warsaw Pact) 会议上已经建议关闭边界来往,那么他事实上在撒谎。但是他的提议首先被婉拒了。5 个月之后,在 8 月 5 日的莫斯科共产党领导人会议上,他赢得了赞同。

1961 年柏林墙的建立和 1989 年的倒塌让每个人都很意外。一旦它矗立在此,它就能证明其正当。明显的结论是,东德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可以留住其公民。这样的结论是无法接受的。东德媒体开启了一场同等重要的运动以劝服公民们相信,柏林墙乃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103 《新德国》在 1961 年 8 月 14 日定下了基调。现在秩序与透明性 (clarity) 获得了胜利。孩子们被保护着免遭绑票者威胁,家庭则免受那些试图引诱其成员之人的诱导,而工厂免受来自西方的猎头 (headhunters) 的侵扰。敌人被意外抓住了,东德公民们欢欣鼓舞。东德公民的大量陈述声称他们满足于东德最终还是安全的。〔57〕

媒体为不同的读者度身定制信息。供自由德国青年的领导人阅读的杂志,《年轻一代》(Junge Generation) 写道:“一场重要的打击已经发起了。1961 年 8 月 13 日将会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作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而名垂史册。我们在这一天的胜利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在德国和世界上对每个年轻人来说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自我膨胀的布兰特 (Brandt) 和他暴虐的、冲锋在前的城市恶棍受到了工人们拳头和武器对其肮脏之手的沉重打击。”〔58〕

〔56〕 Herbst, Stephan, and Winkler, *Die SED*, 57.

〔57〕 *Neues Deutschland*, 14 August 1961, 1.

〔58〕 *Junge Generation*, 16, 1961, 1.

儿童杂志《鼓》(*Trommel*) 在柏林墙建立后的第一期中,刊登了一幅守护战车(watching tanks)的快乐男孩儿女孩儿的照片。配的文章这样写道:“8月13日这天,他们离开工作台和绘图桌沿着柏林的西部防区承担保卫和平的工作。这些年轻的战士,工人与农民的儿子,开着战车来到柏林,以此向好战者和麻烦制造者显示我们爱好和平的国家的铁拳。西柏林间谍的藏身之处没有费一枪一弹就被封锁了。同志们,因为这一行动,我们感激你们。你们已经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

妇女杂志《今日女性》(*Frau von Heute*)引用了一个医生的话:“我认为我们政府的行动是值得赞许的。西柏林的挑衅已经停止,生活再次回归正常。我们的医生护士乐观而高兴地看到,我们的国家最终结束了人的交易和儿童绑票。劝诱我们真正需要的医生和护士离开的企图已经停止。生活变得更舒适了,尤其对我们妇女而言更是如此……我们政府的行动是对和平的贡献。”〔59〕

幽默和讽刺周刊《捣蛋鬼》(*Eulenspiegel*)采取了一种嘲讽的笔调。柏林墙建立后第一期刊登了一篇名为“一句非常坦率的话:给站在满满手提箱旁边的一个人”(A Very Open Word to One Standing Next to His Packed Suitcase)。建议是简单的:打开它把东西取出来吧(unpack)。西方的“自由”是一个怪物:

自由是可以自由地用桌边电话打给在奥格斯堡大街(Augsburg)巴黎宫舞厅(Palais de Paris dance hall)的优雅的(Anita)应召女郎,在她已完成“色情皮影戏”(erotic shadow play)时。自由是有能力作为一个货币骗子在货币兑换商那儿做一些小手脚(make a little thing)。自由是有能力阅读垃

〔59〕 “Der Frieden ist starker geworden,” *Frau von Heute*, 25 August 1961, 2.

圾报纸,里面只有痛苦的内容和不能告诉你8月13日就将到来的占星术。你会对自己就像一头愚蠢的公牛一样感到诧异。自由是野蛮的西方电影,在那里你会一点点地失去人性中最后一点残余。自由是成为下流之人的可悲自由。

现在你必须停止做一个下流之人,再次变成一个体面的有尊严之人。你将不得不诚实挣钱,理性花钱。这真的如此糟糕吗?

那么,打开手提箱把东西取出来吧。这里需要你,你也有自由,它会让这里值得你生活与工作,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所有人才能生存下来繁荣下去。〔60〕

每一份重要的报纸或杂志,都以一种适合读者的方式,把柏林墙看成是保卫和平的一个步骤,因而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欢迎。通过命名为“反法西斯主义保护墙”,它被描绘为一场胜利,而不是失败。

斯大林格勒相对来说很快就从德国媒体中消失,而柏林墙则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隐隐约约的存在。贯穿于东德余下的历史,媒体一直把柏林墙作为一项重大的成就。在第一个周年纪念日,苏联的太空飞行抢走了它的部分光彩,不过《新德国》仍然写道:“一年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建来用以反对侵略者的保护墙业已证明它是牢固的,它保卫了和平……我们的国家是稳定、强大、攻不破的,波恩的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s)甚至不会在他们的北约伙伴中找到任何人愿在危急行动中支持他们。”〔61〕同样的基本方针执行到1989年,那时埃里希·昂纳克做出了他那著名的论断,即柏林墙可能会一直存在50或100年。

〔60〕 *Eulenspiegel*, 34/1961, 2.

〔61〕 “Zum 13 August,” *Neues Deutschland*, 13 August 1962, 1.

总结

迈克尔·巴尔弗(Michael Balfour)有关纳粹新闻媒体的说法,对于东德的新闻媒体以及总体而言两个体系的媒体来说同样是正确的:“党在两个体系中收获的是最糟糕的。它们没能掌控想掌控的新闻媒体,而又不喜欢已掌控的。”〔62〕戈培尔在1943年写道:“任何在其骨子里对荣誉保持一定敏感性的正派新闻工作者完全不能忍受帝国政府新闻部门对待他的方式。新闻工作者被训斥,就像他们还在小学里一样。自然地,这会对新闻工作的前景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任何还有一点儿残存荣誉感的人将会非常谨慎地不要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63〕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约阿希姆·赫尔曼,在1978年后掌管新闻媒体,1987年告诉其下属:“我们不得不摆脱媒体的统一性。它不应该让人看起来似乎一切都是中央控制。或者至少,无人有能力注意到是这样。”〔64〕对公民而言,要不注意到统一的新闻体系是困难的。1989年后,一位东德的新闻工作者描述了这一职业随之产生的相当低的自我认同:“我们没有地位,不管是在人民中间,还是在党的机构中……我们被整个党的机构看成是笔墨仆人/操刀代笔者(ink lackeys),有人会给予他们命令的人。我们没有被认真对待。人民说我们是国家的宫廷弄臣/小丑(court fool)。”〔65〕

105

〔62〕 Balfour, *Propaganda in War*, 34 - 35.

〔63〕 Goebbels, *The Goebbels Diaries*, 327.

〔64〕 Günter Simon, *Tischzeiten; Aus den Notizen eines Chefredakteurs 1981 bis 1989* (Berlin: Tribüne, 1990), 92 - 93.

〔65〕 Roland Reck, *Wasserträger des Regimes; Rolle und Selbstverständnis von DDR-Journalisten vor und nach der Wende, 1989/90* (Münster: Lit, 1996), 158.

尽管甚至在体系内有频繁的抱怨,但是对此形势却无能为力。既然两个体系一开始就假定领导人拥有真理,都担心它们的真理建立在不牢固的基础之上,那么新闻工作者就不被允许行使许多他们惯常的职责。他们被严格限制着去发掘创造性的方式来讲述他们被告知要向公众说明的事情。

两个体系都建立了格外相似的媒体体系。它们在外在结构上存在着诸多差异。纳粹的媒体主要由国家监管,而东德媒体则由党来监管。纳粹体系比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体系更令人费解。支撑两体系的意识形态各自宣称具有重大差别的目标,但是其结果大体是相似的。

两个体系明确要求新闻工作者无论如何都要支持国家的世界观。为了确保忠诚于各自党的路线,它们为主要的新闻工作者建立了每日会议制度。随后它们禁止在会上做记录,显示出对以某种方式隐瞒控制手段的特有迷恋,这使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处境更艰难。不过在两个体系中,下达的指示的重要性还是导致一些新闻工作者违反训谕做记录。

新闻工作者很快认识到,即使一个很微小的过失也可能导致困境,甚至是丢掉工作。他们不必每天被国家告知这一危险。两个时代新闻工作者的回忆录清楚地表明,那些本可能发表的报道被同事们温和提醒其危险之处的建议挡回去了。这些同过去的相似之处对东德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再明显不过了,他们背地里称呼掌管新闻媒体的德国统一社会党鼓动部官员海因茨·吉格为“吉格博士”(Dr. Geggels,一个明显的与戈培尔的类比)。

两个体系竭尽全力以建立一种新的新闻伦理(ethos)。“新闻工作者”这一词本身恰好是令人起疑的。1938年的纳粹党卫军周刊中有一篇文章提到“我们反对和打败的那种人,过去时代的三流作家,他称呼自己为新闻工作者。”接着是一种毫无恭维之意的描绘:“新闻工作者是一种待售的动物(a creature for sale)。一个

人从前门将其赶走,只为了让他从后门再爬进来。新闻工作者是社会的渣滓,今天说一套明天又是另一套。他依赖于感觉和轻率、欺骗、撒谎、无良知以及空洞的言辞。”〔66〕纳粹更喜欢的代表新闻工作者的术语是报纸编辑(Schriftleiter),即一名新闻记者以国家社会主义的视角而非自称的客观立场从事写作,以此引导公共舆论。东德沿用了“新闻工作者”这一术语,但是有各种限定。1969年,东德劳工组织领导人哈瑞·蒂希(Harry Tisch)在一封信中对一位自认有某种独立性的新闻记者抱怨说:“弗希(Fotsch)同志相信他能超越其工厂新闻编辑的角色,像你一样可以‘独立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而行动,这一身份不受制于党的书记或国家领导人。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而不是党工。”〔67〕两个体系中的新闻工作者成为统治意识形态的有意识的工具/代理人——一个福音传播者。

发生错误的危险使正式的新闻审查变得不必要。纳粹和东德都没有新闻审查(虽然二战期间存在军事审查报告)。它们不需要。新闻指示的复杂体系、新闻工作者的精心挑选、党的参与和惩罚的威胁提供了多样的方式迫使媒体依照方针行事。两个体系中大多数的新闻工作者为避免麻烦采取合作态度从而做出了可理解的决定。

一个人可能会认为,结果会是一个绝对难以令人置信的新闻体系。事实上,大量证据表明两个体系中的公民并不相信新闻媒体。纳粹党卫军的报道频繁提及公众对媒体的不信任。东德的民众关注西德的电子媒体。然而新闻媒体仍有相当大的劝说性权力。读报人数在纳粹统治下是较高的。当第三帝国末期纸张短缺

〔66〕 “Nie wieder Journalisten!” *Das Schwarze Korps*, 3 March 1938, 6.

〔67〕 SAPMO, DY 30/IV A2/9.02/39; Harry Tisch to Werner Lamberz on 5. 6. 1969.

迫使报纸缩小时,有人建议隔天出版报纸。因意识到对信息的迫切需求和防范谣言的危险,这一建议被否决了,报纸仍是每日出版直到末日临近。〔68〕在东德,尽管许多报纸的内容不是一般的乏味,但是发行量仍很高。到1989年,39份日报的总发行量在900万份。鉴于总人口少于1700万,平均每户家庭会收到2份报纸。人们仍然需要信息,以及对他们相信的东西的确证(尽管是微弱的)。

107

雅克·埃吕尔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现代宣传只会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即这些条件导致受过教育之人比未受教育之人更怀疑它的各种主张。受过教育之人期望被告知各种事件,但是不能直接获得这方面信息。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二手的观点,这些都从媒体获取。这些材料的数量是如此庞大以至于那些声称具有批判精神的读者除了接受他们所读到的大多数内容外,别无其他选择。他们可能是充满怀疑的,但是又很难确证其怀疑。〔69〕很少有人能怀疑一切。两个体系的公民面对的是很难不同意的全面的媒体体系。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例子中不存在与之竞争的信息,在东德的例子中只有有限的信息(西德的电子媒体)。要让公民们去详细分析他们接受到的信息洪流简直是不可行的。

两个体系的新闻媒体在维持稳定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提出人们完全不会相信的关于世界的观点,但是它们那无法逃避的存在,它们的总体性(totality)仍然操纵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态度。它们提供的现实图像是有缺陷的,但是糟糕的图像总比没有好。至少读报者拥有某些信息、某些手段来理解这个世界的意义。

〔68〕 参看1945年1月24日的宣传部活动报告,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series T-580, roll 1037, frame 6500428。

〔69〕 Ellul, *Propaganda*, 102-117.

第六章 文艺与娱乐

109

人们出于一种可理解的期待关心新闻,希望它有助于理解周遭世界的意义,不管它如何被宣传所影响。大众文化就不同了。它们的流行要受到口味、风格与个人偏好的影响。此外,还存在大众文化之外其他休闲方式的选择。第三帝国和东德都明白,密集的宣传产生了不受人欢迎的广播、电影、电视和文学。因此两个体系寻求在不疏远受众的前提下多方位运用文艺来为宣传服务。

希特勒的文艺政策

“没有哪个民族会比它的文化体现(evidence)存在得更长久”,希特勒在1935年的纽伦堡集会上如此宣称。〔1〕无论是在艺术或建筑,电影或广播,还是文学或音乐中,纳粹党对文艺应该是什么有自己的观点,如果并非总是很清晰的话。〔2〕正如《民族观察报》在1935年写的:“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判定一件文艺作

〔1〕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2: 695.

〔2〕 有关纳粹文艺政策的一个出色研究,参看 Jonathan Petropoulos, *Art as Politics in the Third Reich*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5)。

品的唯一可能标准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观。只有党和国家有权利界定与国家社会主义文化观相一致的标准。”〔3〕

110 事实证明界定好文艺比好新闻更难。纳粹党人做了足够的努力。他们设立了文学和艺术奖。他们提出了一份党所许可的文学作品清单。他们举办各种重要的展览,同时涵盖获得赞赏的与该受谴责的艺术(而后者比前者抽到的机会更多)。

1937年慕尼黑举办的著名的“堕落艺术展”(Exhibit of Degenerate Art)清楚地显示了纳粹主义的手段。这次展览把像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奥托·迪克斯(Otto Dix),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恩斯特·基尔希纳(Ernst Kirchner),鲍尔·科里(Paul Klee),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和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等艺术家的作品摆放在一个不起眼的、拥挤的和混乱的环境中。这一展览的信息是,纳粹主义已经让德国人免受了赞美堕落与丑陋而非高雅与美丽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艺术的影响。〔4〕因而,到现在,许多德国人会发现众多现代艺术作品是无吸引力或不好理解的。即便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前,大众就已经对现代艺术发动攻击,因此纳粹主义能够把它自己看成是德国传统文化的保卫者。

为了强化这一观点,党的出版社出版了一份精美的杂志,《第三帝国的艺术》(*Die Kunst im Dritten Reich*, 1939年9月后更名为《德意志帝国的艺术》)。它有两个版本。A版聚焦于绘画和雕

〔3〕 引自 Igor Golomstock, *Totalitarian Art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Third Reich, Fascist Ital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rans. Robert Chandler (New York: IconEditions, 1990), 97。

〔4〕 有关这一展览,包括许多被人搞臭了的艺术的仿制品,对它们的全面论述,参看 Stephanie 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91)。

塑。B版包括A版的所有内容,但是还增加了有关建筑的资料。〔5〕纳粹领导人,尤其是希特勒、戈培尔和罗森博格经常就艺术发表讲话。希特勒把他自己看成是一个本应更喜欢艺术生涯的几乎很不情愿的政治家。

建筑是希特勒特别喜欢的一项消遣(pastime)。他有坚定的观点和对细节极其敏感的大脑。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没有什么能比同他喜欢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讨论建筑规划让他更放松的了。他的这种激情超越了纯粹个人的喜好。他知道纪念碑的劝服性权力。在《我的奋斗》中,他写道:“我们的大城市没有高耸于城市风景中的纪念碑,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被看成是整个时代的象征。几乎每个国家都拥有一座特殊的引以为傲的纪念碑,而这在古代城市中是真实存在的。古代城市特有的方面不在于私人的建筑,而在于那些不是为当下而是为永恒所建造的公共纪念建筑。”〔6〕古代伟大的建筑具有宗教性质,它为永恒而不是当下所建,确切地说不是为像希特勒所制造的当下而建。

阿尔伯特·施佩尔讨论了希特勒希望建立让未来数代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的问题,受此激励,他在1934年提出一个有关建筑的“残垣价值”(ruin value)的视角。施佩尔画出了千年帝国消亡后纳粹建筑看起来会是怎样的草图。希特勒的随从对此感到不安,而希特勒认为这一观念是令人满意的。〔7〕纽伦堡集会场所、柏林新帝国总理府(Reich Chancellery)以及许多其他建筑设计出来向后代证明第三帝国的伟大。一位重要的纳粹作家汉斯·乔斯特

111

〔5〕有关这一杂志的更多信息,参看 Otto Thomae, *Die Propaganda - Maschinerie: Bildende Kunst und öffentlichkeitsarbeit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Gebr. Mann, 1978), 201 - 209。

〔6〕Hitler, *Mein Kampf*, 264.

〔7〕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trans. Richard Winston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56.

(Hans Johst)做了一个明显的宗教类比：“第三帝国的建筑是对这种铭刻在石头与钢筋、混凝土与铁之中的世俗信仰的回答！”〔8〕他在对弗里兹·托特(Fritz Todt)的赞颂中做了一个类似的宗教类比,此人曾负责建造高速公路系统：“我把弗里兹·托特称为我们高速公路史上的马丁·路德。他抓住了高速公路的议题然后把它带到了帝国的大门口。”〔9〕

希特勒并不因建筑(或任何其他艺术)本身的目的而对其感兴趣。他想改造主要的德国城市正如他想改造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他所计划的新柏林有宽敞的大道、宏伟的大厦与伟大的广场。人们来到他的柏林,就像朝圣者去往罗马,在这个帝国的首都城市顿时变得敬畏与渺小起来。他的建筑就是世俗帝国中的世俗神殿。

文学是纳粹最不喜欢的文艺体裁。希特勒阅读广泛,但是比起歌德(Goethe)来更喜欢卡尔·迈(Karl May,一个通俗作家,许多冒险故事的场景设置在美国西部)。一如既往,纳粹党人发展了各种复杂与冲突的部门来处理文学事务(比如,在妇女组织,种族政策事务部与希特勒青年团中),而且控制是严格的。在一些杰出的作家离开这个国家之后,留下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写一些让他们避免麻烦的作品。〔10〕存在大量带有强烈宣传意味的小说,它们设法讲述一个会受欢迎的足够好的故事。一个例子是1934年的小说《党员施米德克》(*Parteigenosse Schmiedecke*),故事讲述一个男人在1933年前因为党员身份而丢失了工作。1933年后,他重获工作但又再次失去,因为他诚挚的国家社会主义行为使他陷

〔8〕 Hanns Johst, *Ruf des Reiches-Echo des Volkes!* (Munich: Franz Eher, 1940), 80.

〔9〕 Hanns Johst, *Requiem* (Munich: Franz Eher, 1943), 13.

〔10〕 有关纳粹文学政策的概况,可参看 Jan - Pieter Barbian, “Literary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 in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 ed. Glenn R. Cuomo* (New York: St. Martin's 1995), 121 - 154.

入了与那些还未接受新秩序的人的冲突之中。最后,他的那些踟蹰不决的和坚定的同志帮助了他,他再次获得工作。〔11〕存在大量类似的小说,但是很少有销量不错的。

戏剧运用口头语,比起书面语,纳粹更喜欢前者。为了显示他们对文化的热情,相当多的资源投入到戏剧之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对戏剧史的贡献是 Thingspiel,它涉及在露天剧场表演的庞大合唱团,其中不仅充斥神秘主义,还诉说着一战中为德国而烧死之人最终得到了多么大的幸福。可以理解的是,这些措施最终证明它们并没有希望的那般受欢迎,随着 1930 年代的发展,它们都逐渐消失了。纳粹党推动的其他宣传剧目也未大受欢迎,但是戏剧主管们明白,他们最好在当年的戏单中包括这样一个剧目。正如戏剧协会(Theater Chamber)主席在 1939 年所写:“戏剧是精神斗争的武器。它站在知识斗争的前线做好了战斗的准备。”〔12〕戏剧方面的大多数精力经常投入到了经典作品的出色演出上。

112

哈达莫夫斯基在他 1934 年《我们的广播》(*Our Radio*)一书中概括了纳粹的广播计划。他写道,广播的目的是政治性质的。这一任务要出色地完成,不是通过政治演说与说教/讲道来征服听众,而是在其所有播发的内容中应包含一种政治的意涵。〔13〕戈培尔在 1933 年 3 月的一次演说中同样清楚地向一定会对此感觉不自在的广播从业者群体表达了纳粹的目标:“广播属于我们,别人绝不行!我们将让广播为我们服务,其他想法没有机会表达。如

〔11〕 Alfred Karrasch, *Parteigenosse Schmiededecke* (Berlin: “Zeitgeschichte,” 1934). 至少有 4 万本得以印行。

〔12〕 *Deutsches Bühnen-Jahrbuch*, 1940 (Berlin: Buchdruckerei und Verlag Albert May, 1939), 1.

〔13〕 Eugen Hadamovsky, *Dein Rundfunk: Das Rundfunkbuch für alle Volksgenossen* (Munich: Franz Eher, 1934), 72.

果我们确实允许一个别的想法被听到,它将只会显示出与我们多么的不同。”〔14〕

在最初的纳粹政策赋予广播太多政治内容后,关注点更多地转向了娱乐和资讯,尽管政治考量从未被忽视。正如一位纳粹作家在1941年所言:“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一开始就把广播看成是应该服务于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一种引导工具。”〔15〕问题不是是否广播由宣传所指导,而是它如何能更有效地做到。

电影被管理的方式远不同于新闻媒体或广播,这部分是因为它更加利害攸关。〔16〕一个犯了错的新闻工作者最多会有些尴尬地被解雇,但是一个有错误的电影则涉及庞大的投资。虽然电影公司仍是私人所有,但是复杂的控制体系确保电影保持在清晰的限度之内。帝国的文艺顾问(dramaturge)安置在宣传部。〔17〕所有电影剧本需要他的事先批准。1936年电影审查员加入帝国电影协会(Reich Chamber of Film)。他们在电影发行前进行批准。政府的资金支持和奖励影响了这一工业发展的方向。戈培尔本人对电影有特别的兴趣,因而保持密切监管。他的日记中有大量关于电影的评论。比如,在1937年8月,他写道:“大量的电影问题,新问题每天层出不穷。”〔18〕他对电影的兴趣几乎在其工作和婚姻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导致他和捷克女演员琳达·巴洛娃(Lida Baarova)有染。希特勒最后命令他断绝这一关系回到妻子

〔14〕 Heiber, *Goebbels Reden*, 1: 87.

〔15〕 Gerhard Eckert, *Der Rundfunk als Führungsmittel: Studien zum Welt-rundfunk and Fernschrundfunk* (Heidelberg: Kurt Vowinkel, 1941), 243.

〔16〕 有关纳粹电影的总体调查,参看 David 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1933—194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and Hoffmann, *The Triumph of Propaganda*.

〔17〕 这一职位直到1936年4月前都是由能力稍逊的 Willi Krause 所把持,然后由 Jurgen Nierentz 接任。Fritz Hippler 则在1939年担任此职。

〔18〕 Goebbels, *Joseph Goebbels Tagebücher*, 3: 1112.

身边。戈培尔很不情愿地服从了。

最初有一个宣传类电影的爆发期。比如,《机智的希特勒青年》(*Hitlerjunge Quex*)讲述的是在纳粹掌权前的斗争期间(Kampfzeit),一个为希特勒效忠而死的男孩子。《汉斯·韦斯特马尔》(*Hans Westmar*)——一部极其平庸的电影——则美化纳粹冲锋队。两部电影都在1933年发行。宣传类电影,其结果是在票房上并不叫座。人们甚至购买包含大量宣传内容的日报以获知他们能看到的新闻,但是他们避开那些提供更多宣传内容而非娱乐的电影。其结果是,纳粹时代的大多数电影包含相对有限的政治内容。目标是以一种巧妙地巩固宣传路线(或至少不削弱)的方式为人们提供娱乐。不过也存在例外,像战争早期的反犹太人三部曲:《流浪的/永恒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犹太人苏斯》(*Jud Süß*)和《罗斯柴尔德家族》(*Der Rothschilds*),或最后一部纳粹电影《科尔贝格》(*Kolberg*),它提供的信息是,只要一个人坚忍不拔,奇迹就会发生。但是正如伦特斯勒(Rentschler)所说:“纳粹的故事片除了被普遍地排斥或厌恶之外什么都不是。但是它们今天仍然在许多地方上映。这一时代的大多数电影继续存在着并且——除开几个非常宝贵的例外——仍然在发行。”〔19〕正是它们的无害性(innocuousness)有功于它们的宣传价值。通过呈现一种乐观的、快活的生活态度,经由这种巧妙的方式它们巩固了纳粹宣传的基本主题。〔20〕

还有相当数量的宣传类电影短片,通常由纳粹党制作。这些片子有浓厚的政治内容。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在1935年单独

〔19〕 Eric Rentschler, *The Ministry of Illusion: Nazi Cinema and Its After-lif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20〕 有关纳粹电影的另一个观点,参看 Sabine Hake, *Popular Cinema of the Third Reich*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1)。

制作的类似影片达 140 部。大区办公室发行其他影片。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电影处发展了机动小分队,这样就能把电影带到没有电影院的乡村和小镇放映。〔21〕在战争早期,这一体系拥有 900 辆车,每月能提供 5 万次电影放映。

虽然电影工业通常没有过度支持纳粹主义,但就像其他媒体领域一样,大多数人仍同其合作(虽然出走德国的知名人物的数量在电影领域比其他媒体高)。考虑到在戈培尔毫不犹豫加以威胁的集中营同财富与欢呼之间选择,大多数人则在公开场合管住其嘴巴,并将自己的反对意见限制在那些不会激怒这一体系的事情上。

有关纳粹文化政策的一个花边趣闻是艺术批评。问题在于,纳粹施加给艺术的种种限制通常导致的是二流的绘画、书籍、电影和戏剧,即便还是由专业人士创作。经常这样说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它会与纳粹的宣传方针相抵触,而这一方针则认为艺术在国家社会主义之下正达到从未有过的繁荣。戈培尔同批评家持续对抗,最后则试图完全禁止批评。他执意认为,批评是一个“犹太人的”现象。“批评家要被艺术编辑所取代。艺术报道不应关乎价值,而应将其限定在描述层次。”据称公众将会形成自己的意见。〔22〕当艺术批评在报纸中缺席并由此产生各种批评意见时,戈培尔宣布禁止批评报纸。正如他所说:“既然我已经禁止了刊登批评的报纸向党务官员下达指示,那么我也必须禁止对报纸本身的批评……从现在开始,任何对报界的公开批评都是被禁止的。”〔23〕这一政策证明已超出他的权力实施范围,但是这一尝试显示出,他相信批评可能对纳粹的事业产生多么大的危险。

〔21〕 Belling, *Der Film in Staat und Partei*, 143.

〔22〕 George L. Moose, *Nazi Culture: Intellectual, 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in the Third Reich*, trans, Salvator Attanasio et al.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68), 162.

〔23〕 Wulf, *Presse und Funk*, 85.

社会主义文艺政策

德国统一社会党对文艺也有巨大的兴趣。政治局委员柯尔特·哈格尔(Kurt Hager)监管着1963—1989年的文化政策。党的其他领导人,中央委员会以及党代会对文化应该是什么做了普遍和冗长的说明。当该党尝试过各种产生了有限成功的方法之后,这些期望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发生了改变。

同希特勒一样,建筑也是东德领导人特别喜爱的消遣,虽然他们发展的方向不同。他们对建立印象深刻的建筑有某种兴趣。沃尔特·乌布利希在1951年提及“屹立数世纪的建筑”。〔24〕1969年,他鼓励其下属在柏林重建上想法大胆点:“此次会议最重要的事情是将其精力集中到市中心的问题上。几年前,存在分散这一精力的趋势。我们不能以那种方式来建设首都。为了首都,把整个国家的资源集中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在同样这场会议上,保罗·维尼尔(Paul Vernier)说道:“我们时代的纪念性艺术应该展示社会主义秩序和它的人民的伟大与成就。”〔25〕

不成比例的资源投入到柏林,努力使其成为一处历史名胜。不幸的是,在1989年离开柏林市中心,很快你就会看到自1945年以来再也没有触动过的建筑群。对于像莱比锡或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来说,这更加真实。像希特勒一样,东德的领导人想要建设一个让参观者印象深刻的首都,但是缺少实现他们梦想的资源。

宣传也会影响以往建筑是修复还是淘汰的选择。比如,柏林

〔24〕 Henrik Eberle, *Kopfdressur: Zur Propaganda der SED in der DDR* (Asendorf: MUT, 1994), 101.

〔25〕 Landesarchiv Berlin, BPA/SED IV B 2/9.01/65; *Warum bauen wir das Zentrum sozialistischen Hauptstadt konzentriert auf?* 5, 8.

115 损毁的普鲁士皇宫(Prussian Royal Palace)在1950年被拆除,最终被共和国宫(Palace of the Republic)所取代,它因此成为社会主义建筑的东柏林样板,同时也是东德议会所在地和重要的政府接待场所。就其国际形象而言,它通过拆除过去的象征物,一洗柏林的形象。在面对相当多的国内反对意见时,莱比锡的大学教堂(The University Church)仍在1968年被拆除了。“形势不得不继续发展”,乌布利希说道,即使它是莱比锡中心城区少有的重要建筑之一,历经战争洗礼幸存下来,并且保持着相对良好的状况,也不得不如此。废墟中的德累斯顿圣母大教堂(Frauenkirche)被留下作为战争纪念遗址。另一方面,德累斯顿塞帕歌剧院(Semper Opera)则经过精心修复,在1985年重新开放。作为“更好的德国”(Better Germany),东德没有老式教堂和宫殿无妨,但却不能没有歌剧院。

在昂纳克统治下,直到1990年,建筑上的主要努力投入到了试图满足他解决实质性的住房短缺目标上。其结果是住房供应获得了长足发展,像柏林的马灿(Marzahn)或哈勒新城(Halle-Neustadt)就是例子。这些建筑经常在结构上很拙劣,美学上看也是千篇一律,但是它们包括中央供暖系统(对于过去那些必须把褐色的煤拖上五楼的人来说可不是小事)和卫生间(许多战前建筑只有公用的过道厕所)。住房供应上的进步也是宣传中一个持续不变的方面,它把这一成就看成是社会主义有能力满足人类需要的证据。大而新的公寓楼比起那些修复好的德国资本主义过去的建筑来,是社会主义进步性更加显而易见的证据。不过,结果是,随着屋顶开始漏水(在东德,屋顶水泥瓦常年短缺),许多昔日坚固的公寓楼由于缺乏维护,经常从上到下开始腐坏。

文学是东德文艺的女王。这个国家以它自授的名号“东德:文学之地”(Leseland DDR)或“东德:阅读者的国度”(GDR:Land of Readers)而自豪。东德一年出版约6000种书,其中1200种为

非小说类写实文学。在消除正式审查需要的同时,一个谨慎的评论家体系确保几乎不会出现包含过多争议的作品。〔26〕

不像第三帝国没有给大多数作家以任何特别的好处,东德的作家则被供养起来。他们被保证给予名望和利益。这一体系鼓励各种层次的写作。比如,在1959年4月,“比特费尔德道路”(Bitterfeld way)获得了褒奖。一群作家,受到党在幕后的操纵,纷纷发表声明,作家应该深入工厂和建筑工地来写作歌颂劳动光荣的文学作品。工人自己也要创作文艺作品。〔27〕正如乌布利希当时所说:“艺术表现必须时刻紧跟意识形态的步伐。”〔28〕事实证明,比特费尔德道路没有取得特别的成功,几年之后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29〕1955年创立的莱比锡约翰纳斯·罗伯特·贝希尔文学研究所(Johannes Robert Becher Literature Institute)每年招收20名住宿制学生,也提供函授课程培养未来的作家。它一直维系到东德晚期,产生了大量成功的作家,不过无人跻身一流行列。

有相当数量的重要作家离家去往西方,而那些留下的则几乎像真正东德的新闻工作者那样发挥作用。像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和克里斯托夫·海因(Christoph Hein)这样的作家写作的小说,以报纸无法采取的那种方式提到了东德生活中的某些困境。存在着清楚的限制,作家们不得不经常为了保留一些批评性内容而接受重大的修改。德国统一社会党主管文学的官员克劳斯·哈普克(klaus Höpke)解释了他的规则:“从共和国潜逃是敏感的事件。凭经验而论,它可以被暗示,但绝不允许将其作为标

116

〔26〕 Barck Classen, and Heimann, “The Fettered Media,” 217.

〔27〕 Manfred Jäger, *Kultur und Politik in der DDR, 1945—1990* (Cologne: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95), 87—92.

〔28〕 引自 Anne McElvoy, *The Saddled Cow: East Germany's Life and Legac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2), 11。

〔29〕 Jäger, *Kultur und Politik*, 103.

准,即便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东德人知道某人已经这样做了。社会政策包含不能批评的可靠基础。你不能说,领养老金的人在这里生活得很糟糕,或者大量的救济院都过时了。你不能涉及军队、国家安全或与苏联的关系。”〔30〕或者相当数量的其他事情。卡亚·朗格·穆勒(Katja Lange - Müller)对克里斯塔·沃尔夫的批评根本就不公正,但是包含了一一般来说适用于东德文学之实情的方面:“一种表达七个不重要事实的尝试,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一个重要的谎言。”〔31〕

这一体系精心监控电视节目。东德制作了大量有趣和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其中一些还能在西德找到观众。但是也存在蕴含强烈宣传意味的实例,这些通常只能吸引有限的观众。包含强烈宣传内容的最容易看见的节目是卡尔·艾多尔德·冯·施尼兹勒(Karl - Eduard von Schnitzler)的《黑色频道》(*Der Schwarze Kanal*),在其 1519 集中,它对采自西德电视中的片段进行评论。〔32〕涉及普遍利益领域的节目在播放前要经历一条错综复杂的道路。比如,1985 年一个有关技术的节目要求获得 10 个官僚部门的同意,最后到德国统一社会党经济学专家冈特·米塔格手中。〔33〕

同纳粹党一样,东德发现,那些有着强烈宣传内容的电影几乎不会有票房上的成功。东德电影制片厂(DEFA)为广电业和电影

〔30〕 McElvoy, *The Saddled Cow*, 156.

〔31〕 Robert Von Hallberg, *Literary Intellectual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tate: Professionalism and Conformity in the GDR*, trans. Kenneth J. Northcot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239.

〔32〕 这一节目的收视率从来就不高,在 1980 年大概在 7% 左右。参看 SAPMO, DY 30/IV 2/2. 037/41: *Information über weichtige Ergebnisse der Fernseharbeit im I. Quartal 1980*.

〔33〕 Holzweißig, *Zensur ohne Zensor*, 42.

业制作了各种不同的影片。〔34〕电视在鼓动部的管辖范围下,而电影则属于文化部(Culture Department)。实际上,后者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但是即使这样,最优秀的导演,要是以一种无法完全与那些监管电影之人的观点相一致的方式处理有争议的问题,他们就会遭遇麻烦。1989年东德的崩溃导致姗姗来迟的大量有趣禁片的发行,比如像库尔特·梅切格(Kurt Maetzig)的《兔子是我》(*The Rabbit Is Me*)和弗兰克·贝尔(Frank Beyer)的《石迹》(*Trace of Stones*)。

正如对纳粹来说是真实的一样,党对艺术的限制遭致了批评。既然艺术只能迎合清楚的期待,东德也发现它处于把批评维持在某一确定限度的境地,但是这与戈培尔彻底禁止这一实践的努力无任何相似之处。然而,1981年柯尔特·哈格尔对批评的讨论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存在两种批评: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建设性的批评据称是受欢迎的。然而,指向反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批评则是不受欢迎的:“它总是要在汤里找一根头发,抱怨一切,因而,以一种轻蔑的姿态,不遗余力地把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的光辉建设性工作一并抛弃,而这个党是我们这个由工人与农民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动机。”〔35〕其要点在于,只有在据称批评已偏离社会主义秩序时,它才会被加以引导,从而用来巩固整个体系。

117

尴尬的文艺表现:幽默与讽刺

对极权主义的文化政策来说,幽默和讽刺是特别尴尬的领域。

〔34〕 Sean Allen and John Stadford, eds., *DEFA: East German Cinema, 1946—1992*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1999).

〔35〕 Kurt Hager, *Beiträge zur Kulturpolitik: Reden und Aufsätze 1972 bis 1981* (Berlin: Dietz, 1981), 224.

一方面,幽默是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有可能产生一种被那些掌权之人所引导的令人讨厌的趋势。幽默可以,并且讽刺也经常是一种批评形式。纳粹党人当然不想看起来无幽默感,但是他们也不想成为它的靶子。这一困境在戈培尔 1940 年的两处日记开头显示出来了。在 1940 年 12 月 7 日,他写道:“《傻大哥》(*Simplicissimus*)(一份幽默周刊)正被太多不同的权力部门所检查与审查。我要结束这一局面。为了制造笑话,一个人必须要有施展谋略的空间。”尽管如此,两天后,他这样写道:“让维也纳本地的卡巴莱剧团维尔克(Werkl)的负责人安分点。这一组织自我满足于狡猾的颠覆与典型的维也纳人夺人眼球之法。我要明确地让这个绅士意识到他的活动的危险性。从现在开始,他就会更谨慎了。”〔36〕我将考察两个极权主义幽默的例子:卡巴莱表演与幽默杂志。

来看卡巴莱表演吧

政治性的卡巴莱表演在 1933 年前的德国扮演着突出的角色。它的措辞是嘲讽和活泼的,很少有神圣之感。纳粹掌权之后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许多艺术家是犹太人,左翼分子,或者两者都是,他们离开了这一职业或国家。〔37〕戈培尔希望,自我保护的冲动将会约束留下来的表演者,但是事情并未如此发展。表演者们越狡猾,他们的台词就越让人印象深刻。经典的例子是柏林的维尔纳·芬克,在因先前一场演出而遭遇麻烦又重新登台后,他说道:“我们不是太开放了,但是我们要保持足够开放,以刚好维持

118

〔36〕 Fröhlich,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9:39, 42.

〔37〕 Peter Jelavich, *Berlin Cabare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28.

演出。”〔38〕正如纳粹党人看到的,芬克是一位暗示艺术的大师,尽管暗示已足够多了,但还是没有被抓住把柄。〔39〕1935年,戈培尔把他忠诚的党员派到芬克的表演现场,结果发现他们只是得出了相互冲突的结论。一些人认为题材是可以接受的,而大多数人则发现观众会自然地得出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不一致的结论。戈培尔考虑禁止传统的卡巴莱表演,用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版本取而代之。〔40〕

正如耶拉维奇(Jelavich)指出的,纳粹党有一个矛盾的目标,这注定了他们的卡巴莱表演不会成功:“纳粹党渴望的‘建设性的卡巴莱表演’被用来攻击那些打破一致性态度(homogeneous mindset)的人们。当然,同样的那些人正在被国家的镇压机构所迫害。不为受害者辩护,纳粹的卡巴莱表演被认为支持胜利的强者一方。这一事实严重地限制了纳粹‘建设性的’卡巴莱表演的成功。在观看一个已倒在地上的人正被无端踢打时,观众们很难发现幽默之处。”〔41〕戈培尔最终决定在1937年12月完全禁止政治性的卡巴莱表演,但是又缺乏实施这一禁令的权力。尽管相当忐忑不安,但卡巴莱表演仍一直维持到战争岁月。

东德更加有效地管理着卡巴莱表演。1982年,卡巴莱表演吸引了42.8万人。〔42〕到1984年,主要的城市总共有14个剧团。

〔38〕 Peter Jelavich, *Berlin Cabare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28.

〔39〕 Bohrmann, *NS-Pressenanweisungen*, 7:313.

〔40〕 戈培尔有关此问题的一封信收于 Wulf, *Presse und Funk*, 136 - 137。

〔41〕 Jelavich, *Berlin Cabaret*, 245.

〔42〕 SAPMO, DY 30/vorl. SED 32727; *Zu ausgewählten Tendenzen und Problemen bei der Entwicklung des politisch satirischen Berufskabarets in der DDR in Auswertung der 3. Werkstatttage der Berufskabarets vom 14. bis 18. Januar 1983 in Gera.*

而票则在数月之前就已售罄。此外,还有许多业余的和学生的卡巴莱剧团。〔43〕东德甚至在1987年建立了一项大学计划用以专门培养卡巴莱表演艺术家。〔44〕

119 每一位卡巴莱表演艺术家意识到存在诸多界限,但却并非总是清晰的。表演者们明白,他们的大多数题材不得不指向敌人,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正如一位鼓动部的官员乌苏拉·拉格维茨(Ursula Ragwitz)在1983年所写的:“东德日常生活中的批评性题材不可以掩盖最重要的阶级斗争问题。”〔45〕卡巴莱表演的脚本要求事先得到相关党务部门,以及城市官员们的批准。即使如此,表演有时仍被禁。1961年,莱比锡的学生卡巴莱表演,没有攻击阶级敌人,而是把它的一些讽刺矛头指向社会主义阵营。一个典型的方式是这样的:“为什么《莱比锡人民日报》(LVZ,德国统一社会党莱比锡党报)发行的是肯尼迪(Kennedy)和尼赫鲁(Nehru)的演讲缩写版,而不是赫鲁晓夫(Khrushchev)的?答案是:唔,在你削减它们之前,你不得不读它们。”5个卡巴莱剧团成员被逮捕,2个被驱除出党。〔46〕其中一个恩斯特·罗尔(Ernst Röhl),随后成为东德唯一的幽默杂志《捣蛋鬼》(*Eulenspiegel*)的长期职员,也因此 in 监狱里待了将近一年。在1964—1965年,莱比锡的卡巴莱剧团胡椒磨(Pfeffermühle)有3场演出被禁,考虑到其中一

〔43〕 按照彼得·奈尔肯(Peter Nelken)1965年的一份报告,存在1000个业余的卡巴莱剧团。参看SAPMO, DY 30/IV A2/2. 028/64: Thesen zur Aufgabenstellung und den Formen der sozialistischen Satire。

〔44〕 Maja Lopatta, “Von der Hochschulbank? Zur Aus- und Weiterbildung von Kabarettisten; Gespräch mit Dr. Gisela Oechelhaeuser,” *Unterhaltungskunst*, April 1987, 7-9.

〔45〕 SAPMO, DY 30/vorl. SED 32727: Kurzinformation zur Situation der Berufskabarets in der DDR (1983).

〔46〕 SAPMO, DY 30/IV 2/9. 02/21: Information an Genossen Norden (1961).

场正值吸引了大量外国观光客的秋季贸易展销会期间,这相当尴尬。〔47〕

然而,卡巴莱表演比《捣蛋鬼》有更大的批评空间。我观看了1988年胡椒磨的一场演出,它试图暗示,东德领导人在其噩梦中看到的尽是小戈尔巴乔夫们(little Gorbachevs)。这些笑话从没出现在更广泛传播的媒体中。卡巴莱表演只有有限的观众(剧院最多只有几百的座位),完整的演出几乎从未在电视上播放过(虽然有时会播放精心选择的滑稽短剧)。西德的电视记者频繁地要求获取拍摄卡巴莱表演的许可,但总遭到拒绝。正如1983年的一份报告中所言,允许西德电视播放东德电视不能播放的内容,这太不可思议了。〔48〕

笨蛋都笑了:讽刺性出版物

纳粹时代有大量讽刺性出版物得以发行。《傻大哥》(*Simplicissimus*)就和《滑稽集锦》(*Lustige Blätter*)一样,有着漫长的历史。〔49〕纳粹党在1931年创办了自己的《荨麻》(*Brennessel*)。〔50〕遵循苏联的先例,东德也有一份出版物《捣蛋鬼》,它几乎垄断了全部讽刺文学。〔51〕我会利用前者1934—1935年,后者1985—1986年的资料首先考察这两份杂志。

〔47〕 参看 SAPMO, DY 30/1v A2/2. 028/64: Nelken to Norden on 15 September 1964 and Nelken's Thesen zur Aufgabenstellung。

〔48〕 SAPMO, DY 30/vorl. SED 32727: Kurzinformation zur Situation。

〔49〕 战争期间《滑稽集锦》(*Lustige Blätter*)的例子,可参看 GPA/lustige. htm。

〔50〕 有关《荨麻》(*Brennessel*)中漫画的例子,参看 GPA/brenn1. htm and GPA/brenn2. htm。

〔51〕 有关《捣蛋鬼》(*Eulenspiegel*)的封面漫画,参看 GPA/spieg. htm。

《荨麻》和《捣蛋鬼》在运用讽刺评论国际事件的方式上最为相似。在两个体系中,政府控制了对其他国家发表看法的权力,它宣称所有的出版物都应该支持官方的路线。结果是,两种杂志的国际讽刺文章都是可以预期的、重复唠叨和乏味的。既然这是两种杂志中最无趣的题材,我只想简略地考察它。

《荨麻》很少去赞赏世界上其他国家。奥地利、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英国、美国和立陶宛(Lithuania)——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更多国家经常是它讽刺的对象。比如,1934年,希特勒发起了一场反对奥地利的运动,并在7月25日刺杀奥国总理厄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ß)的行动中达到高潮。《荨麻》中数百条内容,从简短的尖刻之语到封面漫画,从重要文章到诗歌,都竭力讽刺奥地利(虽然刺杀本身没有提及)。1934年还有几十条内容谴责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针对德国的军备建设计划。

120

1935年奥地利不再是主要的关注点。现在大量条目转向攻击苏联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到1935年秋,立陶宛成为主要靶子。比如,1935年11月19日这期,刊登了2幅漫画和2篇短文,指责立陶宛政府的各种罪行。

很清楚,讽刺外国是一场受中央操控的运动之一部分。《荨麻》的办公室文件副本被一个美军士兵缴获,并在战后把它们赠送给了他的母校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这里面有时还包括在印刷发行前审查者对某一期所作的校正。1934年6月26日刊登了一幅名为“*Ikraus der Dollfußige*”的漫画。这是一个经过翻译无法再保持其意义的双关语,描述的是Dollfußige试图通过在天空中飞得更高来逃避敌人,结果却和彩虹相撞。页边空白处一条手写的评论对此说道:“5点获得印刷许可(5 Uhr kam Druckerlaubnis)。”同一期中,一首反奥地利的诗被剪掉了。

虽然《捣蛋鬼》从未怀疑过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智慧,但是它

的作者们意识到,重复老式的陈词滥调是乏味和无效的。《捣蛋鬼》的编辑彼特·奈尔肯(Peter Nelken)在1962年写道:“对讽刺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运用艺术的手法来表现帝国主义之下人性的扭曲,以及揭露帝国主义代理人那无可救药的旧式本质,不是每一个好战分子看起来都像一只猴子,不是所有的垄断资本家都焦虑不安。这种陈词滥调不仅会低估斗争的严峻性,而且还会忽视讽刺的一个重要功能:激发读者或观众去想象,迫使他们去思考,进而得出结论,最后则影响他的行动。”〔52〕不过他的训令很少产生影响。

1985—1986年的重要运动直接指向反对北约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的决定。几十条内容提及这一主题。尼加拉瓜(Nicaragua)是第二个经常提及的主题。封面或封底漫画表现的是被枪杀的尼加拉瓜学童,流向洪都拉斯(Honduras)的反政府武装的钱,向牛奶运输车开枪的反政府武装战士,富有的美国人担心尼加拉瓜人想从他们那儿夺走迪斯尼乐园,等等。〔53〕这些陈词滥调都是奈尔肯在20年前就已经指责过的了。

杂志也不会提及这个国家的盟友的任何消极内容。《荨麻》的副本显示,甚至温和的意大利笑话也被剪掉了。比如,1934年8月14日这期包含两条涉及意大利的内容。其中一条是,旅行者错把让人感到迷惑的托钵僧(whirling dervishes)当成意大利的新闻工作者。1934年9月25日这期是一幅漫画,它描绘的是一个无知的意大利农民把塔西佗的书给拿反了。图片说明这样解释:“他不能读塔西佗,当然——但是他至少来自于两千年前塔西

121

〔52〕 Peter Nelken, “Die Satire-Waffe der sozialistischen Erziehung: Ein Diskussionsbeitrag,” *Einheit* 16 (1962): 107.

〔53〕 参看《捣蛋鬼》中的例子, *Eulenspiegel* 13/1985, 22/1985 and 25/1985。

它从事写作的地方。”没有哪一条刊登在了发行本上。《捣蛋鬼》对苏联的反应只能被描述成卑躬屈膝，它没有任何一条建议说，苏联的政策会以任何方式屈从于批评。

虽然两种出版物对国际问题的一般处理方法是相似的，但是还存在着重大的不同。《荨麻》经常刊印外国政治家的讽刺画，《捣蛋鬼》很少这样做。^[54]纳粹党人不会特别关心世界如何想象它，而东德则不遗余力寻求外交承认，并且避免对大多数外国领导人进行尖锐的个人攻击。它的漫画类型通常概括为资本家、将军或政客，而不是特定的外国领导人。

考虑到国际讽刺很清楚地是普遍宣传运动的一部分，而且多样性又如此缺乏，那么国际讽刺很少有那么点有趣之处就不难理解了。讽刺作家没有谈论任何粗暴或煽动性内容的空间。唠叨的国际讽刺在柏林墙倒塌后从《捣蛋鬼》中消失了，这样一来它的职员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可以选择他们想写的东西。

虽然它们处理国际讽刺的方式是相似的，但是《荨麻》和《捣蛋鬼》在国内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前者拒绝了任何国内的批评，而后者被允许的批评空间比东德任何其他主要杂志都要大。尽管如此，正如我们会看到的，这种批评还是保持在精心界定的界限之内。

《荨麻》花了相当大的精力来支持戈培尔的宣传运动，以对抗那些抱怨短缺、腐败或无能的德国人。^[55]许多漫画、诗歌与文章谴责吹毛求疵(Miesmacher)和爱发牢骚(Meckerer)之人，即那些对最微不足道之事都爱抱怨或对第三帝国缺乏完全信任的人。1934年一幅典型的漫画，标题这样解释：“那些视而不见之人一定

[54] 这方面例子，可参看丘吉尔(12 November 1935, 691), Dolfuß(27 February 1934, 29), 和斯大林(2 July 1935, 405)的漫画。

[55] 有关细节，可参看 Scanlan, “The Nazi Party Speaker System”。

会感受到”。在第一个画面中,两个人抱怨什么都没发生,而背景中另外两个人则正在工作。在第二个画面中,其中一个工人手握铁铲,将手柄一端顶向抱怨者的下巴,而在最后一个画面中抱怨者只得连声道歉,并评论说:“唔,终究有事发生了。”〔56〕另一幅漫画是一个进入商店买黄油的抱怨者。当店员告知他已经没有时,他回答道:“我就知道没有。要不然的话,我就不会来问了。”〔57〕许多条目提出同样的看法。抱怨意味着不忠诚。

其他条目则攻击那些不能按所期望的方式行动的德国人。对于每年党的冬季救济运动,那些无甚热情对此做贡献的人会受到密切关注。一幅典型的漫画展现了一对驾驶大私家车的富有夫妇只捐了一分钱给纳粹冬季慈善救济计划。〔58〕还有假爱国分子(110 percenters)的抱怨,即那些在1933年1月30日之后发现国家社会主义吸引力的德国人。一篇文章采取了给一个官员写信的形式,该官员通过接受必要的政治上色(coloration),而在向国家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幸存下来,但是他抱怨,必须承担的6个月劳动服务将会让他付出1000马克的工资代价。〔59〕

122

这一信息表明,德国的一切都称心如意,抱怨就是显示出对元首和祖国的不信任。无论什么问题,一切都能通过那些掌权之人得以解决。不需要广大群众来插手。

另一方面,《捣蛋鬼》的版面满是抱怨无尊严的东德生活。奈尔肯1962年的小文章概括了国内讽刺作品的恰当目标:“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什么消极的东西阻挡在前呢?首先是各种个人主义的表现,它们乃由仍然影响人们思想与行为的资本主义

〔56〕 Brennessel, 23 October 1934, 677.

〔57〕 Brennessel, 3 December 1935, 725.

〔58〕 Brennessel, 30 October 1934, 689.

〔59〕 Brennessel, 6 November 1934, 710.

所滋养。旷工,企图从社会得到尽可能多却没有生产出相应的数量,囤积居奇,收听散布谣言的北约电台,酗酒和粗暴,跋扈的品质与嫉妒,在家庭和工作场所虐待妇女——所有这些都是需要被消除的有害残余。”〔60〕同《荨麻》相比,《捣蛋鬼》有时会表明,存在一些问题,公民们可以适当地抱怨它们。国内讽刺的目标是帮助克服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阵痛。

123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的阵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加。《捣蛋鬼》不缺乏话题。有一期它抱怨了火车站饭店糟糕的食物,肮脏的厕所和便利店有限的开放时间。同期的漫画描绘的是因瘟疫危险而关闭的厕所和摆满酒的车站小卖部:“在这里你能找到任何需要的,以便忘掉晚点的列车。”〔61〕其他数期则揭露了东德的出租车司机为敲诈乘客高于正常费用的车费而运用的小诡计,获取零部件的困难以及消费品糟糕的质量。〔62〕频繁的旷工成为一幅漫画的主题,它展示了6个工作站,但其中5个空无一人。工厂主管经过,然后问人都去哪里了。在场的工人这样答复:“波拉(Paula)的儿子病了,迪特尔(Dieter)正在采煤,麦克斯(Max)正在买家具,海因(Hein)在驾驶学校,而埃尔斯(Else)正好在购物。”领班则回答:“需要和埃尔斯谈谈。其他人别无选择。”〔63〕由于承认了东德生活的沉重压力,漫画接受了有充足理由的旷工。

每一期刊登的文章和漫画都直接提出了东德公民面临的但很少在其他大发行量杂志中涉及的日常困难。不像《荨麻》,《捣蛋鬼》表达了人们的挫败感。有时提及特定的罪犯,有时它提出一个普遍的抱怨。

〔60〕 *Nelken*, “Die Satire,” 108.

〔61〕 *Eulenspiegel*, 5/1985, 8-9.

〔62〕 *Eulenspiegel*, 8/1985, 13; 43/1985, 8-9; 20/1985, 4.

〔63〕 *Eulenspiegel*, 22/1985, 13.

还有些条目处理更深刻的社会主义问题。文雅些的笑话则取笑不断引用马克思主义领导人的行为,比如就像下面这首诗:

我强烈希望知道
因此我正要直率地问,
请告诉我
卡尔·马克思引用过吗?[64]

东德官方修辞中充斥的是源源不断的引用,任何对此熟悉的人难免会付之一笑。采用创造性措施来获得零部件或稀缺物品的需要在一幅漫画中受到讽刺,它讲述的是一个人把他的电话号码写在一张 50 马克的钞票上“以便零部件早日到手”。[65]各种条目要不时处理为了家用而偷窃工作场所生产资料的习惯行为。[66]

甚至更严重的问题有时也会被考虑进去。一幅封底漫画揭示了,孩子们在其公寓阳台上向外张望时看到 3 个喝醉酒的笨蛋正毁坏他们的游乐场,他们因此嚎啕大哭。[67]另一幅漫画展示的是站在破旧工厂面前的工人们,眼前只有破碎的窗户,漏水的房顶和地面上的大洞。他们的厂长告诉他们:“你们需要的,同事们,是文化。去歌剧院或音乐会吧!”[68]

这些条目几乎不是尖锐的批评,但是它们比德国公民们在其他杂志中发现的更有力量。尽管如此,必须将它们同《捣蛋鬼》中有关西方的论述相比较才有意义。它似乎在说,在那里,犯罪、贫穷、腐败和剥削是许多人日常生活的全部。社会主义偶尔的不利

[64] *Eulenspiegel*, 6/1986, 4.

[65] *Eulenspiegel*, 35/1985, 4.

[66] *Eulenspiegel*, 3/1985, 7.

[67] *Eulenspiegel*, 22/1985, 16.

[68] *Eulenspiegel*, 34/1985, 16.

形势也被刻画成不严重的干扰。

124 这一杂志经常会给它的批评对象以回应的机会。针对抱怨某篇文章的一个建筑经理,杂志回复道:“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不需要讽刺了。消极的讽刺将是自我毁灭。请不要在那样一些人手里期望一个‘客观的’报道,他们的工作就是对各种异常现象喋喋不休,他们靠夸大事态而活。”〔69〕《捣蛋鬼》从没表达过,抛弃社会主义以改善商店售货员的礼仪或消费品的质量,可能是必要的。

正如该杂志的一位作者随后提到的,批评不得不因“街道和门牌号”而异。〔70〕较低级别领导人的不光彩行为,对于批评是开放的,但较高层级领导人的行动不在此列。比如,当《捣蛋鬼》批评领导东德体育系统的主管曼富莱德·艾瓦德(Manfred Ewald)时,编辑们都被解雇了。即使任何批评领导层的细微迹象也会被否决。一个有趣的例子出自1963年,那时该杂志准备刊登如下笑话:当西德总理吕布克(Lübke)正在进行他的非洲之行时,他想让公众知道他是德国的代表。一个过路人据说做了这样一个评论:“他一定是个骗子,因为德国的代表要有山羊胡(beard)。”这是一个如此温和的指涉,直接指向乌布利希的山羊胡(goatee)。鼓动部拒绝了那句妙语。相反,读者们读到的是:“他一定是个骗子,因为我在自由德国青年大会上见到过德国的代表。”编辑彼特·尼尔肯写信给鼓动部:

在大众鼓动作品中运用如此愚蠢、空洞的表达,我们必须表现得如此神经质和自我防卫吗?我们为何要如此的过敏?

〔69〕 *Eulenspiegel*, 33/1985, 10.

〔70〕 Karl Kultzsche, *Links und rechts der Dumme: Lebensdatenverarbeitung eines DDR-Satirikers* (Cologne; Tiberius, 1993), 28.

乌布利希同志的山羊胡很难看吗？

我在此位置已待得够久，因而明白一个人不可以写哪些内容，不能用哪些术语。但是看看我们围绕“墙”一词手舞足蹈的方式吧。一个人必须倾听人们在说什么，如果他想争取他们的话。

我并不特别关心乌布利希同志的山羊胡，或者一个甚至不起作用的《捣蛋鬼》中的笑话。我所关心的是自我防卫性质的，因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忌讳。〔71〕

不过这是一个温和的争论。还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说明《捣蛋鬼》的编辑更加积极地从事着许多被分派的任务。〔72〕

虽然《捣蛋鬼》被允许了比《荨麻》更多的国内批评，但是它们都不能容忍任何对社会基本原则的批评或来自其他国家的批评。它们都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来揭示，来自国外的对它们国家的批评是无知的、愚蠢的和错误的。

比起昂纳克的德国来，希特勒的德国收到了来自国外新闻媒体更为负面的报道，它一点都不喜欢这报道。《荨麻》的普遍应对方式是，国外的批评是犹太人或不满意的流亡者的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个人问另一个人是否读过一份移民报纸中的一篇文章：“这份报纸，我读过一点儿，甚至可以说几篇文章，但我不知道

〔71〕 SAPMO, DY 30/Iv A2/2. 028/64; Nelken to Norden on 27 June 1963. 这一笑话出现在《捣蛋鬼》(1963年第26期)的封面上。相同主题的一篇文章名为“我们如何描写沃尔特·乌布利希？”它得出结论说，考虑到乌布利希是一个高尚的政治家，那么讽刺的任务是帮助他达到其目标，而不是挖苦他。还有另一篇文章对一个西德记者的评论做出了回应，后者说乌布利希从未对他在不同场合微笑的14幅照片表示过满意之情(8-10)。

〔72〕 比如，参见 SAPMO, NY 4182/921/B1. 55 - 58; über die ideologische Schwankungen im “Eulenspiegel” (1957).

你说的是哪一篇。是那篇拼凑的,或那篇不属实的,或欺骗人的,还是充斥一堆谎言的?”〔73〕

其他几十篇文章和几十幅漫画提出同样的看法。每一个都试图表明,国外的批评是错误的或极其荒谬地夸大其词。

还有其他条目则表明,虽然德国可能存在一些不严重的问题,但是其他地方的事态远比德国糟糕。比如,1934年一条引人注目的内容写道:“奥地利集中营据推测将会建造墓地和火葬场以帮助它们更好地实现其目标。”〔74〕随后一幅漫画展现了,两个英国人非常愤怒,因为他们的德国邻居正在他的院子里敲打一条毯子,而在第3个房子里,俄罗斯人正向民众开枪,此时栅栏底下老鼠正蹑手蹑脚侵入邻居的房中。〔75〕

《捣蛋鬼》经常给予类似题材以不少空间。一月一次,名为“另一面”(The Other Side)的专栏声称是一份有西方风格的刊物,专门评述东德的问题和资本主义的幸福。每一期都包括一幅东德的配有特定解释的图片。一张照片显示的是一个站在池塘边喂鸭子的小孩儿,更不要提东德的孩子会被迫劳动以实现党规定的家畜计划了。〔76〕既然大多数东德公民经常观看西德的电视,因此懂得(就像亲身经历一样)东德的困难比《捣蛋鬼》中讽刺作品所显示的更为严重,那么,它在这些方向上的努力就比《荨麻》更具挑战性。

反犹主义是《荨麻》的支柱。1935年的一篇文章讨论了如何在战争期间运用幽默来对抗犹太人。通常的情况是,反犹笑话只是让犹太人看起来可笑,有作者这样说道。有效果的幽默指出了

〔73〕 Brennessel, 31 December 1934, 840.

〔74〕 Brennessel, 8 May 1934, 294.

〔75〕 Brennessel, 19 November, 1935, 705.

〔76〕 Eulenspiegel, 29/1986, 13.

犹太人的“撒旦本性”：“菲利斯人(The Philistines)以廉价的犹太笑话证明了他们的反犹主义,同时巩固了犹太人在经济上是一场瘟疫的观点,然而他们忽略了,后者具有极端的严重性!”〔77〕犹太人被看成是擅长各种邪恶手段的丑陋的漫画对象。

为了诋毁那些逃离德国的犹太人,它还进行了特别的努力。1935年一篇典型的文章攻击了柏林报纸《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的前任编辑乔治·伯恩哈德(Georg Bernhard)。写作者看到一部影片,里面有1920年代以来伯恩哈德的视频剪辑,对此,他断言,观众们会发笑的,无法相信如此一个顽固不化之人曾经在德国长大:“你的面孔——我们确实不想谈论它——但是照照镜子,看看那张脸,你必须随身带着的东西。在那方面,你不可能做得更好了。你的种族特征没有以一种有吸引力的方式出现。首先,摄影师会捕捉你,我该怎么说呢,是从特拉维夫的角度(Tel Aviv side)。没有吸引力,根本没有,乔治·伯恩哈德!然后你开始说话吧。这太好笑了。你自己试试,大声说几个词儿。然后你会明白你那散发着德国气味的意第绪语。对我们而言,那听起来会是怎样的感觉,难道你对此没有任何想法吗?”〔78〕漫画与文章的内容是反复的、不变的和乏味的。

126

东德在涉及犹太人时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作为执行了种族灭绝的一部分,它会对讽刺犹太人感到不安,但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它又站在以色列敌人的一边。其结果是,东德的新闻媒体很少提及以色列或犹太人。犹太人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民族,以色列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国家。

在此期间,重要的文章或漫画都没有详细提到过以色列。只有偶尔几处简略地提及过。1985年的社论注意到世界都在谴责

〔77〕 Brennessel, 4 June 1935, 341.

〔78〕 Brennessel, 12 February 1935, 82.

以色列的政策,但是美国却支持它。〔79〕另一则是讽刺以色列的报复政策:“在一次肆无忌惮的打击中,以色列突击队员于星期二夜间炸毁了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起因在于,1200 人的观光客中有一个人被看到在同一个阿拉伯人交谈。而这个阿拉伯人的小姑子经常被以色列情报机构看到公开携带黑白相间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标志(PLO)。”〔80〕尽管如此,与该刊中直接针对美国或西德的讽刺相比,这确实是很温和的材料了,它显示出,以色列是该杂志更希望避免的主题。

1938 年《荨麻》的倒数第二期向读者宣告,它已经实现其目的,因此马上就会停止出版了。该杂志给自己写的讣告是:

正是我们的《荨麻》,好几万的国家社会主义读者在斗争期间享受阅读的乐趣,因为它给予旧体系以激烈的和仇恨式的打击,从而逐渐地瓦解了它。

正是我们的《荨麻》,在夺取权力之后,它坚定地把目标对准了国外的敌人和国内的抱怨者与发牢骚者。

正是我们的《荨麻》,它对敌人的嘲弄,使它们遭受重创,使它们成为世界的笑柄,让它们看起来无比可笑。

我们感谢忠诚的读者们。你们知道,在实现它的伟大目标之时,《荨麻》(我们党史上的一个片段)已经通过激烈的攻击与决定性的防御,为其信念付出了多少。它最终的斗争目标是:创建更伟大的德意志帝国!〔81〕

不过,《荨麻》不是因为它完成了使命而停止出版。它的失败在

〔79〕 *Eulenspiegel*, 41/1985, 3.

〔80〕 *Eulenspiegel*, 6/1986, 13.

〔81〕 *Brennessel*, 20 December 1938, 695.

于,人们都不去买它。1933年《荨麻》的发行量约为3万2千。到最后一期,则跌倒了2万3千。〔82〕

《荨麻》的竞争对手也好不了多少。《傻大哥》在1908年销量达到8.6万份。到1939年,发行量则下降到了1.9万份(虽然《荨麻》订阅者的注入暂时把它提高到了4万多份)。第三帝国对平淡的讽刺没有什么兴趣。人们在其它活动中已经听过足够多的宣传。考虑到《荨麻》几乎没有缓解日常的压力,这表明人们因为这些压力而不愿忠实于它,因而大多数德国人会选择把30芬尼(pfennig)花在其他地方。

127

《荨麻》之所以失败在于它太像第三帝国的一切其他领域了。没有惊喜,没有冒险。幽默经常是处理日常生活压力的一种方式,通过笑声让它们变得更可忍受,但是《荨麻》没有给类似的解脱以机会。爱抱怨者,爱发牢骚者,不满意者,他们是这一杂志的敌人,是它经常攻击的靶子。它表明,批评生活困境的人是一个叛国者。这几乎不可能创造出好的幽默。甚至希特勒也把它称作是“可想到的最沉闷的小报”。〔83〕

另一方面,《捣蛋鬼》则是期期销售一空。每期印行约50万份(鉴于希特勒的德国和东德的人口差异,《荨麻》本需要200万份才能比得上《捣蛋鬼》的销量)。甚至这些已印行的份数还不够。新的订阅量没有被批准;到达报刊亭的每期杂志很快就卖光了。编辑部的职员们估计,要是有足够的纸张(东德长期供应短缺)可用,那么接近现在两倍的份数也能卖出。

两份杂志都试图迫使幽默接受宣传的种种限制。那么为什么一个失败了,另一份则成功了呢?

简单来说,《荨麻》未能激起读者的兴趣。它提供给他们的内

〔82〕 这些数字基于向广告客户保证的最低发行量。

〔83〕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125.

容,几乎没有不能在其他地方找到的,并且它的幽默缺乏能使讽刺具有吸引力的刺激。《捣蛋鬼》提出了一些东德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很少人去读它是为了看国际讽刺,他们也不会对它试图揭示出的“讽刺作家必须在把讽刺作为国内批评的手段和揭露外国敌人、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手段之间做出实质性的区分”所打动。〔84〕虽然它也包含一些粗鲁的讽刺,但是它至少还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给对东德状况的温和批评。它避免纠缠其读者,让他们参与“加入我们吧”行动(Mach mit actions,清扫一个区域或完成其他种类市民工作之类的半自愿努力),或由于没能对一场团结运动(a solidarity drive)做出贡献而责备他们。它的受欢迎程度部分源于其稀缺(因为人们本质上更喜欢很难得到的东西,而不是唾手可得的)。

128 一个人沮丧是因为他不能为他的洗衣机找到一个零部件,一个妇女愤怒在于一个社会中性别歧视的存在,而据称适合于它的条件已经消除了,一个旅客生气是因为列车已一周三次晚点,还有人则是厌倦了糟糕的工作条件,当《捣蛋鬼》攻击他们提到的问题时,这些人可能都会付之一笑,或许听天由命。确实,这一杂志很少超越具体的愤慨。它从不建议说,或许德国的问题有一个系统的原因,但是仅仅一期就比一个月的《新德国》包含更详细的有关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之相关批评。

东德崩溃后,这一杂志很快终止了昂纳克时代拙劣的讽刺,而开始刊登转型的德国社会生活中真正有趣与辛辣嘲讽的内容。虽然它的讽刺现在采取完全不同的路线,但是它继续存在,一月出版一期。

〔84〕 Nelken “Die Satire, ” 103.

总结

纳粹和东德体系都把文艺看成是重要的。正如数世纪以来大部分的欧洲艺术巩固了基督教的世界观,极权主义的艺术也要巩固它们新的世界观。两个体系在准确界定什么是许可的艺术上存在困难,但是它们都毫不犹豫试图这样做。一般来说,纳粹的体系比东德的体系更为混乱。

通过控制作为艺术生涯必要条件专业组织的准入门槛,两个体系得以指导艺术。在希特勒的德国,只有帝国文化协会相关组织的成员才能受雇从事艺术工作。在东德,只有相关专业组织的成员才可能找到一个出版商或画廊。而那些不服从恰当路线的人则被排斥在专业组织之外。

两个体系也对抗着艺术上的模棱两可。许可的艺术包含清晰的主旨以回应意识形态的元叙事。纳粹的绘画赞美一个已然消失的田园世界,党的领导人及其历史,伟大的建筑工程,以及军队。纳粹主义否定“现代”艺术乃因为它的意义不够清晰或者过于清晰(比如反战艺术)。许可的社会主义艺术则是歌颂工人和社会主义的成就。它们都不喜欢爵士或者其他形式的现代“堕落”音乐。

德国统一社会党,因文艺形式表情达意之微妙,事实上比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允许了更多文艺上的自由。电影和电视更直接地处理现时代的问题。《捣蛋鬼》确实比《荨麻》提出了更多日常生活中的苦恼。

文艺仍然巩固两个体系。除开一些例外,艺术家们都被合作的收益所“收买”。罗伯特·冯·哈尔伯格(Robert Von Hallberg)有关东德艺术家的评论同样适用于纳粹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那样难以控制。比起合作的明显收益来,他们很少被明确的审查所指导(虽然必要的时候也会使用)。他的结论值得在此大篇

幅引用：

一个人也许 would 认为，在一个极权社会中，对警察力量的恐惧将会支撑起被知识分子们接收到的指示与建议，但是这种事情似乎根本没有发生在东德。东德的知识分子——不只是文学知识分子——现在经常说：“事实上，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他们没有如此做的原因很少是因为监禁或酷刑的威胁，而是相反，担心专业受到阻碍。我的观点不是简单说某种专业组织，比如作家协会 (Writer's Union) 或中央文学史研究所 (Central Institute for Literary History)，会增强特定种类的服从。更为有趣的现象是精心设计的东德专业组织似乎赋予了知识分子的生活以相当大的可预见性：一个人明白，要是经由苛刻的当局，他的某一作品将会被仔细地阅读；进一步地，他自己也认为他自己明白，要是他说了些特别的话将会有什么后果。〔85〕

一般来说，两个体系中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情愿避免会危及他们地位的行动。这并不会让他们与大多数公民有所不同，后者也希望避免麻烦，但是他们的能见度 (visibility) 和声望有助于以一种重要的方式来维持体系。他们的可信性赋予了这一体系以可信性。

在两个体系中，文艺为有价值的宣传功能服务。它通过某种方式满足公众娱乐的需要，以此支持或至少不削弱官方的路线。比如，幽默和讽刺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真实的缺陷与罪恶转向它们的敌人有时真实的缺陷。极权主义的社会不是让公民们大笑或蔑视他们的政府，而是试图把那种蔑视引向

〔85〕 Von Hallberg, *Literary Intellectuals*, 317.

他处。

艺术也引人注目地巩固了两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纳粹党人鼓励建造剧院与艺术画廊,而德国统一社会党,尽管通常缺乏建筑材料,也把大量精力放在了修复战争期间受损的剧院或建造新剧院上。它甚至在柏林拥有两个深受外国游客欢迎的歌剧院。在两个体系中,艺术都不是为自身而存在;那些想法不同的艺术家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

第七章 公共与私人生活

131

在生活的每一领域,要弯曲人们的脊梁就要施加持续不断的压力。雅克·埃吕尔评论道:“宣传试图通过所有可能的途径来包抄个人,在感觉与观念的领域,通过作用于其意志或需要,经由他的意识或无意识,以及在公共与私人生活中攻击他。”〔1〕我更早之前已经探讨过要求对生活所有方面都拥有权利的主张所具有的准宗教性质。国家社会主义和东德体系夺取了权力,但是也清楚从来不可能征服所有人。它们想要的是信服(conviction),但是也勉强接受了许多拒绝成为或无法成为真正信仰者的表面赞同。它们接受了各种不同层次的服从,并且也找到了对付那些不愿屈服之人的诸多方法。本章中,我会首先考察公共一致性(unanimity)的普遍要求,然后审视相关的各种具体手段,它们用来劝服公民们按照他们本不相信但却表现得相信的方式行动。

一致性的外观(appearance)是关键的。一个普通的国家不会期望100%的同意。事实上,民主国家还预料到一系列的分歧,它甚至会在各种观念与观点的竞争中发现社会收益。极权主义国家做出了真理的绝对声称,它不允许重要的公众异议。它们知道异端邪说会传播开来。戈培尔在1928年把观念比拟为空气,它无影

〔1〕 *Ellul, Propaganda*, 11.

无形地在人民之间流动。〔2〕更好的比喻是病症。除非极权主义社会“隔离掉”会引发异议的观念,否则它们经常会快速地散播开来。解决办法是让人看不见错误的观念,其途径则是使传播它们的后果糟糕得足以助长沉默。既然这一体系已经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公共一致性的波特金村,恰好掩盖了其支持的表面性(shallow-ness),因此,东德在1989年的突然崩溃让几乎每个人都深感意外,甚至对它的领导人和公民都是如此。

党内高度一致

任何政府都更愿意向其政治对手呈现一个统一的正面形象,并且把国家看成一个整体,但是对于提出绝对要求的独裁国家来说,这种一致性是决定性的。正如经常所注意到的,纳粹领导集团在幕后争吵不休,但是希特勒个人则命令绝对不允许公开的冲突。一条1942年9月的命令提醒党的领导人们:“元首反复强调,党的主要成员间的分歧无论如何必须控制以防进入公众耳中。”〔3〕他如此反复强调这一事实证明并不成功,但是它也揭示了一个统一的正面形象所具有的重要性。宣称真理的党不能让它的领导人提出相互冲突的真理。问题是,官员越有能力,他越可能看到其缺陷。正如迈克尔·巴尔弗对纳粹党的评论,“有能力的信仰者的稀缺意味着,取代他们的将是那些倾向于持保留意见的信仰者。”〔4〕

鉴于纳粹的“领导原则”,要在较低层级保持一致性相对容易些。下属绝对服从于他们的上级。这在实际操作中并非总是实

〔2〕 Goebbels, *Signale der neuen Zeit*, 34.

〔3〕 Partei Kamzlei, *Verfügungen/Anordnungen Bekanntgaben*, 1: 18.

〔4〕 Balfour, *Propaganda in War*, 50.

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纳粹党人享有一种普遍的感觉,他们正在向同一方向进发,“致力于为元首工作”。地方领导人会把他们自己看成是执行元首的意志,至少维持统一的外观。

133 东德的手段是不同的,但是目标仍相同。既然向苏联学习就是学会如何取胜,那么东德按照苏联的榜样来行动,就是将寻求一致性的压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首先从上层开始。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是有象征意义的。当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在1980年向其政治局同事做报告时,他强调了以下事实,“‘去年(1979)的中央委员会全体大会在全体一致的气氛下成功召开’,这促使安德罗波夫(Andropov)评论道,‘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结论。全体大会确实在全体一致的气氛下进行着’,随后佩尔谢(Pelshe)补充道,‘他们的决议也是获得了全体一致的采纳’。当契尔年科提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Secretariat)举行了51次会议,并且通过了1327条规章时,苏斯洛夫(Suslov)和安德罗波夫一起高声说道,‘就像政治局一样,书记处也在全体一致的气氛下完成了它的议程。’〔5〕东德从这些能人中收获良多。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在作为政治局委员期间(1984—1989年)只记述了两次生动的讨论,一次涉及罢免柏林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康拉德·诺曼(Konrad Naumann),第二次是在1989年9月,事态已经不可控制,开始崩溃。〔6〕除此之外,一致性获得了胜利。昂纳克甚至在1989年10月为他自己的辞职而投赞成票。

一致性在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中非常流行。党的领导人通常

〔5〕 Dmitri Volkogonov, *Autopsy for an Empire: The Seven Leaders Who Built the Soviet Regime*, trans. Harold Shuk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280.

〔6〕 Günter Schabowski, *Das Politbüro: Ende eines Mythos: Eine Befragung* (Reinbek: Rowohlt, 1990), 20.

用一种充满马列主义行话的“党八股”(“Party Chinese”)发言,并引用恰当的原句。在1961年,昂纳克把他关于一份即将出版的文件评论转达给了沃尔特·乌布利希。昂纳克评论道:“顺便提一下,我注意到,这一报告没有哪怕一次提及在第一书记处领导下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以贯彻第五次党代会决议。”乌布利希在这段话下划了线然后在页面空白处加上“!!”。〔7〕党的领导人通常用行话和标准的句子来填充其冗长的讲话。

如果领导人在他们内部达成了一致,那么它对下属的压力就更加沉重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允许少量公共讨论的规则下运转。它由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所统领。《简明政治词典》最终版清晰地界定了这一术语:“通过选举的中央实现党的领导,通过下级机关实现所有主要上级机关党委的定期选举,集体领导原则,各级机关党委向选举它们的人做定期报告;严格的党的纪律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机关和成员坚决执行上级机关党委的决议……【并且】各级机关的党员积极参与,以贯彻这些决议。”〔8〕考虑到下级机关在选举上级机关党委时很少有真正的发言权,并且上级不会准确无误地向下级做报告,那么结果是,这一体系不是民主的而是中央集权的。

1975年该党党章序言部分这样宣称:“任何宗派主义或小团体主义的征兆都与一个马列主义政党的性质相抵触,因而同党员身份不相容。”〔9〕大多数党员,服从严格纪律以避免对党的方针的任何细微偏离,并且在脑子里记住了大量因偏离而受惩罚的例子,因此他们明白利害而不会去打破常规。正如那些质疑党的决

134

〔7〕 SAPMO, DY 30/NL 4182/29: Honecker to Ulbricht on 22 October 1962.

〔8〕 Kleines politisches Wörterbuch (1988), 179 - 180.

〔9〕 Statut der Sozialistischen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Berlin: Dietz, 1975), 16.

议之智慧的人有时会被质问：“你认为你会比党的集体智慧更聪明吗？”〔10〕“是的”不会是期望的答案。

党的官员们明白，同其上级产生分歧不是一个明智的对策，表达任何的公开怀疑也是如此。沃尔夫冈·莱昂哈德（Wolfgang Leonhard），一位随后逃亡西方的东德建国团体（founding group）的成员写道：“我自己经常亲自看到，在与西方人交谈时，对于他所提到的对国内的最严重怀疑，一个全力应付的官员，将会固执地，而且显然充满完全的自信，为党的正式路线辩护。他的西方对话者随后也使自己坚定地相信，他正在同一个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者谈话。”〔11〕伴随着几乎每个人都试图使他的下属与上级相信他的意识形态正统性的是，对于人们实际在想些什么，存在着普遍的不确定。

这一体系找到了其他方法来强化对权威的服从。比如，东德历史晚期，兰多夫·舒尔茨（Landolf Scherzer）出版了一本名为《第一书记》（*Der Erste*）的小书。它追踪了巴特萨尔聪（Bad Salzungen）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县委第一书记，那时他从事该工作，并且在（为东德）讨论真正的问题上相对地开放。此书迅速销售一空。舒尔茨描绘了一次党员会议，会上他们很不高兴地了解到，该地区不会得到已经要求的新住房。第一书记提到他和他们有共同的希望：“但是我是一个党务工作者，因此我将不会再讨论这一问题了。并且我要求在座的每位党务人员了解，我们要把这一决议变成我们的观点，我们集体一致把它作为我们的观点。”〔12〕第一书记，一个勇于奉献和努力工作的人被塑造成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

〔10〕 *Materialien der Enquete-Kommission*, vol. 3, bk. 1, p. 322.

〔11〕 Wolfgang Leonhard, *Child of the Revolution*, trans. C. M. Woodhouse (London: Collins, 1957), 373.

〔12〕 Landolf Scherzer, *Der Erste: Protokoll einer Begegnung* (Rudolstadt: Greifenverlag zu Rudolstadt, 1988), 205.

的人,他懂得党的意志是其第一义务,而不管个人偏好是什么。在他的下属与公民们应该如何行动上,他做出了榜样。

99% 的选举胜利

纳粹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与党员至少在公众面前意见一致,这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大众支持的公开表现如何呢?没有人会怀疑 1939 年希特勒广受欢迎,并且学术文献中包含大量杰出学者的令人尴尬的论述,迟至 1989 年他们仍异常自信,基于东德拥有显而易见的 ability 来维持公众支持,它还会有一个漫长而稳定的生命周期。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在一个政治组织的成员与追随者之间做了区分。前者是那些受组织约束,并且愿意为之奋斗甚至战死的人。而追随者会投票支持这一政党,但是不能在危机时代指望他们。在他 1934 年纽伦堡集会的闭幕演说中,他期待着有一天每个德国人都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但是唯有最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才是党。在 1933 年 3 月对那些人进行广播演说时,戈培尔清楚阐述了他的目标。目标是赢得 100% 德国人的支持。“一旦我们达到了,广播必须帮助我们维持它,保卫它;必须灌输给他们我们这个时代的崇高使命,没有人能摆脱。”〔13〕

135

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暗示了这一困境。纳粹不可能期望赢得完全 100% 人口的支持。并非每个人都是真正的信徒。“最好的”德国人或许是党员,但是余下的 90% 呢?如何能够阻止他们冲破宣传的毒气(miasma)呢?解决办法是制造一种公众对政权保持压倒性支持的印象,它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满腹狐疑的人很少敢于公开表达其意见。正如奥托·迪特里希在 1935 年的纽伦堡集会

〔13〕 Heiber, *Goebbels Reden*, 1: 93.

中所说：“德国人的民意是国家社会主义。”〔14〕这为那些不如此想的人留下了很小的空间。

选举是一个推动一致性的具有启发性的实例。纳粹党人在1932年7月的帝国议会选举(Reichstag election)中获得了37%的支持。在1933年被操纵但部分是自由的选举中,他们正好获得了44%上下的支持。8个月后,纳粹党在1933年11月的投票中夺得了92%的支持。正常的劝说技术不能确保如此戏剧和快速的变化。兴登堡(Hindenburg)逝世之后于1934年8月举行的公民投票,其官方数据是88%,但在一些地区,它都在70%以下。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意外。《我们的意志与方法》中一篇文章评论道:“8月19日的情况证明还有10%的德国人仍然在一边观望。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为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赢得更大部分人的支持。”〔15〕“赢得”一词表达了一种真正的劝服的努力,但也有可能再次失去。不过,流失又是不可接受的。纳粹党确信1936和1938年的公民投票会产生99%支持的结果。没有人相信几乎每个德国人都会以一种方式思考,但是一个理性的人也不知道多少人不会按照希特勒所期望的那样思考。这种不确定性是关键的。在面对不确定时,人们会管住自己的嘴巴。

东德对选举一致性的兴趣不会少于纳粹。在17次人民议院(Volkskammer, 国家议会)和公共选举中有16次,它的官方数据是,超过99%的参与者投票给了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候选人,即党所许可的候选人名单。这一数字在1989年5月7日最后一次公共选举中承认下降到98.85%。〔16〕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鼓

〔14〕 引自 Baumann, *Grundlagen und Praxis*, 44。

〔15〕 Alfred Dietz, “Das Wesen der heutigen Propaganda,” *Unser Wille und Weg* 4 (1934): 30.

〔16〕 Peter Joachim Lapp, “Wahlen und Wahlfälschungen in der DDR,” *Deutschland Archiv* 29 (1996), 92-93.

励投票者参与投票。选举甚至为普通公民提供了施加压力的机会。某人也许不会投票的一个迹象,有时会推动一个总是很顽固的官员对一个公民的要求做出回应。

1961年9月17日的选举,正值柏林墙建起之后一个月,它尤其有意思。东德尽其所能以制造大众支持的幻觉。几十万次的选举集会鼓励公民们投票。到8月22日为止,仅马格德堡专区(Magdeburg)就举行了25 072次集会,644 326人出席,占到选举人口的53%。这些集会通常指向特定的群体,比如医生或基督徒。每场集会平均参与人数在30人以下,这是一个鼓励投票的巨大资源保证。^[17]选举的结果从未被怀疑(尤其考虑到百分比能够被操纵到99和后面恰当的小数点位数)。目标不只是赢得选举还是向公民施压以建立一种服从的公共仪式,同时也是投票赞成柏林墙。虽然公民们有权利秘密投票,但期望是,公民们会公开投票。正如1961年哈勒专区的一个口号所言:“不愿意公开为国民阵线候选人投票的人就是在支持战争。”^[18]由于这种清晰的表述,很少有德国公民利用了秘密投票权。

选举相对来说是不存在问题的。以错误方式投票有令人不愉快的后果,而且收获甚微。大多数对政权无甚热情的人做出了实用主义的决定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日常行为如何呢?人们会抱怨,而且是经常的。

临界点

纳粹党人写了大量有关公众态度的报告,当然它们的准确性

[17] 参见1961年的选举报告, SAPMO, DY 30/IV A2/9.02/191。

[18] Eberle, *Kopfdressur*, 92. 依照同时存在的宣传指示所言,这被用作人们意志的一种表达,而非一种命令,虽然很难想象听者完全不将其看成是威胁。

各不相同。比如像这份来自明斯特(Münster)的1935年报告是常见的：“人们的情绪，尤其是工人、商人和体力劳动者，是沮丧的。一系列迹象表明，广大群众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热情已经不如数年前了。”〔19〕纳粹党卫军情报机构(SD)的战时报告充斥的是人们的批评性评论。对付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爱抱怨的趋势要求复杂的机制或办法。抱怨不能被消除(按照戈培尔的话说，“心灵的肠胃运动”)，但是可以让其更不可见。

埃吕尔注意到，所有的现代宣传体系，包括民主的体系在内，都为寻求一致性而努力，而当公众有太多抱怨时，这就是不可能的。〔20〕差异在于，由于极权主义体系声称他们主张的真理不容争议，那么它们需要的就更多。纳粹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明白，对任何形式的公开分歧保持永远的警觉是必要的。

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发展了一个观念类似流行病的看法。〔21〕某些观念，就像某些病症一样，比其他的更加“具有传染性”。我们并非总是可以事先预测出哪种流感变体或观念会迅速蔓延开来。尽管如此，在确定的“临界点”，已在人群中足够广泛传播的疾病或观念会变成传染性的，而且经常是令人吃惊的意外。流感和时尚以相似的方式传播。它们也能以相似的方式被阻断。无需每个人为了产生效果而注射疫苗。如果已有足够多人这样做了，疾病就会减弱而不是蔓延。同理，如果足够多的人不情愿传播某一观念，那么它也会逐渐减弱。极权主义的

〔19〕 参看 Kuroпка, *Meldungen aus Münster*, 153 警察局报告。

〔20〕 Ellul, *Propaganda*, 11.

〔21〕 Malcolm Gladwell, *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2000). 这不是一个新看法。古斯塔夫-勒庞(Gustav Le Bon)在1895年就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观念、意见、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拥有的传染性力量就像细菌那般强烈。”参看 Gustav Le Bon,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New York: Viking, 1960), 126.

领导人承认,必须阻止某些观念传播。他们更进一步意识到,减少愿意表达一种观念的人数会导致这一观念在公共话语中消亡。

1939年5月,一个纳粹党分区领导人写信给盖世太保(Gestapo),提及一个公开抱怨希特勒与纳粹党的公民:“我极力主张你们尽全力设想一下这个人所应接受的最严厉惩罚……牧师(Ch.)似乎已经对新教会(Neukirchen)及其周边地区人口造成了扩散性的影响。”〔22〕这个人显然被好好地加以考虑,而他的公开评论也是有影响的。两个体系的领导人都拥有东德“文化部长”克劳斯·哈普克(Klaus Hopke)随后所说的“对言辞的恐惧”。言辞是有传染性的,而口头语比书面语更加强烈。

伊丽莎白·诺艾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 - Neumann)有关公共舆论的沉默螺旋理论(spiral of silence theory)表明,对于区分各种观点哪些能够安全地表达,哪些则不能,我们有着很好的判断力。〔23〕“危险的”观点从公众的讨论中消失了。甚至提起它们也是有风险的,至少,在公民同胞们看来是不友好的。我们知道什么会引发不愉快,从而寻求避免它。蒂默尔·库兰(Timur Kuran)提议,更好的表达应该是“谨慎的螺旋”(spiral of prudence)。人们通常会隐藏他们的真实观点,进行自我审查,只是公开提出与其私人信念相冲突的观点,但他们明白这会给他们带来好处,或允许他们避开不利局面。〔24〕

138

公共一致性通过两种方式可以达到:一方面,体系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贿赂(social bribery)来鼓励所期望的行为;另一方面,通

〔22〕 Gerhard Paul, *Staatlicher Terror und gesellschaftliche Verrohung: Die Gestapo in Schleswig-Holstein* (Hamburg: Ergebnisse, 1996), 333.

〔23〕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Die Schweigespirale: öffentliche Meinung- unsere soziale Haut* (Frankfurt: Ullstein Sachbuch, 1982).

〔24〕 Timur Kuran,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3.

过恐吓与强力,它们阻止不期望的行为。其结果是,至少从表面看来,是广泛的公众支持。

许多行为通过它所带来的奖赏或所避免的麻烦而得到鼓励。我已经讨论过投票行为;投票花费很少,但不投却可能带来相当多的不便。群众组织是另一个例子。纳粹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本身都是群众组织。希特勒的党员目标人数,从未达到过,只有10%。〔25〕1988年,东德的成年人口中1/6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员。任一体系下,成为一个党员就把一个人置于党的纪律之下,它大大地鼓励了服从的行为。对那些不是党员的大多数人来说,其他组织还有各自的规范,这其中的成员也要宣誓遵从这一体系的各种要求。

第三帝国独一无二的最大组织是德国劳工阵线(DAF)。90%的德国工人是其成员。〔26〕纳粹冲锋队、纳粹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纳粹妇女组织以及所有其他党的附属组织试图吸纳余下的大多数人口。不属于这些组织中的某几个,对一个人来说就会是不便的。它会让一个人在比如像尤里乌斯·施特莱彻的周刊《先锋报》中被提及,而它臭名昭著的专栏有时会公然抨击那些不是这些合适组织的成员的人。

东德也有大量可明智地参加的组织。几乎所有的青年都加入了自由德国青年的不同部门。德苏友好协会(Society for German-Soviet Friendship, DSF)到1989年已拥有620万的会员(超过半数的成年人口)。它格外受欢迎,因为加入其中就以名义上的会费与最低程度的义务提供了遵从的证据。加入德国自由贸易联合

〔25〕 Amton Lingg, *Die Verwalt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3rd ed. (Munich: Franz Eher, 1940), 163.

〔26〕 Jost Dülffer, *Nazi Germany, 1933—1945: Faith and Annihilation*, trans. Dean Scott McMurray (London: Arnold, 1996), 103.

会(FDGB)的压力同样是巨大的。

一般来说,向公民要求太多不会起作用。比如,1952年有一场运动,让公民们写数百万封信给在西德的朋友、亲戚和曾经的同事以劝说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个包含有趣标题“在统一与和平的斗争中你的信是一把启蒙的锐利武器”(Your Letter is a Sharp Weapon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Struggle for Unity and Peace)的小册子提供了一般公民会写的信的好坏两方面例子。书信写作小组定期会合讨论传递有效信息给西德人的种种方法。这些都由国民阵线来组织,一个负责协调许多东德活动的机构。它宣称,类似的小组已有数千个,但是还需要数万个。尽管如此,可以理解,公民们并不情愿花许多时间来写宣传信,这一运动似乎不久之后就偃旗息鼓了。〔27〕

139

几乎每个东德公民都同时是几个群众组织的成员,而且大多数人在其职业生活中担任过“领导”职务。在1979年,比特费尔德化学制品厂有1.9万名工人,97%的人隶属于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84%参加了德苏友好协会,71%的年轻员工还是自由德国青年的会员,并且有24%加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除此之外,这些组织需要大量的公职人员。仅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就为它比特费尔德2/3的会员设立了职务。〔28〕

要劝服人们以牺牲空余时间为代价去承担只提供很少的真正权力的任务,通常来说并不那么容易。温和的或不那么温和的压力会劝说人们去接受这些经常让人讨厌的任务。毕竟,接受德国

〔27〕 *Dein Brief eine scharfe Waffe der Aufklärung im Kampfe für Einheit und Frieden* (Berlin: Büro des Präsidiums des Nationalrates des Nationalen Front des demokratischen Deutschland, 1952).

〔28〕 Lutz Niethammer, Alexander von Plato, and Dorothee Wierling, *Die Volkseigene Erfahrung: Eine Archäologie des Lebens in der Industrieprovinz der DDR: 30 biographische Eröffnungen* (Berlin: Rowohlt, 1991), 330.

自由贸易联合会或德苏友好协会中的一个职位或者担任鼓动员,更可能会有一个假期,或是升迁,或是让一个人远离繁重的任务。一个希望终止其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会员身份的妇女被以下事实所劝止了:她的整个工作集体的小额奖金取决于100%的会员资格。〔29〕一个对加入德苏友好协会有着更少兴趣的学校心理学者印证了她所遭遇到的压力:“许多观点认为,会员身份显示了一个人对国家、社会主义与苏联的态度,而德苏友好协会的会员身份则是一个社会主义教师的根本特征,否则的话,教师集体是不可能赢得‘社会主义教师共同体’(Socialist Teacher's Collective)这一称号的。”〔30〕这些论点很有力量,因为它们是由朋友和同事们提出来的。这一体系不仅惩罚未能加入特定组织的个人,还包括他们的同事。鉴于集体在东德的重要性,它会阻止人们去做一些可能给他们自己或朋友带来麻烦的事情。

这些群众组织的事实是重要的。埃吕尔注意到,有效的宣传要求社会的碎片化,以及为那些拥有共同观点的人提供庇护的小团体的消失。〔31〕其结果是,被剥夺了小团体的温暖与支持的个人变成了大众的一部分,他们要么只有很少的共同点,要么都提心吊胆。威廉 S. 艾伦(William S. Allen)为他研究纳粹时期诺特海姆(Northeim)的一章取名为“社会的自动运行”(Automation of Society)。他描述了纳粹党人是如何迅速地瓦解了现存俱乐部与团体的多样性,从而将它们纳入更大的群体之中,然而这些群体不再服务于具有相似思想的人群的社会互动目的。〔32〕通过同样的方

140

〔29〕 *Materialien der Enquete-Kommission*, vol. 7, bk. 1, p. 210.

〔30〕 *Materialien der Enquete-Kommission*, vol. 2, bk. 1, p. 322.

〔31〕 Ellul, *Propaganda*, 9.

〔32〕 William Sheridan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 1922—1945*, rev. ed.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1984), 217—232.

式,东德也使独立的俱乐部或团体难以为继。教会是少数几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之一,即使在那儿,东德也努力缩小其影响范围。比如,1964年一份关于改进无神论宣传的报告提及,要通过耐心细致和坚持不懈的工作诱使参加者们远离教会文化活动。〔33〕出席教会音乐会的人可以被吸引来参加其他的活动。

教育也获得了特别的关注。〔34〕来自最早年代的孩子懂得了什么适合在公共场所诉说。教师们是精心挑选的,教科书受到严格的指导。青年组织中的成员身份出于现实目的是必须的。1959年一条传达给父母的信息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你的孩子的教育的起点开启了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人生中的系统准备,以服务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帮手是恩斯特·台尔曼先锋队(Pioneer Organization),孩子们的社会主义群众组织……如果你同意你的孩子加入先锋队,那么它将对你的孩子的发展是最有益的。”〔35〕父母们要抵制这些信息需要莫大的决心。

威尔弗莱德·彼司勒(Wilfried Poßner),随后成为自由德国青年的头目,在其学生时代拥有启发性的经验。他和同学们反对歌颂1967年5月庆典上的一个口号(“牛和蠢驴都阻止不了社会主义进步的步伐”),这激起了党的愤怒。他们也为公开表演的歌曲做了一个糟糕的选择(比如,“花落何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当他们提议将其学校更名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33〕 SAPMO, DY 30/J IV 2/3/999: Verbesserung der weltanschaulichatheistischen Propaganda (1964), 28.

〔34〕 对东德教育体系的一个出色解释,参看 Rodden, *Repainting the Little Red Schoolhouse*。

〔35〕 引自 Heinz Elmar Tenorth, Sonja Kundella, and Andreas Paetz, *Politisierung im Schulalltag der DDR: Durchsetzung und Scheitern einer Erziehungsambition* (Weinheim: Deutscher Studien, 1996), 155.

(Bertholt Brecht)时,当局告诉他们,他们存在敌意以及精英主义的趋势,因而学校应该用一个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作家来命名。〔36〕对任何卷入其中的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个个人的灾难,它还有教育意义。

自由德国青年的初创时期是艰苦的,甚至进入 1950 年代,它的成员比例也仅在适龄人群的 35% 左右徘徊,这要部分归咎于教会的决定性抵抗。到了 1960 年代,已达到完全满意的接近全体加入的水平。〔37〕一些父母可能本来就不是这个国家的热烈支持者,却仍得到了一个清晰的信息,要是他们的孩子不加入,那么孩子就会变成局外人。压力起了作用。我一个东德的朋友记得,她的学校里有两个人没有加入,其中一个是她。成为局外人的压力导致她央求其父母允许她加入。

141 除此之外,积极加入这些群众组织还会有具体的好处。到 1980 年代,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控制了超过 500 万个假期机会,还分配 180 万个国内和 1.6 万个国外旅行的机会。自由德国青年则运作一个青年旅社网络,也分配令人垂涎的国外旅行机会。〔38〕这些机会经常不会给予那些没有宣示适当忠诚的成员。

这些都是劝说人们按照许可的方式行动的所有努力。还存在着施加给人们的巨大压力,以使他们不去做一些可能削弱一致性的公共外观的行为。这种压力并非不可避免地是压迫性的——一些人几乎感觉不到它。而且它也以多种形式出现。

所有公民都成为了温和强迫过程的一部分。邻居作用于邻

〔36〕 Poßner, *Immer bereit*, 14 - 19.

〔37〕 即使在东德晚期,还有让人颇感麻烦的地区,通常是在农村,那里教会的控制仍很强大。比如,在 Motzlar 村,85% 的年轻人迟至 1987 年都避免加入青年奉献组织,不过这是罕见的。参看 Scherzer, *Der Erste*, 63.

〔38〕 *Materialien der Enquete - Kommission*, vol. 2, bk. 2, p. 1268 - 1273.

居,从动机来看,有时是好的,有时是坏的。在希特勒的德国,一个人在进入当地酒馆时,可能会看到一个标志,它预示着人们应行纳粹礼。那些没能在恰当场合悬挂旗帜的人收到邻居们关心的提醒,不是所有人都是好事者。正如一位妇女在她的母亲慢慢适应服从之后所回忆的:“人们总是来问为什么你还不把旗帜挂起来,因为是希特勒的生日,如此云云……你差点就要被送去监狱了。如果你不那样做,会非常危险。一个接一个的人过来,按门铃,然后说你怎么还没有把旗帜挂起来。最后,我的母亲买了一面虽小但名副其实的旗帜。”〔39〕赫尔穆特·贝伦斯(Helmut Behrens),一位对纳粹并不友好的大学化学家,仍然警告他的朋友们当心他们的公开主张。写到一个实验室助理时,他回忆道:“他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坚定反对者,我不得不反复警告他,对他所说要更加谨慎,尤其是同忠诚的党员们交谈时更是如此。”〔40〕

这些都是朋友们的警告。还有许多不够友好的人,因他们公民同胞的各种过错行为,而迫不及待地告发他们。盖世太保和其他的纳粹权力组织分散得太稀疏,不可能发现每一句不好的言辞,它们依赖的就是告发。罗伯特·盖拉特莱(Robert Gallately)和其他人已经证明存在大量向国家机关告发的材料。〔41〕施特莱彻的周刊《先锋报》印发了1935年到战争爆发期间,超过6500个有名有姓或可辨认的个人因反犹主义不够积极

〔39〕 Alison Owings, *Frauen: German Women Recall the Third Reich*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2.

〔40〕 Helmut Behrens, *Wissenschaft in turbulenter Zeit: Erinnerungen eines Chemikers an die Technische Hochschule München, 1933—1953* (Munich: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1998), 48.

〔41〕 Robert Gallately, *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而被告发的材料。许多人只是表达了一般的礼貌或同犹太人有商业往来。〔42〕其他纳粹组织和出版物也刊登了那些不按所期望的方式行动的人的名字,并且纳粹党人毫不犹豫地逮捕,有时是处决那些违反规则的人,而这些规则是用来抵制公开反对意见的。

142

东德在保护公众远离传染性观点上甚至更加不遗余力。它所面对的巨大问题是,这一国家的几乎每个人都能收听从“阶级敌人”到西方世界这样大范围的广播电视节目。我已经提到过,阻止人们收听或收看西德媒体的各种努力都失败了。然而,它还采取了许多措施,至少阻止人们公开谈论所了解到的内容。

教会领导人汉斯-奥托·福瑞安(Hans-Otto Furian)评论道:“毕竟,东德是一个国家,它对任何其他事情的恐惧都无法与对公众的恐惧相比。”〔43〕党和国家竭尽全力在大事和琐事上始终保持一个统一的公共舆论。比如,一直以来,东德消费品都很短缺。一个人不能因此而责备这一体系,但是没有人会假装问题不存在。在1980年,廉价餐具极为奇缺。德国统一社会党文件中一条记录讨论了这一形势:“批发商报告说全部都在出口。经理不能告诉销售员,也不能把它传递给消费者。如果这里的经理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但这不意味着同样的观点会被该城市的其他商店所运用。相反,每个商店有它自己的解释,通常是很不同的。不过,至少我们必须在同一城市给出相同的解释!”〔44〕真相没有前后一贯重要。有关宗教信仰徒的文献讨论“神圣的谎言”,这些谎言

〔42〕 Randall Bytwerk, *Julius Streicher: Nazi Editor of the Notorious Anti-Semitic Newspaper Der Stürmer*, 2nd ed. (New York: Cooper Square, 2001), 199.

〔43〕 *Materialien der Enquete-Kommission*, vol. 6, bk. 1, p. 373.

〔44〕 SAPMO, DY 30/vorl. SED 33899; Aktennotiz über eine Aussprache im Centrum-Warenhaus Berlin, Alexanderplatz, 14. 2. 1980.

据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们服务于神圣的善。东德有许多类似的“神圣谎言”。

或者我们考虑一个工人的例子。1962年,针对《新德国》有关苏联太空飞行的一期特别版,他对此评论道:“一个人可以用那份报纸(rag)擦屁股。”一个无意中听到这一评论的党员“组织了一次全体工作队(brigade)会议以让他认清目前的形势。‘他道歉了,然后说,他不是那个意思。’”〔45〕他的公开受辱清楚地向其他人表明,轻率的主张是要承担后果的。

国家安全局史塔西(Stasi)的告密者网络在东德远比在纳粹时期更加严密。东德成年人约有2%同史塔西有某种关系。那些乐意告发邻居的人形成的网络得到了很好的发展。〔46〕东德花40年时间建立了一个用来对付异议人士的完善体系,这些人会面临孤立、职业压力、监禁、移民或驱逐等精心计划的复杂困境。那些提供了任何不友好观点之迹象的人会受到坚决的处理,如此的坚决,以至于史塔西估计,到1989年春天,整个国家只有2500名激进分子和60名异议“骨干”分子。〔47〕他们的界定是重要的。一般来说,成功是通过公民们被阻止在公共场合表达不友好观点的程度,而不是他们内心想些什么来衡量的。到1989年秋季,结果证明,大多数人不满意这个国家,但是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宁愿冒着被惩罚的危险,公开表达异议。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鉴于东德成功地控制了公共话语,普通公民面对这种高压,无暇感受对抗的态度究竟有多广泛。迪克·菲利普森(Dirk

143

〔45〕 Landesarchiv Berlin, BPA/SED IV/4/06/261; Bericht zur Lage; 29. 8. 1962, 3-3a.

〔46〕 Eric A. Johnson, *Nazi Terror: The Gestapo, Jews, and Ordinary German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367.

〔47〕 Charles S. Maier, *Dissolution: The Crisis of Communism and the End of East German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73.

Philipsen)援引了一个莱比锡异议人士,谈及1980年代中期的形势。整个国家存在许多分散的异议组织,但是它们经常意识不到彼此的存在。“关于所有这些,真正可怕的事情是,没人知道这些事情正在其他地方发生。要是了解情况那可能会有多么大的不同。然后,你就不会感到如此孤立无援了。它会极大地激励我们。”〔48〕

为了确保公共一致性的外观,东德采取了所有必要的步骤。依照东德的法律,为了一个相同的公开目的,3人以上的集会就需要批准。比如,1983年,莱比锡的教会官员被告知,对于像3人以上的举烛祈祷这样的公共集会需要批准。〔49〕史塔西和其他军事力量防备任何不被许可的观念的公开宣示。1988年,一个约150人的群体在教会集会结束后离开莱比锡的尼克莱教堂(Nikolai Church),穿过这一城市。史塔西则现场带着武器随行。按照史塔西文件上的报告:“行进中的参加者未携带旗帜、象征物或其他明显的标志……这一群体对公共安全和秩序没有影响;它只会引起

〔48〕 Dirk Philipsen, *We Were the People: Voices from East Germany's Revolutionary Autumn of 1989*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49.

〔49〕 Christoph Kaufmann, Doris Maudis, and Kurt Nowak, *Sorget nicht, was Ihr reddet werdet; Kirche und Stadt in Leipzig im Spiegel kirchlicher Gesprächsprotokolle (1977—1989): Dokumentation*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1993), 203. 与此同时,基督徒学生开玩笑地引用了梅尔克第二章第一节的一句话(I Mielke 2:1):“无论哪里,两个或三个人聚集起来反对我的意志,在那里,我就在他们中间。”这是对马太福音第18章第20节(Matthew 18:20)基督之话的模仿:“因为无论哪里,两个或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在那里,我就在他们中间。”参看 Hanalore Kleinschmid, “Der Mut zum Nein: Ein Bericht über Mechschen, die sich der Stasi verweigerten,” *Deutschland Archiv* 28 (1995): 355.

公众轻微的关注。”〔50〕最后一点是重要的。几乎不会有人知道正发生着什么。

示威游行也是被禁止的,即使它们有着正当的主旨。1983年,魏玛(Weimar)的一个团体想在柏林举行一场反对北约的示威游行。困难在于,虽然他们支持国家政策,但它会是一场独立的示威游行。到了计划当天,柏林约有100人被捕。一名参加者乌尔里奇·波普(Ulrich Poppe)注意到:“那是一种恐惧,这个国家有的,它反对一场独立组织的示威游行,独立于它的宗旨!”〔51〕领导人们当然意识到,它的公共支持所依赖的基础是不稳固的。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在德国联邦议院有关东德的听证会上,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德国统一社会党是一个党——虽然可能有些人不这么想——它从未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我们只有通过忽略我们是否拥有大多数的支持才能前进。如果我必须去等待这大多数,我不得不选择社会民主的道路,而那却是我们会鄙视的。

144

只有通过隐瞒以下事实,即人口中的大部分,也许是大多数是反对我们的,我们才能继续存在下去。〔52〕

研究东德的著名西德历史学家赫尔曼·韦伯(Hermann Weber)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从开始到崩溃,东德的根本性缺陷在于任何民

〔50〕 Christian Dietrich and Uwe Schwabe, *Freunde and Feinde, Friedensgebiete in Leipzig zwischen 1981 und dem 9. Oktober 1989. Dokumentation*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1994), 198. 一个游行参加者的解释描述说,它比斯塔西报告所揭示的拥有更多的公共曝光度(Ibid., 198-199)。

〔51〕 *Materialien der Enquete-Kommission*, vol. 6, bk. 1, p. 274.

〔52〕 *Materialien der Enquete-Kommission*, vol. 3, bk. 1, p. 87.

主合法化的缺席。”〔53〕一个压制分歧的体系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困境。它明白,它的支持可能是表面的,但是它用以施加公共一致性的方法越严酷,公民们隐藏真实看法和显示许可看法的行为就越勤勉,而这个体系就越担心它的公民不站在它这边。

看不见的教会

考虑到教会有一套世界观,一种完全外在于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体系的权威来源,它还太引人注目了,那么它(不管是天主教的还是新教的)对二者来说都是一个独特的威胁。庞大的和古代的教会不能被忽视。上帝(Almighty)的广泛信念早于两个体系,而且上帝仍然有追随者,他们有时还会把其宗教上的忠诚置于对统治者的政治体系的忠诚之上。没有哪个体系感觉自己有相当的能力可以通过强力废除教会,但是它们也不能轻率地容忍一种制度独立于支配性的正统之外。

不像马克思主义者,纳粹党人声称要推进和保卫宗教。他们意图吸收宗教,而非取缔它。希特勒通过有礼貌地提及上帝来点缀他主要的演讲。纳粹的纲领誓言党会支持一个“积极的基督教”(positive Christianity)。国家社会主义清楚地知道,积极的基督教应该如何表现。教会不管对政治说了些什么,这都没有意义,它的活动完全限制在精神领域,而且基督教的精神主张将会同信仰者的世俗追求完全分离。正如希特勒在1933年所说:“宗教和教会将保持它们的自由。但是我们要负责政治。”〔54〕一项典型的纳粹措施在1935年出现:“普鲁士整个国家

〔53〕 Hermann Weber, *Geschichte der DDR* (Munich: Deutsche Taschenbuch, 199), 16.

〔54〕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1: 347.

(Prussia)的所有天主教青年团体(Catholic youth associations)禁止参加任何非纯粹宗教性质的活动。尤其是,天主教青年不能再穿制服,或从任何角度看与制服相似的衣服;他们不能公开佩戴会将其与天主教团体联系起来的胸针或饰物,也不能公开展示天主教的旗帜和标语;他们被禁止参加游行或徒步旅行以及露营;他们还禁止参加所有组织起来的体育活动。”〔55〕新教组织也遭遇了相同的对待。

可接受的宗教活动躲藏在教会高墙之后,除了那些出席的人,其他人都看不到。纳粹党人不断地抱怨“政治的教士”(political clergy),这意味着任何牵连教会的活动不仅仅是教会的。第三帝国期间,大量基督徒被监禁,有时还被杀害。实际上,纳粹党人拒绝承认教会作为一个拥有世界观的组织的地位。纳粹才可以谈及一切事情。教会要把它的活动限制在“纯粹精神的”领域。纳粹党卫军在战争期间密切监视着教会,更不要说它的种种努力超越了它的“恰当”角色。比如,天主教徒在1940年5月的圣三主日(Trinity Sunday)为青年人组织了一场全国范围的“信仰典礼”(festival of faith)。纳粹党卫军报告说,富尔达(Fulda)的主教说过基督信仰比“任何世界观都更有价值”。〔56〕虽然天主教徒已经避免过于敌意的言辞,但是用不着怀疑,那对教会成员或纳粹党人意味着什么。

纳粹党人的目标是让教会尽可能地不露面,以消除它作为一个有着强大和全方位世界观的替代性组织之影响力。1942年一份传递给宣传员的简报命令党的演说家应完全避免在公共集会上谈及宗教问题:“最重要的是,宗教事务上的争论已经浮出水面,在此情况下,演说家们让自己被诱导进这些事务的一场讨论中。

〔55〕 Johnson, *Nazi Terror*, 270.

〔56〕 Boberach,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4: 1217.

这恰恰给了教会想要的：一种公开讨论。”〔57〕国家机关密切监视着教会，当监督不充分时，它们又会焦躁不安。比如，来自巴登（Baden）的党内文件抱怨，越多人卷入教会，他们就越少参加党的活动；许多集会就发生在天主教牧师公馆（parsonage）那“密不透风的门”背后，在那里，没人会告发有人说了些什么，在那里，不存施加影响的可能性。〔58〕

146 教会成员人数仍是庞大的，虽然参与并不总是那么热烈。甚至在1939年，95%的德国人仍保持教会成员身份，而这也包括大多数党员。〔59〕涉及宗教礼仪，教会的支配是最清楚的。尽管纳粹党试图在许多领域建立各种仪式，但它在出生、婚嫁与葬礼的仪式上只有不到1%的“市场”。〔60〕人们会说“希特勒万岁”，但是到了入葬的时候，他们更喜欢让一名牧师作他们的领导人。

一个人一定能回想起，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教会成员身份是名义上的，这更多攸关传统主义而非强烈的信仰。在乡村，教会的控制经常是强大的，但在城市则另当别论了。比如，在柏林，70%的人是教会成员（他们得支付教会税），但是只有9%的人会参加圣餐仪式（communion），在1932年甚至整年只有一次。〔61〕

〔57〕 Myers Collection, Kreisleitung Eisenach/56: Propaganda-Parole Nr. 3 (1942).

〔58〕 参看1942—1943年的众多报告，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series T-81, roll 176. 这些是Gauschulungsamt Baden的文件。

〔59〕 Marlis G. Steinert, *Hitler's War and the Germans: Public Mood and Attitud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ed. and trans. Thomas E. J. de Witt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7), 53. Steinert提供了许多有关纳粹监管教会的细节。

〔60〕 Boberach,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15: 6114-6118.

〔61〕 Manfred Gailus, “Die andere Seite des ‘Kirchenkampfes’: Nazifizierte Kirchengemeinden und ‘braune’ Pfarrer in Berlin, 1933—1945,” in *Berli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Jahrbuch des Landesarchivs Berlin*, 1955, ed. Sigurd-H. Schmidt (Berlin: Gebr. Mann, 1995), 150-151.

然而,即便对于那些不相信基督信仰的人而言,教会仍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一个纳粹意识形态之外各种信仰的停留所。这是不可接受的。

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指望,一旦战争取胜,他们就会清算教会,但是在这之前,他们还须被迫容忍它们的存在,并且竭尽全力限制其影响。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采取强制性行动只会帮助教会而非伤害它。比如,明斯特(Münster)的盖伦(Galen)主教公然谴责纳粹的政策(比如,取消宗教学校和安乐死)。他在天主教人口密集地区大受欢迎。纳粹党惧怕他,但是得出结论说,逮捕他只会引发真正的问题。正如这一地区的宣传领导人在1941年写给戈培尔的信中所言:“反对明斯特主教的警察措施几乎不可能成功。他要是被逮捕和定罪的话,教会将把他看成是殉道者,而其他主教和牧师将会采纳他的主张。”〔62〕许多不够知名的教士和牧师则被逮捕,不过这通常只引发了地方上的抗议。

东德从教会的可信性所受的摧残中获益,这种伤害来自于它对纳粹主义经常不够充分的回应。作为一个公开声称无神论的组织,德国统一社会党几乎不可能赞成宗教。东德官方的立场是,“宗教的发展、转化和逐渐消亡遵循的是人类生活不可避免的进程。”〔63〕如同国家一样,马克思主义预测宗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消亡,但是,教会没有像该党所希望的那样迅速走向灭亡。该

〔62〕 Kuropka, *Meldungen aus Münster*, 537.

〔63〕 *Kleines politisches Wörterbuch* (1988), 828. 有关东德教会与国家关系的一个综合性研究,参看三本书:Gerhard Besier: *Der SED - Staat und die Kirche: Der Wege in die Anpassung* (Munich: C. Bertelsmann, 1993); *Der SED - Staat und die Kirche, 1969—1990: Die Vision vom “Dritten Weg”* (Berlin: Propyläen, 1995); and *Der SED - Staat und die Kirche, 1983—1991: Höhenflug und Absturz* (Frankfurt: Propyläen, 1999)。

党试图通过一场协同运动来加快这一进程。〔64〕这些努力采取了有趣的做法。一位牧师记得，他在1960年代初期收到过一本传记体的世界史词典，它以某种方式避免提及耶稣基督。〔65〕

147 像纳粹党一样，德国统一社会党也试图将教会限制在纯“精神”的活动中。史塔西的头目埃里希·米尔克(Erich Mielke)在1956年写道：“因教会与国家的分离，东德现存的教会已经失去了它们对人们很重要的一部分影响，而且会越来越被迫将其活动限制在纯教会事务中。”〔66〕艾尔哈特·诺伊贝特(Ehrhart Neubert)牧师注意到，东德成功地限制了教会在公共场合的作用：“教会不再有机会在公共场合(比如，媒体)独立而自由地表达自己。它们只能‘在教会内部’某些事务上发表看法，正如规章所表达的。甚至教会所有的报纸、杂志与发行的电影都要服从于严格的审查。批评性的公共观点，甚至类似的一些迹象都被立即禁止。教会报纸的分发经常受到妨碍。”其结果是教会执行自我审查。〔67〕宗教领导人担心丧失他们仅有的一点公共发言权，普遍地避免发表一些会冒犯党的看法。

东德确实通过各种方式使教会“社会主义化”。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是4个获许可的非德国统一社会党(non-SED)之一。它约有14万成员，因而提供了一种方式将基督徒融入政治结构之中。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晚期，它甚至

〔64〕 比如，参看 Mark Allinson, *Politics and Popular Opinion in East Germany 1945—1968*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87—112, 有关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图灵根州努力削弱教会的控制。

〔65〕 *Materialien der Enquete-Kommission*, vol. 3, bk. 1, p. 87.

〔66〕 Gerhard Besier and Stephan Wolf, *Pfarrer, Christen und Katholiken: Das Ministerium für Staatsicherheit der ehemaligen DDR und die Kirchen* (Neukirchen: Neukirchener, 1991), 183.

〔67〕 Ehrhart Neubert, “Meister der Legende: Ein Kommentar zum Text des ‘Insider-Komitees,’” *Deutschland Archiv* 27 (1994): 395.

发现自己对教会有点儿感情。该党热情支持 1983 年的路德年 (Luther Year)。^[68]《承受彼此的重担》(*Bear One Another's Burdens*, 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一部令人意外的、充满同情的电影在 1988 年发行了。它呈现了一个年轻的路德派教士同一名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斗争, 而他们同是一个结核病疗养院的病人。一开始, 他们视对方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但是随着电影剧情的发展, 他们相互给对方以温暖。正如柯尔特·哈格尔在一份给埃里希·昂纳克的备忘录中所评论的, 这部电影的主旨是: “为了和平与社会主义, 人们必须共同奋斗”。^[69]更多的例子不胜枚举。它们是一些尝试, 试图将宗教的能量导向被许可的方向, 同时也为了与更伟大的目标保持一致: 将教会限制在精神的领域。除此之外, 教会则尽可能地不要露面。

通过为一些人提供避难所, 教会让德国统一社会党感到不安, 这些人并非为它的神学所吸引, 而更多地是它所提供的安全庇护。正如约翰·伯吉斯 (John Burgess) 所观察到的, 教会所拥有的更大重要性, 乃在于它是“一股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力量”。^[70]我在 1989 年 7 月参观了一个莱比锡教会的替代性教会会议 (Statt - Kirchentag), 那是在福音派教会会议 (Kirchentag) 期间举行的, 有着浓厚生态主题的另一非传统集会。它要比一个人在东德所期望找到的类似集会远开放得多。当然, 事态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但

[68] 详细可参看 SAPMO, DY 30/vorl. SED 33276: Ordnung für die Koordination von Maßnahmen der kultur - politischen Propaganda, Agitation und Öffentlichkeitsarbeit anlässlich der Martin - Luther - Ehrun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3.

[69] SAPMO, DY 30/vorl. SED 42314/2: Hager to Honecker on 29 January 1988.

[70] John P. Burgess, *The East German Church and the End of Communism: Essays on Religion, Democratization and Christia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5.

是经验证实了沃尔夫冈·格罗格(Wolfgang Groger)告诉我的,这位1980年代早期莱比锡教会的年轻牧师说道,他多次拜访市政厅,已经确保各种教会活动获得了许可:“你能做任何想做的事,只要它在教会高墙内”,他有时被这样告知。严格来说,那不是实情,既然国家机关密切监视着发生之事,墙内墙外皆是如此,不过,如果事情发生在它们无法被看到的地方,这就存在着更大的灵活性。

尽管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功地让教会尽可能地不露面,但是教会在整个东德历史中始终是一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党不能对此做简单理解。正如玛丽·福尔布鲁克(Marry Fulbrook)所写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一方的主要失算在于……假定教会在按照同样的控制层级运行——换句话说,它实质上的特征是相同的民主集中制结构——就像党一样。不过,令该党沮丧万分的是,它太晚才发现,不能指望教会领导层去控制下面不守规矩的人;教会的‘不守规矩的牧师们’比在共产党纪律之铁腕下的世俗同道们有更大的发挥余地。”〔71〕

然而,教会人数还是在平稳地下降。一旦德国统一社会党采纳的政策使教会成员身份越来越让人不安(尽管并非不可能),那些希望拥有一个安静生活的人则下决心,不值得为此而自找麻烦。东德初期拥有82%的新教徒。到198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下降到了30%—40%。1987年,只有7%的东柏林人声称有某种教会从属关系。在新卫星城(通常没有教会建筑),成员人数则低至3%。德国统一社会党期望,到2000年全国范围成员人数下降到20%—25%。〔72〕

〔71〕 Mary Fulbrook, *Anatomy of a Dictatorship: Inside the GDR, 1949—198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6.

〔72〕 Burgess, *The East German Church*, 48.

锋利之剑

戈培尔注意到,“锋利之剑”是有效宣传的后盾。东德国家安全部也把自己宣传成党的“盾与剑”。每个人都知道,武力是宣传的后盾。对不受欢迎行为之后果的认识通常并非处于人们思想的最前线,但是他们不会忘记它。正如一位社会主义观察家在1936年所写的:“对于那些甚至只需要一丁点儿勇气的行动,工人们都退缩了。”〔73〕艾尔哈特·诺伊贝特问道:“在东德,谁能承认他是害怕的?只有少数一些人,而且还是私下的。恐惧已经被这一体系工具化并加以利用了。”〔74〕对于那些生活在更加开放社会中的人来说,淡忘或低估它都是容易的。两个体系的公民们明白,异议会很快有重罚的危险。

然而在希特勒的德国或东德,很少有人生活在持续不变的恐惧中。一般来说,两个体系在运用恐怖上是“理性的”。除去一些例外,那些陷入麻烦之中的人不会感觉意外。大多数明白异议后果的其他人,任由自己的脊椎被弯曲,并以各种心理上未感觉不适的方式为自己的默然同意辩护。存在一种人性的倾向,它假定世界是公平的,一个人会得到其应得的。穷人“理应”受穷,那些被逮捕的人也“罪有应得”。这缓解了大多数公民的恐惧。两个体系都竭尽全力劝说人们相信,只有那些罪有应得的人才会受到国家的制裁。

纳粹德国和东德完全乐意运用武力,有时是恐怖,但是一般来说是作为最后手段而不是第一劝说工具。正如哈达莫夫斯基在他书中名为“宣传与武力”(Propaganda and force)〔Gewalt〕一章中所

〔73〕 *Deutschenland-Berichte*, 4: 322.

〔74〕 *Materialien der Enquete-Kommission*, vol. 2, bk. 1, p. 146.

评论的：“宣传与武力从来就不是绝对对立的。武力的运用可以是宣传的一部分。在它们之间是对人民与大众施加有效影响的全部范围：开始于突然赢得注意或单个人的劝服，到异乎寻常的大众宣传，从皈依者的松散组织到半政府或政府制度的创建，从个体到大众恐怖，从更强大的等级、阶级或国家合法运用武力到以战争法之名义而由军事力量强迫的服从与惩罚。”〔75〕衡量的标准多少会有些不明确，这让听众无法确定“安全”行为的界限。他们可能在安全的一边犯错。比如，在1936年，汉堡（Hamburg）的人们收到了一封来自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分部的信，敦促他们在节日期间悬挂旗帜。它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我们希望，你们将不需要进一步的提醒。”〔76〕这封信清楚表明，有事可能会发生在顽固的公民身上，但究竟会是什么，它留给了他们想象的空间。

1936年，一位盖世太保高级官员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清楚知道，纳粹乐意运用武力。他写道，盖世太保负责消除任何对纳粹世界观的挑战。他用医学术语如此写道：

每一种推动另一种政治观点，或者甚至是维护它的尝试都被看成是一种疾病的表征，它会威胁到不可分割的国家有机体之健康整体，不管它的携带者（bearer）主观愿望如何，都必须消除它……

要完成这项任务因以下事实而变得更加困难了，考虑一下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敌对活动的所有外在迹象都被消除了，但是仍有人怀揣这些动机，而且很大程度上，还以新的秘密的或隐蔽的方式追求着他们的目标。发现国家的这些敌人，密切监视他们，在合适的时机把他们驯化得无害，是一个政治警

〔75〕 Hadamovsky, *Propaganda und nationale Macht*, 22.

〔76〕 *Deutschenland-Berichte*, 3: 543.

察的预防性任务。〔77〕

贝斯特担心他不能看透人们的灵魂,他也明白许多人只是装样子。他的盖世太保履行一项医学任务,阻止传染病向外蔓延。他关心的不是公开的行动,而是揭穿观念,那些虽然隐藏着,却可能导致公共行动的观念。

150

1942年的纳粹党卫军周刊《施瓦岑贝格军团》有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它清晰地显示出支持宣传的剑。它讲述了一个因斯大林格勒战役而受伤,在家休假的士兵的故事。在拜访朋友们的时候,一场对话变成了一个老妇人抱怨战争努力的独角戏。人们建议说,她有些神经失常,不需要严肃看待她。告发她可能使她入狱,甚至受到恐吓。《施瓦岑贝格军团》则有不同的观点。它评论说,虽然“在德国只有很小比例的罪犯和种族败类”反对战争努力,但是他们可能动摇前线战士的决心:“因而,用不着说,我们必须用展现给敌人的同样的决心与严厉对付这些少数的局外人,不管我们发现他们是多么的愚笨和无害。这是一场为了我们生存的战争。不想我们取胜的人就期望我们失败。期望我们失败的人想要我们灭亡。”这篇文章得出结论,那些没有告发这些人的人都是懦弱的叛国者。〔78〕文章建议,反对者是稀少和卑劣的,他们支持一致性的外观,同时它也建议说,不支持国家所应受的惩罚,即便对一个不能完全控制其身体机能的老妇人来说,面临的也可能是死亡。

在东德晚期,埃里希·米尔克召开了一次史塔西成员大会。

〔77〕 Martin Hirsch, Diemut Majer, and Jürgen Meinck, eds., *Recht, Verwaltung und Justiz im Nationalsozialismu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Gesetze und Gerichtsentscheidungen von 1933 bis 1945* (Cologne: Bund, 1984), 328–329.

〔78〕 “Rücksicht am falschen Platz,” *Das Schwarze Korps*, 2 September 1943, 2. 全文参看 GPA/sk02.htm。

他问到工厂里的情绪如何,然后被告知:“部长同志,目前这自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米尔克回应道:“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它就是权力的问题,别无其他。”这次会议稍晚时候,他问到是否存在另一个1953年6月17日(一场被苏联坦克镇压的起义)的前景。他的下属向他保证不存在类似的威胁:“那不可能在未来发生。毕竟,有我们在这儿。”〔79〕东德的公民们记得,1953年在他们国家,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80年代在波兰都发生了什么。

151 一个寻思着抢劫银行的人可能想到警察会来干预而打消念头,他会因这一认识而沮丧但不是感到恐惧。极权主义体系施加的是类似的压力。大多数公民,他们至少明白国家措施的某一变动范围正等待着不受欢迎的行为,因而会选择避免麻烦。宣传会毫不犹豫地宣称隐藏在它背后的权力。但是人们不大会告诉自己,他们因为懦弱而克制住了一种特定行为。他们通过逐渐改变态度来缩小这一距离。一个曾经考虑过但最终拒绝了的行为下次很少可能再被考虑进去。

进一步来说,人们很难鼓起对抗的勇气。在民主社会,一个国家假定了一定数量的争议。比如,在美国,民主党人可以预料共和党人不同意他们。对分歧的认可使不同意更加容易。极权主义社会抵制和惩罚大多数形式的公开分歧,而与此同时呈现一个确定性的外观。这把公民们置于一种麻烦的境地。他们在面对确定性时是迟疑不决的。他们知道,支持一种不是主流的世界观可能会导致严厉的惩罚。通过谨慎表述的批评性观点来一点点拆除正统之墙是困难的,因为它必然假定那种正统之根本有效性。也就是说,东德的公民们试图改变时,必须要从社会主义的基础开始探

〔79〕 “Stasi-Dokumente, 1989,” *Deutschland Archiv* 23 (1990): 613 - 614.

讨,然而,既然只有党的集体智慧能够决定党应该向何处去,那么德国统一社会党就将通过个人或群体改变社会主义的尝试看成是不可接受的。纳粹德国的公民也面临相似的正统之墙,它会迫使那些有异议的人运用脆弱的观点来攻击一个显然是绝对的事实。一个人反对许多人,不确定反对确定意味着什么?通过使许多观点变得不可能,极权主义国家让仍残存的观点不堪一击。

一致性的代价

两个体系都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实现一致性的幻觉上,它是有效宣传的基础。不管是在选举中,99%的人显然遵照正确的方式投票,还是在媒体、学校或者一般的公众话语中,目标就是强加给人们一座由许可观点构成的无形大厦(edifice)。取自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一长段文章描绘了这一结果:

一个水果和蔬菜店的老板将一条“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放在窗前,恰好在洋葱和胡萝卜中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试图传达给世界的是什麼?他确实热心于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理想吗?他的热情如此之炽烈以至于他感觉到有一股不可压制的冲动要让公众了解他的理想吗?他确实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深思过这种联合可能如何发生,而它又意味着什么吗?

152

我认为,可以有把握地推测,占压倒性多数的店主们压根儿就没有思考过他们放在窗前的各种标语,也没有用它们来表达其真实的看法。那一标语,和洋葱、胡萝卜放在一起,是从公司总部(enterprise headquarters)传递到我们的蔬菜水果商手中的。他把它们全都放在窗前,仅仅因为这样做已有年头了,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做,还因为那就是它必须如此的方式。如果他

准备拒绝,麻烦可能就接踵而至。他可能因为没有在其窗前放上合适的“装饰品”而备受指责;有人甚至可能控告他不忠诚。他这样做,因为这些事情必须如此,如果他还想生活下去的话。这只是数千例子中的一例,正如他们所说,这些会保证他“同社会和谐相处”时,有一个相对安宁的生活。〔80〕

哈维尔注意到了服从,或在公开场合做“正确”之事的重要性,然后以意识形态或世俗信仰的重要性作结。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将哈维尔从监狱送到总统之位后,蔬菜水果商毫不迟疑把这一标语从窗上取了下来,但是即便像把一条标语放在窗边这样的小步骤都能帮他增强对这个国家不够热情的支持。蔬菜水果商或许从来就不是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可能同其他同行一道发动一场革命,正像看起来那样,要是几乎其他每个人都赞成事态原本发展的方式的话。他对意识形态的信念是模糊的,但也是现实的。只有当其他蔬菜水果商开始从他们的窗边取走标语,他才可能从自己的窗边拿走它。

两个体系由以下几部分人构成:相对少量的“真正信仰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而奋斗;庞大得多的不够热心的公民,他们随波逐流;还有一些情愿公开表达反对意见的人。在此意义上,纳粹主义和马列主义都成功实现了它们的劝服目标。但是它们都知道支持是脆弱的。纳粹主义受到比东德更多的真正的欢迎,但是尽管戈培尔发动了各种反对发牢骚和爱抱怨的运动,而且大量活动还有所进展,不过,一旦宣传和武力的混合在1945年消失了,德国人就迅速地放弃了“永恒的国家社会主义价值”转而支持接下来到来的——西德的议会民主和东德的马列主义。很不幸地“两次”战败的东德公民们,发现他们

〔80〕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27 - 28.

拥有一个新的和被强加的世俗信仰。到 1970 左右,他们已经适应了它,但是它那表面的控制在 1989 年被揭示出来,那时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清楚地知道,他们对于维持那种正面的外观不再抱任何希望,这让许多知识分子深感意外,他们仍然看到了未来社会主义希望的前景。正如一种宗教赢得的是表面服从而不是内心信服,它就没有实现其目标,一种强加一致性的体系似乎可以依赖于广泛的支持,但是最终它会发现自己依靠的只不过是武力而已。

总结

国家社会主义和东德的体系都将宣传延伸到了公共生活的每个领域。通过无所不包的措施体系,同时运用胡萝卜与大棒,脊梁逐渐弯曲了。它没有采取监禁的恐惧或其他灾难性的惩罚来弯曲人们的脊梁。按照哈维尔 1975 年所言:“一个威胁绝对价值不如它,相对价值有意义。某个人客观上失去的,以它自身的价值标准来看,不具有对他而言,他靠此活下去的程度,那么强的主观重要性。……每个人都会失去些东西,因而每个人都有理由感到害怕。”〔81〕一般来说,态度不会马上改变,而是一步一步的。这一步使下一步更容易,而且很难再扭转过来。一个人只要每次屈服于压力,他的脊梁每次都会多弯一点,下一步就变得更容易。要从心理学上承认正在发生什么,对人来说是不舒服的,因而人们普遍不这样做。

大屠杀不可能发生在 1933 年。纳粹党人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但是经过 8 年无休止的宣传与采取有力的国家措施之后,很少有人打算站在犹太人一边。我不同意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观点,他认为德国人中充斥着心甘情愿的刽子

〔81〕 Havel, *Open Letters*, 53 - 54.

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大多数德国人不喜欢犹太人,而且情愿不理睬会完全针对那些希望被看到之人所实施的野蛮行径的种种迹象。〔82〕只有当事情突然发生时,他们才深感震惊地有所意识,但这只持续了一小段时间。

东德幸免于其马列主义各种最糟糕的暴行,作为尚未完成的存在,马列主义终归要对其间将近一亿人的死负责。〔83〕尽管如此,当苏联已经决定西进的时候,谁会怀疑东德也会加入其中?脊梁随着多年来大大小小各种方式的运用已经弯曲了。东德的基督徒在1950年反对引入“青年奉献”仪式。到了1980年,大多数基督教父母允许他们的孩子加入。公民们慢慢习惯了管住自己的嘴巴,只做期望之事。

154 每一步屈从都是单向的,很难逆转。当宣传塑造行为时,态度也跟着变。耶稣说,那些在小事上能信任的人在大事上也能信任(路加福音:第16章第10节,Luke 16:10),但是相反也能成立。那些在小事上屈从的人在大事上最后也会如此。到战争晚期,许多德国人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战争必须获胜,因为,正如士气报告所提到的,他们知道糟糕的事已经在东方发生,他们担心犹太人的报复。他们一度还有着道德上的内疚感。现在他们担心起报复来了。东德的公民没有什么令人恐惧的东西值得害怕,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靠谎言而活”(living the lie),那些一度让人烦躁不安的行为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了。两个体系都没有成功赢得公民们的完全忠诚——但它们都通过宣传与武力的结合迫使公民们行动,似乎他们本就该如此一样,从而建立了足够程度的公共一致性。

〔82〕 我对丹尼尔·戈德哈根的回应是:“Is It Really That Simple? A Response to Goldhagen (and Newman),” *Rhetoric and Public Affairs* 1 (1998): 425-438。

〔83〕 Stephane Courtois, ed.,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第八章 失败的宣传

第三帝国和东德的宣传都失败了。它们的目标是更好的和永恒的世界,在那里全由新人组成。第三帝国存在了 12 年,东德是 40 年。它们都彻底崩溃了,第三帝国是军事失败,而东德则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当它的公民们意识到他们的领导人不再准备维持由枪弹保障的统治时,这一衰落突然变得异常明显。尽管它们谈及永恒价值与科学规律,但是没有有一个体系产生了即便在它们灭亡之后仍然迫切想重建它们的支持者。纳粹主义的当代追随者通常是些讨厌的疯子(crackpots)。东德剩下的支持者希望的不是回到昂纳克的年代,而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最初梦想(original vision)。为什么这些改变人类态度的巨大努力只有如此微弱的永恒效力呢?在转向考察它们最终的失败之前,让我先从回顾两个体系在何处和为何成功开始吧。

155

成功

主要的成功在于二者在国内和国外建立起了某种幻觉,这种幻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拥有比它们实际上大得多的深厚支持。那些在 1930 年代访问纳粹德国的人回去后仍对这个国家印象深刻,在那里,或许如果不是 99% 的话,至少绝大多数的

156

人在支持元首。纽伦堡集会对参与者和观察者来说都是劝说的奇观,因为它们是大众集会和群众组织。德国人自己在确定对希特勒的支持究竟有多深厚上存在着困难。人们知道他们的态度和他们的亲密朋友与家庭成员的态度。每个人都明白,明智的人不会公开表达敌对的观点,但是源于多重压力的一致性的外观却具有劝说力量。

东德几乎一致的大众媒体,组织完备的大众集会,以及党和国家庞大而重要的机构呈现了一个平稳运行之体系的外观。很少有理由相信如此一个从外表看来坚固无比的体系建立在流沙之上。东德的突然消失让每个人震惊,包括那些当它正在崩溃时仍然预测其稳定性的学者。〔1〕考虑到只有少部分充满激情的异议者,史塔西认为它的国家是稳定的。当我在1988年和1989年访问东德时,我告诉这些熟人朋友,东德在10年内必将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回复说我是一个美国式乐观主义者,这至少要花50年时间才可能。我们都被一些重要的但可能存在分歧的边缘现象误导了。

在国教(state religions)方面,一般来说,公民们至少在装样子,这就使得在确定谁相信谁不相信这一问题上困难起来。对于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s)而言,这同样是真实的。一些公民热

〔1〕比如,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Norman Naimark 在 1989 年 7 月为西德政府撰写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道:我们只能想象柏林墙在下列几种特定条件下才会被拆除:东德政权赢得了人民的完全信任与尊重;或者是不管有没有波恩的主动倡议,西方强国决定放弃西柏林;或者是波恩同意了东德对格拉(Gera)的要求,尤其是西德人完全承认独立的东德公民身份。【“格拉要求”是 1980 年由昂纳克提出的。虽然满足第三个条件的机会比其他两个都大……但是当前的形势——正如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所不断重申的——并不有助于推翻柏林墙。】参看 Norman Naimark, *Soviet - GDR Relations: An Historical Overview* (Bonn: Bundesinstitut für ost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 1989), 26。

情地信仰国家社会主义或马列主义。两个体系如其所是解释这个世界,而且承诺一个更好的世界就会到来。许多最具献身精神的信徒为他们的体系而奋斗,哪怕他们不受欢迎,经常付出个人的代价。他们冒着死亡与受伤的危险,忍受蔑视的目光,在流放中生活。他们被误导了,但是许多人相信他们是在为高贵的事业而奋斗。

一旦他们的体系获得权力,他们就处于一种尴尬的夸张境地。就像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改信宗仰之后的基督徒一样,他们一度被人蔑视的事业现在控制了整个国家。实现他们的目标证明是具挑战性的。攻击远比创建容易。已然牺牲很多,再要放弃信仰是困难的;保持信仰的压力是巨大的。正如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1950年代写的:“当共产主义者正处于革命前夜或革命之中时,世界已经见证了少数做好准备为此献身和遭遇磨难的英雄。但它很可能从未看到过在夺取权力后,变成如此毫无个性的可怜人以及死板信条的愚蠢辩护者。”〔2〕一些1933年前就献身于希特勒事业的人也不会有多少不同。

157

对于真正的信仰者来说,宣传增强了其信念。既然他们接受了它的前提,他们也会原谅它的过错,并且急切地相信它的主张。为了赢得胜利,他们已付出很多,要让他们承认在为一项可疑的事业而奋斗将会带来相当大的内心矛盾。他们想要确信,而宣传则千方百计为他们提供理由。纳粹主义或马列主义变成了他们事实上的宗教,党将他们的信众聚集了起来。

不过,真正的信仰者是少数。远远大得多比例的人口没那么坚定。希特勒在自由选举中最好的表现是37%的大众投票数,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真正的信仰者。社会主义随着苏军来到东

〔2〕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7), 155.

德,它很可能从未在一次自由选举中赢得多数支持。宣传在保持三心二意信仰者的支持上是一个关键的要素。

毕竟,两个体系都宣称伟大的目标。很少有人支持希特勒,是希望他会给世界带来战争,或是杀害数百万的犹太人,纳粹的宣传也没声称它会如此。相反,希特勒谈及和平、民族复兴、道德,甚至还有上帝。正如阿兰·布洛克(Alan Bullock)评论的:“没人会有比希特勒谈及战争的恐怖与愚蠢时更加异乎寻常的感受。”〔3〕他所提供的成功是相当多数的德国人会欢迎的:失业数量的急剧减少,军备的重整,领土的征服,普遍欢快的气氛。马列主义不能通过提供一个死板的官僚体系、一个荒废了的经济和柏林墙来赢得支持者。取而代之的是,它允诺一个没有剥削、战争和痛苦的平等社会。它提供社会服务和一个可靠生活标准的能力获得了尊重。两个体系都从失败的先驱那里获得力量。在经历了大萧条(Depression)的巨大灾难以及甚至更大的二战灾难之后,德国人宁愿相信一个新体系至少会使境况变好。很难想象境况变得更糟。

这两个体系的罪恶是明显的,不过很难同时看出来。伟大的目标提供了希望,让人不愉快的因素可以忽略或者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当德国人声称他们对大屠杀一无所知时,他们就卷入了真相与自我欺骗的混合。证据就在那里,但是大多数人不想面对它。J. P. 斯特恩(J. P. Stern)这样写道:“情况似乎是,第三帝国的人们,只要他们想知道,可以知道很多(比如,他们的德国公民同胞被杀害),或者知道很少(比如,他们的犹太公民同胞被杀害)。他们不知道的,基于一些明显的理由,他们不想去知道。但是不想去知道意味着一个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不想去知道更多的东

〔3〕引自 Timothy Garton Ash, *In Europe's Name: Germany and the Divided Contin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20。

西。”〔4〕存在各种理由不去了解让人不舒服的事情。懦弱是一个原因,但是普遍人性就是如此。即使在开放社会,很少有人会不厌其烦地去遭遇那让人不舒服的事情。

对于那些信仰不坚定的人来说,宣传提供了让人相信的貌似有理的理由。理由是重要的,即便它们不是特别好的理由。在埃伦·兰格(Ellen Langer)的经典研究中,它让人们在复印机前请求插队。那些请求插队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人中有60%的人成功了。那些提出一个好理由(“我上课快迟到了”)的人中有94%的人成功了。而那些提出糟糕理由(“打扰一下,我可以用一下复印机吗,因为我必须复印一些东西?”)的人中,有令人吃惊的93%的人获得了成功。〔5〕重要的不是理由的品质,而是有一个理由就够了。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宣传也提供理由,即使经常是糟糕的理由。德国人被告知,二战开始的起因是,西方联盟正试图包抄德国,波兰袭击了一个德国广播站。柏林墙建立起来是为了阻止西方的法西斯主义者破坏东德。这些观点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虽然证据的质量有时也很糟糕,但是要找到坚实的对立证据通常是困难的。

在反对这一体系的同时,一个人似乎正在反对一个美好未来的梦想。一个人在怀着对即将到来之事的希望时,可以接受当下的缺陷。在纳粹德国,一个时常做出的评论是:“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即使希特勒有着近乎超人般的能力,也不能期望他知晓一切。类似的评论允许人们将罪恶看成是这个体系中次要的方

〔4〕 J. P. Stein, *Hitler: The Führer and the Peop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215.

〔5〕 Ellen Langer, A. Blank, and B. Chanowitz, “The Mindlessness of Ostensibly Thoughtful Action: The Role of ‘Placebic’ Information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 (1978): 635 - 642.

面。《青年世界》(*Junge Welt*)的编辑汉斯·戴尔特·舒特(Hans-Dieter Schütt)在1989年后说道：“我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如同与一件外套的关系一样，一个人把第一颗纽扣就扣错了，然而却只注意到最后一颗纽扣。不过，外套还是保暖的。”〔6〕另一个作家将许多东德知识分子对他们国家的看法与父母对一个残疾孩子的看法相比较：“当局外人提及这一问题时，哪怕意识到缺陷，仍表现出一种不顾一切的、自我折磨式的爱，满怀着改善的希望，满怀着防卫性的愤怒。”〔7〕

159

此外，宣传呈现了压倒性的公众支持的外观。媒体、艺术、学校和日常活动——所有一切表明几乎每个人都普遍地对国家充满赞许之情。这种一致性不仅阻止了积极的对抗性观点，鼓励了公开的受许可行为，它所产生的顺从压力也导致公民们逐渐转变他们的内心观点，从而与他们的公开行为保持一致。一个人要是没有被影响，不会一天说12次“希特勒万岁”。甚至在民主国家，重复也发挥作用，正如广告商明白该何时把频次(*frequency*)考虑进他们的活动中。

没有不时地向党屈服，要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则更不可能。一位德国的社会主义观察家在1937年认为，纳粹已经放弃了试图劝服每个公民的努力。相反，它们的体系是如此广泛，以至于“不依靠一些国家社会主义组织，没人能有所作为”。〔8〕在东德，没有党的一些参与或支持，很少有事发生。为了过一个相对正常的生活，人们简直不得不向这一体系屈服，说或做一些他们被期望之事。

〔6〕 Poßner, *Immer bereit*, 221.

〔7〕 Heinz Niemann, *Hinterm Zaun: Politische Kultur und Meinungsforschung in der DDR—die geheimen Berichte an das Politbüro der SED* (Berlin: edition ost, 1995), 45.

〔8〕 *Deutschland-Berichte*, 4: 300.

公开怀疑的后果是无法令人愉快的。生活变得愈加困难。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或者更糟，他的孩子的未来——会因为反对各种神圣的社会机构而受到损害。正如哈维尔所评论的：“大多数人不情愿把他们的时间花在与当局的无休止冲突中，尤其当它只会以被孤立个人的挫败而告终时。因此，为什么不作当局要求你做的？它不会花费你什么，而你即刻不再为此而烦恼。”〔9〕两个体系都想被看成理所当然，看成是必须接受的事实。一个人也许不喜欢雷暴雨，但是仍会拿出雨伞。

那些生活在极权主义国家的人的心理过程不是独特的。顺从的压力在任何社会都是强大的。第默尔·库兰有关偏好伪装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的作品主张，明显的公共一致性会激励人们过度展示他们的公开表现，以此作为宣示他们“真正”相信的内容的方式。〔10〕埃吕尔争辩道：“当代宣传的目标不再是修正观念，而是激发行动。”〔11〕行动改变态度，至少一如态度改变行为。宣传帮助养成信仰和表达的习惯。纳粹主义和马列主义都竭力运作，让人们投票，参加所期望的组织，谈论正确的事，以及避免可能证明是麻烦的行为。

违反规范的惩罚具有威慑力。东德的新闻工作者随后谈及“头脑里的剪刀”，或自我审查。作家们注意到，审查会阻止一些书的出版，但是自我审查会阻止更多东西被写下来。再一次，这不限于极权主义国家。一份 2000 年出版的针对美国新闻工作者的调查发现，他们中 1/4 的人避开了具有报道价值的故事，因为他们预计到一些职业上的麻烦。〔12〕不管在美国，有关“政治正确”的

160

〔9〕 Havel, *Open Letters*, 58.

〔10〕 Kuran, *Private Truths*, 61.

〔11〕 Ellul, *Propaganda*, 25.

〔12〕 Andrew Kohut, “Self-Censorship: Counting the Way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y/June, 2000): 42 - 43.

争论(brouhaha)的功过是非是什么,几乎无人怀疑,即使在开放社会,许多因素以多种方式搅合在一起,导致了沉默或慎重的螺旋。

向围绕他们的无休止宣传的四周看看,毫不意外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或者东德的多数公民选择了尽可能平静地生活。此外,考虑到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并不像他们的领导人希望的那样占据他们生活的中心,那么逐渐弯曲他们脊梁的种种妥协则相对容易做出。两个体系共同的合理化假定(rationalization)相信,如果一个人并未在做一份特定的工作,那么他或她将很可能被一个取代。强硬派份子走一段路防止其他人走完全程,但是今天走一段路将会使明天走完全程更容易。

两个体系都需要绝对的忠诚,但是只能勉强接受这样的公民,他们不制造麻烦,而且至少还做出一些保持正确态度与做正确之事的公开姿态。只要宣传和武力两个支柱维持下去,波特金村仍会屹立不倒。

失败

在更深的意义上,两个宣传体系都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它们都宣称传达真理;但是没有一个是可信的。它们都要求热情的支持但是只能勉强接受公开的服从。它们都讨论永恒价值;但没有一个配得上。它们制造的痛苦远比快乐多。它们的失败在根源上是一样的。它们要求宣传做的远多于它能做的。

一个人必须一开始就记住,两个体系失败的主要原因与宣传本身无太大关系。不管纳粹的声称如何,人的意志不足以战胜敌对方在人员和物资方面存在的压倒性优势。没有任何的宣传可以顶得住希特勒的帝国在军事力量下崩溃。东德的内爆是因为苏联不再愿意从军事上支持它,还因为它萧条的经济状况。最好的宣传也只能做到劝说人们忽略他们的感官体验到的,尤其在戈培尔

的锋利之剑不再作为后盾时。

极权主义的宣传因内在的诸多原因而失败,从长期来看(这也许是数代人),它们使它不能实现其创建者设立的目标。它失败了,因为它是不真实的,因为它鼓励虚伪,还因为在圣经的意义上,它是崇拜偶像的,将一个人类绝对性(a human absolute)置于神圣绝对性的位置。结局是最糟糕的。确信元首或党是永远正确的,罪恶之门已然开启。

161

对真理的全部声称使宣传具有欺骗性。国家社会主义者和马列主义者忽略了那些有时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于声称真理的体系而言,现实是令人为难的。事态不会按照理论预测它们应该怎样的方式发展。正如哈维尔评论的:“现实没有塑造理论,而是相反。因此,权力逐渐向意识形态而不是现实逼近;它从理论中获得力量,并且变得完全依赖于它。”〔13〕宣传与世界被迫形成了一种颠倒的关系。既然一个国家不能承认错误,现实就得像脊梁一样向意识形态的需要屈服。纳粹的一个经典案例是1938年8月的德苏条约,它使德国能自由发动战争。它消除了两线作战的前景,直至希特勒认为两年后他已为此做好了准备,但是它同纳粹党人数年前所说的一切产生了令人厌恶的自相矛盾。这一体系甚至不知道如何向它的宣传员们解释清楚。〔14〕约瑟夫·斯大林,德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在死后变成了一个被冷落的人(unperson)。善于观察的东德公民注意到了这一事实。

由宣传决定的新闻削弱了体系的信心。埃吕尔注意到,宣传需要与事实保持协调一致:它“不可能战胜那些过于印象深刻的

〔13〕 Havel, *The Power of Powerless*, 33.

〔14〕 比如,参见1939年9月给党务官员们的一份报告,“Reich und Sowjetunion,” *Der Hoheitsräger* 3 no. 9 (1939): 52. 它简单地提到了这一条约带来的经济和军事利益,然后试图表明,这是独裁主义体系相对于民主体系之优越性的明证。

和确定的事实”。〔15〕戈培尔承认,新闻不能同人们直接的经验、秩序(ordering)相矛盾,比如轰炸损失的报道在受影响地区就应该是准确的:“歪曲发生在人们眼前的事实是毫无意义的。”〔16〕尽管如此,任何细心的公民都明白,新闻是被操纵的。正如一份1942年的纳粹党卫军报告所注意到的:“公民们意识到,公共媒体总是提供负面事件的‘官方论点’。其结果是,广泛的公众圈子不再将新闻媒体作为最好的信息来源地。”〔17〕

162 这些体系中的人们要怀着以下认识生活,即新闻是不可靠的,政府会说些它需要说的内容来达到其目的。1965年,在处理西方电视问题的《一周评论》(*Argument der Woche*, 寄给鼓动员的一份小册子)即将出版前,它的一份草稿正在鼓动部相互传阅以接受批评意见,一个部门职员评论道:“民意调查已经发现75%的人不相信西方的电视。我认为这一观点棒极了(bad)。要是真如此就好了!”〔18〕私下的怀疑很少直接影响到日常生活,它或多或少可以被忽略掉,但是也留下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认识,即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公民和领导人都参与进公开的伪善。政府告诉公民们并不真实的事态,公民们通常也知道是不真实的,但是还要求他们在公共场合按照仿佛它们是真实的那样去行动。

那本身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即使公民有所怀疑,但是他们个人不可能去核实每一个故事与事实。两个体系中绝大多数的新闻至少有一些事实基础。此外,新闻为公共舆论设置议程。那些读后得知1934年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的公民们了解

〔15〕 Ellul, *Propaganda*, 295.

〔16〕 Willi A. Boelcke, *The Secret Conferences of Dr. Goebbels: The Nazi Propaganda War, 1939—1943*, trans. Ewald Osers (New York: E. P. Dutton, 1970), 81.

〔17〕 Boberah,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9: 3195.

〔18〕 SAPMO, DY 30/IV A2/9.02/45; To Rudi Singer on 28. 1. 1965.

到,恩斯特·罗姆(Ernst Rohm)不再是这场运动的大英雄,由此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公共观点。那些读到全东德的人在欢庆柏林墙建立之报道的公民们也许并不共享这些观点,但是他们明白,应该说些什么以避免麻烦。比起由报纸和广电媒体报道的二手事件来,人们对攸关其日常生计的事情更感兴趣。

更重大的问题是,宣传从未能提供两个体系所渴望获得的:只有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公民。相反,它促进了伪善。1935年明斯特区的一份报告注意到,公众的热情是较低的。种种迹象是微妙的:“既然人们担心法律上的后果,他们就很少在公开场合表达其真实感受。但是在涉及运动集会,人们表现出明显的顺从时,他们的真实想法又显得是明白的。”〔19〕文件中有许多相似的评论。

公民们玩这场游戏,但是许多人更明白个中缘由。纳粹党人挖苦“假爱国主义者”,这些公民拼命努力穿上了忠诚的外衣,但他们也要追随那些其忠诚度似乎没有100%的人。要在过于热诚和不够热情之间游走是困难的。正如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注意到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明白,许多加入群众组织和在公开场合说着被期望之事的人并不是热情的支持者。领导人知道这种支持比他们希望的更加表面,但还不得不在公众场合表现得他们相信自己有着广泛的支持。

理解这一问题的方式之一是回忆一下希特勒在政治运动的成员和追随者之间所作的区分。成员们是充满激情的,愿冒所有风险的真正信仰者。而追随者是那些投票支持党,或在党的事业中做出适度牺牲的人,但是对他们而言,它没有形塑生命(life-forming)的重要性。对任何革命运动来说,这是一个有用的区分,但是当运动夺取了权力,并坚持所有人应该共享少数人的激情时,麻烦不可避免地来了。在这方面,要把这两个群体分开不再那么容易。

〔19〕 Kuroпка, *Meldungen aus Münster*, 162.

一个公民不会因为是一个纳粹党人或一个共产主义者而“受苦”。现在情况是,一个公民会因不属于其中之一而苦恼。不过要说出谁是真正的信仰者,谁又不是却变得困难了。

163

一个国家不能强迫人们接受长期的充满激情的信仰。让人们按照他们似乎相信的来行动,这是相对容易的。大多数人会从外表上进行调整,以适应占据支配地位的观点。对一个需要和平与秩序的国家来说,那也许足够了,但是对世界观来说则不是,不管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制造的是只会装样子的公民。人们假装相信,而政府也假装相信人们已经相信了。

东德的国内报告支持了这点。柏林墙建立之后不久,一份有关医学界的报告注意到医生们正在讨论:“尤其在8月13日以后【1961年】,讲任何事情都是不好的。最好什么都不要说。毕竟,一个人并非总是有合适的观点。”〔20〕两年后,一份与新闻工作者的讨论摘要发现,他们对任何批评都很警觉,尤其是针对官员们的:“最好是远离它,既然那样做,至少不会有什么发生在一个人身上。”〔21〕一个苏联公民告诉一个西方新闻工作者,他有6副面孔:“一个是面对妻子的;一个是面对孩子们的,少了些坦率,恰好是防止他们把家里听到的事说出去;一个是面对亲密朋友的;一个是面对熟人的;一个是面对工作同事的;还有一个则是面对公众的表演。”〔22〕第三帝国和东德的公民讲述的是同样的事。

两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并不积极抵制他们遭遇到的宣传。他们甚至接受了许多,至少从表面上看如此。希特勒帝国相当大多

〔20〕 SAPMO, DY 30/IV A2/9.03/22: *Argumente der Intelligenz—Stichtag 1. Dez, 1961*, 166.

〔21〕 SAPMO, DY 30/IV A2/9.02/39: *Bericht über eine Aussprache mit Kreiszeitungsredakteuren der Gebietsgruppe Karl-Marx-Stadt des VDJ am 25. Juni 1963*.

〔22〕 引自 Kuran, *Private Truths*, 39。

数的公民,甚至在1938年的自由选举中也会把票投给他。东德公民中至少有一个重要的少数,他们支持社会主义的梦想。但根基是不稳固的。大多数人秉持“正确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是安全的和简单的,因为它们表面上看来是充满说服力的。然而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某一角落却是焦虑不安的。

1984年,莱比锡青年研究所(Institute for Youth Research)的一份报告发现,80%的东德年轻人收听或收看西德的媒体节目。这导致他们在对东德的态度上产生了清楚的后果:“先前研究的重要结论是,对西方媒体的大量消费与更低的政治意识,更少的社会活动,以及个人的生活定位中社会主义价值更低的重要性等等之间存在重大的关系。”〔23〕这些年轻人仍然是自由德国青年的成员,在军队服役,当他们长大之后还会加入各种正确的组织。他们使自己适应被期望的事情。冈特·古(Günter Gau)把东德描述成一个“匿栖社会”(niche society)堪称经典,它也涉及相同的观点。人们找到了一些他们能做喜欢之事的偏僻角落,相对来说摆脱了党或国家的强制。〔24〕当然,这与东德的主张相互矛盾,它声称生活中没有哪个角落不是政治的。然而宗教倾向于整合信念与行动,极权主义体系则分裂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不管有多少宣传攻势想倾注其中。

164

德国统一社会党鼓动部头目霍斯特·辛德曼在1959年的一次宣传会议上,清楚地说道整个东德历史上什么才是真实的:“同公民们的交谈清楚地证明了,甚至对于我们政策的中心问题,他们

〔23〕 Dieter Wiedemann and Hans-Jörg Stiehler, *Die Funktion der Massenmedien bei der Kommunistischen Erziehung der Junged* (Leipzig: Zentralinstitut für Jugendforschung, 1984), 90-91.

〔24〕 Günter Gaus, *Wo Deutschland liegt: Eine Ortsbestimmung* (Hamburg: Hoffmann und Campe, 1983).

仍是多么地不清楚。”〔25〕在该党的行话中,那就意味着分歧。在最后的几个月,一份来自东德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s)的报告注意到:“我们的时代首先被界定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样一种信念,很清楚,已经被削弱了。越来越多的工人不再自动接受我们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仅从历史上看是不可避免的,从社会方面看,也是可欲的。”〔26〕这些是一个教会作家或许会叫做“精神真空”的报告。这一体系的核心信念正在消逝。

强大的武力也加入到让那些只有些微信念的人坚持他们的这点信仰的行列。在向调查委员会(Enquete Commission)作证时,沃尔夫冈·舒勒(Wolfgang Schuller)概括了东德体系根本的压制性原则,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第三帝国:

- 一个广泛的、密不透风的、无所不包的措施网络,以阻止任何对抗;
- 一个“黑手党原则”,通过它,意味着两个体系强迫其公民屈服于它们的意志,或多或少程度的合作,以及甚至实现生命的一般目的;
- 一个看起来不变的和坚固的环境。

这些原则的结果是“无力的感觉,屈从的感觉,受他人摆布的

〔25〕 Horst Sindermann, “Über die Änderung der Arbeitsweise der Agitation und Propaganda,” in *Die Agitation und Propaganda ganz dem neuen Leben und dem Sieg des Sozialismus zuwenden* (Berlin: Abteilung Agitation und Propaganda beim Zentralkomitee der SED, 1959).

〔26〕 SAPMO, DY 30/vorl. SED 42224/1, “Resümee der Studie: Ausgewählte Probleme der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tischen Bewußtseins in der DDR” (June, 1989).

感觉,而且,或许是夸张了些,焦虑的感觉,并且这都是有意为之的。”〔27〕

虽然镇压成功地让大多数人保持安静,但它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信仰者,而只是一批精神紧张的人。根本问题是,如果一个人要相信什么,那么不相信的自由则是关键的。〔28〕两个体系要求相信,而把怀疑看成是令人不愉快的,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公民们明白,为什么他们正在做他们在公开场合会去做的事情,并且在内化体系的诸种要求,使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时没有感觉到压力。

不仅普通公民在私人与公共生活间面临两难,党员和官员们也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一方面,他们正在把生命献身于一项事业,一些人认为它有崇高和高贵的目标,或者至少被看成是这样。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体系的缺陷,正如任何其他人一样不自由地承认了这一体系的。随着意识形态狂热的衰落,领导集团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哈维尔在1987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描述同样适用于东德:“我们不再被盲信者、革命者或意识形态狂热者所统治。这个国家正被无个性的官僚们所操纵,他们公开宣称支持革命意识形态,但是他们照料的只是自己,而且不再相信任何东西。”〔29〕东德产生了庞大公务员队伍,他们都是些“职业的信仰者”(professional believers)。他们的生计取决于他们说或做正确之事。按照耶稣的话来说,许多人是“伪君子”,向人呈现的是一个掩饰虚伪的正面形象。

165

这种状况在东德最终崩溃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以想象一下,东德在1989年瓦解之时,列宁、斯大林或甚至是乌布利希将不

〔27〕 *Materialien der Enquete-Kommission*, vol. 2, bk. 1, pp. 220 - 228.

〔28〕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总是对那样一些人做出激烈反应,他们喜欢引用罗莎·卢森堡众所周知的观点,即“自由只有在它为那些有不同思考的人预留了空间时才存在”。

〔29〕 Havel, *Open Letters*, 334.

会袖手旁观。他们会运用国家军队。更早研究极权主义的作品清楚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1965年的经典作品《极权专制与独裁》(*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宣称:“(极权主义)体系,由于它的信条声称意识形态永远正确,因而对赞同和一致性有着强烈的激情,导致它不断地被引诱来增加恐怖。”〔30〕吉恩·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的《专制与双重标准》(*Dictatorship and Double Standards*)在1982年提出了相似的观点。〔31〕考虑到还没有哪个极权国家的例子像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柴郡猫(Cheshire Cat)那样慢慢消失,这一观点是合理的。尽管如此,这一观点假定极权主义国家的新任领导人会保持同样的意愿以掌控权力,而不管代价几何。这证明不是实情。当到了开枪的时候,整个欧洲,那些已经失去了创建者们激情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共产主义领导人则退缩了。他们对这一体系的信念太脆弱了以至于不能为其杀害正名。

纳粹的领导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达成这样一个国家,然而,随后数代领导人将可能已经缺乏第一代领导人的激情了。不过,那些调整自己以适应新体系的大量官僚和公务员确实缺乏纳粹主义所要求的革命狂热。对于领导层来说,这的确是持续苦恼的一个来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宣传也欺骗它自己的领导人,迫切希望他们相信它希望他们相信的。除此之外,这些体系通常对于那些维持其运转的人来说是有利的。在纽伦堡集会期间,阿尔伯特·施

〔30〕 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163.

〔31〕 Kirkpatrick, *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 在她写作之时,仍可以准确地说:“本世纪的历史没有为期望激进的极权主义政权会变革自身提供任何理由”(51)。

佩尔以向上照亮的大量探照灯所形成的壮观的“光的穹顶”，覆盖纳粹领导人的整个晚会，部分是为了隐藏他们还在变大的大肚子。施佩尔，一个优秀的和能干的人，充满激情地为这个体系服务，而这也为他提供了机会，在1945后进行一次人生的反思。虽然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在万德利茨(Wandlitz)郊区的住宅比不上纳粹领导人的豪华住宅，但是同高层住宅发展工程中的公寓相比，它也是一个更惬意的居住之所。

大众似乎感激他们的领导人。这样的支持是令人满意的。正如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所评论的，“简单虚荣心的成份从不应该在解释掌握权力的男人女人之行为中被低估。”〔32〕施佩尔描述了跟随希特勒，坐车穿越一系列村庄的情景。当消息从一个村庄传到下一个时，等候的人群就增多起来。希特勒谈到说：“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德国人获得过如此的欢呼：路德。当他骑马穿越这个国家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为他欢呼。就像他们今天为我做的那样！”〔33〕埃里希·昂纳克在其国家崩溃后接受采访时，完全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我的离开是一场巨大阴谋的结果，这一阴谋的组织者仍然躲在幕后”，他这样说道，反而完全忘记了这一事实：即它是由大量已有叛意的公民所发动的。〔34〕一个井然有序的(well-regulated)体系提供给他的好新闻和快乐的工人。他几乎看不到正在逼近的厄运的征兆，哪怕至少几个他可以选择的。

只有很少征兆的一个原因是，下属们知道直率不是一个好的职业对策。希特勒告诉他的追随者，没人应该向他抱怨糟糕的士

〔32〕 Ash, *In Europe's Name*, 199.

〔33〕 Speer, *Inside th Thirs Reich*, 65.

〔34〕 Anbert and Herzberg, *Der Sturz*, 19-21.

气。他们有责任创造出好的士气。〔35〕结果,经过过滤的(sanitized)报道遵照方针得以通过。甚至那些在报道上相对直率的处于较低层级的人,也要经上级对报道加以改动以使语词温和些。〔36〕玛丽·福尔布鲁克在东德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大众对政权及其统治者的所谓支持,各专区的报告对它的描绘是一次比一次乏味;而像德累斯顿专区第一书记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那样的人,面对处于不断增加的不满之下的社会现实,试图吸引昂纳克对它们的注意,但是这些努力却换来了惩罚。”〔37〕从德国统一社会党专区第一书记到柏林中央,标准的报告以一段对成就冗长而枯燥的陈述开始,然后小心地涉及一些现实问题,而它们可能通过某些达到目的的额外资源加以解决。这也助长了党内的伪善。这些领导者知道,他们正弯曲脊梁以取悦于他们的上级。不存在批评因而也就不存在真相的空间。当领导者们过于强烈地深信自己的伟大之处时,谄媚者则取代了先知。

167 对公共生活来说,这同样是真实的。人们逐渐习惯于东欧人称作“依靠谎言而活”或“在水下呼吸”(breathing underwear)。这种行为能产生持续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的社会,但是它不会制造出纳粹主义和东德想要的:新的纳粹主义或社会主义男女,他们充满激情地献身于即将到来的乌托邦。相反,它们塑造的公民是,在命令下欢呼,在公共场合谈论正确之事,甚至相信宣传告诉他们的一些或许多内容,但这些行为都只是表面的而非发自内心的。他们看起来像一个国教的拥护者,对于国教他们不会相当地怀疑。

〔35〕 参看他战争爆发时的演说,Domarus, *Hitler: Speeches*, 3: 1755. 希特勒的训谕在为宣传员准备的材料中被频繁引用。比如,参看 Fritz Kramer, “Haltung und Mundpropaganda,” *Der Hoheitsträger* 6, no. 10 (1942): 11。

〔36〕 比如,可参看 Unger, *The Totalitarian Party*, 233 - 236。

〔37〕 Fulbrook, *Anatomy of a Dictatorship*, 27。

新社会不是由那些不法怀疑的人,而是由那些充满激情、愿意献身的人所建立。在它们取得权力之前,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这样的追随者。他们也许不是最优秀的,但是,按照奥登(Auden)的话说,他们充溢着“强烈的激情”。纳粹主义并未比其建立者存在更久,不过45年的马克思主义之后,大多数东德领导人已经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了。一些人仍然有激情,但是许多人本身就是半心半意的信仰者,他们的个人兴趣是延续这一体系。他们变得更不愿意通过向其同胞公民开枪来保卫它。

国家社会主义比马列主义有更强大的支持基础,但是它在1945年后迅速从德国消失了。1989年10月9日,它鼓足勇气在莱比锡游行,当夜东德革命爆发。根本不清楚东德的领导人已经失去了用武力支持宣传的意愿。一旦他们不能用权力阻止大规模公众不满的展演,这一体系几周内就会崩溃。那些勇气稍显不足的人加入了拥有更大勇气之人的行列,在此之后,连那些毫无勇气的人也开始加入这一人群的洪流之中。

追求一致性的压力恶化了这些体系。太多人太多次说了太多他们不相信的事情。很少有人会在公开场合提出几乎所有人会在私下讨论的问题。那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希特勒的亲信和他的将军们可能与他存在分歧——有时还能劝服他。东德的公民在私下的谈话中(甚至在党的会议上)谈及体系的破裂。然而,两个体系都没有为重要批评提供公共论坛。宣传和武力监管着它。正如埃吕尔所言:“宣传终了之地正是简单对话开始之处。”〔38〕而简单对话终结之处正是罪恶开始之地。

正如最近一句习语所言,“只有尿湿的小孩才会喜欢改变”。没有敦促变化的声音,很少有什么改变。纳粹体系不能有效地回应要求比秩序和服从更多东西的挑战。有趣的是,它的一些最伟

〔38〕 Ellul, *Propaganda*, 6.

大的成就来自于相对开放性占据支配地位的领域(比如,阿尔伯特·施佩尔的部门)。东德的命令经济在颠簸不稳(jerks and starts)运行。东德末期,昂纳克吹嘘说,大量的资源已经投入到制造一块达一兆字节(megabyte)的计算机芯片上,而事实上当他如此说时,这就已经过时了。同时,尽管自诩为处于世界第十的重要工业国,但是,一旦1989年后封闭体系的各种保护消失,东德的工厂没有希望产生竞争力。

但是比一边倒的报纸、经济失败以及被侵蚀的人格更糟的是,两个体系的宣传都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很少有人有勇气表示反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犯下罪恶的程度使东德所做之事相形见绌,但东德是一个杀害了达1亿人的更大体系之一部分。由《共产主义黑皮书》(*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引发的争议是一个有意思的证据,对一些人来说,马列主义的受害者比起国家社会主义的受害者更加“可以接受”,按照他们的想法,既然马列主义正追求着高贵的目标,他们的死某种程度上没有如此的不幸;但是,它也运用许多它的对立性世界观所采用的同样方法来追求那些目标。〔39〕

尽管声称拥有真理,但每个体系不能补救它所产生的罪恶。它们确信能够塑造一种新的和统一的人类类型,因而毁灭现存的人。教皇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1993年的教皇通谕《真理的光辉》(*Veritatis Splendor*)准确地传达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对人类卓越尊严的拒绝中找到现代极权主义的根源。然而,一个人作为不可见之上帝的可见形象,就其本质而言,是权利的主体,没

〔39〕 有关此书在德国的反响,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讨论,可参看 John Rodden, “‘It Should Have Been Written Here’: Germany and The Black Book,” *Human Rights Review* 2 (2001): 144 - 164。

有人可以去侵犯——不管是个人、团体、阶级、民族还是国家。”〔40〕两个体系在评估单个的人时，没有将其看成是独一无二和内在有价值的，相反，是依据他们对统治性信条所具有的用处。由于不承认神秘之事物和人类生活的固有价值，作为替代性宗教，它们失败了。在弯曲人们的脊梁时，极权主义体系误解了人性，从而唤起了人类以往的最糟糕一面，而不是新人最优秀的品质。

参加过1938年最后一次纽伦堡集会的人中，没人预料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整个结构会在7年内土崩瓦解。当我在1988年7月访问莱比锡时，我对人们在与我私下交谈中，批评这一体系所表现的活力深感意外。无疑，我认为，我只是遇到了那些有足够勇气邀请一个美国人共进晚餐的人们。他们并不能代表所有人。在我并不完美的分析中，我并不孤单。

169

在国家社会主义和东德的马列主义之下，宣传是强有力的和有说服力的。脊梁弯曲了。普通人有时会以各种方式行动，这些方式的性质跨度很大，从令人不愉快的到可怕的。然而，不管独裁政权多么努力地尝试，它们运转多长时间，都不可能创造出由充满激情地、毫无异议地服从于统治性信条的公民组成的国家——这一信条在其核心处已经腐烂不堪。正如各种宗教已经发现的，强迫的忠诚是表面的，20世纪的强大独裁政权，因为它们喧嚣与骚动，没能创造出有能力建立一个千年世俗王国的新人类。借用圣经的隐喻，它们那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房子，根本无法抵抗暴风雨的肆虐。

〔40〕 Siegfried Mampel 在研究作为意识形态警察力量的史塔西时，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参看 *Das 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der ehemaligen DDR als Ideologiepolizei: Zur Bedeutung einer Heilslehre als Mittel zum Griff auf das Bewußtsein für das Totalitarismusmodell*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6), 368。

精选参考文献

档案文献

Bundesarchiv Berlin: Records in NS 22. These are files of Robert Ley's *Reichsorganisationsleitung*.

Landesarchiv Berlin: Records of *Bezirk* Berlin of the SED.

Myers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Records of NSDAP *Kreis* Eisenach.

Stiftung Archiv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DDR im Bundesarchiv (SAPMO):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rchives of the Parties and Mass Organizations of the GDR under the German Federal Archives holds the records of the 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 (SED), the four bloc parties, and the mass organizations of the GDR. A useful brief guide to its collections is Elrun Dolatowski, Anette Meiburg, and Sigrun Mühl-Benninghaus, *Die Bestände der Stiftung Archiv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DDR im Bundesarchiv: Kurzübersicht* (Berlin: Edition Colloquium, 1996).

U. S. National Archives, Captured German Records: Microfilm series T-81 and T-580.

源自出版物

- Adolf Hitler: Bilder aus dem Leben des Führers.* Hamburg: Cigaretten/Bilderdienst Hamburg-Bahrenfeld, 1936.
- Allen, seán, and John Sandford, eds. *DEFA: East German Cinema, 1946—1992.*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1999.
- Allen, William Sherida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 1922—1945.* Rev. ed.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1984.
- “ ‘ Alles nur für den Sieg, der Sieg allein entscheidet! ’ ” *Monatsblätter der Gaupropagandaleitung Weser-Ems der NSDAP* 7, no. 3 (1942): 18 - 19.
- Allinson, Mark. *Politics and Popular Opinion in East Germany, 1945—1968.*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 Andert, Reinhold, and Wolfgang Herzberg. *Der Sturz; Erich Honecker im Kreuzverhör.* 3rd ed. Berlin: Aufbau, 1991.
- Fritze, Lothar. *Täter mit gutem Gewissen; Über menschliches Versagen im diktatorischen Sozialismus.* Schriften des Hannah-Arendt-Instituts, vol. 8. Cologne: Böhlau, 1998.
- Fröhlich, Elke,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15 vols. Munich: K. G. Sauer, 1997—2001.
- Fulbrook, Mary. *Anatomy of a Dictatorship; Inside the GDR, 1949—198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Gailus, Manfred. “ Die andere Seite des ‘ Kirchenkampfes ’ : Nazifizierte Kirchengemeinden und ‘ braune ’ Pfarrer in Berlin, 1933—1945. ” In *Berli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Jahrbuch des Landesarchivs Berlin*, 1995, ed. Sigurd-H. Schmidt, 149 - 170. Berlin: Gebr. Mann, 1995.

- Gamm, Hans-Jochen. *Der braune Kult; 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Ersatzreligion; Ein Beitrag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Hamburg: Rütten & Loening, 1962.
- Gaupropagandaamt Oberdonau, Linz. "Parteigenossen!" *Front der Heimat* 1939, 1.
- Gaus, Günter. *Wo Deutschland liegt: Eine Ortsbestimmung*. Hamburg: Hoffmann und Campe, 1983.
- Gedenkstätten: Arbeiterbewegung, Antifaschistischer Widerstand, Aufbau des Sozialismus*. Jena: Urania, 1974.
- Geggel, Heinz. "Jederzeit aktiv und überzeugend die politik der partei vertreten." *Neuer Weg* 44(1989): 195 - 200.
- Gellately, Robert. *Backing Hitler: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 *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Gemkow, Heinrich, ed. *Der Sozialismus—Deine Welt*. Berlin: Neues Leben, 1975.
- Gibas, Monika, and Rainer Gries. "Die Inszenierung des 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Geschichte und Dramaturgie der Dezennienfeiern in der DDR." In *Wiedergeburten: Zur Geschichte der runden Jahrestage der DDR*, ed. Monika Gibas, Rainer Gries, Barbara Jakoby, and Doris Müller, 11 - 40. Leipzig: Leipzig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99.
- Gibas, Monika, Rainer Gries, Barbara Jakoby, and Doris Müller, eds. *Wiedergeburten: Zur Geschichte der runden Jahrestage der DDR*. Leipzig: Leipzig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99.
- Gladwell, Malcolm. *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2000.

- Gleason, Abbott. *Totalitarianism: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Goebbels, Joseph. *Das eiserne Herz: Red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41/42* Munich; Franz Eher, 1943.
- . “Das Jahr 2000.” *Das Reich*, 25 February 1945, 1 – 2.
- . *Der steile Aufstieg: Red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42/43*. Munich Franz Eher, 1944.
- . *Final Entries, 1945: The Diaries of Joseph Goebbels*. Trans. Richard Barr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8.
- . *The Goebbels Diaries: 1942—1943*. Trans. Louis P. Lochner.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48.
- . *Joseph Goebbels Tagebücher, 1924—1945*. Ed. Ralf Georg Reuth. Erweiterte Sonderausgabe. 5 vols. Munich; Piper, 1999.
- . *Kampf um Berlin: De Anfang*. Munich; Franz Eher, 1934.
- . *Signale der neuen Zeit: 25 ausgewählte Reden*. 5th ed. Munich; Franz Eher, 1938.
- Golomstock, Igor. *Totalitarian Art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Third Reich, Fascist Ital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rans. Robert Chandler. New York: IconEditions, 1990.
- Göring, Hermann. Untitled editorial. *Sommerlager-und Heimabend-material für die Schulungs-und Kulturarbeit*, summer 1941,2.
- Hackl, Hans. “Die Partei hat in allem Vorbild zu sein!” *Die Lage*, September 1943, 1 – 7.
- Hadamovsky, Eugen. *Dein Rundfunk: Das Rundfunkbuch für alle Volksgenossen*. Munich; Franz Eher, 1934.
- . *Hilfsarbeiter Nr. 50 000*. Munich; Franz Eher, 1938.
- . *Propaganda und nationale Macht: Die Organisation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für die nationale Politik*. Oldenburg; Gerhard

Stalling, 1933.

Hager, Kurt. *Beiträge zur Kulturpolitik: Reden und Aufsätze 1972 bis 1981*. Berlin: Dietz, 1981.

Hake, Sabine. *Popular Cinema of the Third Reich*.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1.

Hampf, Ernst. *Weil die Partei führt, ist unser Sieg gewiß*. Wissen und Kämpfen. Berlin: Militärverlag der DDR, 1973.

Harm, Marie, and Hermann Wieble. *Lebenskunde für Mittelschulen: Fünfter Teil, Klasse 5 für Mädchen*. Halle: Hermann Schroedel, 1942.

Hauptkulturrat der NSDAP. *Deutsche Kriegsweihnacht*. Munich: Franz Eher, 1944.

Havel, Václav. *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 Trans. Paul Wil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ed. John Keane, 23–97.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85.

Heiber, Helmut. *Goebbels Reden, 1932—1945*. 2 vols. Munich: Wilhelm Heyne, 1971.

Heiss, Michael. "‘Gegen Dummheit gibt’s kein Mittel!’" *Neuer Weg*, December 1949, 31.

Hempel, A. "Zuviel Politik." *Trommel*, 18/1980, 1.

Herbst, Andreas, Gerd-Rüdiger Stephan, and Jürgen Winkler. *Die SED: Geschichte, Organisation, Politik: Ein Handbuch*. Berlin: Dietz, 1997.

Herlt, Günter. *Sendeschluß: Ein Insider des DDR-Fernsehens berichtet*. Berlin: edition ost, 1995.

Herz, Rudolf. *Hoffmann & Hüter: Fotografie als Medium des*

- Führer-Mythos*. Munich: Klinkhardt & Biermann, 1994.
- Herzstein, Robert Edwin. *The War That Hitler Won: The Most Infamou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Histor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8.
- Heydemann, Günter, and Christopher Beckmann. "Zwei Diktaturen in Deutschland: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s historischen Diktaturvergleichs." *Deutschland Archiv* 30(1997): 12 - 39.
- Hilbig, Ewin. "Sind Feierstunden notwendig?" *Unser Wille und Weg* 9 (1939): 164 - 165.
- Hippler, Fritz. *Die Verstrickung: Einstellungen und Rückblenden von Fritz Hippler ehem. Reichsfilmintendant unter Josef Goebbels*. 2nd ed. Düsseldorf: MEHR WISSEN, 1982.
- Hirsch, Martin, Diemut Majer, and Jürgen Meinck, eds. *Recht, Verwaltung und Justiz im Nationalsozialismu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Gesetze und Gerichtsentscheidungen von 1933 bis 1945*. Cologne: Bund, 1984.
- Hitler, Adolf. *Mein Kampf*. Trans. Ralph Manhei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1.
- Hofe Werner von. "Mein Junge." *Ns Frauen Warte* 7, no. 4 (1938): 97.
- Hoffman, Hilmar. *The Triumph of Propaganda: Fil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5*. Trans. John A Broadwin and V. R. Berghahn. Providence, R. I.: Berghahn Books, 1996.
- Holzweißig, Gunter. *Die schärfste Waffe der Partei: Eine Mediengeschichte der DDR*. Cologne: Böhlau, 2002.
- . *Zensur ohne Zensor; Die SED-Informationsdiktatur*. Bonn: Bouvier, 1997.
- Ichenhäuser, Ernst Z. *Erziehung zum guten Benehmen*. 3rd ed. Ber-

- lin; Volk und Wissen, 1983.
- “In eigener Sache.” *WAS und WIE*, December 1989, 4 – 5.
- Jäger, Manfred. *Kultur und Politik in der DDR, 1945—1990*. Cologne: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95.
- Jelavich, Peter. *Berlin Cabare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Johnson, Eric A. *Nazi Terror: The Gestapo, Jews, and Ordinary Germa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Johnst, Hanns. *Requiem*. Munich: Franz Eher, 1943.
- . *Ruf des Reiches—Echo des Volkes!* Munich: Franz Eher, 1940.
- Kalaschnikow, K. *Die Grundsätze der bolschewistischen Agitation*. Bibliothek des Agitators. Berlin: Dietz, 1951.
- Kapferer, Norbert. *Der Totalitarismusbegriff auf dem Prüfstand*. Dresden: Hannah-Arendt-Institut für Totalitarismusforschung, 1995.
- Karrasch, Alfred. *Parteigenosse Schmiedecke*. Berlin: “Zeitgeschichte,” 1934.
- Kaufmann, Christoph, Doris Mundis, and Kurt Nowak. *Sorget nicht, was Ihrreden werdet: Kirche und Staat in Leipzig im Spiegel kirchlicher Gesprächsprotokolle (1977—1989): Dokumentation*.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1993.
- Kershaw, Ian. *The ‘Hitler Myth’: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 “‘Working toward the Führer’: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the Hitler Dictatorship.” In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ed. Ian Kershaw and Moshe Lewin, 88 – 10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Kirkpatrick, Jeane J. *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 Rationalism and Reason in Politic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Klaus, Georg. *Die Macht des Wortes: Ein erkenntnistheoretisch-pragmatisches Traktat*. 4th ed. Berlin: 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68.

———. *Sprache der Politik*. Berlin: 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71.

Kleines politisches Wörterbuch. Berlin: Dietz, 1967.

Kleines politisches Wörterbuch. 7th ed. Berlin: Dietz, 1988.

Kleinschmid, Hanalore. “Der Mut zum Nein: Ein Bericht über Menschen, die sich der Stasi verweigerten.” *Deutschland Archiv* 28 (1995): 348 – 359.

Kohut, Andrew. “Self-Censorship: Counting the Way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y/June 2000): 42 – 43.

Krammer, Fritz. “Haltung und Mundpropaganda.” *Der Hoheitsträger* 6, no. 10 (1942): 11 – 12.

Kremer, Hannes. “Neuwertung ‘überlieferter’ Brauchformen?” *Die neue Gemeinschaft* 3 (1937): 3005 a – c.

Krumbach, Josef H. *Grundfragen der Publizistik: Die Wesenselemente des publizistischen Prozesses: Seine Mittel und Ergebniss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35.

Kultzscher, Karl. *Links und rechts der Dumme: Lebensdatenverarbeitung eines DDR-Satirikers*. Cologne: Tiberius, 1993.

Kuran, Timur.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Kuropka, Joachim, ed. *Meldungen aus Münster, 1924—1944*. Münster: Regensburg, 1992.

Langer, Ellen, A. Blank, and B. Chanowitz. “The Mindlessness of

- Ostensibly Thoughtful Action: The Role of 'Placebic' Information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1978):635 – 642.
- Lapp, Peter Joachim. "Wahlen und Wahlfälschungen in der DDR." *Deutschland Archiv* 29(1996):92 – 106.
- Le Bon, Gustav.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New York: Viking, 1960.
- Lenin, W. I. *Über Agitation und Propaganda*. Berlin: Dietz, 1974.
- Leonhard, Wolfgang. *Child of the Revolution*. Trans. C. M. Woodhouse. London: Collins, 1957.
- Lingg, Anton. *Die Verwalt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3rd ed. Munich: Franz Eher, 1940.
- Longerich, Peter. *Propagandisten im Krieg: Die Presseabteilung des Auswärtigen Amtes unter Ribbentrop*. Studien zur Zeitgeschichte, no. 33. Munich: R. Oldenbourg, 1987.
- Lopatta, Maja. "Von der Hochschulbank? Zur Aus- und Weiterbildung von Kabarettisten: Gespräch mit Dr. Gisela Oechelhaeuser." *Unterhaltungskunst*, April 1987, 7 – 9.
- "Lügensender am Pranger." *Frau von Heute*, 29 September 1961, 7.
- Maaz, Hans-Joachim. *Behind the Wall: The Inner Life of Communist Germany*. Trans. Margot Bettauer Dembo.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
- Maier, Charles S. *Dissolution: The Crisis of Communism and the End of East German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Maier, Hans. "Deutungen totalitärer Herrschaft, 1919—1989."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50(2002):349 – 366.
- . ed. "Total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Religionen": *Konzepte des*

- Diktaturvergleichs*. 2 vols. Politik-und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liche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Görres-Gesellschaft.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1996.
- Mampel, Siegfried. *Das 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der ehemaligen DDR als Ideologienpolizei; Zur Bedeutung einer Heilslehre als Mittel zum Griff auf das Bewußtsein für das Totalitarismusmodell*. Schriftenreihe der 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landforschung, no. 50.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6.
- Marx-Engels-Lenin-Institut. *J. Stalin; Kurze Lebensbeschreibung*. Berlin: Verlag der Sowjetischen Militärverwaltung in Deutschland, 1945.
- McElvoy, Anne. *The Saddled Cow; East Germany's Life and Legac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2.
- McGuire, William. "Resistance to Persuasion Conferred by Active and Passive Prior Refutation of the Same and Alternative Counterargument."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 (1961): 326 - 332.
- Mehnert, Fritz. "Die Statistik der NSDAP." *Der Hoheitsträger* 3, no. 7 (1939): 10 - 12.
- "Merkblatt für den Propagandisten im Gau Weser-Ems." *Monatsblätter der Gaupropagandaleitung Weser-Ems der NSDAP*. 7, no 3 (1942): 10 - 13.
- Meyen, Michael. "Ein Stück Privatleben; Die Anfänge des Fernsehens in der DDR." *Deutschland Archiv* 33 (2000): 207 - 216.
- Miethe, Annadora, ed. *Buchenwald*. N. p., 1983.
- Milosz, Czeslaw. *The Captive Mind*. Trans. Jane Zielonko.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81.
- Mosse, George L.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Political Sym-*

- 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75.
- . *Nazi Culture: Intellectual, 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in the Third Reich.* Trans. Salvator Attanasio et al.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68.
- Münzenberg, Willi. *Propaganda als Waffe.* Paris; Éditions du Carrefour, 1937.
- Naimark, Norman. *Soviet-GDR Relations; An Historical Overview.* Bonn; Bundesinstitut für ost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 1989.
- Nelken, Peer. “Die Satire—Waffe der sozialistischen Erziehung: Ein Diskussionsbeitrag.” *Einheit* 16(1962):103 - 113.
- Neubert, Ehrhart. “Meister der Legende: Ein Kommentar zum Text des ‘In sider-Komitees.’” *Deutschland Archiv* 27(1994):391 - 407.
- Neuner, Gerhart. *Politisch-ideologische Arbeit und Erziehung.* Sitzungsberichte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er DDR. Vol. 9/G. Berlin; Akademie, 1978.
- Niemann, Heinz. *Hinterm Zaun: Politische Kultur und Meinungsforschung in der DDR-die geheimen Berichte an das Politbüro der SED.* Berlin; edition ost, 1995.
- Niethammer, Lutz, Alexander von Plato, and Dorothee Wierling. *Die Volkseigene Erfahrung: Eine Archäologie des Lebens in der Industrieprovinz der DDR: 30 biographische Eröffnungen.* Berlin; Rowohlt, 1991.
- “Nie wieder Journalisten!” *Das Schwarze Korps*, 3 March 1938, 6.
- “9 November.” *Völkischer Beobachter*, 8 November 1935.
- Noelle-Neumann, Elisabeth. *Die Schweigespirale: Öffentliche Meinung—unsere soziale Haut.* Frankfurt; Ullstein Sachbuch, 1982.

- Nothnagle, Alan L. *Building the East German Myth: Historical Mythology and Youth Propaganda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1945—1989*. Social History, Popular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German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 Oelßner, Fred. *Über die allseitige Verbesserung unserer politisch-ideologischen Massenarbeit; Diskussionsrede auf dem IV. Parteitag der Sozialistischen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Berlin: Dietz, 1954.
- . *Über die Verbesserung der Arbeit der Presse und des Rundfunks*. Berlin: Dietz, 1953.
- Oestreich, Paul. *Walther Funk; Ein Leben für die Wirtschaft*. Munich: Franz Eher, 1940.
- “1. Lehrgang der Gau- und Kreispropagandaleiter der NSDAP.” *Unser Wille und Weg* 9(1939):124 - 139.
- Organisationsbuch der NSDAP*. 5th ed. Munich: Franz Eher, 1938.
- Orlow, Dietrich.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1933—1945*.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3.
- Owings, Alison. *Frauen; German Women Recall the Third Reich*. New Brunswick, N. 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3.
- Partei Kanzlei. *Verfügungen/Anordnungen Bekanntgaben*. 4 vols. Munich: Franz Eher, 1943.
- Paul, Gerhard. *Staatlicher Terror und gesellschaftliche Verrohung. Die Gestapo in Schleswig-Holstein*. Hamburg: Ergebnisse, 1996.
- Petropoulos, Jonathan. *Art as Politics in the Third Reich*.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 Philipsen, Dirk. *We Were the People; Voices from East Germany's Revolutionary Autumn of 1989*.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Phillips, Henry Albert. *Germany Today and Tomorrow*. New York:

Dodd, Mead, 1935.

Plan der massenpolitischen Arbeit der Kreisparteiorganisation Rochlitz für das Jahr 1982. Rochlitz: SED Kreisleitung Rochlitz, 1982.

Plantinga, Cornelius, Jr. *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A Breviary of Sin.* Grand Rapids, Mich.: William B. Eerdmans, 1995.

Poßner, Wilfried. *Immer bereit! Parteiauftrag: kämpfen, spielen fröhlich sein.* Berlin: edition ost, 1995.

Puder, Heinz. "Zu den Aufgaben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Bildung und Erziehung sowie zu den Anforderungen an die Propagandisten des Parteilehrjahres." In *Beiträge zur Methodik im Parteilehrjahr*, 3 – 15. Berlin: ZK der SED, 1988.

"Qualitative Stärkung der Reihen der SED fortgesetzt." *Neues Deutschland*, 11 January 1989, 3.

Rademacher, Michael. *Carl Röver: Der Bericht des Reichsstatthalters von Oldenburg und Bremen und Gauleiter des Gauwes Weser-Ems über die Lage der NSDAP: Eine Denkschrift aus dem Jahr 1942.* Vechta: Selbstverlag des Verfassers, 2000.

Raskin, Adolf. "Dramaturgie der Propaganda." In *Handbuch des deutschen Rundfunks, 1939/40*, ed. Hans-Joachim Weinbrenner, 83 – 90. Heidelberg: Kurt Vowinkel, 1939.

Reck, Roland. *Wasserträger des Regimes: Rolle und Selbstverständnis von DDR Journalisten vor und nach der Wende, 1989/90.* Medien und Kommunikation, ed. Hans-Dieter Küberl, vol. 24. Münster: Lit, 1996.

Reibel, Car-Wilhelm. *Das Fundament der Diktatur: Die NSDAP-Ortsgruppen 1932—1945.*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2002.

Reichsorganisationsleiter. *Partei-Statistik: Stand: 1935.* Munich: Reichsorganisationsleiter, 1935.

- “Reichsredner der NSDAP.” *Unser Wille und Weg* 6 (1936) :222 – 223.
- “Reich und Sowjetunion.” *Der Hoheitsträger* 3, no. 9 (1939) :52.
- Rentschler, Eric. *The Ministry of Illusion; Nazi Cinema and Its After-lif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Reuband, Karl-Heinz. “‘Schwarzhören’ im Dritten Reich: Verbreitung, Erscheinungsformen und Kommunikationsmuster beim Umgang mit verbotenen Sendern.” In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vol. 41, 245 – 262. Bonn: J. H. W. Dietz Nachf., 2001.
- Review of *Glaube und Handeln* by Hellmut Stellrecht. *Unser Wille und Weg* 8 (1938) :349.
- Richert, Ernst. *Agitation und Propaganda: Das System der publizistischen Massenführung in der Sowjetzone*. 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ür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no. 10. Berlin: Franz Vahlen, 1958.
- Ringler, Hugo. “Der Rednerstoßtrupp der Reichspropagandaleitung.” *Unser Wille und Weg* 5 (1935) :154 – 156.
- . “Die Arbeit des Propagandiste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 *Unser Wille und Weg* 4 (1934) :293 – 299.
- . “Neuordnung des politischen Rednerstabes.” *Unser Wille und Weg* 5 (1935) :30 – 33.
- Rodden, John. “‘It Should Have Been Written Here’: Germany and *The Black Book*.” *Human Rights Review* 2 (2001) :144 – 164.
- . *Repainting the Little Red Schoolhouse: A History of East German Education, 1945—199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Rosenberg, Alfred. *Lehrstoffsammlung und Grundplan für die weltanschauliche Schu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Munich: Beauftragten des Führers für die gesamte geistige

- und weltanschauliche Schulung und Erziehung der NSDAP, 1939.
- Rosenberg, Alfred, and Wilhelm Weiß. *Der Reichsparteita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Nürnberg, 19./21. August 1927*. Munich: Franz Eher, 1927.
- Ross, Colin. *The East German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DR*. London: Arnold, 2002.
- Ruck, Michael. *Bibliographie zum Nationalsozialismus*. 2nd ed.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00.
- “Rücksicht am falschen Platz.” *Das Schwarze Korps*, 2 September 1943, 2.
- Scanlan, Ross. “The Nazi Party Speaker System.” *Speech Monographs* 16(1949):82 - 97.
- . “The Nazi Party Speaker System, II.” *Speech Monographs* 17(1950):134 - 148.
- . “The Nazi Speakers’ Complai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40(1954):1 - 14.
- Schabowski, Günter. *Das Politbüro: Ende eines Mythos. Eine Befragung*. Reinbek: Rowohlt, 1990.
- . “Ihr Vermächtnis ist unser Kampf für Arbeit, Brot und Völkerfrieden.” *Neues Deutschland*, 13 January 1986, 2.
- Schäfer, Bernd. *Staat und katholische Kirche in der DDR*. Schriften des Hannah-Arendt-Instituts für Totalitarismusforschung, no. 8. Cologne: Böhlau, 1998.
- Scharf, Götz. *Über den moralischen Faktor im modernen Krieg*. Schriftenreihe zur Diskussion über militärwissenschaftliche Fragen, no. 19. Berlin: Verlag des Ministeriums für nationale Verteidigung, 1959.
- Scherzer, Landolf. *Der Erste: Protokoll einer Begegnung*. Rudolstadt:

- Greifenverlag zu Rudolstadt, 1988.
- Schirach, Baldur von, ed. *Das Lied der Getreuen: Verse ungenannter österreichischer Hitler-Jugend aus den Jahren der Verfolgung, 1933—1937*. Leipzig: Philipp Reclam jun., 1938.
- Schmiechen-Ackermann, Detlef. “Der ‘Blockwart’: Die unteren Parteifunktionäre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Terror- und Überwachungsapparat.”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8 (2000): 575 – 602.
- Schmitz-Berning, Cornelia. *Vokabula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8.
- Scholle. “Vom Ortsgruppenleiter.” *Der Hoheitsträger* 6, no. 9 (1942): 29 – 30.
- Schönemann, Friedrich. *Die Kunst der Massenbeeinflussung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24.
- Schrieber, Karl-Friedrich. *Die Reichskulturkammer*. Berlin: Junker und Dönhaupt, 1934.
- Schriftsteller Verband der DDR. *X. Schriftstellerkongreß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Arbeitsgruppen*. Cologne: Pahl-Rugenstein, 1988.
- “Schrifttum über Propaganda.” *Zeitschriften-Dienst*, 28 October 1939, 20 – 21.
- Schubert, Renate. *Ohne größeren Schaden? Gespräche mit Journalistinnen und Journalisten der DDR*. Munich: Ölschläger, 1992.
- Schultz, Wolfgang. “Auch an seinem Heim erkennt man den Nationalsozialisten!” *Der Hoheitsträger* 3, no. 8 (1939): 16 – 18.
- Schulze-Wechsungen. “Politische Propaganda.” *Unser Wille und Weg* 4 (1934): 323 – 334.

- Scütte, Carl. *Schulfeiern im Geist der neuen Zeit*. Langensalza: Verlag von Julius Beltz, 1937.
- Schwarz van Berk, Hans. "Die offenen Verlustlisten." *Das Reich*, 14 February 1943:3.
- Selbmann, Erich. *DFP Aldershof: Wege übers Fernsehland: Zur Geschichte des DDR-Fernsehens*. Berlin: edition ost, 1998.
- Simon, Günter. *Tischzeiten: Aus den Notizen eines Chefredakteurs 1981 bis 1989*. Berlin: Tribüne, 1990.
- Sindermann, Horst. "Über die Änderung der Arbeitsweise der Agitation und Propaganda." In *Die Agitation und Propaganda ganz dem neuen Leben und dem Sieg des Sozialismus zuwenden*. Berlin: Abteilung Agitation und Propaganda beim Zentralkomitee der SED, 1959.
- Sozialisten der Tat: Das Buch der unbekanntenen Kämpfer der N. S. V. Gau Groß-Berlin*. Berlin: N. S. D. A. P. Amt für Volkswohlfahrt, Gau Groß-Berlin, 1934.
- Speer, Albert. *Inside the Third Reich*. Trans. Richard Winston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 Sperber, Kurt. "Die Versammlungswelle." *Der Hoheitsträger* 3, no. 1 (1939):27 - 28.
- Springer, Hildegard, ed. *Es sprach Hans Fritzsche*. Stuttgart: Thield, 1949.
- "Stasi-Dokumente, 1989." *Deutschland Archiv* 23(1990):612 - 622.
- Statut der Sozialistischen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Berlin: Dietz, 1975.
- Steinert, Marlis G. *Hitler's War and the Germans: Public Mood and Attitud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Ed. and trans. Thomas E. J. de Witt.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7.

- Stellrecht, Helmut. *Glauben und Handeln: Ein Bekenntnis der jungen Nation*. Berlin: Franz Eher, 1943.
- Stern, J. P. *Hitler: The Führer and the Peop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 Tenorth, Heinz Elmar, Sonja Kudella, and Andreas Paetz. *Politisierung im Schulalltag der DDR: Durchsetzung und Scheitern einer Erziehungsambition*. Bibliothek für Bildungsforschung, no. 2. Weinheim: Deutscher Studien, 1996.
- Thomae, Otto. *Die Propaganda-Maschinerie: Bildende Kunst und Öffentlichkeitsarbeit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Gebr. Mann, 1978.
- Tießler, Walter. "Der Reichsring für nat.-soz. Propaganda und Volksaufklärung." *Unser Wille und Weg* 5(1935):412 - 416.
- Toepser-Ziegert, Gabriele. *NS-Pressenanweisungen der Vorkriegszeit: Eine Einführung in ihre Edition*. Munich: K. G. Saur, 1984.
- Über die Verbesserung der Parteipropaganda: Entschließung des Parteivorstandes der SED vom 2. und 3. Juni 1950. Berlin: Parteivorstand der SED, Abteilung Propaganda, 1950.
- Unger, Aryeh. *The Totalitarian Party: Party and People in Nazi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Uricchio, William. "Rituals of Reception, Patterns of Neglect: Nazi Television and Its Postwar Representation." *Wide Angle* 11(1989): 48 - 66.
- Uschner, Manfred. *Die zweite Etage: Funktionsweise eines Machtapparates*. Berlin: Dietz, 1993.
- Voegelin, Erich. *Political Religions*. Trans. T. J. Denapoli and E. S. Easterly III. Toronto Studies in Theology. Lewiston, N. Y. : Edwin Mellen Press, 1986.

- Volkogonov, Dmitri. *Autopsy for an Empire: The Seven Leaders Who Built the Soviet Regime*. Trans. Harold Shuk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 Vondung, Klaus. *Magie und Manipulation: Ideologischer Kult und politische Relig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1.
- Von Hallberg, Robert. *Literary Intellectual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tate: Professionalism and Conformity in the GDR*. Trans. Kenneth J. Northcot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Vorländer, Herwart. *Die NSV: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ation ein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Organisation*. Schriften des Bundesarchivs, no. 35. Boppard am Rhein: Harald Boldt, 1988.
- Vorsteher, Dieter, ed. *Parteiauftrag: Ein neues Deutschland: Bilder, Rituale und Symbole der früheren DDR*. Munich: Koehler & Amelang, 1997.
- Walter Ulbricht—*Ein Leben für Deutschland*. Leipzig: VEB E. A. Seemann, 1968.
- “Warum ist die Oder-Neiße-Grenze die Friedensgrenze?” *Frage und Antwort: Argumente für die tägliche Diskussion*, no. 6 (1950): 3 – 4.
- Weber, Hermann. *Geschichte der DDR*. Aktualisierte und erweiterte Neuauflage. Munich: Deutsche Taschenbuch, 1999.
- Weberstedt, Hans, and Kurt Langner. *Gedenkhalle für die Gefallenen des Dritten Reiches*. Munich: Franz Eher, 1938.
- Welch, David.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1933—194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 . *The Third Reich: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London: Routledge, 1993.

- Wiedemann, Dieter, and Hans-Jörg Stiehler. "Die Funktion der Massenmedien bei der kommunistischen Erziehung der Jugend." Leipzig: Zentralinstitut für Jugendforschung, 1984.
- "Wie reimt sich das zusammen?" *Der Stürmer*, 24/1936, 10.
- Wischnjakov, A. S., et al. *Methodik der politischen Bildung*. Trans. Intertext. Berlin: Dietz, 1974.
- Wolle, Stefan. *Die heile Welt der Diktatur: Alltag und Herrschaft in der DDR, 1971—1989*. 2nd ed. Berlin: Ch. Links, 1998.
- Wulf, Joseph. *Presse und Funk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Sigbert Mohn, 1964.
- Young, Robert G. "'Not This Way Please!' Regulating the Press in Nazi Germany." *Journalism Quarterly* 64 (1988): 787–792.
- Zander, Otto, ed. *Weimar: Bekenntnis und Tat: Kulturpolitisches Arbeitslager der Reichsjugendführung, 1938*. Berlin: Wilhelm Limpert, 1938.
- Zeuschner, Heiko. *Die braune Mattschreibe: Fernseh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Rotbuch, 1995.
- "Zum Geburtstag des Führers." *Deutsche Kinderwelt* 9/1936, 71.
- "Zum 13. August." *Neues Deutschland*, 13 August 1962, 1.

索引*

A

- Adolf Hitler: Pictures of the life of the Fuhrer* 《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生活照片集》 16, 28 - 29
- Agitation* 鼓动 48 - 49, 51
- definition 定义 3
- difficulties with 困难 79 - 80, 84
- distinguished from propaganda 区别于宣传 3
- GDR directives on 东德有关指示 85
- organization of 组织 81
- purpose of 目的 53
- statistics on 有关统计资料 81
- Aktuelle Kamera* “当代摄影” 95
- Allen, William S. 威廉·S·艾伦 139
- Allgemeiner Deutscher Nachrichtendienst* (ADN) 德意志通讯社
68
- alte kampfer* 老战士 21

* 索引中所注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译注

- Amann, Max 麦克斯·阿曼 58, 90
 heads Franz Eher Verlag 弗朗兹·艾尔出版社主管 65
 in the RKK 在帝国文化协会 65
- Andropov, Yuri 尤里·安德罗波夫 132 - 133
- Angriff, Der* 《攻击》 45, 90
- antifascism 反法西斯主义 39
- Anti - Fascist Protective Wall 反法西斯主义保护墙
 See Berlin Wall 参见柏林墙
- anti - Semitism 反犹主义 26, 125 - 126, 141
 See also Jews; *Mein Kampf* 参见犹太人;《我的奋斗》
- architecture 建筑 110 - 111
 Hitler on 希特勒论 110
 in the GDR 在东德 114 - 115
 propaganda value of 宣传价值 114 - 115
 See also Honecker; *Mein Kampf*; Ulbricht 参见昂纳克;《我的奋斗》;乌布利希
- Arendt, Hannah 汉娜·阿伦特 40
- Argument der Woche* 《一周评论》 161
- Ash, Timothy Garton 蒂莫西·加顿·阿什 166
- Auden, W. H. W. H. 奥登 167
- Aufklärungs - und Redner - Informationsmaterial* 《教育与演说家情报资料汇编》 75 - 76

B

- Baarova, Lida 琳达·巴洛娃 112
- Baird, Jay 杰·拜尔德 58
- Balfour, Michael 迈克尔·巴尔弗 58, 104, 132
- Barsch, Claus - Ekkehard 克洛斯 - 伊克哈德·巴斯克 11

- Bear One Another's Burdens* 《承受彼此的重担》 147
- Becher, Johannes R. 约翰纳斯·R·贝希尔 1
- Beer Hall Putsch “啤酒馆政变”
- See 9 November 参见 11 月 9 日
- Behrens, Helmut 赫尔穆特·贝伦斯 141
- Berg, Hermann Von 赫尔曼·冯·博格 80
- Berlin Sport Palace 柏林体育场 100
- Berlin Wall: Anti - Fascist Protective Wall 柏林墙:反法西斯主义
 保护墙 39, 101 - 104, 158
- election following 接下来的选举 136
- media treatment of 媒体的态度 95 - 96, 162 - 163
- Ulbricht denies plan to build 乌布利希否认建立计划 102
- Berlin: as showplace 柏林:作为历史名胜 114
- Bernhard, Georg 乔治·伯恩哈德 125 - 126
- Best, Werner 维尔纳·贝斯特 149 - 150
- Beyer, Frank 弗兰克·贝尔 116
- bible: Hitler's words as 希特勒的话当作圣经 17 - 18
- Mein Kampf* as 《我的奋斗》当作 17
- Bitterfeld way “比特费尔德道路” 115
-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共产主义黑皮书》 168
- Blecha, Kurt 柯尔特·布勒查 68
- Blood Banner 血旗
- Boberach, Heinz 海因茨·鲍伯拉赫 93
- Bouhler, Philip 菲利普·波尔 58, 65
- Braun, Volker 弗尔克·布劳恩 1
- Brecht, Bertholt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30, 140
- Brennessel* 《荨麻》 119 - 128
-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英国广播公司

- See broadcasting 参见广播
- Broadcasting: BBC BBC 广播 92
- radio 无线电广播 92, 94, 95, 112
- television 电视 94, 95
- Brooks, Robert D. 罗伯特·布鲁克斯 8, 23
- Brothers Karamazov* (Dostoevsky) 《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 12
- Brzezinski,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 165
- Buchenwald 布痕瓦尔德 33 - 34
- Bullock, Alan 阿兰·布洛克 157
- Burgess, John 约翰·伯吉斯 147
- Burleigh, Michael 迈克尔·柏勒赫 11

C

- cabaret 卡巴莱表演 117 - 119
- banned shows 被禁的演出 118
- in the GDR; Nazi 在东德 118 - 119; 纳粹德国 117 - 118
-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 4, 42, 46, 144 - 145
- Censorship Committee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t Literature
国家社会主义文学保护审查委员会 65
- censorship 审查 90 - 92, 159 - 160
- of films 电影 112
- in the GDR; Nazi 在东德 94; 纳粹德国 90 - 92
- self 自我审查 113
- See also church; Honecker; journalists 参见教会; 昂纳克; 新闻工作者
-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SED (ZK)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32, 943, 94

- and GDR culture policy 与东德文化政策 114
- and propaganda 与宣传 51
- departments of 各部门 66 - 68
- Central Propaganda Office(RPL) 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 61 - 62, 64, 75, 113
- Chernenko, Konstantin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 132 - 133
-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GDR) 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 147
- Christianity: and Nazism 基督教教义与纳粹主义 37
 - and Marxism - Leninism 与马列主义 37
- Christmas 圣诞节 20
- church 教会 144 - 148
 - banned from politics 严禁染指政治 144
 - censorship of 审查 147
 - denied status as worldview 不承认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地位 145
 - in the GDR 在东德 144
 - loyalty to 忠诚于 144
 - membership in 成员身份 145 - 146
 - as a problem 作为一个问题 148
 - as refuge 当作庇护所 146
 - restricted to "spiritual" activities 限于“精神的”活动 144 - 146
 - worldview of 世界观 144
- coercion: denunciations and 告发与强制 141
 - gentle 温和的 141
 - in Hitler's Germany 在希特勒的德国 141
- collective: importance of the 集体的重要性 141
- criticism, artistic 艺术批评 113
 - a "Jewish" phenomenon 一个“犹太人的”现象 113 - 114

- restrictions on 限制 116 - 117
 See also Goebbels 参见戈培尔
 cybernetics 控制论 50 - 51

D

- DAF. See German Labor Front ; Ley Robert 德国劳工阵线; 罗伯特·雷
 dead; immortality of the 亡者之不朽 23, 25 - 26
 DEFA 东德电影制片厂 93, 116
 democratic centralism 民主集中制 66, 133
Dictatorship and Double Standards 《专制与双重标准》 165
 Dietrich, Otto; conflicts with Goebbels 奥托·迪特里希与戈培尔的冲突 57 - 58, 63 - 64
 heads *Deutsches Nachrichtenburo* 主管德意志通讯社 64
 influence of 影响力 64
 and the press 与新闻媒体 54
 and propaganda 与宣传 19, 57, 58, 135
 as *Reichspressechef* 作为帝国新闻主管 63
 Djilas, Milovan 米洛凡·吉拉斯 156 - 157
 Dollfuß, Chancellor Engelbert 厄尔伯特-陶尔斐斯总理 119
 Dostoevsky, Fyodor: *The Brothers Karamazov*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12
 Dusiska, Emil 埃米尔·杜西斯卡 93

E

- education: in the GDR 东德的教育 78 - 79, 140; Nazi party 纳粹党的教育 64
 Educational and Speaker Information Material 《教育与演说家情报

- 资料汇编》 75 - 76
- Eintopfsonntag* collection 星期天炖煮食物募集 72
- Ellul, Jacques: on fragmentation of society 雅克·埃吕尔论社会的碎片化 139
- on propaganda 论宣传 3 - 4, 106 - 107, 131, 137, 139, 159, 161, 167
- on unanimity 论一致性 137
- Enquete Commission 调查委员会 164
- Erste Der* (Scherzer) 舒尔茨《第一书记》 134
- Eulenspiegel* 《捣蛋鬼》 103 - 104, 119 - 128
- Ewald, Manfred 曼富莱德·艾瓦德 124
- ewige Jude, Der* (film) 电影《流浪的/永恒的犹太人》 113
- Exhibit of Degenerate Art “堕落艺术展” 110

F

- Faith and Action* 《信仰与行动》 24
- Faith: Marxist; Nzai 马克思信仰 6, 34 - 36; 纳粹信仰 23 - 27
- FDGB (Free German Trade Union) 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 81, 93, 141
- FDJ (Free German Youth) 自由德国青年 28 - 29, 81, 93, 103, 140
- film: and the Propaganda Ministry 电影与宣传部 112
- short propaganda 宣传电影短片 113
- as subtle reinforcement 作为精妙的强化手段 113
- in the GDR 在东德 116
- Finck, Werner 维尔纳·芬克 91, 117
- Frau von Heute* 《今日女性》 103
- Frauen Warte* 《女性立场》 25

- Free German Trade Union (FDGB) 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 81, 93, 141
- Free German Youth (FDJ) 自由德国青年 28 - 29, 81, 93, 103, 140
- Freemasons 共济会员 42
- Frei, Norbert 诺伯特·弗雷 91
- Fritzsche, Hans 汉斯·弗里茨彻 91 - 92
- Fulbrook, Marry 玛丽·福尔布鲁克 148, 166
- Functionaries, lower level 低级党务人员 73
- See also organization 参见组织
- Furian, Hans - Otto 汉斯—奥托·福瑞安 142

G

- Galen, bishop of Münster 明斯特的盖伦主教 146
- Garbo, Greta 葛丽泰·嘉宝 91
- Gau, Günter 冈特·古 163
- GDR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式东德)
- preference for written propaganda 偏爱于书面的宣传 52 - 53
- propaganda and lying 宣传与撒谎 52
- truthfulness of 现实 142
- unapproved demonstrations 未经许可的示威游行 143
- unpopularity of 不得人心 143 - 144
- views on propaganda 有关宣传的观点 51 - 53
- See also architecture; cabaret; censorship; church; education; holidays (GDR); film; infallibility; worldview 参见建筑; 卡巴莱表演; 审查; 教会; 教育; 节日; 电影; 绝对正确; 世界观
- Geggel, Heinz 海因茨·吉格 67

- compared to Goebbels 与戈培尔相比 105
- German Labor Front (DAF) 德国劳工阵线 62,74,75,76,90
- German Propaganda Archive (GPA) 德国宣传档案 8-9
- Gestapo 盖世太保 141,149-150
- Gladwell, Malcolm 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 137
- Goebbels, Joseph 约瑟夫·戈培尔
- and art 与艺术 110;
 - and the big lie 与大谎 44-45
 - and cabaret 与卡巴莱表演 118
 - campaign against complaining 反对抱怨的运动 152
 - and disloyalty 与不忠 121
 - control of holidays 控制节日 19-20
 - and criticism 与批评 113-114,117
 - and *Der Angriff* 与《攻击》 45,60,90
 - goals 目标 60-61,135
 - as head of RMVP 帝国公众启蒙与宣传部头目 60
 - and heresy 与异端 131-132
 - on the masses 论大众 43
 - and media 与媒体 91,104,112
 - ministry of 部门 60
 - and national book award 与国家图书奖 15-16
 - and newsreels 与新闻片 92
 - and propaganda 与宣传 48,54,57,63,96,148
 - and public opinion 与公共舆论 136-137
 - as *Reichspropagandandaleite* 作为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领导人 60
 - and secularworship 与世俗崇拜 11
 - speeches on Hitler's birthday 在希特勒生日聚会上的演说 16

- “total war” speech “总体战”演说 99 - 100
 and war 与战争 97 - 99
 on worldviews 论世界观 39
 Goldhagen, Daniel 丹尼尔·戈德哈根 153
 Goring, Hermann 赫曼·戈林 19, 29, 98
 Groger, Wolfgang 沃尔夫冈·格罗格 147 - 148

H

- Hadamovsky, Eugen 欧根·哈达莫夫斯基
 on broadcasting 论广播 46 - 47
 on force 论武力 149
 on freedom 论自由 90
Our Radio 《我们的广播》 112
 on propagandists 论宣传员 77
Propaganda and National Power 《宣传与国家权力》 48
 Hager, Kurt 柯尔特·哈格尔 114, 117, 147
 Half Way Covenant “中途立约” 38
Hans Westmar (film) 电影《汉斯·韦斯特马尔》 112
 Havel, Václav 瓦茨拉夫·哈维尔 36, 55, 151 - 152, 159, 161, 165
 Hein, Christoph 克里斯托夫·海因 116
 Heroes' Memorial Day 英雄纪念日 100
 Herrmann, Joachim 约阿希姆·赫尔曼 67, 68, 104 - 105
 Herzstein, Robert 罗伯特·赫兹斯坦 58, 60, 63
 Hess, Rudolf 鲁道夫·赫斯 16 - 17, 19, 27, 91
 Hindenburg Paul von 保罗·冯·兴登堡 135
Hitler No One Knows 《不为人知的希特勒》 16
 Hitler, Adolf and *Adolf Hitler: Pictures of the life of the Fuhrer* 阿道

- 夫·希特勒与《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生活照片集》 16
- and the arts 与文艺 109 - 114
- on the big lie 论大谎 44
- and German - Soviet pace 与《德苏条约》 161
- The Hitler No One Knows* 《不为人知的希特勒》 16
- as a deity 作为一个神 14 - 17
- film about (*Triumph of the Will*) 有关电影《意志的胜利》 16
- iconographic images of 肖像照 16 - 17
- and infallibility 与绝对正确 46
- on the measure of propaganda 论宣传的措施 54
- and newsreels 与新闻片 92
- as omnipresent 无处不在 18 - 19
- poems about 相关诗集 15 - 16
- on religion 论宗教 5
- shrines to 膜拜 18
- support for 支持 156
- treatment of 对待 28
- views on propaganda 论宣传的观点 42 - 48, 134 - 135
- See also Goebbels; party; press; propaganda; religion 参见戈培尔; 党; 新闻媒体; 宣传; 宗教
- Hitlerjunge Quex* (film) 电影《机智的希特勒青年》 112
- Hoffmann, Heinrich, *The Hitler No One Knows* 海因里希·霍夫曼《不为人知的希特勒》 16
- Hoheitsträger, Der* 《主权担当者》 76 - 77
- holidays (GDR), 15 January 东德节日, 1月15日 31
- honored occupations 光荣的职业 31
-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国际妇女节 31
- May Day 国际劳动节 31

- party congress 党代会 31 - 32
 recurring anniversaries 周年循环纪念 31
 7 October 11月7日 31 - 33
 World War II end 二战结束 31
 holidays(Nazi) 纳粹节日 19 - 23
 announcement of party program 党纲公布 19
 assumption of power 就职 19
 Christmas 圣诞节 20
 Duty of Youth Day 青年义务日 20
 Harvest Festival 丰收节 20
 Heros' Memorial Day 英雄纪念日 20
 Mother's Day 母亲节 20
 National Holiday of the German People 德国人民国庆日 20
 9 November 11月9日 16,20,23
 Nuremberg rallies 纽伦堡集会 16,20,23,28,44,54,109,135,
 156,165
 summer solstice 夏至日 20
 Holocaust 大屠杀 153,157
 Honecker, Erich: adulation of 对埃里希·昂纳克的奉承 v28 - 29
 and agitation 与鼓动 84
 and architecture 与建筑 115
 and the church 与教会 147
 and censorship 与审查 94
 and the economy 与经济 168
 on leadership 论领导 53
 on the masses 论大众 166
 and SED 与德国统一社会党 32,33,49,66
 and unanimity 与一致性 133

Klaus, Hopke 克劳斯·哈普克 116,137

I

ideas, death of 观念之消亡 137

as epidemics 正如传染病一样 137

infections 感染 142

Illustrierter Beobachter 《观察家画报》 73

Imagery: Christian 基督教的意象 22

infallibility; of GDR leaders 东德领导人绝对正确 29

of Hitler 希特勒 46

of the SED 德国统一社会党 30

Institute for Marxism - Leninism 马列主义研究所 49

Institute for Youth Research 青年研究所 51,3

J

Jelavich, Peter 彼得·耶拉维奇 118

Jews 犹太人 26 -27

and Bolshevism 布尔什维克主义 99 -1100

and art 与艺术 110

Johannes Robert Becher Literature Institute 纳斯·罗伯特·贝希
尔文学研究所 115

John Paul II, Pope 教皇保罗二世 168

Veritatis Splendor 《真理的光辉》 168

Johst, Hans 汉斯·乔斯特 111

journalists 新闻工作者 93 -94

and censorship 与审查 106

demands on 施加的指示 105

Schriftleiter 报纸编辑 106

- See also literature; media; press 参见文学;媒体;新闻媒体
Jud Süß (film) 电影《犹太人苏斯》 113
Jugendweihe “青年奉献”仪式 34,153
Junge Generation 《年轻一代》 103

K

- Kampfzeit* 斗争期间 112
 Kershaw, Ian 伊恩·科索 65-66
 Kirkpatrick, Jeane 吉恩·柯克帕特里克 165
 Klaus, Georg 乔治·克劳斯 50,52,53
 Kohl, Helmut 赫尔穆特·科尔 29
Kolberg (film) (电影)《科尔贝格》 113
 Kucyzinski, Jürgen 尤根·库钦斯基 11
 Kundra, Milan 米兰·昆德拉 39
Kunst im Deutschen Reich, Die 《德意志帝国的艺术》 18,110
 Kuran, Timur, and spiral of prudence 第默尔·库兰与谨慎的螺旋 137-138

L

- Lage, Die* 《形势》 76
 Lamberz, Werner 维尔纳·兰博尔茨 67
 Lange - Müller, Katja 卡亚·朗格·穆勒 116
 leadership: as characteristic of propaganda 作为宣传之特征的领导力 47
 deceived by propaganda 被宣传所欺骗 165-166
 as innate ability 作为与生俱来之能力 47
 leadership principle (*Führerprinzip*) 领导原则 57,66,86,132
 Lenin 列宁 49,165

- adulation of 奉承 28
- On Agitation and Propaganda* 《论鼓动与宣传》 49
- authority of 权威 27
- Leonhard, Wolfgang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 134
- Ley, Robert 罗伯特·雷 19
- and DAF 与德国劳动阵线 64
- and educational system 与教育体系 64
- and party organization 与党组织 77-78
- and propaganda 与宣传 57-58, 67, 76
- as *Reichsorganisationsleiter* of 作为帝国组织部长 64
- Liebknecht, Karl 卡尔·李卜克内西 31
- literature: authors as journalists 文学: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作家们
116
- and *Leseland DDR* “东德:文学之地” 115
- as queen of the arts 文艺之女王 115
- under Nazism 纳粹主义之下 111
- See also Bitterfeld Way, Johannes Robert Becher Literature Institute 参见“比特费尔德道路”,约翰纳斯·罗伯特·贝希尔文学研究所
- Lueger, Karl 卡尔·鲁伊格 43
- Lustige Blätter* 《滑稽集锦》 119
- Luxemberg, Rosa 罗莎·卢森堡 31

M

- Mach mit* “加入我们吧” 127
- Maetzig, Kurt 柯尔特·梅切格 116
- Maier, Hans 汉斯·迈耶尔 11
- Marx: authority of 马克思的权威 27

- masses 大众,群众 43 - 45
 deceived by capitalist propaganda 被资本家的宣传所欺骗 52
- May Day 五一国际劳动节 31
- May, Karl 卡尔·迈 111
- media: and private ownership 媒体与私人所有权 93
 in totalitarian societies 在极权社会 89 - 107
- Mein Kampf* 《我的奋斗》
 on architecture 论建筑 110
 on Jews 论犹太人 26
 on party organization 论党组织 134
 on propaganda 论宣传 43 - 49, 73
 sales of 销量 17
 See also bible; propaganda 参见圣经;宣传
- Methods of Political Education* 《政治教育方法》 50
- Mielke, Erich 埃里希·米尔克 146 - 157, 150
-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Stasi) 国家安全局(史塔西) 142 -
 143, 156
- Mittag, Günter 冈特·米塔格 68, 116
- Modrow, Hans 汉斯·莫德罗 67
- Mosse, George L. 乔治·摩斯 17
- Mother's Day 母亲节 20
- Munzenberg, Willi 威利·明岑伯格 49

N

- National Front 国民阵线 135 - 136, 138 - 139
- Naumann, Konrad 康拉德·诺曼 133
- Nelken, Peter 彼特·奈尔肯 120, 124
- neue Gemeinschaft, Die* 《新共同体》 34, 64

- Neubert, Ehrhart 艾尔哈特·诺伊贝特 147 - 148
- Neues Deutschland* 《新德国》 31, 32, 68, 101, 103, 142
- Neuer Weg* 《新路》 79, 82 - 83
- news broadcasts 新闻广播 95
- western 西方的 96
- newsreels 新闻片 92 - 93, 97 - 98, 100
- disappearance of 消失 95
- 9 November (Beer Hall Putsch) 11月9日(啤酒馆政变) 21 - 23
- Blood Banner 血旗 16, 21, 23
- invocation at 祈祷 21
- martyrs 殉道者 21 - 22
- Noelle - Neumann, Elisabeth 伊丽莎白·诺艾尔 - 诺依曼
- and spiral of silence theory 沉默的螺旋理论 137
- Norden, Albert 阿尔伯特·诺登 67
- Nothnagle, Alan 阿兰·罗斯兰格 33
- NSDAP (Nazi Party)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20 - 21, 29, 31, 36, 62, 69, 74, 85 - 86, 90, 149
- and control of media 与控制媒体 90 - 91
- Nuremburg rallies 纽伦堡集会 16, 20, 23, 28, 44, 54, 109, 135, 156, 165

O

- Oeßiner, Fred 弗雷德·欧司勒 52 - 53, 85
- OKW. See Supreme Command of Wehrmacht 帝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 On Agitation and Propaganda* 《论鼓动与宣传》 49
- organization 组织
- and blocks 与小组 72

- Nazi hierarchical 纳粹的等级 71 - 78
- of propaganda 宣传 57
- purpose of 目的 74
- SED hierarchy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等级 78 - 85
- organizations: benefits of participation in 参加组织的好处 141
- at Bitterfeld chemical concern 在比特费尔德化工厂 139
- DAF 德国劳工阵线 138
- FDGB 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 138
- FDJ 自由德国青年 138
- Hitler Youth 希特勒青年团 138
- mass 大众 138 - 139
- Nazi women's organization 纳粹妇女组织 138
- SA 纳粹冲锋队 138
- Society for Germanp - Soviet Friendship(DSF) 德苏友好协会
138
- SS 纳粹党卫军 138
- Our Radio* (Hadamovsky) 哈达莫夫斯基《我们的广播》 112

P

- Parteigenosse Schmiedecke*(novel) 小说《党员施米德克》 111
- Parteilehrjahr* “党员年训课程” 79
- party: and conformity 党与服从 138
- Hitler's goal for 希特勒的目标 138
- as sacred 神圣的 27,30
- as source of absolute knowledge 作为绝对知识的来源 29 - 30
- “People's Receiver” “人民的收音机” 60
- Philipsen, Dirk 迪克·菲利普森 143
- pilgrimage sites 朝圣地 33 - 34

- Plantinga, Cornelius Jr 神学家克奈里乌斯·普兰廷格 40
- Poppe, Ulrich 乌尔里奇·波普 143
- Potemkin, Grigory Aleksandrovich 格里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波特金 89
- Potsdamer Kirche* 《波茨坦礼拜》 68
- power: centrality of 力量的中心性 46
- hidden 隐藏的 151
- part of effective propaganda 有效宣传的一部分 45 - 46
- prayer: socialist equivalent of 祈祷的社会主义等价物 11
- press: failure to trust the 不能信任新闻媒体 106
- in Hitler's Germany 在希特勒的德国 124
- in the GDR 在东德 124 - 125
- and stability 与稳定 107
- propaganda: atheistic 无神论宣传 146
- Cold War 冷战 12
- central bureaucracies of 中央官僚机构 71
- compared with religion 同宗教相比 39
- deceitful 欺骗性的 161
- definitions of 各种定义 2 - 5
- and evidence 与证据 160
- failure of 失败 155 - 169
- Hitler's sources 希特勒论宣传的来源 42
- influence of 影响 36 - 38
- methods "baptized" "被净化了的"方法 50
- no ABC of 没有指南 42 - 48
- and emotions 与情感 43 - 45, 52 - 53
- as Marxist - Leninist Science 作为马列主义科学 53
- as means to an end 作为达到一个目标的手段 44

- ministry 部门 91
 as monologue 作为独白 45
 and news 与新闻 161 - 162
 plans contrasted 可比较的宣传计划 86 - 88
 principles of 原则 43
 as promoter of hypocrisy 作为伪善的催化剂 162
 as public education 作为公共教育 42 - 43
 as quasi - religious phenomenon 作为准宗教现象 11
 relation to agitation 与鼓动的关系 3
 reputation defended 声誉之辩护 2
 and repetition 与重复 45
 rhetorical straight jacket of 华丽的紧身衣 55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理论视角 41 - 42
 totalitarian 极权的 160 - 161
 and truthfulness 与真实性 52
 See also *Mein Kampf*; Marxism - Leninism; leadership; *Propaganda and National Power* (Hadamovsky) 参见《我的奋斗》; 马列主义; 领导力; 《宣传与国家权力》(哈达莫夫斯基) 48
 propaganda materials 宣传材料
 The Agitator's Library 鼓动员丛书 81
The Fundamentals of Bolshevik Agitation 《布尔什维克主义鼓动的基本原理》 81
Handbook for Political Work in Military Groups and Units 《军事组织与单位政治工作手册》 83 - 84
Notizbuch des Agitators 《鼓动员手册》 83
Questions and Answers 《问题与答复》 81
 RADAR 《雷达》 84
Unser Wille und Weg 《我们的意志与方法》 18, 61, 75 - 78,

86,135

WAS und WIE 《为什么与怎么样》 67,81,83,86

Propaganda Ministry(RMVP) 帝国公众启蒙与宣传部 60,62,
67,69

divisions of 分支机构 60

propagandists 宣传员,宣传工作者 85

lower level 较低层级的 75

as a nuisance 作为讨厌的人 78

reading list for 阅读清单 49

public opinion 公共舆论 135 - 144

Nazi report on 纳粹相关报告 136 - 137

R

Raddatz, Klaus 克劳斯·拉德达茨 94

radio. See broadcasting 无线电广播

Ragwitz, Ursula 乌苏拉·拉格维茨 118

Raskin, Adolf 阿道夫·罗斯金 47

Reich, Das 《帝国》 97,99

Reich Chamber of Culture(RKK) 帝国文化协会 61,65

Reich Chamber of Film 帝国电影协会 112

Reich Chamber of the Press 帝国新闻协会 90

Reich Circle for National Socialist Propaganda and People's Enlightenment 国家社会主义宣传与人民启蒙帝国团体 62 - 63,77

Reichskulturkammer(RKK) 帝国文化协会 61,65

Reichspropagandaleitung. See Central Propaganda Office(RPL) 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

Reichsring fü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ropaganda und Volksaufklärung, 国家社会主义宣传与人民启蒙帝国团体 62 - 63,77

- religion; absolute claims of 宗教的绝对主张 46
 co-opted by Nazism 被纳粹主义所吸收 144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外部特征 36
 and Hitler 与希特勒 5,46
 and Marxism - Leninism 与马列主义 6,27 - 31
 political 政治的 156
 and propaganda 与宣传 4
 rituals of 各种仪式 145 - 146
 state 国家的 5 - 6,156
 See church 参见教会
- Ribbentrop, Joachim 阿希姆·里宾特洛甫 58,65
- Richert, Ernst 恩斯特·理赫特 84
- Riefenstahl, Leni 莱妮·瑞芬施塔尔 55
Triumph of the Will (film) (电影)《意志的胜利》 1,16,20,55
Victory of Faith (film) (电影)《信仰的胜利》 20
- RKK. See Reich Chamber of Culture 帝国文化协会
- Röhl, Ernst 恩斯特·罗尔 118 - 119
- Röhm, Ernest 恩斯特·罗姆 162
- Rosenberg, Alfred 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 19,58,110
 control of holidays 控制节日 19 - 20
 Goebbels' s opinion of 戈培尔的看法 65
 grandiose title 夸张的头衔 64
 and RPL 与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 64
 as theoretician 作为理论家 64
- Rothschilds Der* (film) (电影)《罗斯柴尔德家族》 113
- RPL. See Central Propaganda Office(RPL) 纳粹党中央宣传办公室
- 室

S

- SA (Storm Troopers): “褐衫队”, 或纳粹冲锋队 46, 62
- Saints, Nazi 纳粹圣徒 22 - 23
- salvation: intellectual 智识的拯救 14
- satire; and Brennessel 讽刺与《荨麻》 119 - 128
- and complaining 与抱怨 121 - 124
- domestic targets 国内的靶子 121 - 122
- and *Eulenspiegel* 与《捣蛋鬼》 103 - 104, 119 - 128
- international targets of 国际上的靶子 120 - 121
- Schabowski, Günter 君特·沙博夫斯基 133, 143, 162
- Scherzer, Landolf 兰多夫·舒尔茨 134
- Schmitz, Johannes 约翰纳斯·史密茨 91
- Schnitzler, Karl - Eduard von 卡尔·艾多尔德·冯·施尼兹勒
116
- Schuller, Wolfgang 沃尔夫冈·舒勒 164
- Schulungsbrief, Der* 《教育通信》 76, 78
- Schutzstaffel (SS)* “黑衫队”, 纳粹准军事的精英组织, 纳粹党卫
军 62, 90
- Schwarz van Berk, Hans 汉斯·施瓦茨·凡·博克 99
- Schwarze Kanal, Der* (TV program) (电视节目)“黑色频道”
116
- Schwarzenberg Korps, Das* 《施瓦岑贝格军团》 90, 105, 150
- 7 October 十月七日 32 - 33
- sharp sword 锋利之剑
- propaganda as 宣传 148 - 151
- silence; strategy of 沉默的策略 97 - 98
- Sicherheitsdienst* (Security Service or SD) 纳粹党卫军情报机构

- 97 - 98, 100, 136, 145, 161
- Simplicissimus* 《傻大哥》 117, 119
- Sindermann, Horst 霍斯特·辛德曼 67, 164
- Singer, Rudolf 鲁道夫·辛格 67
- 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 (SED) 德国统一社会党 27, 28, 49, 93, 133
- Agitation Department 鼓动部 66 - 67, 81, 83, 95 - 94, 118, 161
- leaders of 领导人 66
- party statute 党章 133 - 134
- Propaganda Department 宣传部 66 - 67
- publish house of 出版社 50
- Society for Germanp - Soviet Friendship (DSF) 德苏友好协会 138 - 139
- Song of the Faithful* 《忠诚颂》 15 - 16
- speakers: active party members 演说家:积极的党员 37, 74
- categories of Nazi 纳粹党的各级别 73 - 74
- Nazi system of 纳粹体系 61 - 62
- Speer, Albert 阿尔伯特·施佩尔 60, 110 - 111, 165 - 166, 168
- Sputnik* 《伴侣》 28
-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161, 165
- cult of 崇拜 27 - 28
- Stalingrad: battle of 斯大林格勒战役 96 - 100
- Statt - Kirchentag* 替代性教会会议 147
- Stasi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史塔西 (国家安全局) 142 - 143, 156
- Stellrecht, Helmut: *Faith and Action* 赫尔穆特·施特莱彻:《信仰与行动》 24
- Stern, J. P. J. P. 斯特恩 157 - 158

- Streicher, Julius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 18,138,141
Stürmer, Der. 《先锋报》 26,138,141
Supreme Command of Wehrmacht (OKW) 帝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96 - 97

T

- television 电视 92,94 - 95,116
and Hitler 与希特勒 16
under SED agitation department 德国统一社会党鼓动部控制下
116
Thälmann Pioneers. See Free German Youth 台尔曼先锋队 28
Thälmann, Ernst 恩斯特·台尔曼 28,34
theater 戏剧 111 - 112
Thingspiel 纳粹时期的戏剧形式 111
Walter Tießler 沃尔特·提司勒 62
Tisch, Harry 哈瑞·蒂希 106
Todt, Fritz 弗里兹·托特 111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131
arguments against 反对的各种论证 12
comprehensive 全面的 36
as form of religious expression 作为宗教表现的形式 12
as state religion 作为国教 13
and truth 与真理 13
used in classic sense 在经典的意义上使用 12
as worldview 作为世界观 13
Triumph of the Will (film) (电影)《意志的胜利》 1,16,20,23
Trommel 《鼓》 14,103

U

- Ulbricht, Walter 沃尔特·乌布利希 28,66,102,133,165
 and architecture 与建筑 114 - 115
 and literature 与文学 115
 “*Ten Commandments for the New Socialist Person*” “社会主义新人的十项戒律” 34 - 35
 and *Walter Ulbricht: A Life for Germany* 《沃尔特·乌布利希:为德国而奋斗的一生》 28 - 29
- unanimity 一致性 132 - 135,138
 critical role of 关键作用 132
 and elections 与选举 134 - 136
 façade of 外观/正面 141,143,150,156,158 - 159
 pressure for 追求的压力 132 - 133,167
 price of 代价 151 - 153
- Unser Wille und Weg* 《我们的意志与方法》18,61,75 - 78,86,135
Unsere Parole 《我们的口号》 76
- Utopia: secular 世俗的乌托邦 38

V

- Veritatis Splendor (Pope John Paul II) 教皇保罗二世的《真理的光辉》 168
- Vernier, Paul 保罗·维尼尔 114
- Victory of Faith (film) 《信仰的胜利》(电影) 20
- virtues: of Marxism - Leninism 马列主义的美德 40
 of Nazism 纳粹主义的 24
 traditional German 德国人的传统 34 - 35
- Voegeli, Eric 埃里克·沃格林 6,11

Völkischer Beobachter 《民族观察报》 23,90,109

Volkskammer 东德人民议院 135 - 136

W

Walter Ulbricht: A Life for Germany 《沃尔特·乌布利希:为德国而奋斗的一生》 28 - 29

Warsaw Pact 华沙条约组织 102

WAS und WIE 《为什么与怎么样》 67,81,83,86

Weber, Hermann 赫尔曼·韦伯 144

Winter Relief Campaign 冬季慈善救济运动 72,122

Wolf, Christa 克里斯塔·沃尔夫 116

worldviews 世界观 12

conflict among 冲突 39

GDR definition 东德的定义 13,14

and interior decoration 与内部装饰 13

Marxism - Leninism as 马列主义 53

National Socialism as 国家社会主义 17,24 - 25,99,149

See also church; Goebbels; speakers; totalitarianism 参见教会;
戈培尔;演说家;极权主义

Z

Zeitschriften - dienst 《工作杂志》 92

ZK . Se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SED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Bending Spines:
The Propagandas of Nazi Germany and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by Randall L. Bytwerk**

Copyright © 2004 by Randall L. Bytwerk,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导 论

历经整个第三帝国的一位牧师以一种方式描绘了他和纳粹官员的会面,它很好地解释了极权社会中的生活:“一个人将会一步步地被推得越来越远,直至他跨过某一界限,然而却没有注意到脊梁*正在以几乎无法察觉的速度弯曲了。”〔1〕他所遇到的纳粹党人都知道劝服是一个运用诸多方法的渐进过程。

正是在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的著名演说揭露了斯大林的一些罪恶之后,民主德国**国家赞美诗的作者兼文化部部长约翰纳斯·R.贝希尔(Johannes R. Becher)也写了一首直至2000年才得以出版的诗,它的名字叫《烧伤的孩子》(*Burnt Child*):

那个脊椎已经受伤的他
别人很难让他相信
还能笔直地站立

受伤脊椎的记忆

〔1〕 引自 Victoria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60.

* 根据情形,本书也有用脊椎。——译注

** 为简便起见,本书多用东德。——译注

让他恐惧
纵然治愈后
休息已足够长
并且不再有任何危险
会再次折断其脊椎。〔2〕

这诗也许是一种自白。在任何情况下,它只会在贝希尔死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出版。

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都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弯曲(bending),有时是折断(breaking)人们的脊椎——它们都发现宣传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过程。两个德国政体在许多方面差异甚大。一个是栩栩如生的邪恶的标志,另一个留下的则是一个苍白城市中灰白老人的形象。在电影和小说中,纳粹恶棍已经是常规。莱妮·瑞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 1935)就是一部典型的宣传电影。民主德国没有留下任何使罪恶如此昭彰的东西。民主德国的作家弗尔克·布劳恩(Volker Braun)曾把它称作是“地球上最令人厌恶的国家”〔3〕。一些人会赞同玛格瑞塔·冯·布伦塔诺(Margherita von Brentano)的说法,“将第三帝国和民主德国进行简单的比较会是极其糟糕的过度简化。第三帝国留下的是如山的军队,而民主德国留下的是如山的文件。”〔4〕

〔2〕 Johannes R. Becher, “Gebranntes Kind,” *Sinn und Form* 42 (2000): 343.

〔3〕 引自 Stefan Wolle, *Die heile Welt der Diktatur: Alltag und Herrschaft in der DDR, 1971—1989*, 2nd ed. (Berlin: Ch. Links, 1998), 14.

〔4〕 引自 Günter Heydemann and Christopher Beckman, “Zwei Diktaturen in Deutschland: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s historischen Diktaturvergleichs,” *Deutschland Archiv* 30 (1997): 2.

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差异不应该被忽略,但是二者同样有很多相似处。它们都试图运用宣传建立一个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将几乎一致享有一种类似宗教的世界观,今天有人会把它称作一种支配性的超越叙事,而几乎不会为真理的对抗性版本提供多少空间。它们都大力缩减开放对话的机会,使自身及其公民纠正政府所导致之罪恶变得困难,或许甚至是不可能。两个体系中宣传达到的程度根植于共同的历史与文化,也随意识形态而发生变化,这些相似处与差异将会告诉我们一些在现代世界中关于宣传的更为广泛的性质。

然而,这一称作宣传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可以说,有多少作者就有多少定义。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F. M. Cornford)的定义是我最钟情的——“一种非常接近于不用像欺骗敌人那样欺骗朋友的艺术”,但它却不是一个可操作的定义。问题部分在于,存在关于宣传的相互冲突的观点。〔5〕西方民主国家恐惧宣传,至少是公开反对它。称某人为宣传家无异于一种侮辱。宣传被看成是独裁的操作性工具。美国政府的对外宣传机构称作美国海外事务局(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它禁止向美国本土广播,因为担心伪装成信息的宣传可能会对国内产生不利的影 响。在纳粹接管前的德国,宣传也是可疑的。1924年出版的一本学术著作这样开头:“甚至宣传一词对我们德国人来说也是非常讨厌的。”〔6〕宣传被普遍看成是不诚实的同盟国(Allies)用以欺骗诚实德国人的工具,这一信念因以下争论而加强:德国只是由于被它国内的叛国者“在背后破坏”才会战败。

〔5〕 有关澄清此术语的一个有趣尝试,可参看 Stanley B. Cunningham, *The Idea of Propaganda: A Reconstruction*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2)。

〔6〕 Friedrich Schönmann, *Die Kunst der Massenbeeinflussung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24), 9.

20 世纪最大的独裁政府却不会这样看。对它们来说,宣传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现象。纳粹党人在戈培尔(Joseph Goebbels)领导下建立了帝国公众启蒙与宣传部(Ministry of Public Enlightenment and Propaganda, RMVP)。民主德国则在党务办公室中处理宣传。尽管如此,它们都建立了全面的体系来影响公共舆论和行为。社会过程取决于新的福音传播者(evangelists)或社会技术人员,尤其是宣传员。

纳粹党人走得更远,他们试图把宣传一词限定为他们的活动,从而为它的声誉辩护。1942 年一项对纳粹宣传员的训谕命令他们保卫这一词语的好名声:“宣传一词只能在积极的意义上使用,并且只能为德国的宣传所用。”鼓动(agitation)一词则用来指敌人意图影响公共舆论。〔7〕这一政策的不断重申表明它并不成功。〔8〕

虽然民主德国使用“宣传”一词涉及敌人的行为,但是它也强调,和资本主义的反动宣传比起来,马列主义的宣传则是一种有德行的活动。追随苏联的区分,民主德国把宣传分成两个相关领域:宣传与鼓动。正如标准的民主德国政治术语词典所说:“宣传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心部分,党的整个活动的中心。”〔9〕它提

〔7〕 Meyers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Kreisleitung Eisenach/56; Propaganda-Parole Nr. 7, 1942, 9.

〔8〕 甚至约瑟夫·戈培尔在 1942 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及敌方的宣传时,他主张,同盟国仍是好战的这一事实的唯一解释乃是,“它们的判断能力已经被不择手段和谎话连篇的宣传所蒙蔽了”。参见 Joseph Goebbels, *Das eherne Herz: Red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41/42* (Munich: Franz Eher, 1943), 344。

〔9〕 *Kleines Politisches Wörterbuch*, 7th ed. (Berlin: Dietz, 1988), 795. 全面的界定,可参看德国宣传档案(GPA): the German Propaganda Archive: <http://www.calvin.edu/academic/cas/gpa/kpwb.htm>. 未来有关德国宣传档案的文献将采取如下形式:GPA/title.htm。

出,马列主义的学说深入到了那些通过鼓动争取大众之人们的心中。鼓动被定义为“工人阶级政党对社会的政治领导的一部分,它把党的指示带到了大众之中”。按照苏联的方式,一个宣传员把许多观念传达给一个或几个人,而一个鼓动员只把一种或几种观念传达给更多的人。正如民主德国的一个地下笑话所言,宣传为从宽广的高速路到光明的共产主义的旅途提供科学的基础,而鼓动则就曲折与困境做出解释。

在这本书中我所采用的路径则来自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作品。他做了一个宽泛的定义:“宣传是由一个组织化群体采取的一系列方法,通过心理操纵达到心理上的统一进而融入一个组织,它想在由个体组成的大众群体行动中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参与。”〔10〕埃吕尔不仅在最明显的形式(比如,大众集会、报纸和海报)中,也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中看待宣传。这包括教育、艺术、公共行为以及现代技术与方法的整个设置(Panoply)。它就是各种手段的全部,通过它,人们被劝服来接受各种权力,而这不仅取决于告诉人们某些事情,还要确保他们的合作,以及劝服他们按照某些方式行事,即支持这一体系和巩固所期望的态度。

埃吕尔认为宣传的意义远大于政治领导人仅仅试图操纵追随者:“接受者(propagandee)绝不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他提供了宣传的心理动机,不只是引导他自己到达此处,甚至还从中得到满足。没有这一先在的、隐含的同意,没有技术时代每一公民事实上体验到的宣传需求,宣传就不可能传播开来。这里不只是邪恶的宣传员,在工作中建立种种方法使无辜的公民身陷囹圄。相反,也有公民从其自身存在深处对宣传的渴望和宣传员对这渴望的回

4

〔10〕 Jacques Ellul, *Propaganda: The Foundation of Men's Attitudes*, trans. Konrad Kellen and Jean Lerne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61.

应。”〔11〕换句话说,宣传其实同时满足了宣传员和接受者的需求。

宣传是技术和方法不断增强的权力之不可避免的结果,也是技术不可逆转的潮流。它帮助政府成功地与通过现代媒体了解事态发展的公民打交道。公民不能再被简单地忽略,但是没有哪个政府能提供与其公民相关的每一主题的全面信息,或者追随在大量问题中不断变化的公共舆论。在混乱与改变之间,宣传有助于提供给公民关于周遭世界的满意解释。

埃吕尔认为,所有现代的宣传,不管它是由民主还是极权政体制造的,从根本上说都是相似的。尽管如此,极权体系所期望于宣传的远多于民主社会。虽然它们不期望马上见效,但却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宣传将会帮助它们形塑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而这是它们所设想的乌托邦未来的前提。

“宣传”一词能在宗教劝说中找到其渊源。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Pope Gregory XV)在1622年创立了一个叫做宣传基督信仰之神圣会众的团体(sacra congregatio christiano nomini propagando,通常以th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propaganda为人所知,或红衣主教会议)。它的使命是在新世界传播天主教义,并同欧洲的新教主义做斗争。由于相当不同的使命,它至今尚存,来罗马的参观者还能沿宣传街(Propaganda Street)散步。正如本书所要澄清的,宣传这一术语的宗教起源正揭示了它20世纪看似世俗模式背后的脉络。

从某一看似古怪的角度来看,在其最初的宗教意义上,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都在从事着宣传的事务。纳粹党人将会比马克

〔11〕 Jacques Ellul, *Propaganda: The Foundation of Men's Attitudes*, trans. Konrad Kellen and Jean Lerne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121.

思主义者更乐意接受这一陈述。一般来说,政治处理的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事情。与之相比,伟大的宗教则通常声称它们有权利统治全部生活。西方民主政体倾向于认可弱权力的政党,它们对其成员提出尽可能少的要求,但是,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者则试图让它们的世界观统领生活的所有领域,事实上,不仅是政党成员的生命,还包括它们社会中的所有入。

顺理成章地,那些撰写关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人通常将其与宗教运动加以比较,但是通过更详细的阐释,这一类比将会更有成效。极权主义运动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平(*Peace of Westphalia*,通常认为它终结了欧洲各国试图强迫所有公民对其国教的忠诚)前的基督信仰,或者当今世界某些国家的实践非常相似。〔12〕这种宗教变体强迫公众忠诚于某一既成信条,这一忠诚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一些人怀着真诚的信念接受了这一宗教,相信它的教义,并且试图在其生活中贯彻它们。这些人充满自信,却做了最糟糕的事情,尽管他们认为这些是好事情。〔13〕其他人则只是出于实用的理由采纳了这一信条:他们的事业或者个人安全取决于这一公开的忠诚。另外还有很大一个群体则相当怀疑其真实性。也就是说,教会的力量,以及看似普遍接受了这一教会的社会的压力会导致毫无热情的接受。这些公民在忠诚测试中经受了审查,但其信念却是不温不火的。最后,还存在一些异教徒和离经叛道者(heretics and infidels)。异教徒共享着基本的神学体系,但是以异于既成教派的方式来解释它。离经叛道者则信仰一种完全

5

〔12〕 希特勒因各种原因对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不满,因而主张废除它,虽然那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参看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Munich: K. G. Sauer, 1997—2001), 7:33。

〔13〕 对东德背景下好心人作恶的进一步分析,参看 Lothar Fritze, *Täter mit gutem Gewissen: Über menschliches Versagen im diktatorischen Sozialismus* (Cologne: Böhlau, 1998)。

不同的宗教。既然异教徒声称,被接受的真理并未在社会内部被普遍秉持,那么他们比离经叛道者更糟糕。许多牧师推动和强迫公众的忠诚,国家与教会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古老的教会与现代的极权主义运动之间的相似处既非少得可怜,也非琐碎而不重要。

威斯特伐利亚之后的西方国家认定,上帝而非政府处在裁决其公民信仰的最恰当位置上。太多的宗教战争带来了太多的伤亡。极权主义体系,即使像国家社会主义那样与宗教只存在模糊联系的体系,也不能依赖上帝了。如果真理需要辩护,国家或政党必须为之。其结果是,它们会不可避免地重蹈国教(state religion)的覆辙。

在对《我的奋斗》(*Mein Kampf*)进行的生动评论中,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把纳粹主义看成是“本质上的宗教思想模式的一个私生子”。〔14〕希特勒看来不会同意只用“私生子”一词来比喻它。在《我的奋斗》中,他讨论了宗教的重要性:“拿走目前人们在教育基础上形成的宗教教义原则——或者,实际上就是伦理道德原则——通过取消这一宗教教育,但是没有能取代它的一种等价物(equivalent),其结果将会是对他们存在根基的严重打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不仅人们生活是为了服务于更高的理想,而且相反,这些理想也是他们存在的前提。”〔15〕他不关心宗教中的真理,只对其实际的后果感兴趣。他称赞天主教固守其教义的坚定意志,并且这样写道:“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民众并不是哲学家;确切地说,对他们而言,信仰经常是一种道德姿态的唯一基础。”〔16〕他希望纳粹党能提供一种将宗教的力量带到政治舞台

〔14〕 Kenneth Burke, “The Rhetoric of Hitler’s ‘Battle’” in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 (New York: Vintage, 1957), 188.

〔15〕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trans. Ralph Manhei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1), 379–380.

〔16〕 同上, 267。

上的等价物。

在1928年的一次对党的宣传员所作之演讲中,他的助手约瑟夫·戈培尔说道:“你永远不会认为百万民众会为了一个经济计划而献出其生命。但是他们情愿为一个信仰而死(Evangelium),因而我们的运动就是要不断接近这样一个目标。”〔17〕我们将在第一章看到纳粹党人是如何在宣传中明确运用宗教主题的。就现在而言,只须注意到他们所建立的不只是一个政治体系,而且还是一种声称对生活所有领域都享有权威的世界观就足够了。

那么马列主义又怎样呢?至少,把无神论哲学看成是宗教的就已经够奇怪了。然而,德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谈到苏联时,就明确做了一个宗教上的比较:“正如一神论者的上帝一样,独裁者就是一个嫉妒心甚强的上帝。它绝不容忍其他上帝的存在。”〔18〕一个更生动的民主德国“宗教”的描述,在其解体后不久就有人写道:“东德就像一个伪宗教崇拜的大庙宇。它拥有全部的外壳(trappings):对领袖的上帝般崇拜,‘圣徒’的画像以及来自教义、游行、大众仪式、誓约和严格的道德要求与戒律中的各种语录(quotations)。这些都由占据教士般‘等级’的宣传员和党务秘书们所施行。”〔19〕波兰作家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谈到这一点时稍显温和:“在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人谈论‘新信仰’,并且把它的发展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

〔17〕 Joseph Goebbels, *Signale der neuen Zeit: 25 ausgewählte Reden*, 5th ed. (Munich: Franz Eher, 1938), 44-45.

〔18〕 *Materialien der Enquete-Kommission "Aufarbeitung von Geschichte und Folgen der SED-Diktatur in Deutschland"* (12. Wahlperiode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vol. 3, book 2 (Frankfurt: Suhrkamp, 1995), p. 1416.

〔19〕 Hans-Joachim Maaz, *Behind the Wall: The Inner Life of Communist German*, trans. Margot Bettauer Dembo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 2-3.

发展相提并论。”〔20〕

虽然拒绝了宗教拥有真理的权利,但马列主义者的主张其实履行的是相同的功能。正如在一次德国联邦议院(German Bundestag)听证会上,一位证人这样提及民主德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诞生于一个失去了共同的、义务性的基督教国教的国家中。”〔21〕正如我们随后将会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在本质上通常是宗教性的,特别是讲到所谓永恒的真理和永远的友谊时,并且它还许诺在共产主义社会,一个幸福的未来国家将会在千禧年憧憬中实现。

我个人是作为一个改革传统(加尔文主义者)中的基督徒来写作的,我认为极权主义本质上诉诸宗教动机,并且满足了人类固有的需求。虽然作为一种替代性宗教,它很拙劣,不过尤其符合一种世界观的需要。正如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所写:“当上帝退回到我们不再可见的世界背后,其结果就是世界上的一些事物注定会变成新的上帝。”〔22〕我相信,那些不同意我观点的人也会接受这一事实:极权主义体系在很多方面的运作酷似于那些伟大的宗教。

7 本书通过它们的福音传播者即宣传员,考察了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的马列主义。在基督教传统中,传教士是信条与好消息的传播者,这几乎就是极权主义拥护者们角色的准确表达。我首先会对这些体系的世界观作一总体的考察,它们对于理解各自的宣传方式是根本的。我会揭示这些世界观是如何提出宗教的典型关切,并且为了指导成人与青少年而建立意识形态教义手册的。

〔20〕 Czeslaw Milosz, *The Captive Mind*, trans. Jane Zielonko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81), xiii.

〔21〕 *Materialien der Enquete-Kommission*, vol. 3, bk. 3, p. 2077.

〔22〕 Eric Voegelin, *Political Religions*, trans. T. J. DeNapoli and E. S. Easterly III (Lewiston, N. Y.: Edwin Mellen Press, 1986), 59.

接下来的章节将会阐述宣传的结构与行动者、媒体、文艺和公共生活。作为结论,我认为,抛开所有的喧嚣与骚动,极权主义的宣传都有着确保其最终走向失败的内在缺陷。简单来说,长期来看,它们不能以满足人类需求的诸多方式来维系全方位的宗教愿望、实践、信念和意义。

但是为什么要把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进行比较呢?更明显的比较应该是在纳粹德国与苏联,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沿着这一路径,已有大量著作讨论它们。〔23〕毕竟,马列主义是伴随着苏联红军而来到东德,而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不再能维持下去时,也就意味着马列主义的终结或寿终正寝。正如苏联是马列主义的中心一样,德意志就是纳粹主义的中心。为何要将太阳与月亮相比呢?并且人们似乎并不喜欢这种类比。当我在网站上吐露我正在写作此书时,我得到的是同时来自新纳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愤怒回应。新纳粹主义者希望表达,他们的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无任何共同点。过去民主德国的公民(以及那些特别希望民主德国成功的西方学者)更愿意认为,这两种体系之间的距离是越远越好。〔24〕这一比较的危险是,它会促成一

〔23〕 两个相当不同的例子,可参看 See Alan Bullock, *Hitler and Stalin: Parallel Liv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and Aryeh Unger, *The Totalitarian Party: Party and People in the Nazi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24〕 一个英国熟人谈及1980年代参加一场有关东德的会议的经历,在那里,最重要的学者 David Childs 对东德的状况做了一个批评性的解释,其中包括这一体系不能满足消费者的期望。他提及了蔬菜短缺的例子。学者们的听众,普遍对东德工程持同情态度,因而积极地予以回应。一位教授气得浑身发抖,站起来呵斥道:“我来这里参加会议不是为了听什么关于蔬菜的趣闻轶事!”但是东德不能提供给消费者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当然是它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

个小规模版本的 1980 年代德国史学争论 (Historikerstreit), 后者乃因如下观点而起: 有人主张纳粹主义者从苏联那里学得了暴虐。

基于以下原因, 纳粹与民主德国之间的比较是有收获的。两个体系共享了同样的历史与文化。它们都宣称自己代表了德意志的顶峰。一旦我们去理解这两个体系是如何试图把宣传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之上, 就会发现这应该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如此而言, 宣传本身的弹性如何呢? 民主德国在 1949 年正式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 但是它的基础则根植于苏联占领的起初那段日子, 紧随第三帝国崩溃之后。在根本不存在时间空隙的情况下, 同样的方法能成功运用于相同的一批人, 从而推动形成两个相当不同的体系吗? 第二, 这两个体系的相似性究竟有几何? 民主德国的宣传揭示的是极权主义的一种更“宽容与温和的”形式吗? 社会主义的更人道主义的想象产生的宣传会比纳粹党人的更无害吗? 8 这些问题很可能会激怒很多人, 不过这一迹象或许表明, 在这些毫不相关的体系中, 其性质与后果却有着无法抹去的顽固的重叠。

宣传是一个很广泛的主题。2000 年的一份有关国家社会主义出版物文献目录列出了超过 3.7 万个条目, 它们中大部分或多或少都与宣传有关系。〔25〕关于民主德国的文献从未可能与前者持平, 不过它的内容充实, 数量也在增加。〔26〕本书不打算对两个体系下宣传的内容做一全面综合的分析。相反, 我的目标是去考

〔25〕 Michael Ruck, *Bibliographie zum Nationalsozialismus*, 2nd ed.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00)。

〔26〕 2000 年出版的一份参考文献列出了出版于 1990—2000 年间的 5800 本著作。参见 Hendrick Berth and Elmar Brähler, *Zehn Jahre Deutsche Einheit: Die Bibliographie* (Berlin: Verlag für Wissenschaft und Forschung, 2000)。相关在线资料库在 2003 年 12 月列出了 4.6 万个条目, 尽管参考文献和资料库中许多条目都是涉及 1989 年后发生之事。参见 <http://www.wiedervereinigung.de/>。

虑一些更关键的问题：在两个压倒性的极权体系中，宣传究竟起何作用？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与民主德国中，宣传有何相同点，它们在哪些方面又截然不同？它们如何成功，在哪些方面又失败了？我在注释中提及的文献提供了有关这特定主题的更详细的分析。

本书是我长期关注德国宣传现象的结晶。当我1971年在西北大学罗伯特·布鲁克斯教授门下读本科时，就对纳粹的宣传产生了兴趣。1980年代早期，我开始订阅东德的杂志，那时，通过航空订阅该国的主流日报《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每年需22美元。虽然民主德国并不鼓励毫无约束的游览，但是它确实为德国的外籍教师开设了一些课程，只要他们乐意付一些名义上的费用就能参加。这些课程因此提供了开放性签证，并且那些教职人员并不过度坚持出勤率，这也就给了我机会，让我在1988、1989和1990年夏天游历整个民主德国，并且遇到了许多的东德人。作为美国人，一些人把我看成是一个他们很快就会信赖的“安全的”谈话伙伴。我1989年的访问尤其有趣。1989年4月，我的名字出现在了大众周刊《每周邮报》(*Wochenpost*)的笔友专栏中。我并未期望看到我的谈话出版。这是1949年以来，该杂志第一次刊登西方人的谈话。我收到2300多封民主德国公民的信件，他们热切期盼与一个美国人通信。正如此，我能去拜访大量的东德人。^[27]这里很多要归功于我的民主德国友人和熟人，尽管他们并不总是同意我从与他们谈话中得出的结论。

[27] 由于已经请求人们给我写信，我就几乎不能忽略他们的信件，但是我也无法同那么多人保持通信联系。因此，我只得在1989年6月以一封冗长的信回复他们中最早的1800人。我让这封信尽可能看起来是无害的(*innocuous*)，因为我知道，如此大量从美国而来的信件会吸引国家安全部官员们的注意，他们专司检查进入国内的国际邮件。我本期望所有的信件要么全被扣下，要么全部放行。正如结果所显示的，东德有10个地区性的邮政辖区。它们中有4个把信件投递出去了，其他6个则一封未递。

本书还有一个很有用的附属资料库,即一个因特网网址,德国宣传档案(German Propaganda Archive, GPA),提供了纳粹与民主德国时期宣传材料的英译本。它也包括许多图片资料。一些注释将会提及德国宣传档案中的某些部分,它们包含与所探讨问题相关的译文与图片资料。德国宣传档案能通过 <http://www.calvin.edu/academic/cas/gpa/> 查询。

- 9 很难预测技术的前景。当目前互联网的形态看起来就是一个历史的新奇事物时,我仍在 2003 年从事写作,并且深信很多人会阅读此书。尽管如此,为了可预见的未来想,我仍打算维护与增加档案,并采取措施以适应技术可能提供的机遇。当然,不管其电子形式多么便捷,我仍会把纸质副本存放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Grand Rapids, Michigan)的加尔文学院图书馆中。